



张新泰 总主编
杨 镰 主 编

Series of Western Regions'
Exploration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新疆新观察

◎储安平 蒲熙修/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张新泰 总主编
杨 镰 主 编

Series of Western Regions'
Exploration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 | |
|---------------|-----------|
| 穿过亚洲 (上卷、下卷) | 蒙古新疆旅行日记 |
| 罗布泊探秘 (上卷、下卷) | 游移的湖 |
| 楼 兰 | 走进西部 |
|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 边城蒙难记 |
| 外交官夫人的回忆 | 新疆游记 |
| 丝绸之路 | 亲历西北 |
| 我的探险生涯 | ▶ 新疆新观察 |
| 重返喀什噶尔 | 天山之麓 |
| 横渡戈壁沙漠 | 修女西行 |
| 蒙古的人和神 | 塔克拉玛干考察纪实 |
| 新疆地下文化宝藏 | |
| 荒漠寻宝 | |
| 驼 队 | |
| 别夫佐夫探险记 | |
| 未完成的探险 | |
| 亚洲的脉搏 | |
|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 |
| 世界屋脊 | |
| 新疆考古记 | |
| 橘瑞超西行记 | |

ISBN 978-7-228-16595-7



9 787228 165957 >

定价：39.00元



张新泰 总主编
杨 镰 主 编

*Series of Western Regions'
Exploration*

西 域 探 险 考 察 大 系

新疆新观察

© 储安平 蒲熙修/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新观察 / 储安平, 蒲熙修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5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ISBN 978-7-228-16595-7

I. ①新… II. ①储…②蒲…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4141号

责任编辑 罗 沛

整体设计 刘堪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365236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大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开
印 张 19.25印张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 000册
定 价 39.00元



出版说明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文献中有了关于西域的正式记载，而历代对于西域的界定，又大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西域的主体部分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辖范围。因此，人们往往会把西域——新疆作为同一概念联系起来使用。

西域这一片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袤地区，自然环境多样，地理位置独特。几千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行者一起开拓经营，创造了辉煌一时的历史。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贯穿全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会，形成了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荟萃的特点。然而，自14世纪以后，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改变、海运的畅通，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片曾是东西交通枢纽、人类几大文明的交会之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从17世纪起，在世界列强扩张殖民地、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西域重新吸引了人们关注的视线。随着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出现与国



际东方学的兴起，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探险考察者纷至沓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高潮。而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觉醒使一批抱着固边强国愿望的有识之士也形成了一股西行考察的热潮。尽管这些探险考察者的目的不同，一些人的行为受到指斥，但他们以全新的视角和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观察与探索着新疆，他们让世界了解了新疆。因此有人说，20世纪是重新发现中国西部的时期。

20世纪末，中国有了近2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被提出，而中国学术界也在西域历史文化、敦煌吐鲁番学与丝绸之路研究等有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总结10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西域的探险考察历史，让人们真实、准确、全面地认识西域、了解新疆，并为今后的考察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共识。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说，那些考察著述，不仅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也呈现了雄奇壮阔的西域风光、神秘诱人的古代遗址、多姿多彩的西域风情、惊险曲折的探险经历，更是难得一见的出版资源。于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一套大型系列丛书《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一版）。

丛书第一版总主编宿白，主编马大正、杨镰、陈重秋、荣新江，另设编委14人。丛书选题设计主要包括三大部分：（1）外国探险考察者的著述。（2）中国历史上关于西域考察的著述。（3）现当代中国学者的探险考察及其著述。但由于多种原因，在实际出版过程中，主要实施的是第一项规划。共计出版了十余种著作，部分图书还以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面世。在这一过程中，编译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炼句结章、索证求实，其艰难程度甚至会超出原创作品；而主编运筹调度、加工润色、事必躬亲的作风也体现了传统的学者风范。丛书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随之而来的相关出版热潮，促成新疆人民出版社塑造出一个自有品牌。

2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对西域探险考察的认识更加明确，了解也更为深入。当更多的资料被发现、更多的研究成果呈现在面前时，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三版。在新版



中，除保留原有的部分选题外，又新增了20多种，计划出版30种。在新版的选题中，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是基本原则。在《西域探险考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富于生动细节、符合一般读者阅读兴趣的著作被优先选用。中国作者原创性著述占有一定的比重，是新版图书在选题结构上最明显的变化。图文合一、相辅并重是这次新版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近年来《西域探险考察》的研究进展与新的发现是修订整理的依据；读者定位与市场反馈是必要的参考；而由主编为每一部著作写一篇导读性序言，则是继续保持的风格。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先生为丛书撰写了总序，提纲挈领，开宗明义。读者藉此，不仅可对《西域探险考察》的性质与意义了然于胸，对正确认识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将获益良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三版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宿白^①

中国的 19~20 世纪之交，以古代文明再发现著称。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 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因为服中药龙骨而辨认出第一组甲骨文，使来自安阳的龟甲兽骨不胫而走。从此，中国历史的纪年，自公元前 841 年的“周召共和”前移了近十个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发现之门。

1900 年，道士王圆箎清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积沙时，长期密封的洞窟复现于世。敦煌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亩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

1900 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为千年流沙湮

^① 宿白：北京大学考古系原系主任、教授。



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汉书》的楼兰故城。沙埋故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间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更名为鄯善）的边境重镇。王国维《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故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培”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鄯善）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佉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佉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想象之词。楼兰故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佉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意是“城镇”。“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佉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故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现代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故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



老村落塔瓦库勒。

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寻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赫定终于见到了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入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入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中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的主要经济来源。

除了《东国公主传入蚕种》，《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故事。

于阗国边境有一个兴盛的城邦，叫曷劳洛迦，因为不信佛教，甚至灭法驱佛，受到上天惩罚，天降一周沙雨，将曷劳洛迦彻底湮灭，沙尘竟聚集成为巨大的沙包。每逢风雨过后，沙包附近就散落着历经劫难的宝物。离开丹丹乌里克，赫定北行贯穿沙漠的第一站，便路过了当地人叫“喀喇墩”的故城。故城为沙子覆盖，喀喇墩，含义正是“黑沙包”。赫定离去后，斯坦因在喀喇墩故城做了发掘，出土物品最奇特的，是储存粮食的大陶瓮。喀喇墩故城与《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传说对照，应该有必然联系。但曷劳洛迦，无疑是“KROLAYNA”（楼兰）的异译，本意也是“城镇”。

新疆塔里木的绿洲城镇为沙雨埋没，出自古人对天灾突然降临的反馈。“沙雨淹没曷劳洛迦”，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例证。

首次报道丹丹乌里克、喀喇墩、楼兰等古遗址的斯文·赫定是瑞典探险家，丹丹乌里克与喀喇墩的再发现，本属沙漠探险的意外收获。而新疆的戈壁荒漠，每逢风沙过去就会出现古代器物，却由来已久。楼兰故城复显于世，为人们了解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独特的



视角。

毋庸讳言，发现尼雅遗址、安迪尔故城等地的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而且吐鲁番、库车、拜城、焉耆等地的寺院与千佛洞等重要遗址遭到西方探险家的掠夺性破坏，成批的文物被运往国外，引起了广泛义愤。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遭遇的缩影，它留下的教益已经成为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新疆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史重要章节，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疆探险考察，我们对西域以致对整部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出现更多的盲区。

作为中华文明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丹丹乌里克遗址、喀喇墩故城、楼兰故城、尼雅古绿洲等陆续发现，足以证明：

以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著称的西域文明，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天山南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没有存在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时段。

在西域，“丝绸之路”是贯通东西方文明的通道。西域文明的特点，来自它的地理位置、人文构成、历史变迁等因素。

西域文明，是中华民族包容性、丰富性、和谐性的体现。西域文明，使中华文明增添了广被四裔的影响力。

从斯文·赫定开始，来新疆的外国探险家回国之后，总要就其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比如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亚与西藏》，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古代和田》。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①，先后出版了50多种著述，成为认识中国西北的系列读物。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生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不但拥有

^① 中瑞共同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文原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统一作“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众多读者，而且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十余种探险纪实之作，在读书界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新一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我希望新的大系有机会补救第一版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出于技术与成本问题，曾删去了书中的绝大部分插图，而这些插图与文字一样，都是忠实的历史记录。再者，为重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一些书比如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不能忽略。另外，确定入选书目时，一定要可读性、纪实性并重，等等。

相信具有了上述特点的新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能成为认识新疆的长线读物，拥有不同年龄段的读者。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马大正^①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正如中国边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样，中国边疆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以西北史地为例，清人的西域史地学派实际是当时学界的风向标，一论既出，马上为世人瞩目。

19世纪以来，中国为列强环伺，面临瓜剖豆分的危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掀起了边疆研究热潮，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以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为代表，学人普遍将关注边疆视为国体存没的特征。20世纪前期，在民族危亡的激发下，边政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以前的边疆史地研究，经历了从中国传统的史学发生，到以现代多学科为基础的新的研究内涵的质变，对当代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①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

回顾60年来的学术史，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中国边疆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同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迎来了蓬勃兴旺时期，可以视为近代以来，继19世纪后期、20世纪20~40年代之后，第三次研究高潮，其重要标志是：

中国边疆学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突破了以往仅仅重视研究近代边界位置与走向的积习，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学学术史这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另一个是以史地研究为基础，走出了纯史地研究的范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的、多学科的、贯通古今的学术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边疆学研究的视角广阔，学者众多，成果丰富。

同时，中国边疆研究的特点逐步形成：对边疆区域的探险考察、对以往边疆探查史著的发掘与研究，是学界热点，受到不同年龄段学者的共同关注，使中国边疆研究集人文地理、探险发现、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成果，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具有牵系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前沿位置。

以西北边疆史研究为例，19世纪后期开始的新疆探险发现，特别是1901年发现楼兰古城掀起的考古探险热，成为考古学进入近代时期的标志。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外著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编辑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亚洲探险之旅》等丛书，刊布了《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等系列档案文献，以及芬兰马达汉（曼纳林）的《马达汉日记》等数十部有关书籍。

作为边疆学术史的组成部分，1992年、1996年在乌鲁木齐连续召开了以总结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西北探险史成果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西域考察与研究”会议，就“19~20世纪西域考察及其学术遗产评估”、“西域历史研究”与“西域考古与文化研究”作了专题讨论。1996年会议，则以“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丝



绸之路考古”、“丝绸之路文化”为议题，分别出版了会议论文集。1992年国际会议之后，特别组织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有八个国家学者参加的考察队，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环塔里木探险考察。在考察的终点库尔勒市，考察队员专门讨论了探险史与边疆史研究的学术衔接问题。同时，会议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开始编辑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可以说，有两次会议做平台，我们将19~20世纪西域探险纳入了边疆学术史的库存，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范例之一。实际上，与我们更贴近的是中国学人的边疆区域考察纪实。

1917年，民国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单车远征，在新疆走了前无古人的路程，并以一部《新疆游记》记述了清朝覆亡之后新疆的现状，将西域的历史与未来纳入笔端。1919年“五四”前后，为解决西部交通问题，历时10个月、行程1.1万公里，林竞在中国西北做了跨越几个省区的考察，并且率先以“开发西部”标榜。他的《亲历西北》（《西北丛编》）一书，为西北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内容。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内蒙访古》一文，才华横溢，格调高昂，别有韵致，不长的文章探及中国西北民族兴替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常年列入中学语文的教学范文。当代学者的边疆考察实践超过了中外前辈，众多成果令世人瞩目，但是他们个人的探险考察经历，却鲜为人知。他们用自己的实践，传承文明，感受文明，他们本身就是西北边疆学关注的内容。这是边疆学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的特点。为此，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边疆探察丛书》、《边地文化探踪丛书》，以及《中国西部探险丛书》。在几种丛书之外，纪实之作比较有影响的尚有数十部，仅以新疆为例，有杨镰的《最后的罗布人》和《黑戈壁》以及穆舜英的《寻找楼兰王国》、王炳华的《沧桑楼兰》和《新疆访古散记》、张平的《草原民族文化的灵魂》等等。

在边疆学术史研究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19世纪以来外国人记述探险过程的著述的学术含量。新中国成立后，这曾经是有重大争议的话题。

19世纪中叶，在日趋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危机四伏，统



治者既无力缓解国内众多矛盾，更无力抵御世界列强的入侵，盛极一时的清朝的衰亡已经不可逆转。在列强加紧侵华的大背景之下，众多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旅游者，以及形形色色、身份迥异的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的边疆区域。从事探险考察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每个人所抱的目的不同，方法各异，在对待当地居民以及中华文化等方面，态度、取舍更带有时代与个人色彩。他们从事探险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旅途所经，又往往属于人迹稀少、古今文明屡经兴替的边裔，有关文字记述相当罕见。除了某些以搜集古物为唯一目的的探险家，比如冯·勒柯克、格伦威德尔等等，他们对古代遗址的带有破坏性的发掘历来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一致谴责，其他大量的书籍毕竟出版在一个世纪之前，种种偏见与误差难以避免，而这正是今天边疆学术史研究的内容之一。所以，不能因为有片面性、局限性就忽视它们的价值，就将其置于视野之外。

关于这一点，有这样一例证：

1907年，斯坦因抵达了罗布荒原，他的目标简单明确：前往楼兰故城。在途中，他的驼队突然止步不前，原来路边出现了两个罗布人的伯克，他们身着大清的五品官服，官服敝旧，已有补丁，而且并不合身，但漂洗干净，缝补针脚细密，着装中规中矩。这两个伯克是清代康熙时册封的世袭官员，他们特意来向探险队的外国人检验护照。作为大清臣民，这是他们的职责与承诺。这真叫斯坦因感慨不已。他走遍西部，所到之处，通行无阻，腐败的官方无不唯唯诺诺，从不敢拂其意，根本不用出示护照。唯独在这罕见人烟的“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斯文·赫定语）的罗布荒原，却遇到不惧强权的、维护大清国权威的罗布人。

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但他的记述却为当时中国边疆地区的人文情感、政体结构，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

总之，中国边疆研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学科，也是充分体现出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内涵的学科。60年来的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与学科本身内涵、外延密切相关。边疆研究不仅仅是边界走

向的确认，还与中华文明发展变化的脉络吻合。它的每一个进展，又体现出贯通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使这个学科突破了学术樊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深入人心的具体例证。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也就成了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当然关注的议题。

只有对中国边疆历史发展情况有清晰的认知，才有合乎现代意义的边疆学。重视对边疆区域的实地考察，是中国边疆学的明显特点。

受到1992年“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特别是会后多国学者环塔里木考察的直接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开始正式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作为执行主编之一，我对这部丛书一直寄以期望，而友人杨镰教授用力颇勤。近年来，新疆人民出版社计划重新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由杨镰主编。从倡议起，我与杨镰就选题、内容等问题做过反复的商讨。新的大系将发挥原来丛书的特点，使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感到开卷有益。新的大系除了以新疆的“探险”与“考察”为主题，而且通过努力扩大视野，使读者可以凭借对新疆的“探险”与“考察”，置身于发现者的行列，认识新疆的过去，把握新疆的未来，为正在构筑的中国边疆学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储安平与蒲熙修对新疆新时期的 即时报道(代序)

杨 镰

20世纪的新疆，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前后两期。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不但是中国现代史的大事，更是新疆历史的转折点。

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与蒲熙修的《新疆纪行》，是率先对和平解放之后的新疆作出的调研，并且以独特的视角报道基层情况的纪实之作。同时，它们反映出当时中国的两大强势媒体《新观察》杂志与《文汇报》对新疆的特别关注，对新疆位置的认同。

—

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早年热心写作，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学习，学习期间即出版了小说集《说谎集》（1930年）。大学毕业，在南京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抗战期间，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杂志，到1948年12



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一个民办刊物居然有10万余份的发行量。1949年10月以后，《观察》杂志很快就复刊了，1949年11月，储安平出任《观察》杂志主编，1950年，《观察》杂志更名《新观察》杂志。此后，他出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改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离开《新观察》，储安平以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视察采访，包括深入新疆天山南北。在新疆期间，写出系列报道，并且先后在《人民日报》、《新观察》、《旅行家》等报刊发表，时间跨度是1954年的下半年到1956年。1957年1月，作家出版社便出版了这些报道的精选集《新疆新面貌》，副标题是《新疆旅行通讯集》。可是，储安平的新书在新华书店与各图书馆陆续上架时，刚刚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就成了“大右派”，印装好的《新疆新面貌》，大部分从印刷厂直接拉到了废品收购站或造纸厂。从“反右”开始，储安平作为记者自报刊淡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失踪。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的22篇报告文学，通过具体的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新疆进入和平生产时期的整体状况。认真读过《新疆新面貌》，就知道新疆今天的来之不易。可以说经过60年的历史进程，今天新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直射，新疆今后的路径走向，就确立于那个时期。《新疆新面貌》涉及了从阿尔泰山到帕米尔高原，从伊犁河谷到和田沙漠绿洲的广袤区域。然而它的立足点（着眼点）仍然是对新疆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归纳判断。储安平通过《新疆新面貌》反映的思想观点，当然离不开它的时代，但作为一个的新闻记者，他坚持自己搜集第一手素材，一切来自生活真实。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新疆新面貌》之中写到的内容，为那一阶段的历史留下了真切的印记。

《新疆新面貌》第11篇《在塔里木河下游》，是全书的范例。

1955年6月，储安平在塔里木河的下游亲自探访了一个村庄，这个叫“客拉切其”的地方，是著名的罗布人的聚落地，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居民“终年捕鱼为食，并且吃草根”，以麻布片为衣，完全自给自足，只要有外人来到，居民们躲进芦苇荡或柽柳沙包。从尉犁县城，经群



克，再经卡拉，越过了英格可力，就来到人迹罕至的客拉切其。实际上，这里距离1899年斯文·赫定考察罗布荒原的大本营“图拉撒干乌依”不远，著名的罗布人奥尔得克在加入赫定探险队之前，就是这附近的渔民。在当年，哪怕在今天，这一带都是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不稳定的区域，是神秘寂寞的地方。储安平一行，是客拉切其历史上第一批专门来访的客人。那时，村民们很少见到外人，也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如果真的有世外桃源的话，这里就是了。

储安平就在这个世外桃源发现了容易被忽视的人间至情至感，记录了“化外之民”罗布人的生活实况，对塔里木河，对河流两岸的植被与动物，没有人比对世居于此的罗布人更敏感，更有发言权。新疆解放了，罗布人做了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再因为穷困而躲避时代潮流，从新疆解放到储安平到来，仅仅几年时间，通过外人的眼光折射出他们融入社会生活的强烈愿望。来到客拉切其，更有收获的是身居新闻界要职的储安平，他倾心写成的《在塔里木河下游》，就是从这个原本人迹罕至的小小村落出发的一次穿越时间壁垒的旅行。通过与罗布人的相识，储安平确认了自己在新生活的位置。

储安平以资深记者的职业敏感，在这篇文笔准确、感情充沛的通讯之中，借助许多生动细节反映了新疆正在出现的深层变化。他这样描写了这个塔里木河岸边的村落的人与环境：

这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些平平的沙地，而是被风吹成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冈。沙冈不很高，大约两三米光景。沙冈上间或露着一些从沙子里挣扎出来的红柳或苇子。整个村子就被包围在这样一望无边的沙浪里面。

我们被引导到村子东头的一排矮小的屋子里。屋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只有两扇门，没有窗子。屋子里砌着一个有一米半高的、可以通烟到屋顶上的壁灶。后来主人们在屋边没有太阳的沙地上铺了毡毯，我们就在那儿围坐下来。他们特地煮了新鲜的塔里木河的鱼招待我们。多年以来，鱼是他们活命的恩



物，现在又成为他们饕客的佳肴。由于天热，村子上的人们都露宿户外；那一晚我也陪着他们睡在那旷畅的沙浪上。当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入睡时，便轻轻地走动，轻巧地说话，想尽量不惊扰我们。虽然夜晚的太空是静默默的，然而在默默的太空中，我一样感觉到民族之间互信互爱的亲切的感情。那一天正是阴历十三，繁星满天，皓月当空，我放眼四望，深深感到这个时代的豪壮，虽然已很疲惫，但还强自振作，细味这难得的丰富的境遇。

在客拉切其的日子，每一缕阳光，每一声笑语，都留在储安平记忆深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仅是罗布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更是罗布人的善良与无私。

与之对照，储安平写到“水走了”，写到“洪水漫浇地”，写到塔里木河尾间海子中的鱼以及罗布人的独木舟，写到野麻花与野麻（罗布麻），写到利用两只木叉几块木板制作出来的织布机，这些都是当地人早就熟悉的，可外人会感到陌生。同时，他借助一个细节：渔猎之民养鸡，表达出了塔里木人的共同愿望：扩大生存空间。

可以说，写下《在塔里木河下游》这篇报道的，必定是敬业的记者。只要读过《在塔里木河下游》，对于罗布人与塔里木河相依相存的关系，就有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新疆新面貌》的副标题是《新疆旅行通讯集》。它记录了从阿勒泰的哈萨克牧民到和田的缫丝女工，从军垦新城石河子的建立到帕米尔高原的牧业合作社，从培养民族师资到置身于库尔班节欢乐的人群中。1954年夏到1955年夏，储安平“在新疆走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地方”，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的面貌。《新疆新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新疆旅行通讯集”。它不同于此前或此后的某些同类文章，由于条件限制，或是出于特殊时期，不能或不愿亲自面对新的素材。正因为如此，《新疆新面貌》为我们记录了新疆百废待举的新时期的真实状况。



二

蒲熙修(1910~1970),女。上海嘉定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在北京中学任教,1936年起,先后任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香港《文汇报》驻南京特约记者,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著有纪实文学《朝鲜纪行》、《六人行》、《新疆纪行》。1949年以后,蒲熙修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蒲熙修被点名批判,此后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起,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副组长。1965年身染重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1月,平反昭雪,1981年8月,为蒲熙修补开了追悼会。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蒲熙修成为有广泛影响的女记者,她提出,作为一个记者“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抗战期间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是四位“女记”:彭子冈、蒲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被称作“三剑客”。

50年代前期,蒲熙修曾深入到新疆塔里木,并且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1951年7月16日,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员,蒲熙修自朝鲜前线回国,从兰州乘飞机前往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在此后的四个月间,蒲熙修成为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后,较早进入新疆的、来自北京的新闻工作者。此行她的任务,是对新疆各界宣讲抗美援朝,但新疆之行则促使《文汇报》资深报人的蒲熙修重新确认了自己的位置,写出了连续报道,并且立即产生了广泛影响。蒲熙修新疆之行在1951年夏天,那时新疆刚刚转入和平生产时期,而储安平深入进行采访的1954



年至1956年夏，新疆和平生产初见成效。从蒲熙修到储安平“接力”，有助于对这一时期新疆基本面貌的了解，是认识新疆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53年4月，平明出版社将蒲熙修的系列报道结为一集，出版了《新疆纪行》，全书9章，约5万字。《新疆纪行》的采访写作，比储安平《新疆新面貌》早几年，但他们的立意一脉相承：反映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的新疆现状。与储安平《新疆新面貌》面对全新疆相比，《新疆纪行》的侧重点在天山以南（南疆）。同时，也更多观照到新疆政治格局的确立。

新中国刚建立，面对突发朝鲜战争与紧张的台海形势，储安平与蒲熙修以他们的文字反映出中国文化界人士的共识：

有了新疆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便具备了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

读过《新疆新面貌》与《新疆纪行》，作为读者，我的体会则是：

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新旧新疆的对比线，在于人民生活状况。

为了全面认识20世纪新疆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将储安平《新疆新面貌》与蒲熙修《新疆纪行》编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通过这两部书，读者可以重返60年前新中国成立的起点。这两部书的原本都有插图，但清晰度达不到今天的标准。我们另选取了同一时期、相同内容的图片作了替换。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宿 白 001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马大正 006

储安平与蒲熙修对新疆新时期的即时报道（代序）

杨 镰 001

新疆好地方 001

伊犁夜话

——民族关系是怎样扭过来的 011

石河子新城 023

新疆大棉区的创造 032

访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 042

阿尔泰山一带 049

流散哈萨克族的救济 064

在阿尔泰山之巅 071

欢乐的库尔班节 078

路中邂逅

——记一个维吾尔农民的谈吐 088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094

一个村子的诞生 105

优先照顾民族老乡的利益 113

南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19

帕米尔高原上的牧业社 135

和田的缫丝女工 142

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

——新疆学院访问记 147

教学结合生产

——八一农学院访问记 160

新疆远景 172

天山上的红领巾 186

从内地到新疆来的年轻人 192

从工人做起

——记独山子油矿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的成长 200





新疆好地方

一提起新疆，人们便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这些巍峨的名字，给人们以一种无限高大无限雄伟的感觉；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苇湖碱滩这些字眼，又使人们掀起一种荒野冷峻的情绪。这一年多，我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漫游，看到那亘古不化的雪峰、葱郁深邃的林色、水天相接的湖景，以及远远看来永远像一片浩瀚的海洋似的平原，心胸开放，意气豪迈。就在这土地上、山岭间、湖滩边、森林里，出现这黄金色的麦浪，雪山似的棉堆以及那数也数不清的肥壮的牛羊，使人深切感到，我们的祖国辽阔而又伟大，美丽而又富庶。

很多人总以为新疆这地方很冷。这不是一句话可以笼统解释得了的问题。新疆的面积有16个浙江省大。在这样一个大面积上，气温不可能一无差别。有些地方，例如阿尔泰山一带，在冬天一般要比较冷些，但有些地方，如喀什、和田一带，冬天就很温暖。我在南疆住过一个冬天。那儿，冬天不仅不用穿棉鞋，甚至不用



博格达山北麓的高山草原一角



穿大衣，不仅比北京暖和。冬季在郊外旅行，比较冷些，在城市里住着，就比较暖和。寒流来时，当然要冷些，没有寒流的时候，就不一定很冷。所以新疆冷或不冷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1954年11月底，我在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正巧寒流侵袭，气温降低到将近零下40度，但我依然去郊外踏雪，欣赏祖国西陲的美丽的风景。有一天，在零下16度的天气里，我坐了一辆轻便马车，在满天的好太阳下，从察布查尔驶回伊宁时，那带着冰凌的马匹，在雪地上一路疾驶，发出轻微的金属似的响声，这样的旅行对于我毋宁是一次最优美难忘的享受。乌鲁木齐冬天户外的温度一般在零下20度左右，但即使最冷的日子，人们照样在街上来来往往，而孩子们也照样提着书包上学。

人们又以为新疆这地方很荒凉。新疆确是山岭多、戈壁多、草湖多、荒地多。总的说来是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假如你意气萎靡，目



光如鼠，满足于株守斗室之内，那么你到了新疆这样的地方，看到大漠连天，自然会兴起荒凉之感。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人，假如你劳动的热情很高，创造的精神很旺，满怀斗志，想为祖国做一番事业，那你就感到你何幸而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更何幸而又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那逶迤千里、峰峦重叠的群山之间，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宝贵的财富，正需要数以千计万计的青年男女穷年累月地去勘测钻探。那浩瀚的一望无边的肥沃的原野，也正等待着十万百万的人们去开垦经营，让这些土地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使它们得到河水的滋润，恢复生命，开始为增强国家的力量而服务。意志坚强的人们，看了这些辽阔的原野，绝不会发生荒凉的感觉；他们生发的感情只能是兴奋、骄傲和跃跃欲试。

过去人们对于新疆的许多看法和印象。今天需要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例如自来论新疆的人都说新疆缺水，但在今天，可以说，新疆不缺水。新疆缺的不是水，而是对水的工程建设和科学管理。假如能开挖水渠，把河水引到田里，修筑水库，把不用的水积储起来，那么水的利用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一面开辟水源，一面减少水的渗漏浪费，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日子里，新疆的水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基本上是不够用的。在过去的反动政权统治时代，当政的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更不会认真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疆的哈密、焉耆、阿克苏以及玛纳斯河流域各地，都兴建了很多的水利工程，在生产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政府一面继续进行各种水利建设，一面又教导人民合理用水。新疆缺水的旧观念今天应该完全改变过来。

过去人们以为新疆少雨少水，好多地方又都是沙漠，因而连带发生了许多片面的不正确的印象。有人以为新疆既然缺水，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河流，殊不知新疆的大河多得很。不仅河流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湖沼（当地统称为海子）。这些河流一向都是两岸人民生活的命脉，不仅广大的农田靠它灌溉，其中很多地方将来还可以利用水力发电，以供工业动力和市民照明之用；有一部分河道将来整理以后还可以通航。有些人以为新疆既然少雨缺水，树木一定不多。其实不然。天山山脉，东起哈密、西迄伊犁，逶迤千里，长着繁茂的云杉，这是



一位维吾尔族农民拿着毛主席的照片给儿子看

目前新疆基本建设的一个主要木材来源。另外在阿尔泰山，也有着丰富的森林。在一般城市和农村里，树木也很茂盛；尤其在南疆。南疆农村树木之盛，只能用“多的像头发一样”那样略带夸张的形容，才能把实际的情况衬托出来。在新疆，兄弟民族大都有种树的习惯，而且他们种起树来，都是一种十几里，或者一种几千株，既多且密。无论在牧区或农村，凡是有水的地方，都一定有树。尤其在戈壁滩上，要是你老远老远看到前面有树了，那地方也一定有水，有人家。在南疆和伊犁各地，很多人家家都栽种果树。在新疆，人民在他们的生活里很明显地感受着种树的好处：取荫、架屋、烧柴和吃果子。当我在新疆各地旅行时，常常一路浓荫夹道，林色不绝。而伊宁的树木之盛，一色白杨，又是这个祖国西陲名城的一大特色。

同样，当有些人听我谈到新疆多鱼的时候，也都表示惊奇。他们以为新疆既是一片沙漠，哪儿还会有鱼？可是事实上，新疆的一些主要河流，大都产鱼。这一年多，我就先后吃过伊犁河、玛纳斯河、开都河、孔雀河、塔里木河、阿克苏河、喀什河、叶尔羌河、玉龙喀什





河以及阿尔泰山下的额尔齐斯河等河里的鱼。几乎新疆所有的河流里，都有鱼。不仅有，而且还多。当我过布尔津时，看到有人在额尔齐斯河畔钓鱼，把鱼钩往河里一撒，随手一拉，钩上就已有鱼。在乌鲁木齐，鱼摊上还有活鲫鱼卖。

人们总以为新疆这地方穷苦。过去新疆人民的的生活的确是很穷苦的，这主要是由于旧时代的封建反动政权的残酷压榨。实际上，新疆这地方不仅不穷，而且富得很。新疆地下的资源，虽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勘测，还不能估计这些资源的数量，但是，新疆物藏之富，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石油、煤、铁都有很大的蕴藏量，此外还有很多珍贵的有色金属。在农业方面，新疆的土地也是出奇地肥沃。今天中国好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全国最高单位面积产量都是在新疆创造的。新疆的小麦生产最高达到每亩1373斤，水稻最高每亩2205斤，棉花最高每亩1677斤，玉米最高每亩1925斤（棉花和玉米两项都是1956年的新纪录）；这些高额丰产纪录虽然还只是在一些小面积上创造的，然而已经足够说明新疆土地的肥沃和它在农业生产上的潜力。在瓜果的

天池是新疆著名的游览胜地





天山达坂城区的羊群

生产方面，除了内地熟知的哈密瓜和吐鲁番葡萄以外，其他如梨、桃、杏、苹果、石榴、樱桃、无花果、西瓜、花生等，也无不既多且好。1954年夏天我在伊犁时，一角钱可以买到5个苹果；1955年初夏我在库车、阿克苏一带时，一角钱可以买到30个杏子，这些还都是市上小贩的手里购买的，要是直接到果园里买，还要便宜。

新疆又是我国的主要牧区之一。这儿有很多天然的优美的牧场，1954年我在伊犁地区的尼勒克、新源、巩留、特克斯、昭苏一带旅行，双目所及，非绿即青。那像地毯一样的绿草，无头无尽地铺盖在所有的草原上和山坡上。一片青翠，一片碧绿；碧绿青翠以外，几乎再见不到第二种颜色。甚至连人们所呼吸的空气，也仿佛是“青色的空气”似的，特别清新透爽。天山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巴音布鲁克以及阿尔泰山一带，都是美好的广大牧区。那些勤劳的牧民，就在这些高山草原上牧放着他们的牛羊。蒙古包、马奶子、冬不拉（乐器），再加上那无限美丽的牧区山色和清新舒爽的高山气候，构成了新疆地区那种充满着丰富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像诗一样的难忘的生活。这一年多，我在新疆走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地方。每到一地方，在当地工作的汉族同志总是对我盛称当地如何如何的好——物产如何富饶、风景如何美丽，只要劳动就能创造幸福的生活等等。这





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没有来过新疆的人，受了旧时不正确的看法的影响，以为新疆这地方比较荒凉，没有什么引人之处，但是到了新疆、在新疆住定了下来的人们，又细细体会到新疆自有它的可爱可取之处，并深切感到这地方具有无限创造开发的前途。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几年来，新疆在各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改进和成就。在党和政府的积极的领导和帮助下，农业生产无论在改良种子上、推广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上，都有相当的成绩。驻新疆部队所建造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劳动，更给当地各族老乡以很大的帮助和启发。1954年吐鲁番农民种的棉花，在3.6万亩的大面积上达到每亩生产籽棉331斤的纪录，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牧业方面，也有新的改进。牧民认识到政府推广的“新疆羊”，无论是毛、肉、乳，都比原来的土种羊好。在人工授精、接羔育羔以及割草搭棚过冬等各方面，牧民也得到

吐鲁番县葡萄沟的农民以喜悦的心情收拾丰收的葡萄





新疆省省会迪化市的街道。远方白雪皑皑的山头是天山的主峰——博格达峰



了政府给予的各种必要的帮助。农牧生产的积极发展，再加上农牧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工业产品价格的降低，就必然使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各地的学校和入学人数普遍增加。医疗卫生事业和电影的放映，不仅已经到达了较小的城市，而且已经深入到较小的农村和偏僻的牧区，这在新疆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城市的面貌也有变化。就以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来说，这地方自从民国以来，被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等前后统治了近40年，直到快被解放的时候，依然是一个“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的烂摊子。再没有比乌鲁木齐这样一个城市更容易使人明显地看出新旧时代的对比了。在这个城市里，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



乎都是破烂的；凡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新的整齐的建筑，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几年来建造起来的；新造的建筑大都装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和暖气设备。道路和市容也有很大的改进。目前乌鲁木齐市的主要街道都已铺了沥青，并有了几条行驶公共汽车的市内交通干线。西郊明园一带，过去是一片荒滩，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乌鲁木齐市的一个相当现代化的新的市区。医院和剧场都有增加，它们的规模和设备都是头等的。更重要的是乌鲁木齐市这个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城市，而且使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以及纺织工业等。这些现代工业正为发展新疆人民的生产和提高新疆人民的生活做出巨大的贡献。最近很多到达乌鲁木齐市的外宾，看到在中国的西部边疆上有着这样一座相当现代化的城市，都表示惊奇。

为着支援边疆的建设，这几年来，很多爱国的青年男女不断地从

为了推广新羊种，农业部把细毛羊从新疆空运到沈阳



祖国各个角落来到新疆。无论在部队里、工厂里、矿山上以及城市里，我们经常会遇见很多说话时带有山东口音、湖南口音和上海口音的年轻姑娘。她们的出现，标志着祖国各地人民对于新疆兄弟民族和新疆各项建设的关怀和支援；标志着新一代年轻人的不畏艰苦、献身边陲的英豪作风。我们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力量和决心来开发边疆、创造新的历史，把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推进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的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这几年来在新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大家融融洽洽，互信互助，的确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这一年多，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到最偏僻的小村，当地的兄弟民族都以无比的热情接待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我充分的帮助和照顾，谈谈笑笑，毫不生疏。他们把我看做一个来自祖国的首都、来自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的可敬的远客。

1955年8月，乌鲁木齐。





伊犁夜话

——民族关系是怎样扭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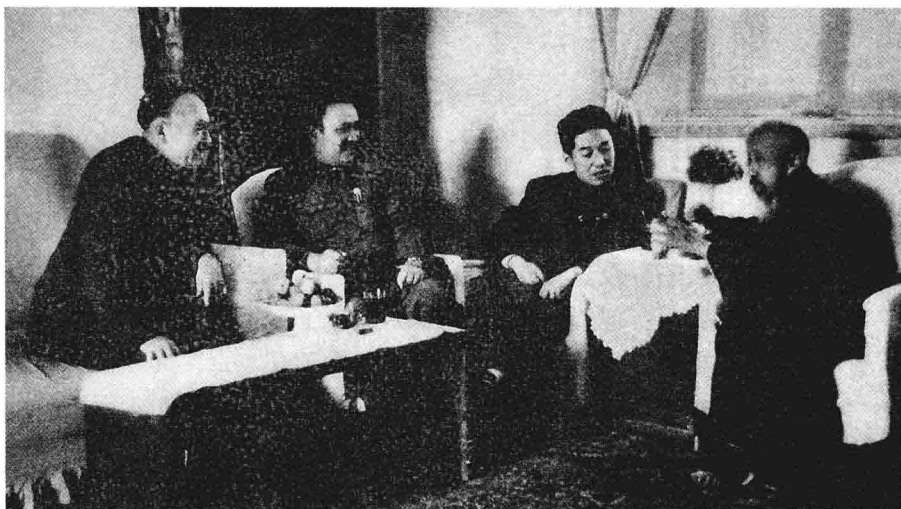
民族关系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要使少数民族热爱祖国、愉快地生活在祖国的温暖的大家庭里，首先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正确地改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团结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加强国家统一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恶劣的，是不平等的、对立的、互相仇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变成成为一种平等的、团结的、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了。仅仅是短短几年，就基本上消除了由于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长期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使民族关系改变了根本的面貌，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具有头等历史意义的国家大事；同时，这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新疆，最能突出地表现这种多民族关系的地区是

伊犁。当我在伊犁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夜晚，有一位同志来看我，我们谈起了民族关系的问题。他说，当他们初到伊犁的时候，情况也并不是完全顺利的。伊犁是三区革命的发源地，是一个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地方。当地各族人民曾经和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而终于获得了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当地各族人民热烈地庆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热烈地欢迎新疆的和平解放，热烈地欢迎共产党到达伊犁。这是历史的主要的一面。另外一面，由于历代汉族王朝对于少数民族所施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盛世才反叛后及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以及由于绝大多数的民族群众还不善于把汉族中的一小部分反动统治阶级和整个汉民族分别开来，因而在当地民族群众的思想里，便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反对汉族的情绪。过去当地民族习惯叫汉族为“黑大爷”。当人民解放军和新来的汉族干部初到伊犁地区时，很多民族群众在思想上都容易联系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好容易赶走了一批黑大爷

中央访问团沈钧儒团长（右起第一人）、
萨空了副团长（右起第二人）会见新疆省人民
政府包尔汉主席（左起第一人）





(国民党)，为什么现在又来了一批黑大爷（共产党）？”这确实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矛盾。

当地一部分民族上层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由于过去的具体环境，他们和苏联的接触较多，和祖国内地的接触较少，因而他们对于苏联，比较了解信任，而对于自己的祖国，反而比较隔阂；特别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性质，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以及当时关内老解放区的一般情况。大都了解不够，再加上敌人乱造谣言，说共产党来了以后要消灭宗教、没收财产，少数在“十月革命”以后从苏联越界过来的人们，又传播着一些不正确的说法，这样，就使很多民族群众对于共产党、解放军以及新来的汉族干部，在思想上蒙上浓厚的混乱和不安，整个社会保持着很大的保留态度，甚至戒备的气氛。

不过，这些终于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仅仅是短短的几年，民族关系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现在，汉族干部下乡，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受到当地民族的友好的接待。随便什么地方，农村或牧区，汉族干部一人单骑独行，安全都没有问题。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各族人民中的威信，至高无比。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说是中央决定了的，或者党决定了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绝对接受，绝没有第二个意见。在县里区里，民族群众有什么困难，都喜欢自动地去找党委书记（汉族）谈。在这边疆地区，一个“区”有时要比内地一个“县”还要大，从东头到西头，骑马得跑上两天才能到。然而在这样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就只有一个区委书记是汉族，再没有第二个汉族，而就是这个汉族干部，他在这一大片土地上，传达着党的各项政策，推动着当地的各项中心工作。党在群众中显然已经牢牢地扎了根；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也真的血肉相连，都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了。

“这条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我问。

“当然，所以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的领导。民族关系的基本改观是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巨大胜利。”他说，“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像一盏明亮的灯，照耀着我们正确地前进。据我粗略的思索，这几年来，我们是经过了这样几个方面，才基本上扭转了过去的民族关系的。

“首先是部队。解放军到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来，就它的政



维吾尔族人民举着“毛主席万岁”的旗子参加迪化市欢迎中央访问团的群众大会

治影响说，要比在内地更突出，就它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说，也要比在内地更严峻。部队是党在民族地区最先和各族老乡接触的先锋队。由于少数民族过去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解放军，他们听说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当他们最初见到了解放军的时候，他们就要看看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再从此推测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些什么不同。他们过去不喜欢汉族，而这批新来的部队又正都是汉族，这又自然地牵涉到民族问题，这批新来的汉族和过去他们所见的汉族又有些什么不同？在解放军一方面呢，到这一带来，既是人生地疏，又加语言不通。在内地，还可以用嘴巴来解释宣传，使老百姓了解他们，可是到了这儿，大家一下子仿佛都变成了哑巴，有一肚子意思也没法表达出来。

“有些民族老乡最初看见解放军时，心中害怕。他们躲得远远的，不和解放军接近，然而他们却在暗中观察。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这批部队到后，并没有什么人向他们借这样、要那样。既没有人要借





住他们的房子、帐篷，也没有人要借他们的粮食草料，更不要说有什么人牵他们的牛羊、掳他们的家禽了。他们有的远远地在看：那些新来的汉族部队究竟住在哪儿呀，又干啥呀？啊！他们就住在地里，有的在地里挖个坑，有的就干脆宿在露天里。他们用着坎土曼在锄地！有些地方，好些人正在拉着洋犁犁地。人拉犁！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传十，十传百，有的民族老乡就慢慢儿地来瞧这‘人拉犁’的把戏。由于党不愿增加民族地区人民的负担，所以命令部队一到当地就自己抓紧生产。部队初到时，一无马，二无犁，上级只发了几个洋犁。就因为部队不愿意去打扰民族老乡，向他们借牲口，所以只好每8个人合拉一架洋犁。慢慢地，民族老乡看出这一批新来的解放军和过去的国民党军队确是不同。他们对部队不再躲避，而是渐渐地亲近了起来。日子久了，他们发现，解放军不仅不打扰他们，反而还帮助他们：给他们借籽种、借口粮、借农具，分水给他们浇，甚至有时还

在伊宁市欢迎中央访问团的群众大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赛福鼎代表全疆人民致欢迎词





沈钧儒团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给新疆省伊宁市各族各界赠锦旗

帮助他们春耕秋收。对于部队来说，既然言语不通，无法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们就只好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解放军是党的一面旗帜。当各族老乡开始欢迎这个军队、歌颂这个军队时，各族老乡也就初步地认识了党，欢迎着党，并对新来的汉族干部开始进行新的估计。这是第一关。

“其次，是几个大运动，如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当刚刚展开这些运动时，有些民族老乡在思想上还是有很大顾虑的。在有些地方，如伊宁六区，减租反霸的工作队下去时，有些群众害怕得不敢出门。说是吃大肉（猪肉）的汉族来了，仿佛就将大祸临头一样。有一家正在结婚，也就慌慌张张地把结婚用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婚也不结了。甚至给地主当了几十年长工而一无所有的一个叫沙吾提的雇工，当他听到汉族干部要找他谈话时，吓得连脸都变了颜色。然而这些运动都是为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使许多老乡的脑筋在无形中逐渐发生了变化，因而在镇压反革





命运动中，群众就能如火如荼地发动了起来。规模巨大的诉苦运动发生了一股极其深刻的力量，它不仅初步地启发了各族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同时也初步澄清了一些狭隘的民族仇恨。许多民族群众开始明白，过去压迫他们的并不是一个‘汉族’，而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在这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无数多少年来为地主下苦、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耕畜、农具、口粮，甚至分到了房屋；使他们开始成为了自己的劳动的主人。经过这样一些大运动，广大的各族劳动人民一接触到实际，就完全认识，共产党是来解救他们的，新来的汉族干部是来帮助他们的。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从此在民族群众的思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民族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而这巨大的历史事实，又回过头来教育了一般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

“党无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总是首先表示它是站在劳动人民的一面的”。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在1950年4月，党的伊犁地方委员会成立时，许多来宾中有一位民族农民代表叫曹达阿虹的，正坐在伊犁专区专员的旁边。‘专员’，这在过去是多么大的一个‘官’啊！而凑巧，这位专员又是从前的‘伊犁王’的儿子。当曹达阿虹被请站

在新疆省
伊宁市，中央
访问团视察了
塔塔尔族中
学。萨空了副
团长与该校女
校长握手告别





起来说话时，他直发抖，他说一句，就对坐在他旁边的专员看一眼。我们勤劳可爱的农民，在长期遭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即使已经被解放了，但在刚被解放之初，还免不了怀有一些恐惧的不习惯的感情。然而党坚决地要解放他们，并把他们扶上他们本就应该处于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950年在伊宁前后召开的两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有半数以上的代表都是工农劳动分子。以后，每年在‘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这样一些庆祝大会上，都有劳动人民的代表在群众前面说话。当劳动人民，尤其是多半受着压迫的妇女，看到了有他们的代表在参与着国家的事务的时候，他们就十分自然地感到，在今天的国家里，也有着他们的一份的，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关怀和责任感，大大地鼓舞了他们对发展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使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共产党在帮助着谁，又在反对着谁。并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在共产党教育下的外来汉族干部，和国民党那些军阀官僚有着多么大的不同！

“使少数民族认识共产党以及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用着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汉族，解放军已经起了一种重要的先锋启发作用，而这一系列的大运动，却是根本扭转民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党掌握了民族地区的基本群众，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敌视、隔阂，基本消除。在民族之间萌长出来的新的感情是信任和友爱。

“第三是机关民族化。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民族地区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化了。主要的官吏都是汉族，公文是以汉文为主，机关里的一切作息时间都是根据汉族的习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正过来。公文的文字，有些地方是汉文和民族文字并用，有些地方则完全以民族文字为主。机关的作息时间以及过年过节的假日，都尽量遵照民族生活习惯办理。当然，机关民族化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培养、提拔和任用民族干部。

“不仅仅是要大量任用民族干部，更重要的是还要搞好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的团结。搞好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的团结，不仅成为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的首要关键，而且假如这一层搞得不好，在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都将受到影响，甚至无法工作。然而对于这一层，我们初来时，认识是很不够的。我们初来时，有些单凭热情办事，不



中央访问团到达新疆省伊宁机场，受到热烈的欢迎。乌孜别克族妇女代表向访问团的同志们献花

少工作像在汉族地区一样地进行，对于民族地区的情况，如历史残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语言的障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等，了解与认识得不够。例如一个汉族干部不带翻译，他就根本无法在民族地区展开工作，而有很多事情，由汉族干部去做就远不及由民族干部去做而来得事半功倍。汉族干部毕竟是外乡人；对于地方情况，特别是民族内部的情况，总还是民族干部比较清楚，摸起来也比较容易。通过民族干部去为民族群众办事，无论如何比由汉族干部直接去办来得合适顺利。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着汉族干部，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初来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对头，认识到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也就是更加深入认识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特点。绝大多数的民族干部都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新参加工作的，缺乏新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我们和民族干部在一起工作时，应当多和他们商量，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感情上生活上对他们多尊重多照顾一些。在制订工作计划和总结工作经验这些方面应当耐心地帮助他们。假如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困难，汉族干部必须给民族干部以更多的支持，并鼓舞他们去克服那些困难。假如大体上能针对这样一些特点去掌握处理，民族干部就容易和你接近，团结也就容易搞好，培养教育也容易收到较好的效果，而各项工作也就容易推动展开。

“第四是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加强民族团结、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条件。然而这个经验，我们也是付了一定的代价才获得的。

新疆省和静县召开蒙古族群众大会，中央访问团朋斯克副团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向当地人民致以慰问与关切之意





“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缺点是突出的。我们初来这儿时。不了解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我们对民族地区的宗教影响估计不足。同时，我们对牧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特点也认识不够。我们低估了民族上层社会在民族地区所具有的力量。这儿的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对于人民的影响很大，甚至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都和宗教分不开。例如，在伊斯兰教里面，结婚的时候要是没有请阿訇到场念经，则在大家看来，这个婚姻就算不得一个正式的婚姻。要是有了丧事，也必须请阿訇来念经，才能把尸身移出去，否则，四周的邻居也会有意见。宗教在民族地区既有这样深刻的影响，宗教界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如阿訇、毛拉等，在群众中间因而也就具有一定影响。但对于这些，我们初来时是估计不足的。

“在牧区，也有着同样的情况。牧区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部落社会。由于牧区的经济生活、地区限制以及血缘关系，在牧区中存在着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这些部落头目牧主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千户长百户长，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牧区的统治者，他们在牧区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在经济上，牧区的主要经济力量（牲畜）也大都掌握在这些大牧主手里。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认识这点。1951年我们在伊犁的一部分牧区曾经试图进行一些改革，而在那些地方就发生了一些困难。例如要斗争一个部落头目，但是群众却不容易发动起来。我们逮捕了一个不好的牧主，然而群众却同情这个牧主，偷偷地给他的家属送茶送食。我们违反了牧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游牧），试图一下子把他们的人和牲畜集中起来（定居），致使当时一部分牧区发生了牲畜骤然下降的那种混乱的和损害的现象。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和教育下，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些缺点，及时地批判了大民族主义思想，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一些毛病，除了在牧区普遍宣传并坚决贯彻执行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各项政策以外，同时加强建立广泛的包括各方面的社会上层分子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和他们协商研究各项中心工作，帮助他们对政策时事的学习，把他们更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例如在宗教方面，政府一方面宣布了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政府不干涉宗教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则要求宗教界的一切活动都不能和政府的政策法规抵触。现在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基本要求是爱国守法。自从宪法草案、宪法先后公布、颁布以后，伊犁各地的宗教界人士都自动地进行了学习讨论，纠正了过去一些糊涂想法，初步地区别了‘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同，并且认为，正如一个阿訇所说的：经典不能放在政府法令的上面。在牧区，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牧业。由于牧区很大一部分经济实力仍然掌握在一些牧主手中，因而这就首先要很好地团结、教育那些大、中牧主，使他们能够解除各种思想顾虑，并由他们来协助政府向群众宣传政策，发展生产；这样，对牧业的发展和牧区的安定就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以上所说的这些，大体上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在改变民族关系中所走过并正在走着的一些道路。这些道路并不是完全顺利平坦的，这是经过一系列的尖锐的思想斗争并在一些失败的教训中逐步摸索出来的。”

1954年12月，乌鲁木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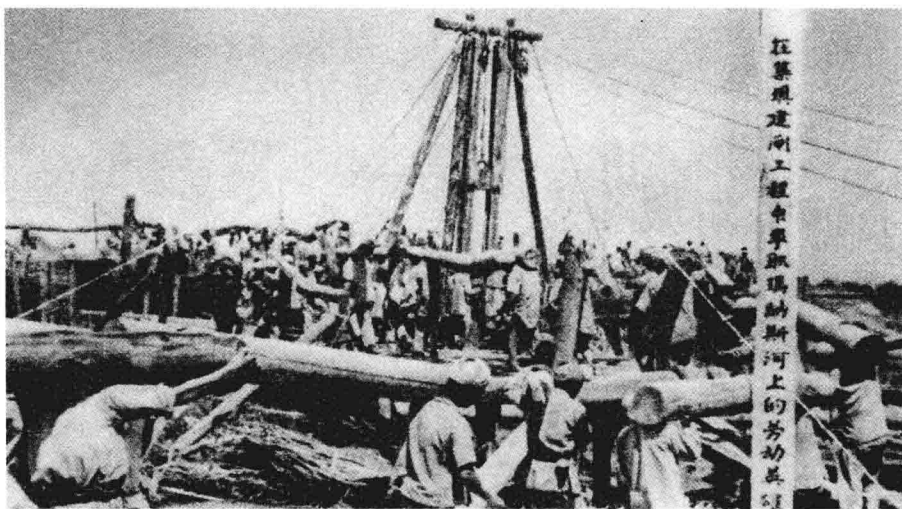
石河子新城

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曾听人说过在新疆的戈壁滩上盖了一座新城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大，而这几年来各地所发生的新鲜事物又这样多，因而像在戈壁滩上平地盖城这样一件具有丰富启发性的事情，也只粗听几句，没有细问下去。当我到了新疆，再向人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们就不费思索地用手一指：

“噢，那是石河子新城！”

石河子在乌鲁木齐的西面约150公里，坐吉普车三个小时就到。从乌鲁木齐一直往西到精河，南面是巍峨的天山群峰，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平原。那逶迤不绝的高山，那高山上亘古不化的积雪；那广袤千里的大地，那大地极边轻烟似的远色，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雄峻深远的大视界，驶奔在这样一个大视界里，使人胸襟开阔，意气豪放。

从乌鲁木齐到石河子这一路，庄稼和树木都很茂盛。过了玛纳斯河，大约又走了20公里，就远远地看到了一幅动人的秀丽的景色。在那衬着豪壮的山色的背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在玛纳斯河上修坝

景下，在那比平地稍稍高一些的山麓旁，在那疏疏密密的墨青色的树林里，隐现着很多红顶白墙的新的建筑。那是多么广阔的一片，然而又是多么深邃的一片！它整个的色调鲜艳柔和，健康明朗。用不着驾驶员指点，就可以料到那就是石河子新城，那就是劳动人民凭着双手正这个荒滩上修盖起来的这座美丽的新城了！

石河子新城的建立，很多人都把它看成为一种奇迹。那些住在石河子附近数十里地以内、平时不大出门的农民，最初听到石河子建了一座新城时，是完全不相信的。他们说，一年以前，两年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也从来没有听到石河子有个什么新城的事。然而，当有的人在什么顺便的机会下来到石河子、亲眼看到这个巨大的改变时，一下子多少有些愣住了，摸摸自己的脑袋说：“这干得好，这干得好！共产党有办法！”

石河子这一带以前是怎样一个地方呢？清末民初经过这一带的人说，这一带多是泥淖草湖，茂木深林。就是当部队初到这儿时，这一带也还是满生着茂密的有着一人一手高的苇子和野生的青蒿杂木。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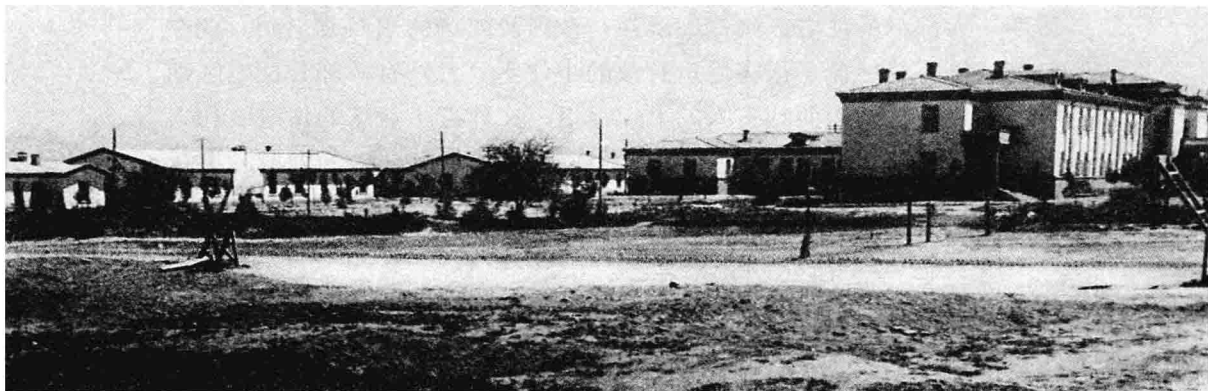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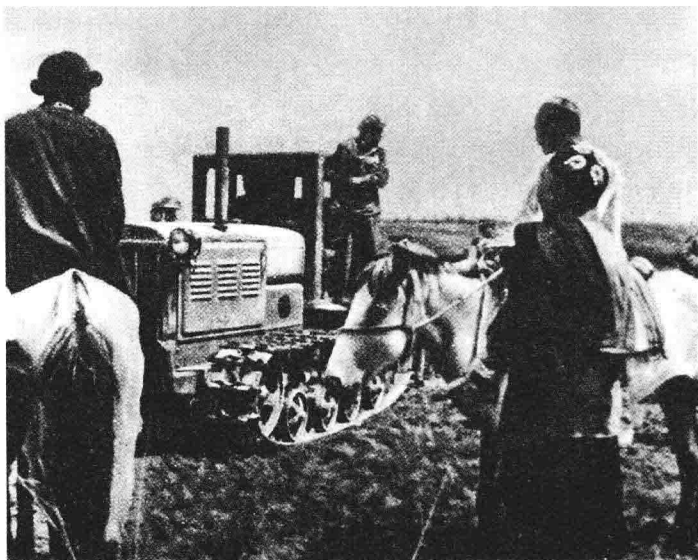
十年，几百年，甚至自有这片土地以来，这土地也许一直就是这样一片干干湿湿高高低低的苇湖碱滩。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历史没有变化，土地也没有变化，没有人注意它、亲近它、器重它。只有那些梅花鹿、狼、野猪，以及野鸡、老鸦等长年地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逍遥自在，毫无顾忌。当1950年部队进入这片荒地进行斩草、开路、测量、夜晚住在临时挖的地窝子里时，狼群还悄悄地拜访他们。

在战士们创造性的忘我劳动中，这片土地上的面貌一天一天地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座新城的建筑，正如新中国其他地方的巨大的建设事业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的无限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所有的施工力量：木工、瓦工、铁工，都是生产建设部队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除了五金、玻璃和油漆以外，木料、石灰、砖头、沙子都是就地自给，自伐自运自制的。

这座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着一个一定的计划进行建筑的，行政、工业、商业、文教、保健、住宅各区以及公园、林带等此，都有一定的范围。全城的核心是行政区，那儿目前已经建筑了一座办公楼，这是一座两层的门形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办公楼的中间部分则突高为四层。这突出为四层的高楼，仿佛成为全城的一座司令台，无论从东南西北，老远老远就能看到它；自然它也更能看到四

石河子新城一角





维吾尔族农民骑马来参观解放军用拖拉机耕地的情形

方八面更远的地方。除此之外，这座四层大厦在石河子还有它特殊的骄傲的意义。因为这样一座高的建筑，是完全由初学建筑的战士们在创造性的劳动热情下完成的。办公楼的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再南是文娱区。将来的戏院、电影院都将建筑在这一带。最南是商业区，预计将来的从乌鲁木齐通往苏联的铁路线将在这商业区的南面通过。城东和城西都是工业区。不过新城的外区将如何配合整个玛纳斯河流域规划的生产需要，还没有最后定案。目前已经建筑的一些工厂大都设在城西。大部分的住宅区则都围绕在行政区及广场的东西北三面。现在已经一幢一幢地盖了很多玲珑有致的小住宅。另外有一部分住宅区则临近着工业区，以便利工人的上工往返，在邻近工业区的住宅区和工业区之间铺植了一条宽阔的林带，借以阻隔来自工业区的烦器的声音和混浊的空气。文教区则夹在住宅区中间，以便利孩子们的上学下学。医院和运动场则在城的东部。

城里的主要道路都是上下行的两条单行车道。两条单行车道之间则是种植花草的路台。车行道的两旁是上下人行道。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以及人行道的最外端，都种植了树木。树木一般已经高过屋顶，





再过三五年，萧萧白杨，都将夹道成林。按照以12平方公里为基础的初步规则，道路占了20%，而绿地则占了26%。在明天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里，人们将得到更多的空地和更新鲜的空气。富余的空地将使每个住家都能养鸡种菜又栽花，而新鲜的空气和足够的阳光，将使人们更健康、更活泼，在劳动时有更充沛的活力。

当我在石河子访问的时候，这座新城已经大大小小盖了400多幢房屋。假如把这些房屋集中起来，就足够形成一个适当的“市容”了，但正因为是按照计划建筑的，所以目前已经建筑的房子就不能不比较分散，然而这毫不影响我们对它的概念和对它的前途所怀有的信心。一个城市本不是一夜之间所能造成的，正如一棵麦子不是一夜之间能长熟一样。

我参观了新城的医院，这是一个较大的建筑。病房部分是一长条地朝南。一字排过去就有45间房，全部可容400张床位。将来还打算在病房前面布置一个花园，全部建筑都设置了地震隔离缝，在地震隔离缝处装置了防火门。楼上的地板和楼下的天花板之间都用锯木屑和泥做成隔音层。此外，在医院的后面及侧面远处，还分别建筑了产科病房和隔离病房。

我曾经访问了这个医院里的一个胃病病房和一个外科女病房。当我参观着这些病房时，我心中的确怀有一种混合着感激、喜悦和安慰的复杂的感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的生活将逐渐得到改善，这已经不是一种宣传，甚或是一种理想：这是已经切切实实地实现了的事情，当你想到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片荒地，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医院时，你怎能抑制住心头的激动！

我又访问了那儿的新华书店，它是在1954年1月新开设的。每天下班以后，特别是星期天，书店里总是挤满了人。据说在1954年1月至6月间，平均一个月销书5000册左右，其中理论书和文艺书占三分之二，技术书籍和通俗读物占三分之一。购书的对象主要是干部，通俗读物的读者则主要是战士。《斯大林全集》在这儿每卷都要销200多册，上千册的《宪法草案》一到，一两小时内就销售一空。由于建筑新城又建筑水库，扩大垦区又大量植棉，所以对于农业技术、建筑工程以及企业管理这类书籍，都很迫切需要。

此外，我又参观了一些工厂，他们都在新城的西南角上。木工厂刚创建的时候，既没有人又没有工具。没有人，就临时从部队里抽出来一些战士；不会做，就边教边学，边学边做；没有工具，就买一些，自己再凑一些。现在这个木工厂里已有六个车间，近500个工人。其中一个锯木车间，是用机器锯的，有好几部锯木机，工人日夜分三班做，然而即使这样，还是赶不上工地的需要。面粉厂是目前石河子许多工厂中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一天可出1700袋到2000袋面粉，供应着玛纳斯、沙湾、昌吉、米泉和呼图壁五个县的面粉食粮。铁工厂的规模不大，它的主要任务是修理农具，但也搭配地自制一些洋犁及中耕器。我参观了铁工厂的宿舍，那是一幢幢的家庭式宿舍。一幢八间，分两头进出。间架要比北京的间架大，窗子也大，空气光线都好。要是一对夫妇，就分给一间，要是单身，两个人合住一间。每个工人都由公家发了一顶蚊帐。有些工人床上还折叠着绣花被头。

新华书店的门市部出售各种民族文化的书刊





部队的同志在
采摘自己种植的豆角

有一个工人床边凳子上放了很多龙门书店出版的有关机械学理的书籍。人们给我介绍，说这是一位技术工人，是从上海来的。

晚上，我参加了他们的晚会。在新疆地区，文娱工作是一个重要工作，它的需要性要比内地更高些。据说这里的文娱生活不算坏。在夏季，几乎每个人一个星期都可以看一次电影。一部片子来到以后，总要演上好几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就在办公大楼后面的空场上，架上一个银幕，露天放映，观众自己带小凳或马扎。冬天虽然没有那样方便，不能每个星期都有，但也经常有得看。

晚会在小礼堂举行。小礼堂在办公大楼的后边，这是一座既玲珑又漂亮的建筑，米黄色的墙，衬着灰色的嵌条，门口有六个通直的圆柱子，建筑不大，估计可以坐七八百人。当我们走进小礼堂时，楼上楼下都是热烘烘地挤得那样满满的。仅仅是三四年以前，这儿还是一片荒滩。然而现在，在那一块小小的舞台上，就将进行一种属于高度文化活动的艺术表演。我从座位上回过头去看着黑黝黝的四周。伟



新疆各族各界的代表前来观看部队使用拖拉机犁地

大的中国人民是具有丰富的生命力量来开辟并进行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他们既能顽强劳动，又能愉快生活。

当我住在石河子的时候，我的窗子正面对天山，只要一抬头，就看到那白雪皑皑的山峰；薄暮西天的晚霞，又红又赤、又艳又烈；夜晚，月色皎洁，大地如洗，这些，大概都是自古不变、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还是这样。然而有些事物就大大变了。我所住的那样一间舒适的房间，以前是没有的；前面那一幢一幢玲珑美观的小住宅以及住宅外面的小花圃，以前是没有的；夜晚，四处通明，电灯厂的马达发着轧轧的有节奏的声响，这光和这声响以前都是没有的。这儿本来是一片苇湖，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一座新城，有了房子，有了花草，有了电灯，正如在那广阔的玛纳斯河流域大平原上，过去是一片荒滩，没有生命也没有财富，然而现在，在那些大平原上，开始生产着黄金色的粮食和雪一样白的棉花。河水苏醒了长睡的泥土，拖拉机冲破了原野的寂静。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要永远记载在人类





活动史册上的巨大变化。然而又为什么同是一片苇湖，同是一片荒原，千百年来一直没有任何建设，而今天竟然出现了一座新城？过去一直荒芜连年，而今天却开始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粮仓和棉田？这历史究竟是怎样解释？这里面的关键究竟何在？这一切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正确的党。它教育了并组织了人民和自然进行斗争，发展生产，改变历史面貌，把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的秩序、制度都推前了一百步。

1955年1月，乌鲁木齐。



新疆大棉区的创造

新疆是我们祖国最好、最大、最有发展前途的产棉基地之一。但是新疆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的棉区，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发创造出来的；它的创造又是和苏联对我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

新疆被奠定为我国巨大的国家棉区的关键是1953年天山北麓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戏剧性的棉花大丰收。新疆很早就产棉花，不过过去都在南路；习俗认为北疆地寒，不宜植棉。1950年，生产部队在玛纳斯河垦区试种了一些棉花，但产量都很低；个别单位每亩的平均产量还不满20斤（市斤，籽棉。下同），到1952年，全垦区的每亩平均产量也还只有120.4斤。就在这一年冬天，苏联农学专家提托夫教授应聘到达新疆。根据他自己25年的丰富的植棉经验，他认为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产量完全有可能大大提高。他提出了一个1953年在玛纳斯河垦区植棉两万亩、每亩平均产籽棉400斤的计划；他并在技术上保证达到这个丰产的目标。

提托夫教授提出的这个丰产计划，是完全有他的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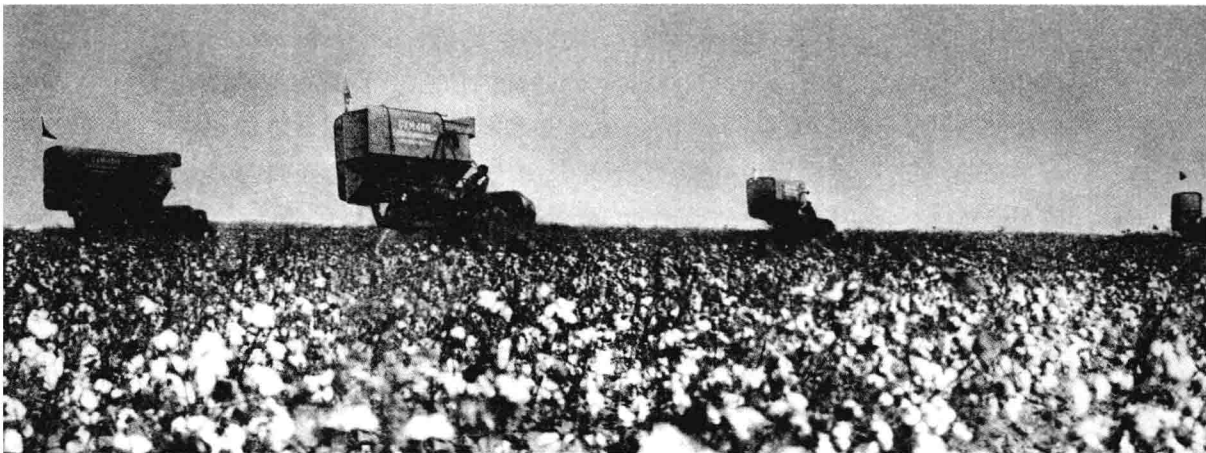


学技术和丰富经验做基础的。但是对于我们刚刚踏上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边缘、技术落后、经验不足的部队来说，提出这样一个生产指标，在当时确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这个丰产计划就像一个猛烈的炸弹一样，在整个玛纳斯河垦区的部队里普遍地激起了掺杂着怀疑和焦愁的混合情绪。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制订计划起，一直到各项具体生产操作，处处遭遇到群众性的顽强的思想抗拒，一开头，各个连在制订生产计划时，思想就打不通，订不下去。有些单位在讨论棉花的生产计划时，大家都不敢发言。有些人说，就是把棉花种子也一起算在里面，恐怕一亩还收不到400斤。

党从来是正确的。党支持了提托夫的棉花增产计划。党在干部和战士中间进行反复的动员、教育和学习。党向战士说，毛主席一再叫我们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苏联派了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们，正是我们诚诚恳恳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最好机会。党具体地指出：学习提托夫教授所教导的各项生产技术就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党指示：提托夫提出的各项技术措施必须坚决执行。

我不打算在这儿详细地介绍提托夫的一套完整的科学植棉方法，

新疆玛纳斯河畔的棉区





附近的少数
民族居民来学习
植棉经验

但我将说一说他的先进方法和群众的落后经验相抵触的一些主要情况，因为1953年新疆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生产过程，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进步思想和保守思想激烈斗争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例子。按照提托夫的办法，要使棉花丰产必须实行密植。他提出每亩一般应密植6000株。棉株多了，结的棉桃自然就相对增加，棉花的产量也就因此提高；这本是十分通达的情理。但是战士们最初思想搞不通，有些种过棉花的战士说：“我们过去种了几十年棉，没有见过这样密。这样密，保险不结桃。”按照他们过去的经验是：此枝不碰彼枝。他们有这样的谚语：“不稀不稠，棉花地里卧条牛。”又说：“不稠不稀，两千六七。”也就是说，一亩棉田大概植两千六七百株。现在听说一亩要植6000株，思想上总是通不过。植棉时，刘学佛小组原规定行距是65厘米，株距是14厘米，每亩密植6500株，定苗时，一律要用定苗尺。可是有些战士却把定苗尺插在腰带里不用，问他时，他说他的手和眼睛就是尺，没错儿。当领导上用定苗尺复量





时，那些没有用定苗尺的，每亩却只植了4000多株；实质上是战士不相信密植。他们很多都是这样想法：太密了，出不了桃。（1955年9月，提托夫教授在新乡、石家庄、南京等地考察当地的植棉工作，觉得内地棉花的产量相当低。新乡、石家庄那些地方过去每亩只植1500到1800株，现在虽然号召每亩植3000到3500株，但实际上只植了2000多株。有些地方，过去每亩不到2000株，现在增至2500到3000株，便认为很好了。提托夫教授考察后的意见是：密植才能丰产，棉株的密度一定要大大提高。他认为不同的地区可有不同的标准。目前在内地推广新疆的株数虽然较早，但有的地方可以不少于5000株，有的地方可以不少于6000株，玛纳斯河垦区在提托夫教授的指导下，1953年，大田一般是每亩植6000株，刘学佛的丰产田每亩植7236株，他的高额丰产田每亩植到7687株。1954年，大田一般是每亩植7000株，丰产田每亩8500到9000株。提托夫教授总结这几年来玛纳斯河垦区植棉的经验时说：“可以断言，要得丰产，每亩至少保苗7000株。”他在1955年11月回国以前，建议玛纳斯河垦区自1956年开始，在一部分棉田上，行距改为55厘米，这样，每亩可植8000株，1957年行距改为50厘米，这样，每亩可植8500株。单位面积产量将可随着更为提高。）

在棉花的灌溉问题上，先进的科学方法更受到保守的经验主义的强烈而复杂的思想抵抗。提托夫对棉花的灌溉是反对大水漫灌，主张实行沟灌；1954年又更提高一步，要求实行细流灌溉。在新疆，过去都是大水漫灌，把田垄开一个口，让大股的水冲进来，把地都浸满了水。先进的科学方法反对漫灌，要求实行沟灌。所谓沟灌，就是要在行与行之间，开一道沟，水由沟里流进，再渗入土中。这个方法最初受到群众的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第一，沟灌就要开沟，不只是一亩地或一块地开一道沟，而是行与行之间都要开一道沟，很麻烦，要花费很多人工。第二，棉苗还小，假如用开沟机开，把土翻动，容易把两旁的棉苗压死。第三，顾虑水从沟中流过，渗不到两旁所植的棉株的根里去。

但是提托夫指出，事实和大家所顾虑的恰恰相反。首先，大家最顾虑的是沟灌比漫灌慢，以为实行沟灌要费很多人工，而事实上，沟

灌比漫灌快，实行沟灌反而比大水漫灌还节省劳动力，棉花在生长中的要求是“上顶太阳脚踏水”。棉花要水，但是不需要大水或过多的水。实行沟灌，水从沟中漫流，正可细细潜入棉株的脚根。棉株与棉株之间一般不需浸水，假如大水漫灌，棉株与棉株之间的土壤势将因为浸水而发生板结，这样要花费人工在株与株之间松土。这种松土的工作非常费时，因为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损伤棉株。通常一个人一天只能松三分或四分地。但是实行沟灌之后，不许水漫过沟顶，这样可使土壤保持疏松，松土的人工就可完全节省。再说，实行沟灌既节省了水，也可减轻土地的碱化程度。此外，大水漫灌时，由于水势大，常常容易把进水口一带的棉苗冲坏，实行沟灌以后，这种现象也可避免。

沟灌的好处是解释清楚了，但很多人一方面因为没有把握，一方面因为费工夫、怕麻烦，所以在思想上总是有抵触。有些人说，沟灌的方法虽然好，但是在苏联适用、在中国未必适用。有些实际领导田间工作的干部，表面上虽然不好再反对，却强调客观困难，例如说地势南高北低，坡度大，开沟困难等。在刘学佛小组里，有些人说，

人民解放军生产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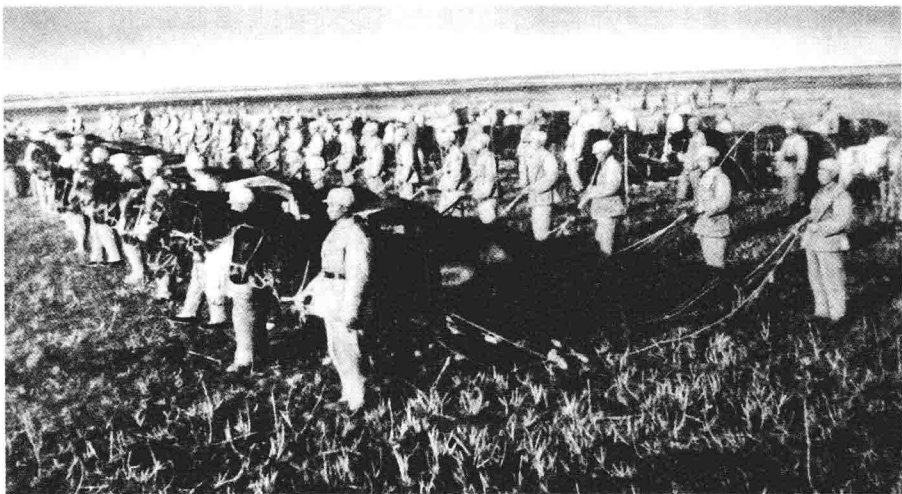




300多亩地，每一垄里都要开沟，要开多少沟呀！大家不乐意。在领导坚持之下，那个小组第一天用马开沟，开了5亩，他们就用开了沟的5亩和另外没有开沟的1亩。来试一试，究竟是漫灌快还是沟灌快。结果，那5亩沟灌的都灌好了，那1亩漫灌的还没有灌完，因为那没有开沟的1亩，地有高有低，低的地方已涝，高的地方还没有到水。这样，大家才同意实行沟灌。在另外一个单位里，也证明了沟灌比漫灌快，那个单位在1951年的1112亩棉田上，大水漫灌，18天才浇完；1953年在1180亩棉田上，改用沟灌，只花了6天时间就浇完。

上面是谈浇水的方式。在浇水的时间上，也遭遇到保守思想的抵抗。先进的浇水思想是以作物的需要为中心。作物要水，就给它水。但在保守的经验里，则习惯于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办事。过去的老办法是对幼苗不给水，有意要“旱它一下”。“旱它一下”的目的是：幼苗既然不能从上面得到水分，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很自然地要把根往下伸长，以争取地下的水分，这样，可以使得棉苗的根深一些，长得牢一些。这个办法在术语上叫“蹲苗”。河北有这样的谚语：“有钱难买5月旱，6月连阴吃饱饭。”意思就是说棉花6月需水，水足丰产，但是5月里，即正在幼苗时期，却要“旱它一下”。在先进的方法里可没有“蹲苗”这一套，要水就给水。所以第一次给棉花浇水，比老习惯要提早半个月。很多战士对此不习惯。按照老规矩，棉花立秋以后不能再浇水，认为这时浇水，会影响棉桃的成熟，使棉桃不吐絮。1953年9月8日，提托夫到刘学佛小组棉田上检查，建议他们在某一部分棉田里再浇一次水，可以帮助棉桃发得更大些。但是战士们按照立秋后向例不浇水的旧习惯说，现在已9月初了，怎还能浇水？党为了教育群众，决定在刘学佛小组的大田和丰产田里都再浇一次水，但特别留出3亩不浇水。结果，没有再浇一次水的那3亩，一些小桃都干瘪了下去，而浇了水的，小桃都变成了大桃，丰产田的棉花更加大开。在另外一个单位里，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一个连的棉田在9月初旬，最后还可以再浇一次水的，但由于保守的经验主义作祟，那个连无论如何不肯再浇，结果发生了落花落桃现象。另外一个连最后一次浇了水，不但落花落桃现象减少，并且所有的棉桃都成熟了。

群众对于每亩产棉400斤的怀疑和顾虑，在进入生产过程的后



准备出发的播种大队

期，已经完全消除了。当棉株开始结桃，结得又多又大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了信心，并感到“事情真能这样”。1953年玛纳斯河垦区的棉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专家提托夫的认真无私的指导帮助下，在兵团首长的严密督促下，在全体干部和战士的忘我劳动下，终于造成了两万亩大面积每亩平均生产籽棉402斤的辉煌大胜利。其中刘学佛小组的高额丰产田中，有1.61亩每亩产棉1349斤，创造了全国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高纪录。

这个大胜利说明了些什么、发生了些什么影响呢？

首先，这是为人人所能看到的，这次玛纳斯河垦区的突出的棉花大丰产是先进科学技术对于落后保守思想的大胜利，是对苏联的先进经验从不完全相信到绝对相信的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大胜利。棉花丰产之后，很多人自觉地检查了保守思想和经验主义，说要是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单靠自己摸索，可能再摸五年也还摸不到这样的成绩。经过了这一次教育，大家对于苏联的先进经验，完全相信了。自此以后，提托夫教授说什么，大家就照着做什么。

提托夫教授所介绍的一整套的苏联植棉方法，不仅在技术上是先





进的，而且还都包含了先进的丰富的科学思想，充分表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具有的优越性。提托夫教授不仅教会了我们这些先进的栽培方法，而且通过对这些先进的栽培方法的学习，使我们很多干部和战士在耕作思想上也得到进一步的启发，提托夫听介绍的苏联的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不仅已经贯彻了棉花作物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其他作物方面，也在这种深刻的教育下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冬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种植冬麦上，过去也是素来主张大垄，反对密植的。过去每亩株数，从16万到24万株，一般在20万株左右。在棉花丰产的影响下，玛纳斯河垦区在1953年冬麦播种时，就普遍改为密植，有些单位采用了每亩35万株的标准。1953年，全新疆部队农场的丰产面积只有两万亩，丰产作物只有棉花一项；但在1954年，全新疆部队农场的丰产面积就扩大到5.6万多亩，丰产作物除了棉花以外，还增加了小麦、玉米、大豆、高粱和水稻五种作物。在1955年，仅玛纳斯河流域及乌鲁木齐区两地的部队农场的丰产面积，就扩大到13.2万多亩。1955年，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又庆丰收，在8万多亩的大棉田上，有1.1万多亩平均产量在600斤以上，其中刘学佛小组的高额丰产田1.05亩平均每亩产粮1392.86斤，打破了他们自己在两年前创造的全国纪录。

1953年玛纳斯河垦区棉花丰产的杰出成就，虽然是部队创造的，然而这毕竟是发生在新疆土地上的事情。因而这个成就又刺激了新疆地方民族的生产情绪，同时明朗地并提前地肯定了新疆地方在全国农业生产上的经济价值和重要地位。毫无疑问，新疆将永远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巨大的优秀的棉粮作业区。新疆植棉的前途尤其远大。棉花的理想环境是：无霜期要在150天以上，生育期的平均温度为摄氏25度，日照要长，成熟时水分不宜过多，而新疆的各种天然条件都很理想。灌溉地区是最宝贵的农业区，因为它的水量可以完全由人控制，而在新疆，现有耕地的95%都是属于灌溉区，水量全部可以受人控制。我们国家现在需要更多更多的棉花，但是在内地，假如再增加棉田的面积，就会相对地影响到粮田的面积。同时，在内地也不能像在新疆那样容易找到这样大的大棉区。玛纳斯河垦区肯定地将以植棉为主。他们计划中的草田轮作制，本来是由棉花、粮食、苜蓿等作物轮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部队种植的棉花

作的，但是由于国家交下的任务加大，棉田所占的比重，更将提高。提托夫最近又建议从玛纳斯河垦区西北角的车排子一带，再向北推进50~100公里；假如在那些地区可以植棉，则将来还可以再在更北的地区试种，以逐步扩大北疆的棉田面积。至于在南疆，吐鲁番盆地是一个突出的植棉地区，按照提托夫的意见，将来吐鲁番应以棉花、无核白葡萄和苜蓿三种作物为主；在棉花种植上，主要是种长绒棉。在南疆的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麦盖提、莎车、巴楚、墨玉、和田等地，都很适宜植棉。按照提托夫的建议，凡能种棉花的地区可多种棉花。新开荒的土地在头两年不宜植棉，正好用以栽种粮食。新疆以后每年新开的荒地很多，因此粮食的播种面积是不会因扩大棉田而受影响的。照现在的估计，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新疆的棉田将扩大到一千几百万亩。

生产部队在新疆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当地民族老乡的农业生产，在耕作面积、耕作技术以及单位产量上，都产生了积极的有利的影响。1954年，吐鲁番农民在3.6万亩的棉田上，平均每亩产棉331.15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吐鲁番访问时，曾经努力了解：1953年玛纳斯河垦区的棉花丰产对于1954年吐鲁番农民的棉花丰产有





没有什么影响？当然是有影响的。除了在植棉的耕作技术上介绍了一些新的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1953年玛纳斯河垦区棉花的大丰产，使领导农民植棉的干部，消除了一部分保守思想，提高了增产的情绪和信心。1955年，吐鲁番1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棉花每亩平均产量是350斤；位于玛纳斯河流域的沙湾、玛纳斯、乌苏三个县里的1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也提高到300斤以上。其中最高的丰产纪录为每亩717斤。1954年冬，乌鲁木齐的八一农学院派出了一个南疆工作组，在南疆地区先后给1.5万多个民族农民作了技术指导。南疆地带的耕作方法，过去一向是比较粗率的，但1955年南疆几个重点植棉县的棉花产量一般也得到提高，其中巴楚县在2.5万多亩的棉田上平均每亩产棉312斤，其中最高的丰产纪录为每亩800斤。

最近中央农业部决定，在1956年，以河南安阳、江苏大丰、山东临清、山西运城、河北石家庄及陕西泾渭等地的农场为重点，进行棉花大面积丰产的示范性试验，积极推广新疆部队棉花大面积丰产的经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业已抽派全国植棉能手刘学佛等八人在上述部分地区协助这种推广工作。将来八一农学院并将抽派教师轮回地到内地的一些农场去指导帮助。全国各个棉区以及试验机关、教育机关和大农场，也将派人到玛纳斯河棉区学习丰产技术。正如提托夫专家回国以前在某一次的报告中所说的：“新疆过去在农业上是落后的，现在它由于各种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上的先进的地方了。”而这一个巨大的成绩，又是和苏联对我国真诚无私的帮助，以及生产部队全心全意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分不开的。

1956年1月，乌鲁木齐。



访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①油区

1956年5月11日，石油工业部负责人在北京宣布：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地区已经证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油田。就在这同一天，我从乌鲁木齐赶了400多公里路，专程访问了克拉玛依。

先循乌伊公路到独山子。从独山子，有一条新修的公路向北直达克拉玛依。这条长达160公里、在几个月以前才开辟的公路，就像一柄利剑似的笔直地刺入了准噶尔盆地。当我们快要到达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中心地带的时候，就远远看到那条称为成吉思汗山的山岭从西向东蜿蜒在准噶尔盆地的西沿。这条青色的、不很高的、山脊齐整得就像一排城墙一样的山岭，给准噶尔盆地增添了不少妩媚。而这新近发现的振奋人心的克拉玛依大油田，就铺展在成吉思汗山的南麓。

我们在这条新辟的公路上行驶，除了一片戈壁和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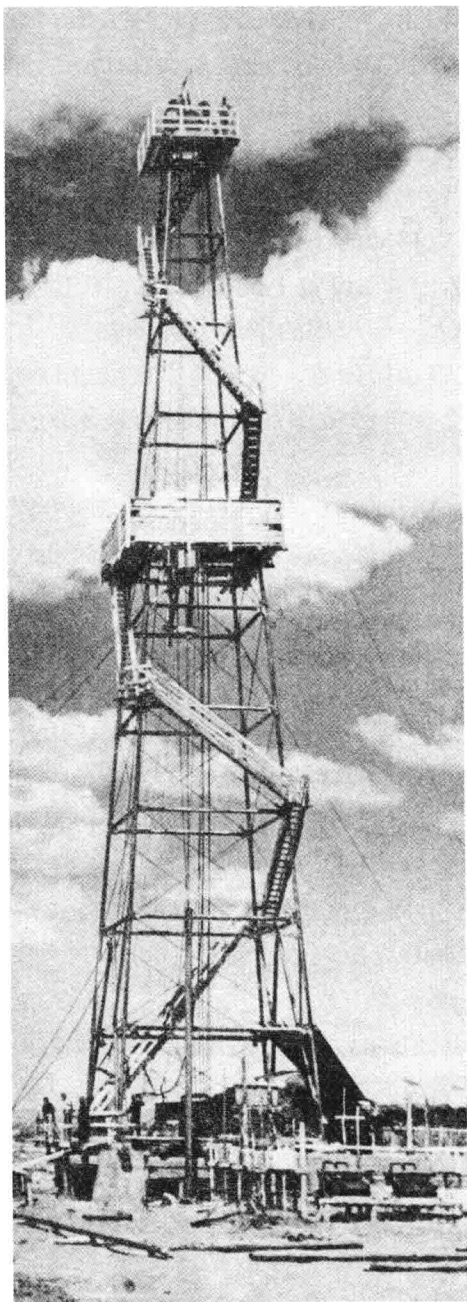
^①“克拉玛依”是维吾尔语，“克拉”是“黑”的意思，“玛依”是“油”，“克拉玛依”就是“黑油”。由于那个地带很久以前，就有原油冒出地面，所以附近的人就管那一带叫“克拉玛依”。



里云天以外，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树木，没有水。没有村庄人家。直到快近成吉思汗山山根，我们陡然看到了好威严地竖立在那旷远的原野上。它们的出现向人们预报：在这片酣睡千年的大地上，就要掀起历史性的变化，使祖国出现空前壮阔的石油工业。

我们终于驶进了目前矿区临时办公的地点；那儿拥挤着很多卡车、帐篷、地窝子以及一排一排可以移动的小木房子。井钻得这样快速，油喷得这样汹涌，使一切思想上的和设备上的准备都跟不上去。兴奋、紧张、局促，交织成一片像火一样炽烈的情绪，弥漫着整个矿区。人们都以无限饱满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定地、夜以继日地在那儿战斗，并且满腔热情地期待着全国范围的人力物力技术的大支援。

中苏石油公司（今新疆石油公司的前身）成立以后，在苏联专家的领导下，曾经在克拉玛依地区进行勘探，初步探明了几个储油构造。1955年7月，新疆石油公司从独山子矿区组织了一支顽强的青年钻井队，在克拉玛依开钻了第一口井。那时，克拉玛依的工作条件是异常艰难的。首先是没有水，水要到60几公里以外的小拐地方去拉。拉一次水，一往一返要7个小时。有一次，拉水汽车走到一半，由于天气太热，水箱里的水干了，车抛锚在戈壁，等了好久，还是没有等到一个过往的人或一辆过往的车。最后，那两个拉水工人只得冒着戈壁上的灼热的太阳走回克拉玛依报信求援，司机则困守在车座上守着汽车。那两个工人走了6小时才走回克拉玛依，可是一到克拉玛依，两个人就干渴得昏倒在地上。那时克拉玛依也没有一间房子，睡就睡在露天里，蚊子和牛虻咬得人睡不着。没有伙房，用三块石头架着一个锅烧饭。柴要到10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打。那儿又常常刮大风。大风一来，井架都被刮得摇摇荡荡。有时钻杆起了上来以后，被风刮得东摇西摆，对不准口，放不下去。人在风里睁不开眼，要是两手不攀住什么地方就会站不住脚。然而这样艰难的环境没有压倒那些勇敢的青年钻井队员。他们到达克拉玛依以前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写了坚决的保证。1955年10月30日，这第一口井喷出油来了，这使那些青年钻井队员的勇敢行为获得了最大的报酬。那天本该夜晚12时下班的一个班，下班以后都不肯回去休息，他们在井架不



油区第一口井开钻

远的地方烤起火来。大家围着火，兴奋地谈着祖国如何需要更多的石油和克拉玛依油田的光明的远景，一直谈到上午4时，才回去睡。

这第一口井出油的消息，立刻震动了所有关切着这一块地区的命运的人们。从今年起，新的井架一个接一个地在这荒漠的大地上竖了起来。4月23日，第二口井又自动喷出了油。5月7日，又有第三口井出了油。第二口出油的井的出油量比第一口井多4倍，而第三口出油的井的出油量又比第二口井多2.4倍。我在克拉玛依访问的时候，参观了才在几天以前出油的那口七号井，那深褐色的浑厚的原油正一股一股猛烈地在管子里自动喷射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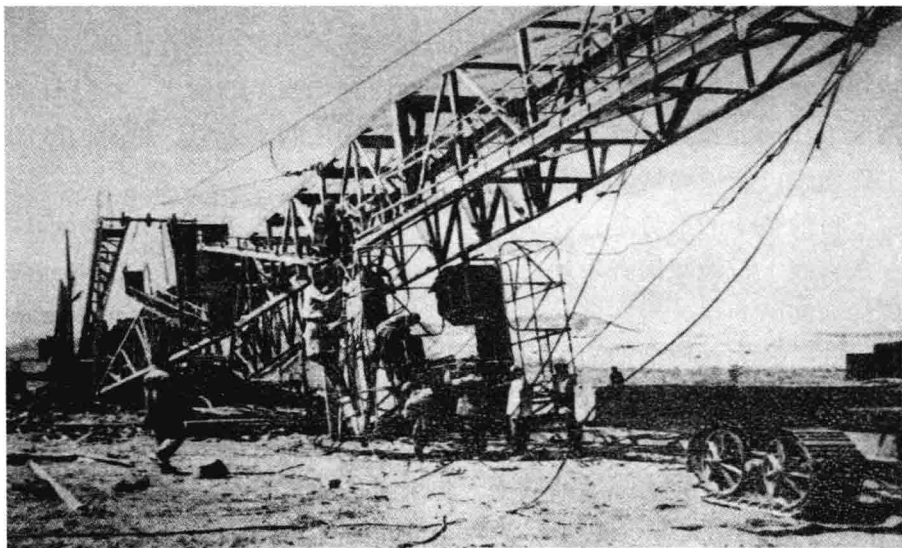
从石油工业的角度来说，克拉玛依是一个具有很多有利条件的石油地区。它的地质情况比较简单，钻探条件也较优越。在克拉玛依钻井，很少发生“卡钻”或井壁塌陷的



事故，也很少遇到高压气水层，泥浆的比重也较小，而且大都是浅井。到6月5日止，克拉玛依已经有九口井出了油，其中有一口井，从开钻到出油还不满一个月，四口井从开钻到出油还不满两个月，另外两口井从开钻到出油不满三个月。井浅，井钻得快，油出得快，因而也就使国家的投资相对地比较少。同时，这一地区的油量也非常丰富。以截至6月5日止，已经出油的九口井中的七口井所占的27平方公里面积（这一带被称为“南黑油山”）的储油量说，就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所给予新疆石油公司的全部可采储量的任务了。

在南黑油山东北约8公里的南小石油沟地方和东北约13公里的深地沟地方，也开钻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现在都出了油。另外，在南黑油山的东南角上，正在钻一口较深的井。目前这口井虽然还没有钻完，但是根据岩心及电测的结果，已经证实地下有油砂。在这样的情况下，储油面积将更扩大；正如石油工业部负责人所宣布的：“如果以今年（克拉玛依）的勘探地区计算，那么（克拉玛依）储油量就将

钻好了一口井，马上把机器搬去钻另一口井





化冰取水，保证钻机一刻也不停止

超过玉门老君庙油田好几倍。”

不仅如此，在克拉玛依东北约100公里的乌尔禾地方，也已发现了长达30公里的露头油苗，同时经过浅钻也探明那一带有油砂。在克拉玛依和乌尔禾之间的一些地带，也钻探到相当厚的油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北长达一百几十公里、东西宽约三四十公里，整个油区的工作面积可能扩展到4000平方公里。

目前整个的形势是：在从克拉玛依南头偏西到北头偏东的乌尔禾这一条直线上，像数箭齐发地正分几条线向东南方向钻探着。以上都在玛纳斯河的西岸，现在还计划在大拐和中拐之间的玛纳斯河东岸也钻一口井。假如在玛纳斯河东岸也能钻到油层的话，那就将逐步伸入整个的准噶尔盆地；那时规模之大，就更难想象了。

以上就是新近被证实的克拉玛依地区的石油资源的一个轮廓和前景。在这样一个大面积的油区中，将来可能找出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油田。同样，在这个大面积上，将来可能出现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新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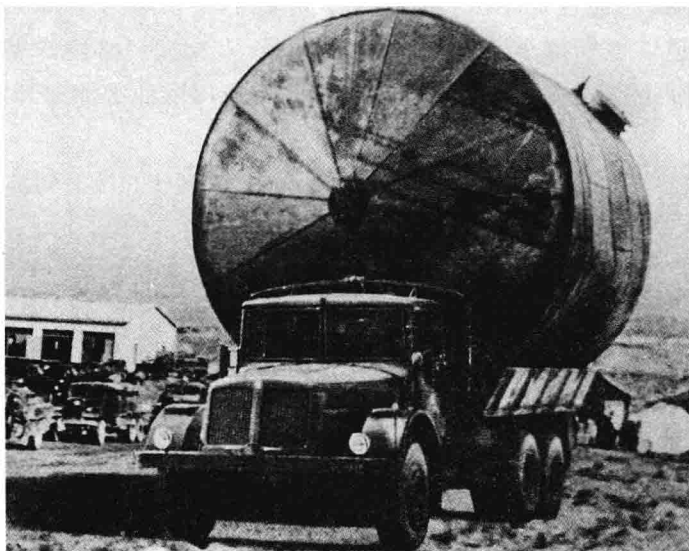




石油工业城市。克拉玛依有希望成为一个“可以满足国家需要”的大油区。

就当前克拉玛依地区最最迫切的问题来说：第一是水的问题。矿区已经打了一口水井，但只能供应工业用水的需要，人吃的水附近没有，而眼看人又将在很短的日子内像潮水一样地汹涌而来。1955年底，在克拉玛依工作的不过几十个人，而现在已经接近一千人。在两三个月以内，估计立刻会增加到四五千人，水的问题急切需要解决。目前计划从克拉玛依西南50公里的青柳沟铺设钢管，把水引过来。将来还要从东北70多公里的地方铺设钢管把艾里克湖的水引过来。其次是公路问题。从独山子到克拉玛依的160公里的这条新公路，路面还只铺了一半，其余一半还是土路。鉴于运输任务的日益繁重，不仅急切要把全路修好，而且要把公路的修筑提高到相当高级的水平上去。此外，从克拉玛依到乌尔禾大约100公里的公路也需要很快地修筑起来。第三是房子问题。目前计划先修3.5万平方米的宿舍和3万平方米供发电、修理、库房等用的建筑物。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克拉玛依的加速开发有决定性的影响。

油区的汽车运输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用很大的力量来支援克拉玛依地区的开发工作，他们拨了一支建筑部队到克拉玛依去修路盖房。几万平方米的建筑要限三几个月内完成，而绝大部分的建筑器材又都要从外面运去，这个任务是相当紧急沉重的。此外，自治区又拨了500多辆卡车，以加强开发克拉玛依地区的运输力量，地方当局已经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这些力量还只能解决当前一部分的紧急需要。克拉玛依的开发规模太大了，就以今明两年来说，要有几十万吨的器材运进去。他们所需要的运输车辆不是以百计，而是以千计。不仅要车子，还要配备司机。他们明年至少要修建几十万平方米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的建筑，这就需要庞大的建筑队伍和数量巨大的建筑器材。他们需要新的大型炼油厂的设计力量和承造力量，他们需要长达几百公里的输油、输水管线的设计力量和敷设力量。在机械方面，他们要数量很多的浅钻机、内燃机、各式储油罐以及各种锅炉等等，还要一个机器修理厂；既要有跟工作规模相适应的设备，还要配备好足够的工人。他们需要巨量的钢板、钢管和其他各种钢材；他们需要地质、钻探、采油、炼油和运输各方面的技术力量；还需要巨大数量的行政干部。而这一切都不是新疆石油公司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能解决得了的。

当我离开克拉玛依的时候，那儿的同志们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在这儿动员一切力量，尽我们一切努力坚持下去。但是我们更迫切地期待全国人力物力技术的巨大支援。必须依靠全国的力量，才能把这样规模巨大、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加速开发出来。”

1956年5月于乌鲁木齐，6月增补。



阿尔泰山一带

1955年秋天，我在阿尔泰山一带旅行了一个多月。这一带是祖国西北角上最最靠北的地带。过去人们把这一带看成为一个荒寒可怕的地方，实际上，这儿却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富庶的地方。我一到阿勒泰，就登上了阿尔泰山的一个主峰。那天云多，我们看远远的阿尔泰山，山云相接，分不清哪儿是山，哪儿是云。秋天游山，本来最美。山间一路都是树木，下面大都是杨树、桦树和云杉；高处则是原始的落叶松。在这秋末冬初、已冷未寒的时候，山上到处是瑰丽的彩色：除了依然闪着光亮的葱绿以外，还夹着嫩黄、鹅黄、绛红、赭红和枫叶红。有时，那满山长着的小灌木冻得发紫，远看就像整个山头都铺着玫瑰花似的。在阿尔泰山，不仅林色美，而且岩石也美。一路经常看到巨大的岩石，奇形怪状，自成格局。岩石上大都长着多年的斑斓的赭红、雪青或草黄色的苔藓。林色和石色相交，使人们远远眺望，高低远近的山峰都成为彩色奇丽的花台。当我登达山巅，纵目四望，我就看到那条我从小时候起就听到的

远不可及、高不可攀、而且被人神奇地称为“金山”的阿尔泰山，那样桀骜不驯地、也那样和平安静地蹲伏在一望无际的最靠北的国境边缘上。真是峰峦重叠，山连着山！再没有比在高山看万山那种壮阔雄伟的气势使人感到心胸豪放，意气舒展的了。人们向东北方指着一个最高的尖峰说，再过去，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向西北，则又毗连着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向南边看，那一片辽阔无边的准噶尔盆地平平地铺展在一阵轻烟似的远雾里。当太阳好时，人们在这山顶上还可以看到从福海海子里泛出来的月白色的水光。

去阿尔泰山一带旅行，最好是在七八两月的夏季；我去时已经迟了一步，然而毕竟仍然看到了阿尔泰山迷人的山色，这种美丽的山色也不仅仅在阿勒泰一带是如此，后来我到富蕴、青河一带时，所见的景色也都是一样的迷人。我在青河时，遇到一位曾经在富蕴、青河一带山里穿行多次的同志，他说，从青河到阿勒泰，一路都是绵延不绝



阿尔泰山的
原始森林





的大森林。在天山，只有山阴生长树木，但在阿尔泰山，山阴山阳都是树木。森林是这一地区的富源之一。只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开始很好地利用这一个富源，而且也还说不清楚阿尔泰山的森林面积究竟有多大。阿尔泰山的森林有70%都是红松，又称落叶松。阿尔泰山的红松和别地的红松还不一样，特别坚硬，阿勒泰的木匠拿到红松，常常要把它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能刨，干的刨不动。这种红松，做铁路上的枕木或者建筑上的木材最好，因为它不怕水，不容易腐烂。此外就是云杉、桦木、杨树、柳树和沙枣。桦木也是一种名贵的木材，这一带很多，但也受交通的限制，不能外运。这儿有些哈萨克人和蒙古人喜欢把桦木镂成碗，碗刨得薄薄的，使桦木的花纹极其动人地显示出来。有钱的人还用银子把这种木碗包起来，夏天用以盛马奶子喝，真漂亮。此外还有一种榛树，俗称黑柳，木性坚韧，最适宜于做一些工具的把手。在布尔津的喀纳斯和红帽河两个地方，还有一种果松，专门结着可吃的松子。

阿尔泰山是有名的出金子的地方。据说，阿尔泰山就是“金山”的意思。在旧社会里，黄金被人们看成为最珍贵的东西；你要是看过卓别林的《淘金记》，对此大概会引起更多的荒诞的想象。阿尔泰山产金确是名不虚传。不仅在阿勒泰，就是在富蕴，过去也有很多人采金。除了私人开采以外，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还在阿勒泰（那时叫承化）开办过金矿局。金子虽然值钱，淘金可并不是轻快的生活。淘金的工人天一亮就要下沟，一直干到天上有星星出现才收工，整天站在有水的金沟里，不管刮风、落雨、下雪，即使全身淋湿，也不能休息。老板雇着工头，永远扬着鞭子在金沟边来回巡逻。很多初干淘金的工人，吃不消，干了几天就倒下了。淘金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三钱金子，然而即使这样，老板还要在工地上开着小铺子，把靴子，袜子、衬衫这些东西卖给工人，先记账，再在工资里扣，既可少拿金子出去，又可从中多进行一次剥削。他们还在工地上开设赌局，勾引工人入赌。不过根据几个从前的淘金工人说，那些想发横财的金客子后来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因为这次挖金可能暴赚一饱，但下次挖金也可能亏赔一空，因为他们找寻“金线”全凭经验，没有科学根据，所以常常开了个空。



在阿尔泰山一带，现在却展开了一种“挖宝石”的工业。这种“挖宝石”的活动，已有10年历史。最近三四年来，这种生产逐渐在扩大。在富蕴，摊开新疆地图看，那是地位很偏僻、交通很不便的一个角落，正是由于这项生产，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生的工业城市。新建筑之现代化和集中化，在新疆，除了乌鲁木齐和独山子以外，就要轮到富蕴了。当我一到富蕴，我就立刻感到这地方充满着活力和紧张。那喋喋不休的风镐声、粗犷的拖拉机声、震人心弦的爆炸声以及那仿佛有着一肚子怒气的从水电站里汹涌而出的激流声，这一切声音都回荡在这四周是山的可爱的城市中。夜晚，灯火通明；我初到时，那远远山头上的电灯，使我几乎疑为天边的星星。简直不能相信：在那荒凉的戈壁边缘上的山窝里，竟然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有声有色的新城市。

这种生产，虽然主要由国家开采，但同时也鼓励民工（私人）开采。这项生产不仅吸收了边疆各族很多劳动人民，使他们得到了新的工作，而且在阿勒泰、富蕴、青河各地，“挖宝石”也成为一部分牧民和农民的重要的副业。特别是在青河，民工采矿的工作很发达，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当地政府对于某些较富的矿，安排人民轮流去采，借以调剂一部分贫苦牧民的生活。民工开矿对于国家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一方面，在生产上他们是国家的助手；另一方面，在矿藏的普查上，他们也成为了国家的义务勘察员。山深岭高，国家的勘察力量有限，不可能处处跑到，但熟悉本地地形的、吃苦耐劳的、英勇善骑的哈萨克族，他们只要带上十天到半个月的干粮，就可以单骑入山，寻觅矿苗。民工采矿的发展，在又一个意义上也等于为国家培养着更多的熟练的采矿工人。他们对于怎样就可断定有矿、矿脉是如何走的，以及分辨矿石种类等，有些人已经很有经验。再说，有些小矿产量不多，还不够条件由国家来开采，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民工开采，对于帮助国家完成生产也是有利的。

阿尔泰山一带是我国有名的牧区之一。全专区11万人口中，论民族是哈萨克人最多；论职业是牧业最多。我从塔城经过和布克赛尔到阿勒泰，后来又从阿勒泰去富蕴、青河一带，一路上经常看到大批的羊群、马群和骆驼群。一群羊就有五六百只，那是太普通了，有时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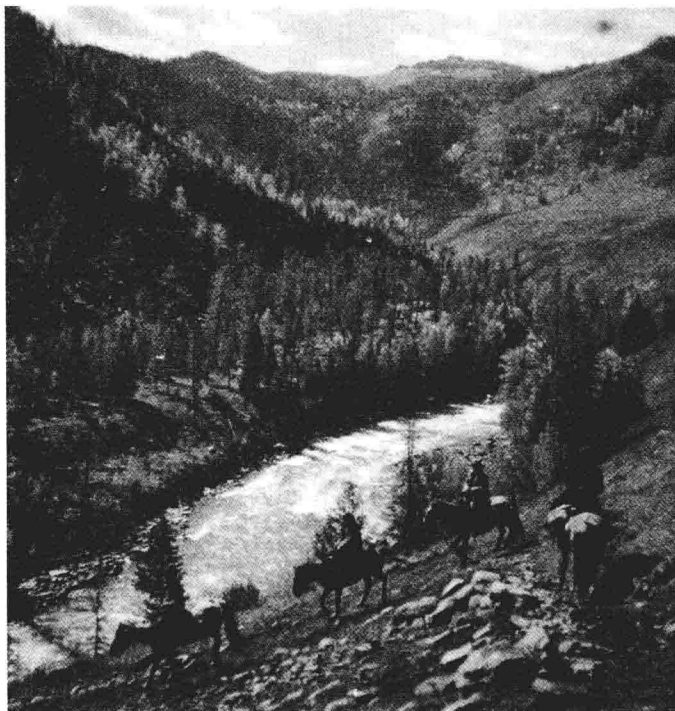


至一群就有上千只羊。当羊群听到远远的汽车声音时，就乱兜乱兜地抢着跑开去，在这时，你就会看到那肥壮的群羊和那又圆又胀的羊尾巴，那种臃肿的样子使你忍不住要发笑。一只肥羊单单它那尾巴上面的那一块油，有时就有25斤甚至30斤重。据说还有这样的事：有些羊太肥了，以致伏在地上以后，简直站不起来了，要人们扶它一下才能站起来。阿尔泰山一带的骆驼也特别多。我在伊犁牧区中看到牧民搬家时，主要是用牛搬家，但在阿勒泰地区，主要是用骆驼搬家。骆驼的外貌虽然极其魁伟，但它的性格却很驯良。由于它的个儿很高，所以当人们要把东西驮到它的背上，或人要骑到它身上去时，它总是驯良地先四脚伏跪下来，等人们把东西在它身上扎紧了或人骑好了，招呼它起来叫它才站起来。新疆的马奶子大家都已闻名了，而比马奶子更珍贵的东西是骆驼奶子。即使在骆驼较多的阿尔泰山一带，人们也不是很容易喝到骆驼奶子的。一则骆驼的数字究竟比马群要少，二则骆驼要两年才怀孕一次，瘦弱的母驼甚至要三四年才产羔一次，所以骆驼奶的产量远较马奶子为少。在较富的牧主家中，即使有骆驼奶，也只让孩子和老年人喝。在青河时，由于我是一个从祖国首都来的远客，因而才有机会尝到这稀罕的骆驼奶子。

在阿勒泰地区，有一个名字是十分引人的，就是“游牧上”。例如找不到一个人，问到哪儿去了时，就有人会说：“到游牧上去了。”谈到当地的民情风俗时，就会说“游牧上”如何如何。古称西域有“行国”与“居国”之别，“行国”就是指游牧生活。牧民终年逐水草而居，所以在“牧”上面加一个“游”字，实在既美妙而又恰当。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阿勒泰地区牧民一般是在冬窝子过六个月，在春秋窝子共过三个月，其余三个月在夏窝子。近年来，当地政府帮助他们做了一些更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劝导他们稍稍迟些进入冬窝子，同时也稍稍迟些上夏窝子。过去，牧民过早地进入冬窝子，常常使得冬季还没有过完，冬窝子里的草早被吃完，因而发生牲口没草吃的灾难。现在，政府一面领导牧民在入冬以前就多打过冬的饲草，一面又劝导牧民稍稍推迟进入冬窝子的日子。同时，也把上夏窝子的日子推后一些，使大山上的草能长得更茂壮一些。

冬窝子一般是在一些比较暖和的地方。常常在一些有山屏障、或

有较多的树林、可以挡风的地方。在我们这些外地人，有时很难分出冬窝子和春秋窝子的区别。至于夏窝子，则大都在高山之上。据说，苏联的学者说，高山的夏窝子生活对于哈萨克民族的健康和生存，是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在冬季，这些哈萨克民族，或其他以牧业为主的民族，有好几个月都住在很矮小的房子里，空气不流通，日光不够，而且吃不到新鲜的食物。按照哈萨克族的生活习惯，在入冬以前，都要“宰冬肉”。通常，大户人家要宰一匹骡马，做马肠子（哈萨克族把马肠子看为最好最珍贵的食物），再宰几头或几十头羯羊（即去势后的绵羊，一般甚肥）。中户人家宰一头牛，再宰几头山羊或不生羔子的绵羊。小户人家宰一头牛。当然，还有很穷苦的牧民连什么都宰不起的。他们把这些牲口宰了，大都还要架起松木火来熏一下，然后挂在屋子里，要吃上一冬天。他们不仅整个一冬天吃不到新鲜的食物，而且他们每天吃肉的时候，大都在夜晚，有时要到深夜十



阿尔泰山的
喀纳斯河畔





一二点光景，吃上一顿肉，喝上两碗肉汤，就立刻倒下睡觉。这种习惯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这种冬季生活对于人们的体质和健康非常不利，起很大的腐蚀损害作用。然而只要雪一化，他们出了冬窝子，就又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特别是在夏季一段：气候是清爽的，风景是美丽的，空气是新鲜的，日光是足够的，喝的是刚挤的奶子，吃的是刚宰的羊肉，使他们为冬季的阴湿的、窒息的生活所损害了的健康，经过这三个月，又恢复了他们的饱满精力。

从冬窝子到夏窝子，像在阿尔泰山那样辽阔的地带，路程常常是很远很长的。有一位老汉叫阿布力海牙脱的告诉我，他的冬窝子靠近布尔津县，但他的夏窝子却挨近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冬窝子到夏窝子，要搬七次，也就是要走七天。实际上还有比这更远的。在我们看来，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在牧区里，搬家被看为一件十分简便而又寻常的事情，就仿佛我们每天要铺一次床、扫一次地一样。不仅从冬窝子到春、夏窝子要搬家，就是在同一个春秋窝子和夏窝子里，也经常是隔几天搬一次家。牲口在这一块地方吃了几天草，就想换一个地方吃草，人们也只好跟着移动。

在阿勒泰专区，在1949年时，全区只有38万多头牲口，到1955年，已发展到107万多头。牲畜的发展有这样的成绩，当然是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做了一系列工作的缘故。从1952年起，肯定了党在牧区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以及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以后，无论在专区或各县，都召开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牧民会议，并组织很多干部深入牧区，把这个政策普遍宣传，使牧民思想上不再有什么顾虑，安心大力发展生产。政府经常派干部下去帮助牧民配种、接羔；教他们怎样用新法剪脐带；介绍改良品种，进行人工授精；组织并发挥民间兽医的力量，使他们更好地为牲畜治病；领导牧民割储冬草，组织牧民打狼，调解牧民之间的草场纠纷。对于十分贫苦的牧民则发放“救济羊”，帮助他们建立家务，长期生产。这一切具体措施，都促进了牧业的发展。但是除了这些具体措施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秩序的安定。

社会秩序的安定是阿尔泰山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最巨大的、主要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之所以是巨大的、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是因为这个变化牵涉到每个人的生产和生活，牵涉到整个地区的改造和建设。过去，人们形容这一带地方说：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反！这短短10个字，包含了多少眼泪、恐惧和死亡！然而从1952年起，这一个40年来一直沉沦在变乱、灾难和苦痛中的阿尔泰山地区，终于走进了一个新的、安定的、一切都在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这个地区过去变乱的情况，在这篇短文里无法细述，只能简单地讲个轮廓。1921年，沙皇将领巴克西带了1万名白俄，流窜我国，占领了承化（今阿勒泰）。当地的守官不敌自杀，部下溃散。白俄勒索与掠夺并行，这势必成为当地人民的一大浩劫。1933年，回人马仲英作乱，福海的沙林巴克副总管煽动群众附和，回族势力占据了承化几月。回、哈两族为一边，汉、蒙两族又为一边，彼此进行了残酷的民族大屠杀。那年秋天庄稼没有收，冬天又是大雪，人畜饿死的很多，又是一次大劫。1940年，盛世才强收民间枪支，官逼民反，就在富蕴暴发了武装反抗，富蕴、青河两地参加反抗的人有两千多。阿尔泰山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政权，实自此时开始，但人们更难忘记的是1946年以后的乌斯满叛变。乌斯满和国民党勾结，反对三区革命，并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在1947年一度占领了承化，到处烧杀抢掠。在阿尔泰山一带，越是深入群众，越能体会到乌斯满匪帮给当地人民所造成的灾害的巨大。我在阿勒泰和布尔津访问一些牧民时，几乎每个人在谈话中都要牵涉到乌匪的罪恶。那一带，有很大数目的牧民都会被乌匪俘虏到东山去过（当地称富蕴、青河两地为东山）。当他们被掳走时，都是有不少牲畜的，但那些牲畜有的被乌匪宰吃了，有的被抢、被偷了，有的因为长途奔走病死了，很多人当他们从东山回来时，只剩了很少很少一点牲口，有的仅仅只剩了自己骑着回来的一匹马，或一头牛，甚至还有不少人只好步行回来，生活困苦到了极点。然而更其残酷的是，当后来三区革命军把乌斯满打出承化，并继续向东追击时，乌匪就把富蕴、青河两县几乎全部的以及福海一部分的牧民，强迫他们搬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昌吉、阜康、奇台、木垒河和巴里坤一带去；甚至还有被迫搬到甘肃去的。在青河，1948年和1949年前后，全县只剩了17户人家，然而即使整整一个县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这十几户家中有些人还是饿死了。在富蕴，基本上也成为—个空



两个哈萨克族儿童

县。绝大多数的牧民是不愿意离开他们可爱的故乡的，但在当时，不服从乌斯满的命令，就将失去自己的生命。他们苦痛地赶着自己的牛羊，越过几百公里长的无人的戈壁沙漠地带，一路上都造成很大的混乱和伤亡。那时富蕴、青河一带不仅所有的生产活动被迫停止下来，整整两个县都陷入了可怕的空虚和死亡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乌斯满终于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海子附近被捕。他部下的一小部分人，由于过去长期地听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因而继续在阿勒泰地区进行扰乱和破坏的活动。主要是以谢尔的曼（乌斯满的儿子，他们是富蕴人）为首的一股，以富蕴为中心，扰乱着四近各地，有一度还居然流窜到阿勒泰城附近的哈拉松一带。另外以胡山音为首的一股，骚扰着青河一带。党

为了早日解除人民的苦痛，早日安定社会秩序，早日发展地方的生产，宣布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再危害人民，遵守国家法令，改过自新，努力生产，就从宽处理，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去，并在生活上给他们出路。由于过去盛世才、国民党一再欺骗当地人民，因而使他们对于党的宽大政策，最初仍然有着很多疑惑和顾虑。政治争取工作是在极其细致、复杂和忍耐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牧区工作，耐心尤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经过好几个月的往返，在1952年9月，谢尔的曼等人终于感激党对他们的宽大，并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归顺政府，亲自到达阿勒泰谒见地方上的党政首长。谢尔的曼表示以后一定好好做人，努力生产，以赎过去的罪过。另一个头目胡尔曼表示，以后如再为非作恶，就不如畜生。谢尔的曼等人归顺政府不久，盘踞在青河一带的胡山音一部分，也跟着归顺政府。阿尔泰山一带多年的变乱不安，在党的正确的政策和坚定的努力下，从此结束。党领导阿尔泰山地区的人民进入了新的、安定的、发展生产的时代。



哈萨克族社员到塔塔尔族社员家里做客





社会秩序安定的效果，首先在一些数字上表现的是：1950年时，全专区的人口还不到7万人，1955年已增加到12万左右；1949年全专区的耕地还不到12万亩，1955年已发展到30多万亩。牲口的数字前面已提到过，1949年时全专区的牲口只有38万多头，1955年已发展到107万多头。这些数字像铁一样地证明着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阿尔泰山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个历史性的变化是当地的粮食生产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给自足。有史以来，这地方的粮食一直是仰仗外区供应的；过去主要是依靠塔城、沙湾和奇台等县及苏联的接济。由于仰仗外区供应，再加上当时官、商的操纵，过去阿勒泰一带的粮价很高。据说在1933年以前，一只羊只能换到五勺子麦子（大约10公斤上下）。1933年以后，由于苏联的帮助，粮价降低，但一只羊也只能换到50公斤上下的麦子。1955年阿勒泰的面粉一公斤售五角九分，但在1949年，一公斤要售一元一角。所以过去这一带只有城市里有粮，山区里根本没有粮；只有少数牧主富户才能吃得起粮，绝大多数的人都吃不起粮。

1950年，干部到游牧上去时，很少看到有人吃面粉，顶多吃一些塔尔米（糜子），但也只有在秋收以后，秋冬两季有吃，到春夏两季就连塔尔米也没有得吃了。当有些干部带了一些用面粉做的饅或馍上山时，一般牧民都视为上品。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阿勒泰专区西面四个县，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和吉木乃的部分地区，稍稍有些农业生产基地，至于东面福海、富蕴、青河三个县，则可以说没有什么农业生产基础。从民族成分上看，过去当地的汉族、回族以及少数维吾尔族种些地，哈萨克族则很少有人种地；而在阿尔泰山一带，主体民族就是哈萨克族。过去哈萨克族不种地的原因是多种的，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民族习惯，但更主要的还是没有人领导。有些人说哈萨克族只爱吃肉，不爱吃粮，这是不正确的。爱吃肉是事实，但未必就不爱吃粮。我访问过的一个哈萨克族老乡说：“过去我们不种地，很少吃粮。看到别人吃粮很新鲜、很羡慕。可是我们既没有力量买，又没有人领导我们种，所以我们吃不到粮。”

在旧时代，由于多年的民族习惯以及对于生产事业缺乏正确的观



牧业社的兽医治疗被隔离的病牛

点，在哈萨克族里是看不起种地的。在那个时代，假如一个哈萨克人竟然不得不去种地，那是一件十分苦痛的事情，因为只有一点牲口都没有的人才被迫去种地，不管他是给自己种还是给别人下苦。然而现在，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情况完全变了。现在，阿尔泰山地区很多从事牧业的哈萨克人都同时兼种一些地了。甚至过去不管怎样也非去夏窝子过一下高山清凉生活不可的哈萨克族，现在有些也留下来照顾田地的生产，不上夏窝子了。我问他们夏天不上山习惯不习惯，他们笑着说：“最初一两年确实不太习惯。可是生产要紧，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一带很多互助组现在都是一部分人带着牲口上山，一部分人则留下来照顾田地。

阿尔泰山是牧区，应以发展牧业为主。但提倡农业并不就是不要发展牧业，正相反，提倡农业生产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牧业。过去，由于没有粮吃，就势必增加肉的消耗。多吃肉就要多宰羊。此外，一切生活上的需要都要依靠出售牲口来解决。但是现在种了一些地以后，不仅自己吃的粮食解决了，粮食有多余时还可以换购其他生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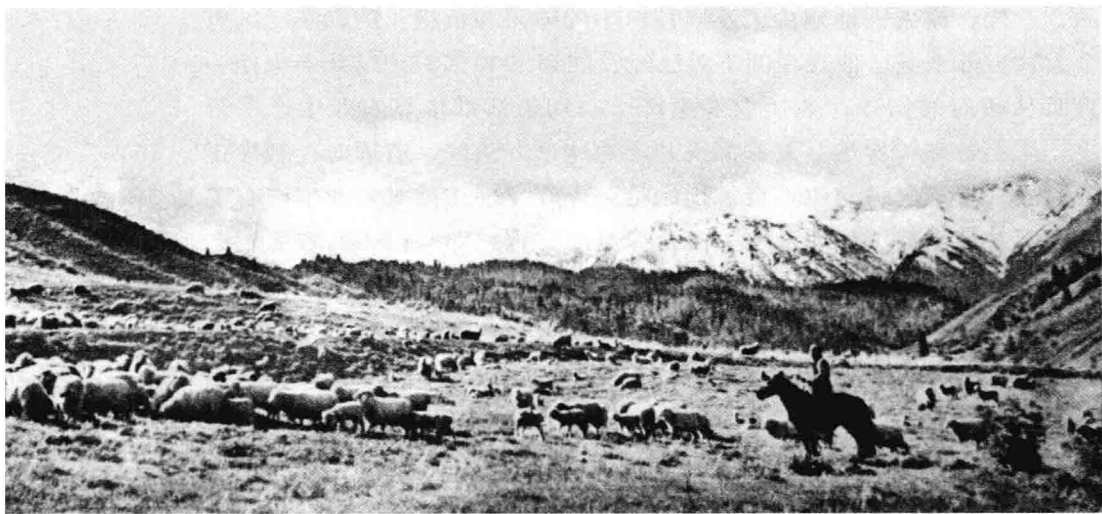


品，这样，就大大地减少了发展牲口中的障碍和负担。阿勒泰二区有个大牧主苏来曼，他现在的羊羔已经发展到3000多只。这几年来他一直听从政府的指导，兼搞农业生产，一切生活都依靠农业生产来解决，用不着宰羊卖羊。大家都说共产党这个办法好，道理对，领导正确。过去看不起种地也不会种地的哈萨克族，现在都对农业生产有了兴趣，并且学会了如何种地。甚至像富蕴、青河那些过去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基础的地方，这几年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在富蕴，1949年全县的耕地还只有1100多亩，1955年已增加到1.9万多亩。在青河，以前简直很少有人种地，1955年也发展到了1.3万多亩。

过去人们以为阿尔泰山一带气候较冷，不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带冬天要比他处冷些，然而春天来的并不迟。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年来，一般在4月上旬或中旬，就都开犁。一般早熟作物此地大都能种。在过去，此地只种了一些春麦和糜子，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地带的作物种类已经增加很多，除了春麦和糜子以外，还种了冬麦、大麦、燕麦、玉米、谷子、豌豆、胡麻、葵花、菜子等。在阿勒泰的农业部队甚至还试种了水稻。我在访问那个生产部队时，就吃过他们在当地种的大米，很好。今年他们又试种了东北大豆，也是成功的。除了粮食以外，蔬菜的种类也大大增加，种了大白菜、莲花白、茄子、洋芋、黄瓜、西红柿、萝卜、菠菜、辣椒、豆角、西葫芦、南瓜、大葱、大蒜、甜菜、韭菜等。在果树方面，也正在移植试种之中。阿勒泰的森林分局在1951年从塔城移来了100多株苹果苗，从1954年起都已开始结了果子。

阿尔泰山地区不仅可以发展农业生产，而且还有着很多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在阿尔泰山地区，发展农业不能妨碍牧业，但这一带土地多，农牧的矛盾不大。土地多，同时也就容易使用新式农具。这一带的水不仅不缺，而且很富裕，实际上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充分地利用当地的水。由于此地是牧区，畜力不缺，这对于使用新式农具是一个有利的条件。牲畜多，肥料也就多，积肥也没有困难。在农牧结合的政策下，农业在阿勒泰地区是有发展的可能的。

一个半月在阿尔泰山的旅行，给我的总的印象是愉快的，具有生命力的，并令人时时回忆着的。当我从和布克赛尔翻过层层大山，终



阿尔泰山高原牧场



于在那高峻的山岭上看到那远远的像一条白蛇一样的额尔齐斯河时，它是多么美丽而又多么雄壮呵！这是阿勒泰地区的一条主河，从富蕴向西流，经过布尔津、哈巴河流入了苏联。哈巴河县的哈巴河、布尔津县的布尔津河、阿勒泰县的克兰河、富蕴县的库颜尔德斯河以及还有很多大小河流，都自北向南地流入了这条额尔齐斯河。当我们从布尔津去富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条河的南岸的山坡边走着的。额尔齐斯河的鱼在新疆是有名的。从布尔津到阿勒泰是120公里。阿勒泰躲在一个山洼洼里，山紧紧地抱住这个城市；别处冬天冷，但阿勒泰冬天仍较暖和，克兰河流过城的中央。当我们穿过山口，初入市区时，那激流、卵石滩、杨树林、木桥……构成了一幅美丽而有诗意的林景。富蕴也和阿勒泰一样，处在一个深深的山窝里。我们翻过了20公里纵深的乌恰达坂，又在吐尔公盆地中穿行了20公里，再翻过一个小山梁，就到了富蕴。四面是山，当中是库颜尔德斯河，河边是密密的桦木林，夏天尤其美。在青河，在我们到达地区以前，也见到一大片桦木林。我们在桦木林里穿过，又渡过青格里河，一切都十分美丽



动人。过去从内地到新疆来的人不多，到阿尔泰山一带的人更少。现在情况变了。在阿勒泰，在银行及贸易系统中，南方人特别多。最近阿勒泰的贸易公司到了一批新从上海来的女孩子，她们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就像一群小鸟一样。食堂里只要她们一来，就显得更热闹起来。在富蕴，从内地来的青年学生很多。在我所接触的一些青年中，有的就是在北大、清华等校毕业的。我们再不要用旧脑筋看新事物，以为阿尔泰山一带是一个荒凉的无所作为的地方。在这一带，无论是工业、牧业、农业，都是有着广大的发展前途的。

1955年11月，乌鲁木齐。

流散哈萨克族的救济

富蕴、青河在新疆的东北角上，是以哈萨克民族为主体的两个牧业县。由于前面一文所叙述的历史变乱，在新中国成立前几年，这两个县都成了“空县”。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0年和1951年，就有一部分流散在外地的富蕴、青河一带的牧民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大部分仍然滞留外地，没有回乡。有些人，由于过去长期地受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党还不够了解，因而采取着观望的态度。又有些人，他们过去曾经跟着乌斯曼在阿尔泰山一带做过一些坏事，害怕回去以后要被追究，所以不敢回去。1952年9月谢尔的曼放下武器、归顺政府，消除了很多人的疑惧和顾虑。“连谢尔的曼都被政府宽大了”，很多人这才放下了心，相信党的宽大政策是真的。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几年中，他们通过自己亲眼看到的许多事实，对党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悟到过去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来后要消灭宗教、没收财产、没吃没穿以及屠杀少数民族这一类说法都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因之，从1962年





冬起，过去流散在奇台、巴里坤一带的哈萨克族，便一批一批地自动地回返故乡。

这些在外乡流散了多年的牧民，饱受忧患，他们回乡时，有很多只剩下了很少几只羊了，有的甚至连一只羊也没有了。还有的，连自己骑的马也没有了，只能徒步走回去。党对于这些流散的穷苦的牧民非常关切，并且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安抚他们，救济他们。很多地方，当那些流散牧民回来以后，就有干部下去，或者是挨户，或者是以阿乌尔（相等于自然村）为单位，进行慰问，并了解他们的困难。对于那些极其穷苦的牧民，除了进行了紧急的救济以外，还从多方面来帮助他们。有的介绍他们到金属公司矿上去挖宝石；有的组织他们去伐木卖柴；有鱼的地方（如福海）组织他们去打鱼，打了由贸易公司收购；有骆驼的，组织他们去外地参加运输。救济工作在1952年就已开始。那一年，在富蕴发放了3万多斤粮食，在青河发放了2万多斤粮食。在1953年，党和人民政府在阿尔泰山地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

开展民主运动，新疆三台村哈萨克族人民在草地上召开部落会议





哈萨克族妇女
做手抓羊肉招待客人

生产救济工作。那一年，阿勒泰专区一共拨付了37亿元（旧币，下同）的救济款项，其中一半以上都用于富蕴、青河两县。第一次救济在冬末春初，那时陆续从外地迁回的一些贫苦户，还没有找到工作，又没有口粮生活，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发放了救济粮和救济金。第二次救济是结合春耕进行的，除了发放救济粮以外，还贷放了很多籽种，解决了一部分牧民生产上的困难。除了这些临时性的救济以外，为了比较彻底地帮助贫苦牧民长期建立家业，发展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在那年7月又进行了第三次救济，发放救济羊，救济羊的发放是十分认真和细致的。事前一面向召集了游牧头目和积极分子座谈，一面又纷纷召开了以阿乌尔为单位的群众会，讲述发放救济羊的意义和发放的等级标准，然后再由下而上地一级一级评上来。被评为一等的最穷苦的牧民，每个人可以领到5只救济羊。在富蕴，最多的一户领到了33只救济羊，事前政府派了专职干部到塔城一带买了大批羊群，再分送各地分别发放。党是要切切实实地使那些被救济的贫苦牧





民真正能够在党的帮助下发展生产并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的。

在1952、1953、1954这三年中，富蕴先后救济了六次，发放了救济羊3600多只，救济粮5.4万多斤，救济金9000多万元，被救济的有950户。在青河，这三年中一共发放了救济羊2300多只、救济粮3.6万多斤，救济金1600多万元，被救济的有668户。这两个县，在上述三年中，受到政府救济的牧民，大体上占到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对于那些在政治上争取回来的争取户，党还另外发了专款救济他们。其中关于救济羊一项，平均每人得到了5只大羊和3只小羊。这样，就使得那些多年来在山里流散不定的人们，也能安下心来从事生产。

很多得到救济羊的贫苦牧民都说：“过去财主没有给我一只羊，父母兄弟也没有给我一只羊。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给了我羊。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终身不忘党和毛主席。”他们都保证要好好爱护羊，好好牧放，决不宰食，一心发展生产。就是不是直接得到救济羊的人们，看到党这样深切地关怀着人民的生活，也为之衷心感动。青河县的桑德克和衣巴特两位老人说：“国民党对我们说，共产

邮递员给一位哈萨克族老大娘送《新疆日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牧区妇女参加认字班



党不要宗教，要没收财产，害得我们有些人逃到青海，流落甘肃，甚至亡命印度；在戈壁滩上，渴死了饿死了很多人。去年（1952年）我们回到青河，看到各种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国民党所说的那个样子，党和人民政府几次救济我们。这次又给我们庄子两户穷人发了救济羊，我们都很高兴。政府救济的虽是两家，实际上是救济了我们大家，因为我们哈萨克族有句谚语：‘一个人肚子挨饿，全部落受到影响。’我经过了几个朝代，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事。”福海县有个牧主雅开斯说：“政府为了搞好救济工作，干部不怕山高、水深、路远，深入到游牧上每一户去了解，务使真正的穷人能得到救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由此也证明党在牧区的政策真正是提倡发展畜牧业和不斗不分的，这也就同时消除了我哪怕斗怕分、对党的政策的怀疑顾虑。”

在富蕴，在给争取户发救济羊时，富蕴县的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沙都瓦哈斯毛拉（哈萨克族）对那些争取户说：“今天政府救济你们，并不是害怕你们，而是表示关怀你们。1952年我叫你们归顺人民政





府，那时你们顾虑政府不会对你们宽大，怕受了骗。今天你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政府究竟是怎样待你们的。今后你们要好好发展生产，报答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关怀。”谢尔的曼最后代表受救济的全体人员感谢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他说：“今后我们一定遵守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努力发展生产，建立幸福的生活，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谢尔的曼现在担任了阿勒泰专员公署畜牧科的副科长；原在他部下的另一个头目胡尔曼担任了富蕴县人民委员会畜牧科的副科长。我在阿勒泰和富蕴两地时，曾想访问他们，不巧他们都下乡了，等了好久没有等着。后来我在青河时，访问了原属胡山音部下的千札达、汉札达两兄弟，他们都是青河人。他们兄弟两户一共15口人，1952年回来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只剩了一个木碗和一把小茶壶。在1952~1954年这三年中，政府一共给他们发了900多斤面粉、200多斤麦子、19块砖茶、60米布、900万元，以及112只羊羔。汉札达说：“我们刚回来时，心里想，只要政府宽大，不追究过去，使我们夜里能够好好安睡，就已心满意足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党和政府这样关怀我们，一再救济我们。党对我们的恩情，真像我们的头发一样，数也数不尽。”千札达说：“过去国民党欺骗我们，使得我们害怕共产党，在山里跑来跑去，当土匪，拿枪打政府。要是在旧政府的时候，我们这样回来了，我们的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早就被宰掉了。现在党不仅宽大我们，而且还救济我们，这才使我认清自己过去的错误。今后我们只有完全相信党，听毛主席的话，才能走向幸福的道路。”

在富蕴，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热合木的，本来是谢尔的曼的部下，可是归顺政府以后，仍不好好劳动，经常在富蕴偷盗一些牲畜去奇台出卖，又从奇台偷盗了一些牲畜赶回富蕴出卖。这事情被他的本部落知道了，他的部落便把他押送政府，要求政府叫他好好劳动改造。可是后来这个热合木在劳改中溜逃了，他又想鼓动人们上山作乱。他去看谢尔的曼和胡尔曼。谢尔的曼和胡尔曼都对他说：“你要上山，你一个人上山去吧，现在再没有人跟你上山了。”结果，谢尔的曼和胡尔曼把这个热合木押送回政府。这是1953年的事。在1955年春天，热合木又溜跑了。有一天傍晚，他悄悄地从外面什么地

方溜了回来，可是当晚就给他部落里的头目知道了，第二天一早，那个头目就来报告政府，这样，又把热合木押了起来。头目对热合木说：“从前是‘官逼民反’，现在党和政府待我们这样好，不仅不杀我们的头，反而还救济我们，我们还反什么？你自己不好好劳动，你对得住党、对得住毛主席、对得住你自己、对得住我们大家吗？”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历史的秘密和党的真正的伟大，在阿尔泰山地区的具体条件下，党首先争取社会安定的宽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接着，党又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安家生产。在这样一个英明的党的领导下，人心怎还会“思变”，社会又怎会不欣欣向荣地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呢！

1955年12月，乌鲁木齐。





在阿尔泰山之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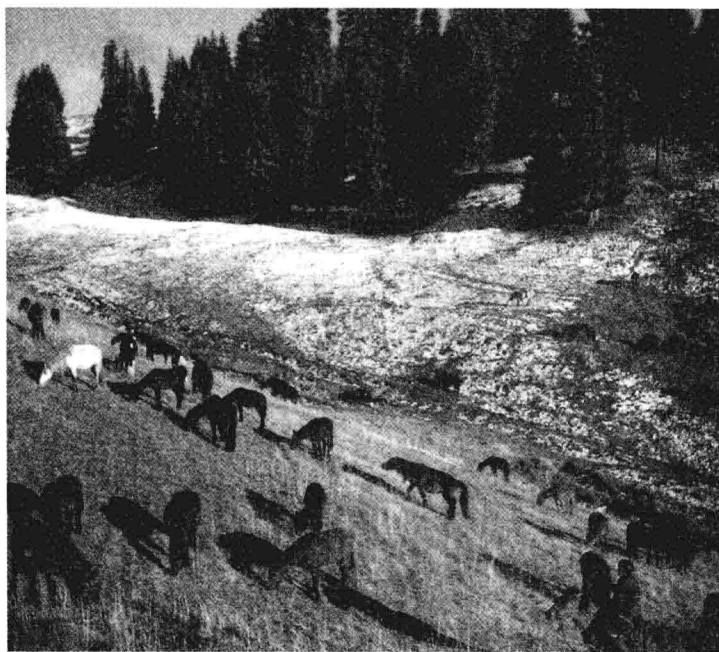
我一到阿勒泰，就去访问了阿尔泰山的一个主峰。上山那天，下面还是好好的天气，可是走到半路上，便落起雨来，接着在雨中飘着疏疏落落的雪花，再上去则风雪弥漫，放目四顾，尽是白茫茫的一片了。那时还没有到中秋，可是我们都已穿戴上皮衣皮帽，俨然严冬景象。到了目的地，看到山上盖着好多幢虽然很小然而饶有风趣的木屋。山上尽是岩石，没有树木。山坡很陡，没有一点平地。每幢木屋都是在山坡的乱石中铲平了一小块地面盖起来的。

这地方一年12个月，倒有九个月在风雪的世界里。雪要到6月中旬才化完，但到8月底9月初，又开始下雪了。冬天的雪很厚，一次要下1米左右。有时积雪厚达3米。要是在一些低洼的山腰里，风把别处的雪也刮了来，甚至会有十几米深。有一年有一次，一夜醒来，窗子和门都被雪埋了，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屋子里走出来。不仅雪大，还经常刮风。1955年4月刮了一场大风，把几座房子的屋顶也刮掉了。黑板报被刮得在

200米高的天空中飘，连有五六百公斤重的铁斗车也被风刮倒了下来。在大风之中，雪就变成像冰糖那样的结晶体，把人们的脸打得热辣辣的。大风大雪常常使得整个的山头沉沦在一片浓得化不开的迷雾里，有时甚至连1米以内的东西都看不见。7~8两个月是这山上比较晴和的日子，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夏天”，人们也不能离开棉衣。在这两个多月里，虽然不下雪，但却经常下雨。有时山上满天的好太阳，但下面的山沟里突然有一股黑云卷上来，云到雨也到。雨势凶暴，还夹着很大的冰雹。

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无情的、在自然条件上及其突出的地方。这是一个要求人们以极大的勇敢、智慧和忍耐同自然进行搏斗的地方，这是一个考验并锻炼每一个人的心志体魄的地方。然而在伟大的党的教育下，人们总是能够经受考验，在困难中锻炼自己，并创造出艰巨的成绩的。1951年秋天，当人们勘探矿藏初到这个山岭的时候，山上除了岩石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五六十个人密密地挤在两个帐

阿尔泰山高原牧场放牧的马群





篷里，锅灶安置在露天里，山高天气冷，经常煮不熟饭；有时苏联专家也只能陪着大家啃冷饷。由于山上没有树木，无论是烧的柴火或是架屋的木料，都要到下面的森林里采伐了再背上来，他们大都下班就下山去背木料，一来一回5小时，回到山上时已快午夜了。1952年，到了两部空气压缩机，可是运不上山来，要把机器拆卸成零件，再用牲口驮上山。机器装好了，还要燃料，也得用马驮。但是山上雪厚，牲口也只能驮到离山头8公里的地方，再往上就得改用人背。那时专门抽出了一部分人背油，每天背的也只够每天烧。特别在化雪季节，背油更困难，底下的雪化了，面上的雪还没化，有时一脚踏下去，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拔起脚来。所以只好改在夜里背，因为夜晚气温低，冰比较厚，从午夜1时出发，到早上9~10时才能背到。但是为了不使生产停止，没有一个人在困难前面屈服。

1954年，金属公司在这深沟、险坡和悬崖的山岭间开辟了一条公路，但是有了公路也保证不了山上山下终年通运。在10月以前，十辆卡车扣上铁链，还可以勉强上山，10月以后，雪大封山，汽车就不能直达山顶了。由于气候的限制，通常矿本部总要抓紧在6、7、8这三个月里把矿上一年中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机器、燃料、爆炸器材、各式零件以及所有职工一年中的食物、木柴和生活用品都运到山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易地任务。这条新公路是在1954年9月1日通车的，但通车不久，就进入了雪季，以致一部分物资没有能够在限期以前全部运足，以后继续用汽车、兽力、人力分段运输。在汽车不能到达的地方，改用牛拖。牛也拖不上的地方，再用人背，但是用牛拖也仍得人先在前面踏出一条路来。假如没有人先替牛开道，牛就会掉进路旁的雪窝里去。1955年1月下旬起，山上连续落了半个月雪，燃料的供应被迫中断，影响了生产。党发动了所有山上的和阿勒泰城里矿本部的职工参加了伟大的扫雪斗争。一头从山上扫下来，一头从山脚下扫上去，花了6000多个人工，终于在从3米到10多米深的积雪里打通了一条80多公里长的走廊。1955年2月里，由于另一件迫切的任务，山上的人要下山，但是路上雪厚，人在雪里走，雪虽已陷到胸口，而脚还没有着地。党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开路突击队，第一个人先把身子向雪地上一扑，把雪压下了30多厘米，再把腿向下面一



跪，又把雪压下了30厘米，然后才能抬起脚来前进一步。就这样，气力大的也只能连续开五米路，气力小的就只能开两三百米。第一个人气力用完了，就倒在路旁休息，再由第二个人如法接着前进。就这样，这三四十个人花了4天工夫，才把从二道房子到大桥之间的9公里路打开。人们就是这样英勇地在党的领导下同险恶的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斗争。

在生产上，情形也是一样，工人们都是日夜三班地不停息地生产着。无论天气如何严寒，除了遇着特大的风雪以外，一般都坚持工作。有时，大雪把铁轨埋了，党就立刻派人在每一二百米之间现下现扫，来维持清沙的运输交通。有的就在轨道两旁竖上许多木桩，钉上木板，借以挡拦两边的风雪，就像挖成了一条白色的战壕一样。风大的时候，两个人推不动铁车，就再加上两个人一起推。天气确实是寒冷的时候，但是劳动着的人仍然一身是汗。很多工人下班的时候，帽子上衣服上都挂着冰凌，胡须、鬓发甚至汗毛都沾着冰霜。不仅没有人抱怨天气，天气反而成了伟大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最亲切的证人。

上山第二天，清早一醒，我就忙着看天，生怕又像昨天那样，满山迷雾，什么都瞧不见，所幸那天满天太阳，也不刮风。我们住的地方大约海拔2700多米，要到山顶上的探矿场，还要上行200多米。有一个雪崖，又陡又滑，沿边竖着一些木桩，上面系着粗大的绳索，供人攀援。我一把一把攀着绳索奋力走上去，神经和肌肉都紧张到极点。然而不管怎样困难，只要不中途掉队，就是胜利；我终于到达了这个高峰上最高处的探矿场。

矿场上的情景是生动的。我们先看到一个很大的凹了进去的露天窟窿，这是已经开采过的一个露天采矿场。现在另一个更高的地方正在被开采着。我们到达的时候，刚爆炸过，看到很多推运工人正在忙碌地把被炸开了的石块装进铁斗车里，通过轻便铁轨推送到选矿的平台上去。另外还有一些工人攀登在很高很陡的山崖上，用铁棍把那些可以用人力扳下来的岩石扳下来。在选矿的平台上，有着很多手持小锤的男女选矿工人在守候着。他们从矿石里细心挑拣；常常一铁斗车倒下来，拣到的只有很少很少一点。那些堆积废矿石的地方被称为“矿尾”，很多矿尾就做一条一条齐整的长堤，向天空延伸出去，为这



高山构成了另一种新的奇景。我们参观了露天矿以后，又看了一个地下矿。隧道的入口处挂满了冰凌，隧道里有一个地方打了一口很深很深的竖井，在竖井底层进行着更深一层的钻探工作。我穿行在那隧道里，看到在黑暗中到处都发射着点点闪亮，这情景仿佛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的世界里，那样美又那样充满着神奇的意味。我们从隧道里出来，再回到山顶，看到远近山脊上长着的岫嶙的巨石，有的就像锋利的刺刀一样刺入天心。云在山下不断地穿浮，放眼所及，满目都是旷无边际的千山万壑，这是何等旷达、雄伟而又壮丽的景色！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荒寒的大山之巅，却出现了一个现代化机械化的工业场地，勇敢的人们在那儿不懈地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小时候，夏夜纳凉，常听老人讲述一些寻觅宝石的神话，而现在，我经历了千万里的路程，登上了3000米的高山，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生动而伟大的挖宝图。这既不是怪诞的神话，也不仅仅是一两个探险家的活动，这是真切的现实，这是为国家创立的不朽的勋业。

我在这高山上住了3天。在这短促的访问中，我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前面叙述过的那些故事所代表着的那种无比坚韧的战斗意志，以及我所接触过的那些人在谈话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些年轻小伙子，嘻嘻哈哈，边说边笑，一切困难的事情在他们的谈吐里仿佛都变成了最轻松的故事。“我们这儿不能和内地比呀，我们是在祖国的边疆，我们是在开发祖国的边疆啊！”他们说，当他们一想到这些，就感到自己的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而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当大风雪袭来时，他们就想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书中的那些英勇榜样，阿列克塞、丹妮亚、根卡等人的英雄形象立刻呈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格外勇敢坚定。……然而这一切感人的印象又引导我进入一种更深刻的感念：越是边域遥远、地方荒奥、山深岭高、风雪袭人，就越使人深切感到强大的党的强大的力量！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新生的时代中，最最深刻巨大的事情是这个强大的党的强大的光芒在全国无所不达！我们不能想象：在祖国边疆这样一个深奥的大山中，自然条件这样险恶，要是没有党，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人们会在这样荒寒的地方制造出这样光辉的成绩！我们更不能想象：在今天中国，不论是怎样一个荒僻的角落或者怎样一座峻险的高山，



阿尔泰山高原牧场



怎会没有党的光芒的照耀！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党，就有英勇的斗争，就有创造性的劳动！在这个高山之巅，正因为有了党、有了党的领导和党的不断的教育，人们才能认清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党不仅领导人们同自然搏斗，党还领导人们教育自己；党不仅组织人们生产，党还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在这个大山之巅，正如在祖国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也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在山上，一天有三次广播，既有新闻，又有音乐。每星期有两次电影，有时周末还有舞会。山上有图书馆，有医疗所，有邮电代办所，有矿区贸易公司。条件虽然艰苦，但生活全凭自己创造。

多少年代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沉沦在黑暗的、有劲使不出的、近乎瘫痪的境地里，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就像久阴初晴的原野



一样，到处阳光焕发，生意蒸长。每个人，每块地方，都在劳动着，创造着。他们既创造财富，又创造历史。阿尔泰山上的战斗只是全国万里战场上的一角；它所缔造的诗篇也只是时代大合唱中的一行。三天山巅所见，使人更加坚信，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必然日趋强大，并将按部就班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

1955年11月，乌鲁木齐。

欢乐的库尔班节

我到达伊宁的第三天（1954年8月10日）就碰上伊斯兰教的库尔班节日。伊斯兰教每年有两个节日，一个是开斋节，一个是牺牲节；在新疆，前者被称为“肉孜节”，后者被称为“库尔班节”。在这两个节日中，回族习惯上把肉孜节视为大节，库尔班节视为小节；但新疆除回族以外的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则把库尔班节视为大节，肉孜节视为小节。

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回历每年九月是斋戒的月份。在封斋期间，日出以前进餐礼拜，一直要到日落以后再进饮食，白天不准饮食。根据教义，真主因为感到人间贫富悬殊，为使富有的人也能体会穷人的痛苦，所以命令所有的教徒一律每年斋戒一月。在封斋期间，并需对穷人施舍救济。一月期满，即行开斋，所以开斋节都在回历的十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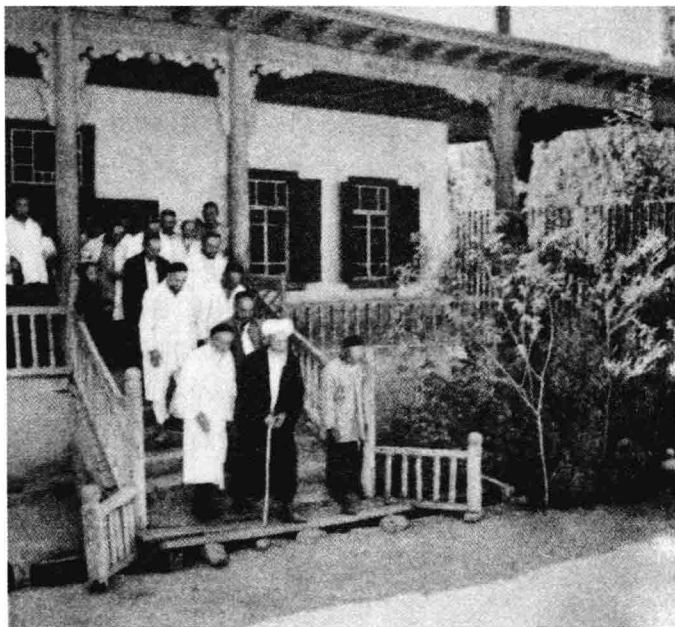
在开斋节（即肉孜节）的后70天，即回历十二月十日，是牺牲节，即库尔班节。这个节日的来源据说是这样：当时有一个“圣人”依不拉音，祈求真主给他一





个儿子，许愿每年宰牲祭祀。不久，他的妻子果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司马义。但是当司马义已经长大到七八岁时，依不拉音并没有履行他的宿诺，因之有一天依不拉音在梦中见到真主责他失信。依不拉音在梦中就说愿宰 100 峰骆驼献祭，后来又增到 200 峰，真主仍不同意，并启示依不拉音应该宰一个他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为祭。第二天，依不拉音便把他梦中所见告诉他的妻子萨拉，并说准备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司马义宰献真主。他的妻子和儿子听了以后，也都愿意遵从真主，牺牲自己。当依不拉音正要动手宰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真主知道了他的诚意，就立刻遣派天使杰不拉衣带了一只羊送给依不拉音，说他既然如此诚心，可以宰羊以代。自此以后，每逢回历十二月十日，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都虔诚地宰牲祭祀，过这个神圣的牺牲节，即库尔班节。

这两个节日的日子，虽然在回历上是固定的——每年的十月一日和十二月十日，但是一合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公用的阳历，这两个



阿訇和群
众在节日里相
互拜年



节日的日子就每年不同了。例如1954年的库尔班节是8月10日，到1955年的库尔班节就会在7月底的一个日子。这是因为阳历和回历的算法不同的缘故。回历本来也有太阳年和太阴年两种年法：供宗教仪式用的大都采用太阴年法。太阴年法以月亮圆缺十二次为十二月，一年只有354天。但是阳历一年有365天。回历太阴年法每年要比阳历少11天。因此这两个节日在阳历的月日上就每年都不相同。

但是这两个节日虽然在回历上是固定的、一致的，而各地过这两个节日的日子，又会彼此不一致。原来在回历九月开始斋戒时，必须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夜晚先看看天上有没有新月。回历太阴年各月的大小，本来都是规定的：逢单，月大，30天；逢双，月小，29天；八月逢双，本来应为小月，仅29天。假如八月二十九日的夜晚，见到天上有新月，到第二天就开始戒斋，而八月仍为小月；但是假如这天晚上不见新月，则必须第三天开始戒斋，而把八月改为大月。同样，在九月二十九日也须先看天上有没有新月。如有，则第二天开斋，过开斋节，而九月即改为小月；如不见新月，则第三日开斋，九月仍为大月。由于各地天气不一，有阴有晴，甲地看到新月，乙地未必见到新月；因此在甲地可以明天过节，而乙地可能要在后天过节。在新疆来说，各地都由当地的阿訇会商决定。常有因为连着几天不见新月而推迟几天封斋或开斋的。

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库尔班节之于他们，犹如阴历年之于汉人，这是他们一年中最欢快的日子。现在在新疆，每逢过库尔班节，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和企业，对于民族干部和民族学生，一律给假三天，使他们能够和他们的家人欢度这个隆重的节日。在这三天之中，不准讲任何不愉快的话或者提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同时，在这三天之中，彼此互相拜节，使平时不大相叙的亲戚朋友，在一年之中至少也有一个叙旧团聚的日子，这犹如汉族社会在过阴历年时去家家拜年一样。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在库尔班节的前一天，家人都应该到祖先的坟上去念经，回来以后，在家里还要念一段经。要是自己不能念，则也要照样跪在地上听别人念。在节前的晚上，长辈还要给子女小辈过节钱，这和汉族社会在大除夕长辈给小辈发压岁钱一样。



在库尔班节那一天，大家起身很早，起身后首先净身，但这种净身和普通的洗澡不同；假如在过节前一天在澡堂里洗了一个澡，这并不能就算净身，因为澡堂里的水是不洁净的。通常，净身大都采用像淋浴那种方式，有一个水罐或水桶悬吊在上面。这种水罐或水桶，底下有一个小孔，附有塞子，洗身时，把塞子拔除，水就由小孔中流下。这样，凡是净身用的水都是干净的，而洗过身子的不干净的水则已随时流去。伊斯兰教这种用水的方式确是人世间最洁净的一种用水的方式。有些礼拜寺里，都设有专备教徒净身的地方。这种净身又分大净和小净两种。大净在经语上称为“乌斯里”，就是用淋浴的方式从头到脚洗净全身；在宗教节日，或参加宗教祭祀，都须实行大净。无论男女，在同房、遗精、月经及生育以后，也都须大净。另外一种是小净，仅仅洗一下手、脸、脚及生殖器，经语上称为“阿布代斯”，在做礼拜以前，都须小净一下。必须净身以后才能进入礼拜寺，这叫做“身上带了水”。

在库尔班节那天，我刚一醒来，就听到市内远近礼拜寺所发出来的鼓声。这种鼓声初听起来，异常单调沉浊，它是用大鼓和班鼓两种鼓按照一定的简单的节奏击奏出来的。然而当你久久地听着这样的鼓声时，你会逐渐感到这鼓声虽然单调，却很肃穆。我匆匆地洗了脸，就到一个最大的礼拜寺去参观。这个大礼拜寺就在我住的斯大林街南面的一条街上，很近。在礼拜寺的大门旁边，矗立着一座有三层高的亭楼，上面插着国旗，挂着毛主席像，还插着其他很多颜色的旗帜。这座亭楼，在教会里称为“邦克楼”；那招呼教徒前来礼拜的鼓声就是从这座高高的邦克楼上发出来的。进入大门以后，是一个有树木的院子。礼拜和讲道用的礼拜殿则位居院子的正中。这座礼拜殿大约七间开阔，十六七间进深。礼拜殿里铺满着一条一条长的地毯，教徒就整齐地一排一排地跪在这些地毯上。礼拜殿里面什么装饰都没有。伊斯兰教做礼拜叫做“乃玛子”。他们做乃玛子时，和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他们不要在他们面前有任何陈设。例如佛教，做佛事时总是要悬挂许多佛像。内地民间信佛的人，在屋子里或者供奉释迦牟尼佛像，或者供一个观世音像。基督徒则都大多挂着耶稣的像。但是伊斯兰教什么像都没有，而且什么东西也不挂。他们做乃玛子时，都是朝西。



假如在野外，只要在他面前是一片空旷，则朝西就可以做乃玛子。假如在屋子里，只要朝西前面是一堵白墙，他也可以面壁祈祷。所以，我们在其他宗教的寺庙里，常常可以看到悬挂着很多的神像，但在伊斯兰教的礼拜寺里，都是四壁空空，没有神像，没有装饰，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什么都没有。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只有在在你面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才直接面向了呼大^①。

我到那个礼拜寺的时候，时间还早。看到东，南、北三个门，一批一批的教徒结伴而来，经常是七八人或十几人一批，他们大都是同住一条街上的。年老地走在前面，年轻地走在后面。有的年老的人还用白布缠着头。用白布缠头，平时在伊宁的街道上并不常见，这时在礼拜寺里，看到的比较多一些，这些由老年人领导的一批一批教徒进入门口时，常常一进门就站住，先念上一段经，大约两三分钟光景，念完后行了一个“接都瓦”礼，再继续前进。“接都瓦”是伊斯兰教中一种通行的礼节，用两手摊开，左右手手指相接。使两手摊成九十度角，然后扬至额角，从鼻部、口部徐徐下抹、连抹两下；这也是一种祷告的意思。

教徒进寺以后，就静静地走进礼拜殿，跪在那里。也有就在殿外的走廊上，或南、北、东面的院子里跪下来的。有的人自己带了一条毯子或白布来，以作垫膝之用。此外，还有一些孤苦老弱的乞丐，跪在大门入门处的树下，他们大都衣服破烂，苍老憔悴，其中女的则用布蒙着头部，不让别人看到她们的面庞，有的还带着孩子跪着，这些乞丐都在等候着教徒们在礼毕后对他们的施舍。

7时半左右，乃玛子开始；那时估计已经到了2000多人。那天到礼拜寺的人一般要比平时多一些，因为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大节日。很多民族干部这一天也到礼拜寺去做乃玛子。不过妇女还不能入礼拜寺，只能在家做乃玛子。

乃玛子开始，阿訇在上面领做，一忽儿全体俯腰前拜，一忽儿又大家跪下，全身伏地。如此前后好几次。虽然不懂阿訇念的是些什么，但是我看到整个礼拜寺的空气异常庄严肃穆，大多数都闭着眼

^① 呼大：波斯语，即真主。



维吾尔族群众到清真寺举行节日“聚礼”

睛，没有一点儿杂声。

做乃玛子的时间并不很长，只有10分钟光景，做完以后，大部分教徒起立外出，他们在院子里，互相握手问候。还有一小部分教徒则留在礼拜殿里，听阿訇继续讲经。

在库尔班节，只要境遇大致还可以的人家，差不多总要宰一只羊过节。所以一个库尔班节过下来，要宰掉不少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每逢要过库尔班节，一些私商便乘机垄断市场，高抬羊价，使很多穷苦市民买不起羊；甚至有时即使出了高价还买不到羊。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对于当地人民过库尔班节，不加干涉，并且还采取了关切和爱护的态度。库尔班节还没有到，贸易公司早就做好了供群羊羔的准备工作，按照平常市价尽量供应，务使要宰羊过节的人都能买到羊，按照当地的宗教习惯，各家宰羊以后，都要把羊皮赠送给礼拜寺里的衣麻木^①。在新中国成立以

^① 衣麻木：礼拜寺里领导教民做乃玛子的阿訇。

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常常只出市价的一半的价格，向各礼拜寺强行收买这些羊皮，以图厚利。现在，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了，各礼拜寺都把教徒赠送它们的羊皮转售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按照牌价收购，并且一律支付现款。

10时半，我就跟当地的一些汉族领导同志一起出去拜节。我注意到他们首先拜访的一批，都是当地宗教界一些有名望的领袖人物。

我们去的第一家是维吾尔族大阿訇阿不都木太阿里海力凡的家里。进大门后先是一个套院。套院一面是马厩和堆积饲料的楼房，另一面似乎是下房。从套院走进内院，院里种着一些花草树木。我在伊宁到过不少人家，则看到有套院的这还是第一次。房子是平顶的，前面有一道走廊。这是维吾尔族的民族建筑格式。伊犁地区的房子，除了过于简陋的以外，在房间前面大多都是有一道宽宽的走廊的。先由大阿訇的儿子把我们引导到客室里。屋子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地毯中间铺着一块很大的洁白的白布，上面放着各种糖果饼点。在房子的上角，有一座玻璃书橱，里面放着一些书籍；靠窗的一个角上，放着一张小书桌，上面摊着几本经文。我们先盘膝坐下来。等了一会儿，老



维吾尔族
幸福的一家



阿訇出来了。他已经有80多岁，穿着一身淡黄的绸质的袷衫，长筒皮靴，戴着小帽，胡子很长很白。他的儿子则端着茶进来飨客。此地一般都不用茶杯。在整个伊犁地区，除了在个别机关、部队里，我很少看到茶杯，一般都是以碗盛茶。他们倒茶并不倒满，一般只倒半碗光景。那个大阿訇的儿子看上去也有40岁上下，他把茶分送客人后，就自己跪在客室的门外，偶尔把头抬起来偷看一眼客人，发出欢欣而又羞涩的表情。老阿訇精神还好，只是毕竟年龄大了，多少显出一点疲乏的神色，不过这80高龄的老人，居然仍能一下子蹲坐下去，又一下子用两手一撑站起来，也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接着又拜了几个民族不同的阿訇。后来到了一个回族阿訇的家里。这个回族阿訇，就住在他主持的清真寺里。这座清真寺还是乾隆年间修造的，距今约有190多年，但是木料房架都还很好，屋顶上的瓦脊和屋头上的飞檐，都是雕花的。整个大门和大殿的结构和内地的一般庙宇相差无几。院子里还有两株苍老的榆树，枝荫四蔽。回族阿訇说的是汉话，回族的生活一般也接近于汉族，在他家里，就不再是席地而坐，而是有桌有椅的了。而且，在他家的果盘里，有着瓜子和花生，而这两种东西，我们在其他各家都是没有见到的。

最后，我们到一个“琼阿訇”家去拜节。维吾尔族称“大”为“琼”，所以“琼阿訇”就是大阿訇。这一位琼阿訇头上缠着白纱，身上穿着一件白底金条闪闪发光的织锦袷衫。他的气色甚好，满脸红润，两眼炯炯有神，胡子很长。完全雪白，已有70岁，然而风度犹若只有50岁上下。他向来客欠身作礼，既庄严而又谦和。他的名字叫翟里卡力阿吉，是乌孜别克族。他的经学很高，是第一个把《可兰经》译成维吾尔文的人。他客室里地毯上所陈列的糖果碟盘，也特别琳琅美观。我数了一下，大概近40件。当中有他家里做的草莓糖酱和樱桃糖酱，我们特地尝了一下，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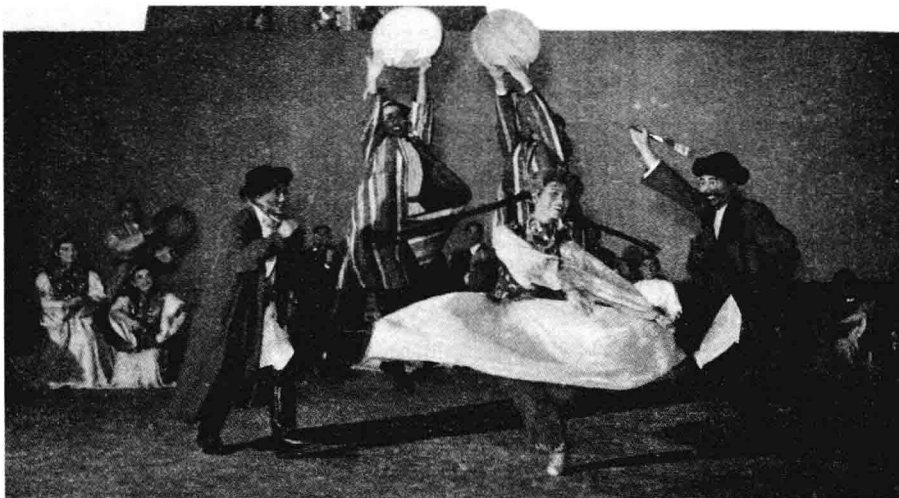
到阿訇家里去拜节，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既不能饮酒，也不能吸烟，而且主客端庄，仪礼甚重。向阿訇们拜完节后，我们就向地方上一些民族负责同志如专员、厅长等拜年。到了这些人家，空气比较活泼轻松起来。拜年拜到这个时候，大概每家的羊肉也大都烧好了，所以每拜一家，都要坐下来吃一点羊肉；在有几家，还喝了伏特加

酒。羊肉是一大块一大块煮的，放在大盘子里端出来，主人使用刀子当着客人一片一片地削起来。另外一个碗里放了一些掺有香料的盐水，以供渍食。

在我们去拜年的这些人家中，有三家的主妇是塔塔尔族。在主妇是塔塔尔族的家庭中，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维吾尔族家庭多少有些不同。一方而他们家中都有桌有椅，另一方面他们食客的饼点也不相同。大概塔塔尔女子都能做很好的点心。在这一天，我观察到，这几家塔塔尔主妇的家庭都做了很好的大蛋糕。大蛋糕有方的有圆的，里面有馅，一般是苹果馅，因为这时正是苹果当令。蛋糕的四边还做着精致美观的花纹。有两家还做了很好的什锦蛋糕，馅里放着核桃仁、杏仁及葡萄干等，拌着很多的鸡蛋和牛奶，做得又软又香。

我们拜节一直拜到下午4时多。我们接触的这些家庭，都是民族社会的上层分子，生活比较优裕，文化水平较高。我注意到这些人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现象：屋子里都有一定的陈设，铺着较好的地毯，挂着窗纱，放着长方形的西餐桌，桌上铺着美丽的桌布；而椅子的式样和质料一般都很精致。在汉族人家，在客室里面是不放床的，但在

表现丰收后欢乐的维吾尔族歌舞





此地，我看到有好几家都在客室里放了一张铺着洁白的床单的床，据说他们实际上并不睡这张床，似乎把床也当作了一种陈设品。这儿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几乎大多数家庭里都挂着几百万分之一的欧洲、亚洲地图，都是俄文的，印得很精致；挂汉文的世界地图或本国地图的则不多。此外，和田出的地毯也成为了一种装饰品，悬挂在墙壁上。每家都有很好的大约一两亩大的果园，种的主要是苹果和葡萄，偶尔也有种梨和杏的。每家人家都有盆花。玫瑰花在这一带很普遍，而且长得好，又盛又香。

整个的城市在这个库尔班节是欢乐的、活泼的、并富于色彩的。我一生之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生动鲜艳的城市。满街来往着马车，上面坐着一车子一车子的穿着五颜六色的妇女和小孩。兄弟民族平时本来就是讲究穿衣服的，现在过节，自然打扮得更美更漂亮。尤其是妇女，很多颜色和花色，在内地一般妇女穿不出、不敢穿的，这儿却是百花齐放，焕耀炫目。那像石榴花的火红色，那像金子一样闪着光芒的金黄色，那像罌粟花一样的洋红色，那像铜锈生绿那样的浓绿色，而且配着一身是胆的大花式。带着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你竟不得不停下步子来向她们夺目而视。另外，则是一些极其文静的色调，像天色甫明那样鱼肚白的淡蓝色，像还没有成熟的苹果那样的嫩绿色，淡淡得像一阵轻烟似的淡紫色，那娴静的嵌着小白花的藏青色，这一切，在你身边过去，又好像一阵轻风似的使你感到一种凉爽的感觉。这儿的女子，她们常常兼具东方与西方之美；既丰满而又窈窕，既活泼而又温和，她们行走在树阴下，风姿绰约，遗留给人们以一种深长的记忆。

1955年3月，乌鲁木齐。

路中邂逅

——记一个维吾尔农民的谈吐

1955年5月下旬，我访问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后，从焉耆去库尔勒时，打算顺便游览一下离开焉耆不远的古迹“千间屋子”，据说这可能就是焉耆古国的遗迹。千间屋子在焉库公路的西面，从焉库公路上的紫泥泉子地方进去，大约不过10公里光景。可是我们在紫泥泉子附近往返找了几次，都没有能够找到去千间屋子的小路。最后只好停下车来，向附近的一个维吾尔族老乡打听。

这位维吾尔族老乡看来是去过千间屋子的，因为他指点得很详细，可是照他的指点，我们估计仍然不容易找到。我的翻译就和他商量，问能不能在这个村子上找人带领我们去一下，不料这位维吾尔老乡很热情地自愿把我们这个要求接受了下来。

这一带土地不好，地下水位很高。我们的车子在草丛、碱滩和沙窝中艰难地前进；有的地方连寻常的车辙也没有。全凭这位老乡指点，走了快1个小时才走到。我们游览了这个古迹和附近的千佛洞，可是一个不小





心，车子却陷入了一块淤沮地。这块淤沮地一共不过两三间屋子那样大。除了在地面流着一些发着油光的黄水渍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引人注目的征象。当我们嘴里连声说“不好”而把车煞住时，车子已陷在里面动弹不得了。司机同志想挣扎前进或后退，可是车子越挣扎，车身陷得就越深，终于四只车轮完全陷在淤泥里。这地方，附近10里方圆以内没有人，在人力及工具上都得不到援助。我们已经担心当晚要被迫露宿那个荒野里。可是经过整整3个小时的努力，最后终于把车子从淤泥里拔了出来。

结束了这个大难以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假如那时直接去库尔勒的话。可以少走十几公里路。但是我们应该首先把这位给我们带路的老乡送回家去；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当我们告诉他先送他回家时，他非常高兴。来的时候，他已经介绍过他自己的名字叫阿合买提，这时，我们又知道他是一个互助组的组长，并且是和硕县三区七乡的乡人民代表。

这位阿合买提老乡，小个儿，黑黑的脸，长着一点胡子，一直是很沉静的，带着一种热情、关切而又谦和的神情陪伴着我们。当我们送他到家时，他的大门正反扣着。他敏捷地跃上一道短墙，用熟悉的口哨招呼他那个正在田里的妻子回家。他是要她回来给我们烧一点茶水。我们大伙那时也当真渴得厉害，就坐在他的炕上，把带着的一些糕点摊开来，一面等茶喝，一面和他聊了起来。

我说：“阿合买提同志，你今天花费了很多劳动的时间，带我们去游览千间屋子，我们非常感激。你最初并不知道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你就自动地愿意为我们带路呢？”

他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当我最初看见你们时，我想，你们要不是从中央来的，也是从乌鲁木齐来的。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汉族老大哥多了解、多帮助。过去国民党时代，没有人关心我们，现在汉族老大哥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很感激。你们既然找不到千间屋子，那地方我又去过，我就应该帮助你们。今天我本来也要劳动，但我今天耽误了，明天可以补一补，你们的时间性比较迫切，假如今天去不成，以后就可能没有机会再去了。

“同时，你们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也是我愿意给你们带路的一个



原因。你们请我和你们一起坐上小车子；这样的小车子过去从来没有坐过，很快。国民党时候，他们也叫我带过路。他们自己骑在马上，叫我在前面跑；有时我拼命跑，还追不上他们的马。有一次，他们明明多一匹马，可还是不让我骑，宁可叫我牵着那匹马走。而现在，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还有，我知道你们游览了千间屋子以后是要去库尔勒的，我心上一直盘算，大概你们游览完了以后，就直接去库尔勒，我自己要一个人走回来了。可是没有想到，车子陷在泥里已经多耽搁了三个多钟头，你们还要先送我回家，这样的事只有在毛主席的时代才能有！”

我说：“当车子陷在泥里的时候，你心里有些什么想法？”

阿合买提说：“首先，我感到我路没有带好。当车子陷了进去以后，我心中十分难过。我几次向翻译同志建议，让我到附近的九乡去找人来帮助。你们大概因为路太远，一往一返有二十几里，不愿我走这许多路，所以没让我去，同时，我看到车子陷进去以后，你们就大家都动手：挖泥的挖泥，找土块的找土块；你们自己做，却又不叫我做，在国民党时代，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一定不动手，而只是叫我们做了。你们既不叫我做，我就只好自动地学你们，你们做什么，我便帮着你们做些什么。”（阿合买提曾自动地脱去鞋袜，帮我们挖泥。）

“你看见我们弄时，信不信车子会弄出来？”我问。

他笑了起来：“我最初看到车轮子一转再转，不仅车子不能出来，反而车身越陷越深，我心上就想：糟了！所以我当时心中一味想到附近去找人并找些工具来。可是后来我见到你们拿出了一个小东西（千金），一扳一扳，虽然吃力，终于把车身和轮轴一点一点抬高了起来，最后使车子开出了泥地。我心里想，汉族老大哥毕竟是有办法的啊。”

我们的谈话转到他们乡里的情况，阿合买提说，这几年来，他们乡的面貌改变很大。他们这儿一带的农民，过去都不是本地生长的，大都是在十几岁时从外地来到这儿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受着封建地主的剥削。稍为好一些的粮食都给地主拿走了，他们自己只能吃一些玉米。常常很多人家都断粮，要是有了几个馕，就要好几家分分



维吾尔族农民说：“毛主席真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救星！”

吃。可是现在呢，他说：“毛主席把我们大家都救了，我们再不怕挨饿了，而且我们再也不会有挨饿的日子了。过去我们吃的是玉米饅，现在我们吃的都是白面饅了。”

农村面貌改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他们这些从前被压在底下的劳动人民，现在都翻身当了主人了，因而现在很多事情，大家都抱着主人翁的态度来处理。他说他们这儿有几条水渠，过去浇的都是地主的地，所以大家都不大愿意去挖渠，地主使用鞭子打他们，强迫他们去挖。可是现在呢，一到了应该要挖渠的时候，大伙儿都自动地来询问并且积极报名，参加挖渠。

我问他他们互助组里种了多少地？他说种了4500斤种子的地，“种了些什么？”“棉花、小麦、芝麻、玉米、水稻、瓜。”“是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两种都有。”“你们过去不是一向不大种棉花、冬麦和水稻的吗？”“过去这儿一带的确不种或不大种这些。国民党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指导并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再说，过去的地

都是地主的，我们这些下苦的人更做不了主。今天，我们自己有了土地，党和政府又号召我们发展生产，提倡种植多样作物。政府有示范农场（部队的农场）领头种，我们跟着学。焉耆地区向来是缺粮的，要靠外地接济，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没两三年，到1952年，粮就够吃了；1953年起，反而还有多余的粮外运了。现在不仅粮够吃，而且作物的种类也很多，除了粮食作物以外，还有很多经济作物了。”

当我问他政府在生产上对他们经常有些什么帮助时，他说：“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政府都给我们很多帮助。从春播到秋收，政府一直像父母照顾子女似的照顾着我们：地怎样犁，水怎样浇，用什么种子，以及怎样拔草中耕等，真是从头教到脚跟。过去我们收割后，总是把粮放在场上搁几天。认为庄稼既已收割了下来，放在场上搁几天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大伙儿先想歇一歇。可是政府指示我们，说放在场上，鸟吃、鼠搬，有损失，号召大家把粮早早入仓。这样细心叮嘱，还不是为了我们好！政府经常派干部下来帮助我们生产，但是除

维吾尔族农民采摘丰收的棉花





了应缴的公粮以外，政府并不要我们负担任何额外的费用。相反，过去粮食不够的时候，政府就运粮接济我们；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生产上的一些困难，经常举办农具贷款和籽种贷款等。这些，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政府宣传互助合作，对我们也有很多帮助。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大家都分到了土地。但有些人，分到的土地不大好，有些人农具不够，有些人劳动力也有困难。政府号召我们互助合作，这是指导我们走的最好的道路。以我们这个村子来说，现在只有两户单干，其余都已经组织了起来。过去没有力量办的事情，自从组织了起来、实行互助合作以后，就都有力量做了。”

我们谈到这里，时间已经不早了，即使立刻动身，到库尔勒时也快要天黑了。我们告辞时，阿合买提说，这次的相识和相谈，都是意外的，然而他却感到非常愉快。他说：“我经常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表达我们少数民族对他的感激恩情。但是在全中国的农民中，像有我这样的意愿的人是太多了，当然不可能个个都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好好劳动。这次大家选我做乡人民代表，也就是因为我劳动好的缘故。我应该用更好的劳动来争取有一天能够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更好地团结各族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对毛主席的敬礼和保证。希望你回北京的时候，把我这点小意思带给毛主席，祝他老人家长寿万岁！”

1955年8月，乌鲁木齐。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1955年6月，我在塔里木河的下游访问了一个小村。这个村子的居民过去终年捕鱼为食，并且吃草根；他们穿的是粗糙的麻袋布，见了外面去的陌生人拔脚就跑，一下子都躲进了芦丛或沙山。由于很少人知道通达这个村子的路径，我们只能一站一站地换人带领。我们从尉犁县城出发，沿着孔雀河的北岸东行。一路都是野生的梧桐，纤绿可爱，后来渡过孔雀河，穿过群克尔村，道路就穿行在许多小河和湖沼中间。那些小河里鱼很多，有些还浮生着娇艳的野荷花。越往南走，戈壁的景象越发浓厚。有些地方尽是沙墩，沙墩上长着黄绿相杂的红柳。经常看到雍容的天鹅遨游湖边，而两眼矍矍的大鹰，雄踞路旁，直到我们车子驶近，才突然惊飞。向西南远方看去，见有旋风上卷，一柱冲天，这又是戈壁中常见的景色。

我们最初是在通往若羌的大道上走着的。到了卡拉，便离开大路朝西向着塔里木大戈壁的东部边缘前进。从卡拉，经过英可尔，通往客拉切其，一路都是草





丛、杂木和沙窝。路径若连若断，使人不辨进退。我们在那烤人的戈壁太阳下驶行了8小时以后，终于越来越接近蜿蜒在塔里木大戈壁东沿一带的沙山。沙山不很高，然而另有风致。那像被熨斗熨过了似的齐整的山棱和贴平的坡面，给我一种极其单纯、新鲜而又深刻的印象。就在这蜿蜒的山脚下，流着来自千里以外，历史上久享盛名的这条旷达的、豪壮的、同时也是桀骜不驯的塔里木河。

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克拉切其的时候，汽车马达的声音已经把这个平静的小村扰乱了起来。村里的人们，都怀着讶异、新奇而又紧张的心情，伸着脖子四面探望。有人发现在远远的沙窝里有着一个黑色甲虫似的东西一点一点向他们驶近。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我们一定是走错路了，因为自有这个村子以来，就没有到过汽车，也没有到过专门去访问他们的客人。当他们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是专门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人群里马上腾起了一片欢呼。人们争着拥上前来和我



沙漠中的旋风



热情地握手，即使最年轻的妇女也不感到一丝害羞。

这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些平平的沙地，而是被风吹成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冈。沙冈不很高，大约两三米光景。沙冈上间或露着一些从沙子里挣扎出来的红柳或苇子。整个村子就被包围在这样一望无边的沙浪里面。

我们被引导到村子东头的一排矮小的屋子里。屋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只有两扇门，没有窗子。屋子里砌着一个有一米半高的、可以通烟到屋顶上的壁灶。后来主人们在屋边没有太阳的沙地上铺了毡毯，我们就在那儿围坐下来。他们特地煮了新鲜的塔里木河的鱼招待我；多年以来，鱼是他们活命的恩物，现在又成为他们饕客的佳肴。由于天热，村子上的人们都露宿户外；那一晚我也陪着他们睡在那旷畅的沙浪上。当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入睡时，便轻轻地走动，轻轻地说话，想尽量不惊扰我们。虽然夜晚的天空是静默默的，然而在默默的天空中，我一样感觉到民族之间互信互爱亲切的感情。那天正是阴历十三，繁星满天，皓月当空，我放眼四望，深深感到这个时代的豪壮，虽则已很疲惫，但还强自振作，细味这难得的丰富的境遇。

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本来也是水足草茂的地方。后来，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有些地主恶霸任意截拦河水，就使下游一带水源日见枯竭。我们在路上曾经看到一个地方残存着很多像被大火烧过似的枯死的大树，据说这就是“水走了”的遗迹。多年以来，像我所访问的那一带地方，都已沦为“洪水漫浇地”，平时没有水，要到大山化雪，上游发着洪水的时候。才有水流到这儿来。由于地势高低不一，水势有强有弱，每年的水漫到哪儿就是哪儿，没有一定。水漫到了，大家就把那块地的一些低洼的地方堵起来，把水堵住。到第二年春天，水已经渗入地下，于是就在地上撒种，这样，那块地就算种上了。过去，即使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封建地主乡约仍然不放松他们的残酷剥削，由于每年究竟哪些地漫到了水、可以种，没有一定，所以每年春天都要分一次地。我访问过一个叫做白拉提的老汉，他说：“洪水来时，拦坝堵水这些苦工都是我们做的，但是分地的时候，全由乡保长做主。好一些的地都由他们占了，分给我们的地，又少又不好。我



们不能不种，还要向他们鞠躬道谢。在过去，我们这些穷人每年最多只能分到种50斤种子的地，但是那些地主乡保长占的地，却可以种到1000斤种子以上。他们自己不劳动，那些地还是要我们大伙儿分着帮他们种。”

在农民分到的这一点小土地上，要是年成好，可以收上三四百斤粮，要是年成不好，那就收多少算多少。可是年成好不好，实际上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要是多收了些，乡保长就来了，摊派这个又摊派那个，到头还是送给他们了事。“像我们这些苦户人家，那时一年能够有上100斤玉米面，那就是够好的了。”那个白拉提老汉接着这样说时，又用手指了指塔里木河那边的海子（湖沼）说：“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带的人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反正我们从小时候起，就是整年靠吃鱼吃草根过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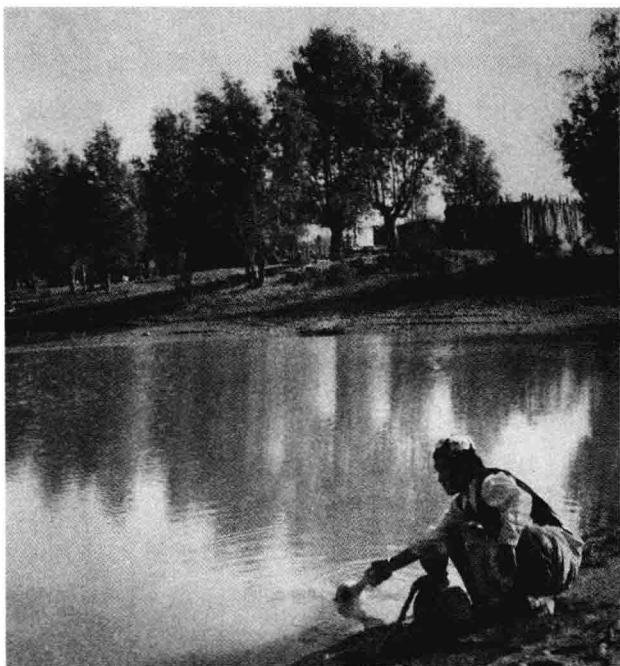
塔里木河下游海子很多，海子里大都有鱼，据说大的有大到两抱半的，一般也有我们的腿子那样粗。这一带没有树木，村民们到一天路程以外的地方背回了巨大的树干，把它刨成独木船，再用野麻织成渔网，到海子里去抓鱼。他们整天、整月、整年地一日三餐吃的都是

沙漠驼队





塔里木河岸边的维吾尔族人家



鱼。他们吃鱼也没有什么调料，只是用白水把鱼煮熟，浇上一些盐水。秋收以后，当他们得到了一点点可怜的玉米面时，有时便在鱼汤里撒上一把做成面糊汤喝。在野沙枣熟了的时候，有的也用野沙枣和玉米面煮汤喝。我尝过他们的野沙枣，颗粒只有黄豆那样大，皮里就是核，仿佛里面什么都没有，然而他们形容那沙枣汤时说：“甜甜儿的，酸酸儿的，味道可美哩！”这些就是他们整年中最好的食物。鱼是热性，吃多了，心中发躁，所以他们经常又吃一些长在海子边的、浸在水面以下的那一段比较软嫩的、发着白色的，据说可以解热的蒲草根。在他们的用具中，除了锅是铁器以外，其他如盛水的桶、洗东西的盆，以及碗和匙等都是用木头做的。他们用两只木叉再加上两三片木板就造成了一架简单的织布机。他们很早就能利用野麻的纤维织制麻袋布；也赖有这种智慧，才使他们蔽体有物，免于寒冻。新疆几乎到处有盐，他们可以在不远的地方挖到发着晶光的盐块。火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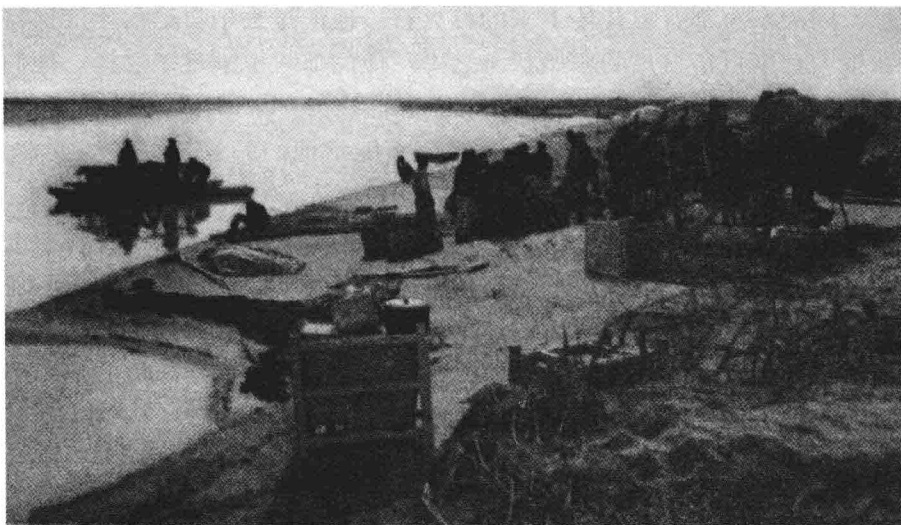


愁，因为家家都有上代传下来的打火石。他们过去把自己的生活保持在很大程度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之中。他们那时也满足于这样。他们害怕、躲避和外面的世界来往。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外面的世界所能给他们的只是更大的灾难。他们形容过去地主乡保长的可怕的情景时说：“他们每次到村上来，都是骑着马，扬着鞭子，一言不发，见人就打。他们没事不上村，上到村来不是要这，就是要那。”有的说：“有时还有一些富人跟着乡保长来，他们经常把村子上的人抓走，带到别的地方去下苦。”以后，他们一见老远老远有着骑大马的人来时，全村就像一阵风似的都躲了起来。他们说：“难道那些富人上村子来还有什么好事？”只要能跑，他们总要想办法跑开，村子跑得空空的。

这种苦难现在终于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地方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虽然由于这一带都是“洪水漫浇地”，不存在土地所有权问题，因而也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然而那些封建地主乡保长的恶势力，却很快地被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人民赶跑了。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就选出了自己的乡长和村长。过去，他们每年分一次地，现在，他们仍然每年分一次地。可是过去分地是由地主乡保长支配做主，农民不敢说一句话。现在分地，则由乡长领导，区上还派干部来参加，先由村上研究协商，大家同意后再分。这一带的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可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还不到三年，一件历史性的重大事在这一带人民的生活里出现了：尉犁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塔里木河下游一带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那年春天，领导很多群众在上游筑了一个大坝，使塔里木河的河水不再流入孔雀河，使河水仍循塔里木河的故道流到下游来。水的回来，使下游各地人民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在1953年，那一带竟然出现了一次多年未有的大丰收。

“水比从前富余了，分到的地也比从前又多又好，就拿我说。我今年分到种500斤种子的地，像我这样只有三口人的一户人家，能分到种500斤种子的地，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白拉提老汉一扯到他们村上这两年来生产情况，就格外兴奋：“过去我们种地，种了以后从来不再浇水，什么都不管，只等秋收。有收即收，没有收成



塔里木河河岸码头

也就算了。现在可不同了。由于再没有人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收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了，大家对于生产就比过去积极得多。前年乡政府号召拔草时，有些人还不大愿意，说过去从来没有拔过草，而且草拔了以后还是要长出来，何必白费劲。那年只有五六户拔了，可是拔了草的，长出来的庄稼确实不同：麦子长得高，麦穗结得大。所以从去年起，大家都相信政府的话，愿意拔草了。过去，穷人很少有牲口，牲口大都是地主乡保长的，他们的牲口踏了或者吃了我们地里的庄稼，谁也不敢哼一声。现在，除了拔草以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些青年在地里巡逻，看看有没有牲口或者野猪吃庄稼。最近又组织了一支水利队，正在挖一条水渠，想把更多的水引上来，好扩大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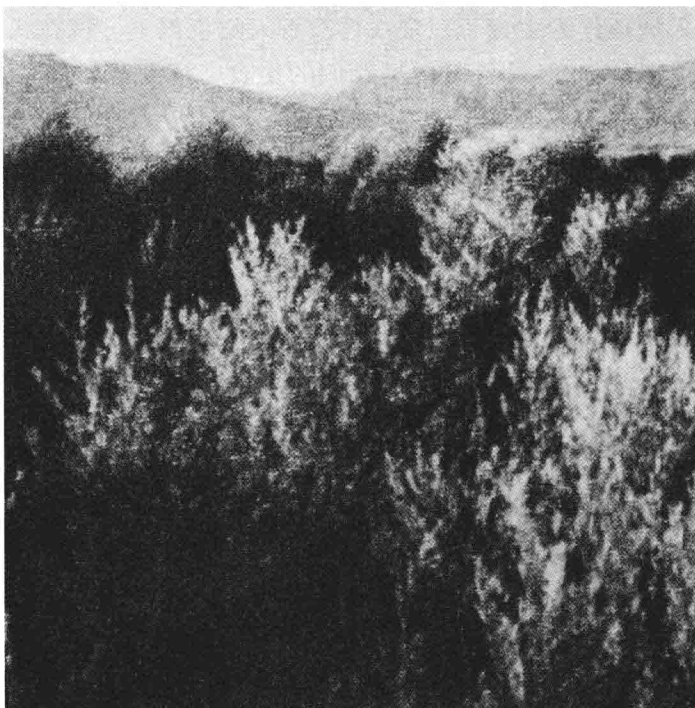
在我和白拉提谈话的时候，一个叫阿西木的中年汉子闯了进来。这位阿西木是这个村子上仅有的一位在外面跑过的人物。阿西木一家15口，其中有三个妇女会用羊毛和野麻编制口袋（装粮用的），织了口袋，就由阿西木拿到焉耆一带去卖。在1952年以前，阿西木每年总要赶着几个小毛驴，带上几十个口袋，到焉耆一带去，把口袋卖掉





了，就换一些玉米驮回来。可是1952年以后，阿西木就再没有出去过，甚至他们连口袋也不再织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我们没吃的，不得不把一些羊毛都织成口袋，拿出去换粮驮回来。我们屋子里一直只能铺些苇席，我们过去就整年地睡在苇席上。从1952年起，政府照顾我们，在上游筑了大坝，河水流回下游，我们这一带的水源大大增加，大家的生产都提高了。生产提高了，我们就想把自己的生活改好一些。都想打些毡毯铺在地上。我们村上牲口本来不多，这样一来，我们这一点点羊毛连自己用也不够了，再没有多余的羊毛拿出来织口袋了。而且，我们也不再需要拿口袋去换粮食了，从1952年起，我就没有再从外面驮回粮食过，正相反，去年我们响应政府出售余粮的号召，我还卖给政府1500斤小麦和400斤菜子呢。”

塔里木河下游是盛产野麻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正是野麻花盛



野 麻



开的季节，土红色的野麻花，给那荒芜的戈壁地带添上了不少春色。这一带的老乡很久以来就知道利用野麻织布织口袋。我还看过他们用野麻织成的毯子，又厚又结实。他们并且把野麻染上几种不同的颜色，织出一些简单的条纹，另具一种引人的民族风格。可是过去的反动政权从来不知道利用这项原料。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提倡下，野麻竟然成了一种高级纺织品的宝贵原料。我在新疆亲眼看到过上海寄来的用野麻纺织的很好的纺织品。政府从1953年开始，大量收购野麻。剥野麻现在成为这一带的老乡、尤其是妇女的主要副业。野麻这东西过去一向被人们铺屋顶、垫路基、当柴烧。很多人说，共产党来了以后，不值钱的东西现在也变得值钱了。一个妇女剥上10天野麻，就可以换购一身衣料；她们一谈到这个问题，都显出一种特殊的兴趣。她们都把长的好的卖给政府，短的次的留着自己家里用。我虽然在那儿只耽误了两天，然而却看到了这个小村子所发生的变化。我问他们现在还吃不吃鱼，他们带着很得意的神气说：“1950年的时候，已有少数人吃到粮了；1951年，很多人都吃粮了；从1952年起，我们这儿再没有人把鱼作为主食了。现在再没有人吃草根了。现在我们一星期还吃两三次鱼，但是鱼不再是我们的主食，而是副食了。”在早上夜晚（沙漠地带早晚特别凉），我还看到一些老年人身上披着他们从前穿剩下来的破烂的粗糙的麻袋布褂衫，当我有一次端详着一个老汉身上的这种衣服时，他说：“过去我们就是穿的这种衣服。你别瞧它粗，可结实着哩。在过去，我们最好的衣服是褡裢布（很粗的土大布），可是褡裢布也还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有人穿。而现在，人们只有在地里劳动时才穿褡裢布了。”说着时，正巧有两个妇女走过我们身边，那个老汉努努嘴：“你瞧那些娘儿们，现在她们都穿上红颜色的花布了。”在这村上，麻袋布和褡裢布还是看得到，可是更多地看到的是各色棉布、有些年轻小伙子身上还穿着带条纹的衬衫。

我看到他们用木桶、木盆、木碗、木匙。在河边，我看到他们的独木船，在有些用苇子遮着的荫棚下，我看到有些妇女仍然用着那两个木杈和三片木板构成的织布机在织布。然而我也注意到他们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瓷茶壶、瓷碗和铁皮桶。他们爱喝茶，可是过去没有人知道一块茶到底要多少钱，现在他们大人小孩都喝茶。再没有人去理会



那些为他们过去生活里一日不能缺少的打火石了，现在大家都用火柴；一匣火柴有十包，才要五角钱。我说：“你们还养鸡！”阿西木说：“这也是这两年的事。从前，要是你养鸡，那是你自己招乡保长来麻烦。而且从前我们人还没吃的，拿什么来养鸡啊！”

这个小村子过去没有小学，从1954年秋天起，村里也有了小学了。阿西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群众都要求办一个小学。时代不同了，不识字就等于瞎子。不仅不能读报，甚至上面来的文件也看不懂。在这样一个戈壁滩上，要是没有人识字，上面来了文件又到哪儿去找人来读啊。这个问题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了几次都没有解决。1953年11月，我们这儿进行了普选，我们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1954年秋天，我们这个村上就有了小学。这使大家格外感到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的好处。”

村子里有好些人都聚拢到我们那一间小屋子里来，安静地并津津有味地旁听着我们的谈话。后来我看到一个有着很长的白胡须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贾马利），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扶着，一步一步摸索到我们屋子里来，看样子好像他要和我谈什么似的。大

新疆各族人民欢庆减租减息的胜利



家帮着招呼他从人群里走过来。他的眼睛没有瞎，然而他眼珠子里发出来的光，就像一个瞎子那样不集中在任何地方。他仿佛是在凝视我，但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有些颤动。他说话也仿佛很困难似的。他说：“过去乡保长来，骑大马，拿着鞭，见人先抽几鞭再说，要把我们抓到别的地方去做苦工。现在，再没有打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毛主席派了人来问我们好。我看不到毛主席，我要来看看毛主席派来的人。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只是要向毛主席道谢。”他这样说时，忽然一下子扑到地上叩起头来。他那严肃的、诚恳的、老态龙钟的表情，强烈地感动了我。他那突然的动作一下子使我紧张到极点。我立刻肃穆地跪下来回拜他，亲切地并带着一种晚辈的心情把他扶起来。屋子里所有的人这时也都立了起来。这一带人民在旧时代里所遭遇的侮辱、灾难和苦楚，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党对毛主席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淳朴的恳挚的感激，都在这个肃静的、感人的、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场合中透彻地表达出来了。

1955年8月，乌鲁木齐。





一个村子的诞生

1955年6月我在阿克苏时，特别去访问了乌什县的英阿瓦提村。乌什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以产水稻著名。英阿瓦提在乌什县境的北端，紧靠在中苏毗界的山群下面。我们到乌什县城东北约20公里的衣麻木地方换乘了高轮大车，花了1个小时才渡过了那河道漫阔的托什干河。过河后穿过一座小山，向北约摸走了2小时，便远远看到英阿瓦提的白杨林梢了。

这是一块好地。几百年前蒙古人曾在这儿开垦过，筑过一个蒙古城。后来清朝的部队也曾在此屯垦，并建筑过一个城。它们的废墟都还隐约可见。其后本地的大地主阿衣甫伯克和买买提阿吉都曾招了农民先后在那儿挖渠、开垦过。我访问了在新中国成立时英阿瓦提仅有的一户居民，79岁的买木苏衣麻木。他是在买买提阿吉时代就到了这地方的，他说在英阿瓦提东面有一条库马力克河。过去地主招了农民从库马力克河开渠，把水引上来了，大家就在此住下种地；后来河床日低，水引不上来了，就弃地而去。买买提阿吉在这儿前后剥削了22



年（1915~1937），后来水上不来了，农民被迫四散，只剩下了他一户。他仅仅依靠了在山洪暴发时才灌满了的两个小池子，种了七亩地；这样地生活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1950年3月，党到达乌什后，就号召人民发展生产。当地群众都知道英阿瓦提是块好地，土肥，只要有水，就是良田。过去他们也常想挖一条渠在那儿生产，只是没有力量。党来后，群众相信党一定有办法，所以向党反映，要求党领导大家到那儿去开荒。1951年3月，有960名各族农民自动报名参加了英阿瓦提的挖渠工作。从3月初挖到5月中，一共挖了3.1万多个工，终于挖通了一条长达45公里的渠道，把水引了上来。但是第一年引的水量有限，而可耕之地很多，所以第二年（1952），另外再挖了一条新渠，这一次参加挖渠的多到2700多人，在35天以内挖了6.2万多个工，把更多的水引了上来。

1951年党领导群众去英阿瓦提挖渠开荒的时候，英阿瓦提除了一片荒芜的干燥的土地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屋，甚至也没有一棵树。政府在1951年拨了10万斤粮食作为挖渠伙食，另外组织了30峰骆驼日夜运输，输送粮食、油盐、菜、柴、木料和生产工具。

党一面发动群众去英阿瓦提挖渠，一面就组织一些无地农民、小商贩、旧军人和二流子前去英阿瓦提开荒。自愿去的，才去，政府不强迫。第一年去开荒生产的有一百几十个人，包括了八个民族。那年一共开了5560亩。开荒的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易地事情，特别在第一年。那时去英阿瓦提开荒的人，都是两手空空去的。其中只有两三个人自己带有锅碗，只有极个别几个人身边还带了几个馕去，其余的人连锅碗都没有，都是一到英阿瓦提，从当天的晚饭开始，就要政府救济的。那一年政府帮助的口粮和籽种共达7.6万斤。

第一年因为挖渠引水，下种比较晚，只种了一些玉米。由于劳动力是新集合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懂耕作技术，各种条件比较困难，所以第一年收成不好，只收五成光景。但是这一带土地很肥，即使只收五成，每亩平均也还收到125斤上下。秋收以后，有30名家眷也被接到了英阿瓦提。

由于旧社会人民的生活太苦，很多农民没有土地，生活没有着落，现在看到党和政府对于贫苦群众这样地关怀帮助，只要有一点期



这片肥沃
的泛区将被
开垦

望，大家就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苦撑下去，所以第一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是第二年（1952）英阿瓦提的开荒人员比第一年增加很多，从167人增至793人。他们大都是些无地或地少的维吾尔农民。其中一部分是来挖渠的，渠挖好后，看到这地方有指望，就留了下来。

第一年是编队集体劳动的，那时大家不知道究竟分不分地，所以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第二年决定分配土地，一个人10亩，两个人15亩，三个人20亩，以此类推。在分地的同时，进行了互助合作的宣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当时一共组织了26个实际上还只是一些变工性质的互助组。大部分人因为农具少，认为彼此互助有好处。但是也有少数，当春麦种下地以后，就散了伙，各干各的了。

在生产上，一般说来。第二年比第一年进步。第一年是先播后犁，其中有100亩水稻田，根本就没有犁过，只是放满了水，撒了种，把脚在水田里踏上一阵就了事。也没有选种，也没有上肥。用的犁都是土犁，草翻不下去，拔草也不勤，田里草很多。第二年就先犁再种，选了种，也施了肥。第一年村上耕畜很缺，政府动员了一部分



富农中农支援了308个牛工，才勉强解决了耕畜不足的困难。可是第二年，全村就新购了37条牛、42匹马、9只驴。另外，政府又贷了226个坎土曼、70把镰刀，20个铧和一部洋犁。那年生产部队也到了英阿瓦提开荒，农民又经常向部队借用一些洋犁。这一年玉米每亩平均产到230斤，水稻280斤。只是春麦因为自然灾害，普遍患了黄瘟病，每亩只收到125斤。但各种作物折合小麦，平均每亩仍收到180斤，情况比第一年好。

群众初到英阿瓦提时，大家都住在地窝子里。1951年秋收以后，政府就运了大批木料、椽子、苇席，贷给群众盖房子。政府收购木料时，说明是贷给英阿瓦提群众的，为了表示支援，所以收购的价格很低，等于半价光景。那年冬天，又进行了植树，政府供应了1万多株树苗。1952年分了地，群众的心更踏实了，很多人把家眷都接了来，安心在英阿瓦提落户了。更多的群众要求政府拨地盖房子。政府拨了盖屋子的土地以后，群众又要求再多拨些地给他们种果树。兄弟民族都习惯在自己的家宅旁边有个小园子，种些果树和菜蔬。政府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第一年栽树时，大家还不十分关心。第二年栽树时，群众知道栽在自己地上的树就是自己的，所以栽树的劲头特别大，最初运来的树苗都不够分配，那年冬天政府先后供应了3.2万多株树苗。植树的成活率达到90%。房子也盖得很多，三分之二的群众这时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在1952年的下半年，英阿瓦提就逐渐出现了村庄生活，有了女人和小孩，大家种菜养鸡，有的开始放牧，发展牲畜，村上还办了民校。房屋的加多和大批植树，很自然地衬出了街道的形式，奠定了村子的基本轮廓。

但是困难还是很多，一部分混乱的现象还是存在。第一年在生产中和秋收后，陆续有人搬走。第二年的生产虽然比第一年好，前途也更见到光明，但仍然有些人不安心，想离开。有些小商贩过去没有劳动过，嫌苦，说回到城里收入还可以多些。有些二流子，习惯于过一天算一天，不习惯作长期打算地搞家务过日子，还是想走开。有些好吃好玩的人，说这儿生产虽好，但没有巴扎（赶集），不热闹，不愿留下来。虽然经过教育劝导，还是走掉了一部分。但是正派的农民都没有走，而且劳动情绪很高。他们说：“党已经教育了我们两三年：



塔里木河
流域新建国营
农场的棉田

劳动创造新生活。再不好好劳动，实在对不住党。”英阿瓦提的自然灾害较多，经常发山洪、打冰雹；夏天又热；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英阿瓦提的生产逐年提高。1963年的产量比1952年高，麦子每亩产180斤，玉米250斤。1954年又比1953年高，麦子242斤，玉米320斤。此外，劳模胡大白提1953年的三亩冬麦丰产田每亩产620斤，1954年五亩半冬麦丰产田每亩产970多斤，创造了乌什全县冬麦产量的最高纪录。胡大白提从1952年起，一直带头领导互助组。那时党号召互助，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主要是怕吃亏。胡大白提认为必须增加生产，才能扭转大家的顾虑，所以他就用心学习附近生产部队的生产方法。他从1953年起就逐渐实行了条播，又学习了部队沤肥的办法。他看到部队种的庄稼长得好，知道这和用洋犁犁地有关，他就学习使用洋犁。他的组里，有牛的人最初不肯把牛借给没有牛的人用；要用，得先付现款。胡大白提就把自己的马借给没有耕畜的组员，并且不要报酬。这样，使有牛的组员自己也不好意思。他趁此在组内进行了教育，说：“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耕



畜，都是党帮助我们的结果。大家饮水思源，不要忘本，应该好好地听党的话，团结互助。”靠他这样，才把那个组巩固了下来。1955年春天，他到乌鲁木齐去出席全省的劳模大会。他最初以为自己的劳动也差不多到家了，可是一听别人的报告，就感到十分惭愧。他说：“我们这儿的棉花每亩还收不到100斤，但别地的棉花已经超过了400斤了。”他又说：“别的人都是‘社’或‘集体农庄’了，可是我还是‘互助组’。”那次的会对他有很大启发。1955年6月我去访问时，他的组已经正式转了社了。胡大白提从14岁起就给地主下苦，一直苦到新中国成立。不仅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还挨饿挨打。他说：“我除了没有吃过粪以外，什么都吃过了；除了没有披过树皮以外，什么都披过了。”1951年他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英阿瓦提开荒。他来时什么都没有，还在本乡欠了15口袋粮的债。他一家6口，按说可以分到35亩地，但是因为家中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所以他自愿少要，只要了20亩。但即使只种了20亩，在四年之内，除了全家六口的衣食以外，他还清了15口袋粮的债，还买了两匹马、一头牛、一只驴，盖了四间屋子。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哪能有今天的日子？我在1954年售给国家2800斤余粮，单这一件事，就可以说明这几年党领导我们在英阿瓦提开荒生产的业绩了。要不是我的生活真真有了改善，我哪儿会有那么许多余粮售给国家？”

我又访问了一个汉族李仁厚。他领导的那个组，最初组员只有七户，大都是汉族的旧军人，1954年春改为常年组时，发展到16户：汉族七、回族七、锡伯族一、维吾尔族一。汉、回、锡伯三族说的都是汉话，在一起工作比较方便，但另外有一户维吾尔族自愿要求加入他们一组，由于全组只有这一户维吾尔族，所以大家处处都特别照顾这一户维吾尔族。李仁厚这一组在生产上也是好的。1953年他们一组的麦子每亩产235斤，1954年提高到421斤。生产提高了，生活自然也改进了。李仁厚说：“我1951年来时只有一匹马，此外什么都依靠政府的帮助。但是我现在又有了一辆大车、一只羊，还盖了三间屋子。1954年我一个人出售了1680斤余粮，我们全组出售了2.3万斤余粮。组里七户汉族，论生产收入，只有一户不及我，其余五户都比我强。像山东老汉徐华，已经70多岁了，可是身体还健壮。他一个人，没有



维吾尔族民间歌舞晚会

家室。这几年努力生产，已经积上了八九百元了。”

我在英阿瓦提时，还访问了好几个群众。他们都说自己开初来时，都是两手空空，仅仅短短四年，现在已经有了牛、马、羊，驴和屋子。村子上已经形成了三条宽阔的道路，两旁都栽了树木。有了供销合作社，开了一家饭馆，还有了小学。这253户能够安心落户下来，就说明着这几年来党领导的开荒生产有成绩，并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那天我们到英阿瓦提时，已近傍晚。刚进村，就看到有200多人，拿着红旗，排着队，唱着歌，远远地走过来。他们每个人肩膀上都扛着一个坎土曼，就像一队士兵扛着枪支一样。队里还有人带着笛子和手鼓，一面走，一面吹打着。一种勇敢的、愉快的，孕育着无限活力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村子。这景象给我们初到的陌生客人以异常深刻的印象，原来这是附近库曲村的农民，他们带着馕、带着还没



有熟透的杏儿，有的还带着自己的毛驴，前来支援英阿瓦提修渠的。他们后来就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歇了下来。他们虽然紧张地劳动了一天，然而他们依然兴致勃勃。在夜晚，他们就在月色下围了一个圈子，边打边唱地跳起舞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74岁的老汉买买提。他也是在买买提阿吉时代就在英阿瓦提种过地的。买买提阿吉垮了以后，他就从英阿瓦提搬到库曲地方住了下来。库曲用的水并不是由英阿瓦提流过去的，他们对于英阿瓦提的渠道并不负担任何义务。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在党的教育下，知道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已经有了彼此互助的精神。买买提老汉说：“1954年我们库曲发生山洪时，英阿瓦提的农民也来支援过我们。这次英阿瓦提的渠道被山洪冲垮了，我们也就自动来支援他们。我们一共来了220人，内中还有三个妇女。政府本来批准我们来帮助两三天，结果我们帮助了四天，明天再干一天我们就要回库曲了。从前，我们有了什么困难，只好千求万求地主。可是现在，我们再不用去求地主了，我们农民能够彼此帮助了，党把我们农民团结成为一家了。”

我在英阿瓦提住了三天。这地方本来是一片荒野，现在却生产了粮食，出现了村庄；居住在这村子上的人们过去本来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现在却有了技术，有了家业，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农民有了困难，农民内部能够自发地进行互助。这些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但是仅仅在六七年以前，却是说来不能令人相信的事情。

1956年1月，乌鲁木齐。



优先照顾民族老乡的利益

1956年春节前夕，我在阿克苏南面的沙井子地方访问。这一带本来是一片荒滩，自经部队开垦以后，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11万亩大面积的胜利农场。1950年部队初到这儿的时候，当地的民族老乡有很多顾虑。有的把东西藏了起来，有的把房子锁上走了，有些人害怕部队来了要侵占他们好不容易才开垦出来的耕地。可是部队不仅没有动老乡的一草一木，反而还帮助那些跑走了的老乡扫院子、喂牲口。部队一到就投入生产，男的女的都背着小筐出去拾粪。那种起早睡晚艰苦辛勤的劳动作风深深地感动着老乡。这样使老乡们逐渐认识并亲近解放军。部队看到老乡缺水，就建议协助他们修挖原有的一条较小的水渠，把阿克苏河的水引进渠来，好发展生产。最初老乡都不相信。沙井子乡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衣米尔说：“从前国民党部队老说要帮我们挖渠，可是他们只收钱，不挖渠。解放军到了才不久，也说要帮我们挖渠，我们那时都不相信。后来渠终于挖通了，水来了，而且水来了以后，部队总是先让我们用，



这时我们才相信解放军确实是帮助人民的。”

部队为了扩大生产，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从1951年起，花了两年多时间，穿过坚硬的戈壁地带，开凿了一条长达67公里的胜利渠。部队一面挖渠，一面进行农场的规划工作。在规划范围以外，部队已经开垦了一些质量较好的土地，为了便于机耕和水利管理，需要把这些土地和在规划范围以内的261户民族老乡的共约7200多亩土地进行交换。老乡们听到要交换土地，最初都不愿意。有的因为和部队相处几年，得到部队很多帮助，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愿离开部队他迁；有的怕在交换土地和搬家之中吃亏；有的误会部队把胜利渠开成了，便想把老乡赶跑，不让他们再在这一带种地。各级党委和部队首长都很重视这一个群众土地的处理工作。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在通过群众自愿、照顾群众利益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原则下，把各族老乡的利益放在前面，尽可能优先满足他们的要求。部队首长协同地方民族干部分别向群众解释了建立国营农场和交换土地的意义，深入进行了调查，并保证部队继续帮助老乡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各种困难。一般老乡经过了开会座谈及个别访问以后，大都了解了建立国营农场的意义，愉快地友善地和部队商量交换土地的具体问题。有些老乡说：“现在国家要建立农场，还先来和我们商量；若是在国民党时代，他们早就把我们的锅灶也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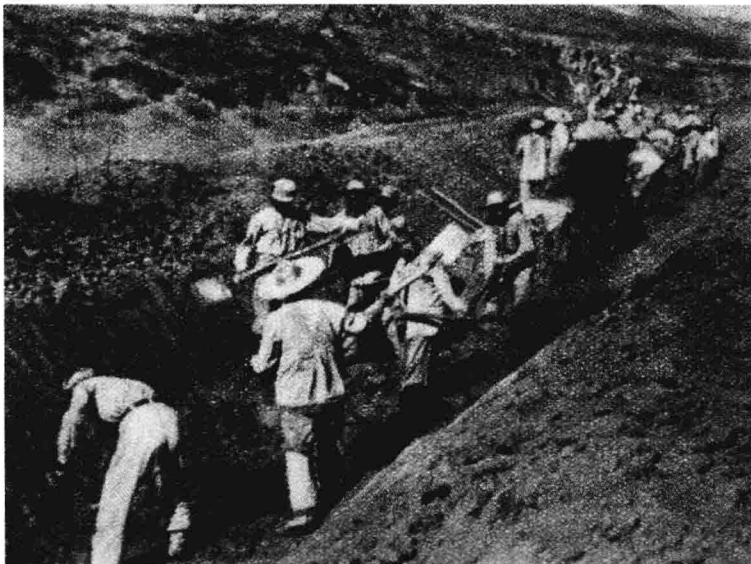
我在沙井子时见到了一个叫贾马利的维吾尔族翻译。他是一直参与过那次的土地交换工作的。他说在那次土地交换中，部队处处照顾着民族老乡的利益。老乡们的好地固然换到好地，就是荒地，也换到了好地。部队先带领老乡到各处去看地，老乡希望交换哪儿的地，部队就尽可能换给他哪儿的地。有一个老汉叫肉孜哈萨夫，他因为别处还有土地，交出了土地以后，硬不要再交换。部队首长认为，不能无偿地收受人民的土地，便派贾马利和袁天祯两人带了10只肥羊和2400斤玉米送到肉孜哈萨夫的家里去。这个老汉感动得哭了起来，说他过去常常挨饿，现在生活好了，都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惠，应该帮助解放军建立国营农场。况且他的地已经荒了多年，地又不好，怎能接受这样的厚礼。他硬不肯收，后来贾马利把维吾尔族乡长请来帮同劝说，老汉这才勉强收了下來。另外有个老汉叫肉孜的，家里没有劳动力，



所以他把沙井子的地交出后，也不要再交换。部队送了他5000斤麦子。他就用这5000斤麦子在附近的阿英克巴扎上开了一个卖馕的铺子，后来他每次看到路过的穿黄军衣的战士，都要拉他们进铺子喝茶吃馕。他说：“这馕就是你们部队送给我的。”

有些土地在交换时已经长了冬麦苗，部队就按那些地最高能产多少斤冬麦的标准，用麦子算还给老乡。地上要是树苗的，部队就按政府规定的价格，用现款付给老乡。此外，部队还把自己种的7000多株杏树苗和桃树苗送给了老乡。那些交的地多、要的地少的人，部队也都分别送了坎土曼、镰刀、犁等农具。

在那261户有地的民族老乡中，有45户是住在沙井子的。对于这45户，部队无条件地给他们修盖新的屋子，帮他们搬家，房子盖在什么地方、要怎样盖，事先都分别征求了本主的意见。我访问了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员木沙。木沙住的本来是两间旧屋子，另外有一间草房，一间马圈和一间破牲圈，修房时，部队派了一个翻译和一个设计员去问他要怎样修。木沙说：“我真没有想到：我那两间破屋子



人民
解放军为
民修筑引
水渠



怎还够得上专门派人来问？后来我选定了地，那个设计员就按照我的意思：门开在哪儿、炕砌在哪儿，一一画成了图样。设计员问我窗开在哪儿？我说不要窗子。他说趁新盖屋子开一两个玻璃窗多好。我说我们这一带的少数民族不习惯在墙上开窗，只要在屋顶上开个天窗就够了。这样，他也尊重我们的习惯，照我的意思办了。政府一共给我修了五间好房，两间住人，一间做仓库，一间装草、一间圈牲口。”

部队给老乡新盖的房子，比原来的又宽大又结实。木料都比原来的好，烂门框都换了新门框。原来的房子，木头直接搭在土墙上，墙塌了，房也倒了。这次新盖的房，都用了柱子。部队里的战士本来不会砌炕，他们就向老乡们现学现砌。部队首长经常去现场检查修建的工程。无论是牲圈、草房、瓜窖、或者涝坝，不管老乡原有的有多么简单破陋，只要原来有的，都要给老乡新做，做得好好的。

老乡搬家时，部队还发动了一些女同志先去把老乡的新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部队赠送的许多图片都贴在墙壁上。还组织了秧歌队欢送，组织当地的民族老乡佷郎欢迎^①。部队发出很多辆用四套马拉的大车帮助老乡搬家具、搬草料、搬肥料、搬木柴。

部队来到沙井子以后，军民关系——同时也是民族关系，一直是好的。部队初到边疆垦地，条件困难，在吃、住、生产工具以及带路看地各方面，都得到当地老乡很大的帮助。在部队这一面，这几年来，无论是种子、农具、用水以及耕作技术各方面，也一直给当地老乡以热情的帮助。尤其是用水。胜利渠挖通后，部队把一干渠的东一支和东二支这两条支渠专门划给沙井子的老乡使用。部队初到沙井子时，当地只有几十户老乡，由于部队来了，水也来了，从各地搬到沙井子来的人就渐渐多起来，现在已经增加到300多户了。部队的大规模垦荒也带动了群众，这几年来沙井子的老乡也开了不少荒地。这一带老乡的耕作技术过去比较粗率。他们过去一直是撒播，部队来了就教他们条播。这一带过去本来没有施肥的习惯，老乡也不懂得施肥的好处。他们最初看到部队背着小筐到处拾粪，还觉得奇怪，后来看到部队施了肥的棉花，棉桃结得很大，他们才相信施肥的好处。现在老

^① 佷郎欢迎，就是跳着维吾尔族舞来欢迎。



人民解放军帮助老百姓收割麦子

乡们也开始积肥和逐渐改用条播了。

1954年9月起，沙井子老乡在部队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用“胜利”作为社名。胜利一社成立的时候，部队送给他们四架洋犁和两个摇耩。老乡最初不习惯用洋犁，说洋犁马拉不动，宁愿仍旧用土犁。部队就派了战士去教他们掌握洋犁。过去他们用土犁犁地，犁得浅，草翻不下去，用洋犁犁地犁得深，一下子把草都翻下去了。后来大伙儿就都抢着要用洋犁犁地。部队不仅帮助训练他们的人，并且还帮助训练他们的马，1955年春天，部队把马拉十行播种机借给老乡使用。他们的马不会拉，部队就一面把自己的马先借给他们拉，一面再帮合作社训练他们的马。

部队对于老乡的技术援助是全面进行的，不仅指导他们选种、条播、中耕、沟灌、施肥、除草，还指点他们进行秋翻冬灌和春耙保墒等项操作。部队经常把播种机、中耕机、追肥机、喷雾器等借给老乡使用。部队举办短期训练班，也都吸收合作社的一部分社员参加学习。现在在棉花、小麦、玉米这三项主要作物上，一般老乡都已掌握了基本的耕作技术。1955年胜利一社的16亩丰产棉田每亩生产了籽棉529斤，比单干户的产棉量提高很多。那年秋分以后，社员收入要

比社外农民平均增加49%。有一个老乡叫吐逊，一家两口，往年一年只能收到480斤粮食，连吃都不够。1954年入社以后，1955年秋分时，分到1200斤麦子，720斤玉米，还有苜蓿等副产品的收入250元，比入社以前增加了好几倍。社外的单干户和互助组看到合作社这样显著的成绩，都想入社。

现在部队正在帮助原有的二社、三社转办高级社。部队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地方工作科”，派了专职干部帮助老乡办高级社。生产部队的政治部的同志对我说：“我们在思想上把老乡的合作社看成为我们自己的生产单位一样，尽一切力量全面地帮助他们。我们将帮助他们进行全面规划工作。过去我们已有两条支渠专门划出来给老乡使用，现在我们将再帮助他们规划斗渠和农渠。将来沙井子也可以不必另设拖拉机站，部队的拖拉机可以就近帮他们代耕。我们对于帮助他们办好高级社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1956年2月，喀什。





新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新疆的农村真美。今年清明节后，我在疏附县の色满区住了一个多星期，村子里到处是翠绿的杨树和艳丽的桃花。很多农民的家宅旁边，都有一个一两亩大的园子，里面盛开着桃、杏、梨、李或者苹果各色鲜花。我每天早起后，总要爬上屋顶，眺望一会儿那南面远远的昆仑雪峰，以及那四望皆是一片葱郁的、彩色缤纷的、孕育着无限富裕、活力和美丽的新疆春天的农村。

有一天，我去访问五乡五星合作社的第二队队长牙生乌守尔。他不在家，他的母亲尼沙汗看到我们去访问，很高兴，说：“从前我们在墙根子下蹲了10天也没有人理会，现在感谢毛主席经常派人来看我们。”我们就在他家走廊上坐下聊起来。尼沙汗指指她的院子说：“我们乡里第一个合作社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成立的。”她说她的儿子在减租反霸时就入了团，一直很积极，“只



是我自己年纪大了，思想保守，最初常常扯我儿子的后腿。”我问她这话怎么讲。她说：“1953年冬天普选以后，有一天，我的儿子叫我把毡子拿出来铺在院子里，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啥。过一会儿，就有好些人到了我家里，有老乡，也有干部。他们就在我院子里开起会来。我听不清楚他们究竟在讨论些什么。后来看到我儿子站起来说：‘我同意。我一定要参加。我一定要好好劳动，发展生产。这样我们才能富裕。’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嚷着：‘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心中很纳闷，不知道我的儿子‘同意’了什么，又要‘参加’什么。后来会散了，我才知道，我儿子要加入合作社，我一听，就引起许多心事，一肚子不愿意。我说，我们好容易托毛主席的福，分到了土地，现在又要加入合作社，万一搞垮了，将来怎么办？那年我家种了5亩冬麦地，长得特别茂。我一想到要把长得这样好的麦地加入合作社，就心痛。我和我儿子闹了好几场。后来他说：我们虽然入了社，但是这5亩麦地没有人。这样，我也就平静下来，可是后来麦子结了穗，快要熟了，有一天，我看到几个干部和我儿子一起在我麦地上鉴定产量，我心一下子明白了：我的儿子骗了我，那5亩麦地也一定入了社。我当时就闯到麦地里大叫大闹，说这5亩麦地不入社。我儿子一看我这样，就硬把我拉了回来，把我关在屋子里，门也反扣了起来。‘你人小心不小，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地都入了社’我那时这样想，越想心越气。”我插口问：“你那时认为那五亩麦地可以收多少呢？”“那年我那5亩麦地长得特别茂，”她指指坐在她身边的媳妇说：“她一下麦地，连身子也看不见了。这样茂的麦子，我想5亩能收12口袋（一口袋约200斤）。可是事情真想不到。有一天，我儿子跑回家拉我一起出去，原来合作社要进行预分了。我一听我家里可以分到15口袋，这把我兴奋得整整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我们就带了毛驴和口袋去领粮，一口袋一口袋都搬到了自己家里。我轻轻地问我儿子：‘怎么我家分到这么多？’原来是我家劳动好，所以才能分到这么多。这样一来，我心里的结完全解开了。加入合作社对我们确实有好处。所以这次大家转高级社，我也不怕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只要劳动好，还怕什么呢？”

色满区是南疆的一面旗。早在1951年，这个区就出现了一些互助



组。1954年2月开始办合作社。那时参加合作社的人虽然有几十户，但是大家多少有些思想顾虑。最近提升为五乡乡长的阿里莫斯泰因说：“那时我虽然也参加了合作社，可是心里总还有些问题放不下。首先，我担心入了社会会不会吃亏？我自己有六亩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六亩地打小麦只能打5口袋。1952年打到9口袋。1953年每亩打到600多斤，一共打了18口袋。产量逐年提高。但是入社以后，是不是会增加收入？或者反而还不及单干呢？我还有牲口。过去单干时，收的粮自己吃，副产品牲口吃。入社以后，是不是还能分到副产品给牲口吃呢？再说，合作社要留什么公积金、公益金，那时上面派了六七个工作组干部在我们乡里，我心里疑虑，会不会这些公积金、公益金都是为他们设的，将来都给他们花了呢？可是那年夏收，我分到了23口袋麦子，还分到很多麦草和一些现款。到了年终，社里又公布了账目；公积金有多少，公益金有多少，用掉了多少，怎样用掉的，一笔一笔都有明账，公积金里买了一些牲畜和农具，公益金里订了一些报刊，帮助大家学文化，又资助了一些困难的社员。这样，我们知道这些公积金、公益金也都是为我们自己花的。那年夏收以后，我们社里开过一次座谈会，大家暴露了思想，当初各人心里顾虑的都



维吾尔族
农民丰收后的
喜悦



差不多。但是一年来事实，不仅把我们的顾虑完全消除了，而且使大家对办社的信心格外提高了。”

1954年2月，色满区先在五、六两乡建立了四个社。那年的夏收，对于后来合作化运动在色满区以及在南疆各地农村的顺利展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民一方面相信党和毛主席的话，但是对于没有实验过的事情，总带有几分疑虑。即使是已入社的，也还有些试探性质。要是办得好，继续参加。要是不好，下年散伙。至于社外农民，观望的成分更大。他们说：好也罢，不好也罢，要收了再看。好，就入；不好，就不入。有些农民怀疑将来合作社的粮食国家会不会收去一部分；有些农民怀疑将来分配时会不会公平合理；还有些农民认为合作社一定垮，将来一定搞得乱七八糟，大闹一场，不欢而散。那年那四个社无论是夏收秋收，社内社外农民都很关心，收割时，很多社外农民都到合作社地里参观。有些农民还有意地把自己的麦场开在合作社的麦场旁边，想和社比一比高下。有些老汉，一连几天整天地坐在合作社麦场旁边看着。那年那四个社各项作物都增了产。新中国成立以前，色满区的小麦每亩约产150斤，高粱165斤，玉米140斤，水稻170斤，棉花则只产30多斤（籽棉、下同）。但是五乡新路社1954年第一年，小麦每亩就产377斤，高粱511斤，水稻283斤，棉花130斤。五乡前进社的棉花每亩产到208斤。这些产量比同年的互助组和单干户也都高得多。但是社外农民不仅要看生产是否增加，还要看分配是否合理。分配时，有时一直要分配到深夜12点钟，社外农民也就看到夜里12时。他们都亲眼看到收割的粮食都是分给了社员的，很多劳动好的社员，20几口袋、30几口袋地把分到的粮食往自己家里搬。在分配中，社员都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的高兴，社外农民都承认分配是公平合理的。四个社75户社员中，有67户都增加了收入。很多社外农民思想里的结都解开了，于是到处都纷纷要求入社办社。

二

那年夏收以后，那四个老社立刻由原有的75户扩大到238户，可是周围很多农民入社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有好些没有被吸收入社



的，都逗留在乡政府前面不肯回家。那年秋收以后，全区又新建了一批社，一共发展到26个社，达到乡乡有社。

社多，问题也多，特别在1955年夏收前后，由于一部分社干部还缺乏经验，预分方案订不出来，会计又弱，账也结算不出，麦子堆在场上分不出去。有些坏分子造谣说：今年生产好，国家要抽一半，只有一半分给社员，有些社员听了心中着慌，就在夜里偷偷地到麦场上来搬麦子；有的被社干部发现了，就打起架来。有几个社在推广乌克兰种小麦时，由于技术指导不当，下种太早，越冬以前生产过盛，冬季管理又不好，以致1955年减产，引起部分社员对社埋怨。同时，个别社员在生产上不够负责，某些社内耕作粗糙，个别社组织涣散……这些个别混乱现象，使一部分区乡干部在思想上有了顾虑，心中害怕，认为社发展得太快了，没有办好。1955年春天在全区建立了26个社以后，区上会又订一个在当年下半年再发展30个新社和普遍扩大老社的计划。但在夏收前后，看到26个社接连不断地发生问题，这个问题刚解决，那个问题又来了，再加上那时上级又把派到色满区去帮助工作的一部分干部抽调了回去，区领导上对发展30个新社的计划，便有些动摇，色满区区委副书记刘世英说：“当时我想，单单领导这26个社就够受了，加上秋后老社还要进行年终分配。现在社的问题这么多，怎么还敢再大力发展新社？当时我想，如果还要大力发展新社，上级就得给我们增加干部。如果上级不增援，我们一定搞不来。与其将来办坏，还不如少建新社为好。”部分区乡干部对再发展新社也信心不高。

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色满区领导上打算把原来再发展30个新社的计划收缩为再发展12个。可是上级不同意。疏附县委提出：“你们区上办了一年半社，难道办30个新社的干部都没有培养出来？”南疆区党委也指示：老社要整顿，新社也要办。要区领导不要眼睛单向上看，想上面拨干部。也不要仅仅依靠区干部。应当把眼睛向下看，发动村乡干部来办社。

南疆区党委驻色满区工作组的负责干部听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传达报告以后，将主要精神向色满区区委会做了传达，区委会及工作组的干部们得到很大的启发。区领导在上级党的指示



下，决定改变领导方法，先下去摸一摸村乡干部的底，看看究竟有多少村乡干部有能力办社。他们逐乡逐乡地摸。先从上面摸下去，再从下面摸上来。每到一乡，就先和乡支书、乡长谈，问他们乡里的互助组的情况，过去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对于建社问题，如建社分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哪些问题应该怎样处理等等是否熟悉。根据乡干部的汇报，再召集一些互助组组长座谈，看看他们有没有转社要求。同时，又访问一些准备转社的骨干，问他们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土地、农具、耕畜的报酬如何规定，担任一个社主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等等。这样前后摸了半个多月，使区领导上对于乡村干部的办社实力，心中有了底。根据各乡干部的报名，当时决定在那年秋季再建25个新社。

区上布置这个再建25个新社的任务时，自以为对群众的情绪是做了适当的估计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个估计仍然落在实际后面。建社的消息传出以后，群众就汹涌地把乡干部包围了起来。有的村全村要求办社，有的乡全乡要求办社，仅仅在两三天以内，每个社的报名人数都超过了原定的控制数字。例如一乡一村，只打算建一个社，吸收30户农民，但申请入社的却有96户。那些没有能入社的农民虽然被先布置在互助组里，答应到冬季建社时再吸收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说：“你们平时宣传合作化的道理，要我们加入合作社，可是我们真要加入时，你们又不让，这是什么道理？”有的则说：“党的政策是目前不要地主富农入社，我们既不是地主富农，为什么不要我们入社？”乡干部向他们解释，说人太多了，社太大了，社干部领导不起来。群众就说：“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事，社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社，社干部力量不够，我们大家来帮助社干部办社好了。”

更突出的是四乡一村农民自发办社的故事。我到四乡一村第二自然村访问时，四乡乡长坎吉肉孜说：“四乡一村有两个自然村。第二自然村一头邻近第一自然村，一头邻近第四村，四乡四村在1954年秋建立了一个和平社。打那时起，就吸引了第二自然村农民很大的注意。他们看到自己村上虽然办了一个互助组，但是无论在哪一项耕作上，他们都深深感到组的力量赶不上社。1955年和平社夏收预分时，他们最初也以为不一定会分得公平。想不到和平社社员比一家人还分



得好，公平团结，没有一点纠纷。第二自然村在四村建社时就想加入，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四村人，没有加入成。1955年9月，区上决定在四乡一村第一自然村建社，我们在第一自然村宣传办社，组织群众学习时，第二自然村也一起来听课，后来他们就要求同时建社。我们说上面只批准第一自然村建社，第二自然村要再慢一步。可是他们不乐意，说：“难道第一自然村是毛主席的亲儿子，我们是毛主席的后儿子？你们为什么不一视同仁？”“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听毛主席的话，实行互助。现在我们要求转社，你们干部为什么不肯？”“我们不比第一自然村落，为什么不让同时建？”我们就说：“建，迟早都要建，只要求你们再等一下。”可是他们都不满意，说：“要是上级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建社。反正建社的样子有。第一自然村怎么办，我们也照着怎么办好了。”我们看到他们的情绪这样高，要求这样恳切，也很受感动，就打了一个报告给区上，请示可否批准在一村同时建两个社。但是区上没有批准，我们也就不敢擅自答应。”

正谈到这里，那个“自办社”的主任和加西尼亚子也走了来。我就请他谈谈为什么他们不愿再等。他说：“我们在1954年就有入社的愿望，也向领导上要求过。1955年秋天我们学习后，大家更迫切地要求建社。当时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四邻都办了社，我们感到很孤立。我们前后写了三次申请书，为什么上级一次都不答应？我们犯了什么罪，要存心使我们孤立？乡干部说我们基础不好，我们哪一点基础不好？他们说我们没有党员、没有骨干。我们虽然没有党员，但是我们有骨干，一定能起带头作用。他们怕我们办了社不能巩固，我们表示了决心，一定能把社办好。我们当时的思想是：建社总比不建好，早建总比迟建好。现在谁愿意落后？谁不争早一天踏上社会主义的大路？”

听他这样说，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乡长说：“他们说要自办，可真的自办起来。他们把地块如何划分、劳动力如何编组、土地报酬如何规定、劳动工分如何计算、农具和耕畜如何使用、入社应带多少肥料和种子等等具体问题都一一讨论决定，甚至对社主任和社务委员的人选也做了酝酿。不仅如此，他们还一口气合力种了六十亩冬麦，表示建社的决心。社叫什么名字，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好名字，干脆就



叫‘自办社’（维吾尔文是康耐拨起卡社，其意为‘水自己沸了’）。正巧区委会的负责干部下来检查工作，这样的事实在面前，区上也只好批准了。”

就在群众这般要求入社的热情下，区上原定1955年秋天新建25个社，结果建了29个社。

三

这一次建社的特点，就是这29个社的建立都是乡村部领导的，区干部只作了巡回检查的工作。从9月18日开始，到10月初，前后只有半个月时间，29个社的建社工作都基本结束。这次建社，不仅时间短、组织快，而且在政策上没有出大的偏差，有不少具体问题比过去解决得更妥当。群众的建社情绪始终是高涨的。

我问坎吉肉孜说：“你们听说那一次的建社工作要你们乡村干部包下来的时候，心里怕不怕？”他说：“那时我们虽然缺乏经验，心中没底，但是接到这样的任务时，心中并不害怕。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年，我们这一带的工作一直都是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1954年建社时，我们乡干部只是从旁做一些事务工作，没有自己动过脑筋。可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永远依靠上级。现在有这样一句话：‘干部落后于群众。’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检查自己，我们当乡干部的确实落在群众的后面，所以大家在思想上也都感到非切实努力学习不可。我们听到那样的任务时，情绪都很高，都希望通过实际的锻炼来提高自己的。”

我说：“建社的具体工作虽然要你们包下来，但是上级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帮助呢？”

坎吉肉孜说：“当然有的。要是上级不帮助，我们这些拿坎土曼出身的人，这样的任务怎能完全背下来？”当区领导到各乡去摸底时，就已经和各乡干部研究了如何选择建社基点、如何物色及培养骨干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在建社工作开始以前，区委会根据老社的经验和群众的意见，并照顾到乡干部的水平，又拟订了一个简单明确的解决有关建社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发给各乡。



后来又把各乡干部集中到区上来进行了学习，使他们一方面进一步领会了合作化运动中的自愿互利政策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又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些政策原则来解决具体问题。区上又指导他们如何使用村干部及老社干部的力量。通过这次学习，乡干部领导建社的信心大大提高。他们回乡以后，就组织建社力量，并遵照区上的指示，强弱搭配，一个熟手带引一个新手。在建社过程中，根据工作进度情况，各乡都组织建社干部进行有关建社工作的学习。此外，又发动老社干部向建社干部和新社社员介绍老社经验。有些老社干部一谈就谈了十几个问题，比干部还谈得深入具体、细致生动。

坎吉肉孜说：“上级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帮助，就是指导我们实行集体领导。我们下村以后，有些问题我们有把握的，就当时办了或答复了；没有把握的，就记下来，回到乡支部里大家研究后再决定。再不能决断的，就向区上请示。”由于考虑到乡干部虽然学习了建社政策，但是缺乏建社经验，假如光依靠乡支书一个人领导或者各个乡干部孤立把守一村一社，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考虑不周、认识不足而造成工作中的缺点，因此在这次建社工作开始以前，区领导就强调了乡支部集体领导的问题，所有建社基点、干部分工、工作步骤、各社户数、社干人选，以及建社中其他一些重要问题，都先在乡支部委员会里讨论决定，再统一布置执行。不仅乡支部加强了集体领导，就是区委会也贯彻了集体领导的精神。在区领导干部之间实行了分片包干；轮回到各乡检查（一般各乡每隔三天都有区委到乡了解情况），解答问题。区委回区后，彼此交流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做法。

我所访问过的一些乡干部都说，经过这次建社的实际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都有了提高。三乡支书吐逊阿不都拉说：“经过这次锻炼，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一遇到困难，就不知如何是好，非得依靠上级解决不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在政策思想上进行领导，同时也能在生产技术上进行领导。党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摆出一个‘领导人’的架子来领导农民，我们用亲自动手的方法来领导农民。现在农民都在学习使用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我们当乡干部的，也就应该先学会这些新鲜事物。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新东西，



农民问什么，我都能答得出，或者亲自做给他们看了。”

参加这一次建设工作的有乡干部26名、村干部29名、老社干部28名；他们都已学会了独立办社的本领。这又为这一个区1955年底的大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1955年底，色满区在全区群众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之中又建立了52个新社，至此全区一共建立了107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81%，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四

和此同时，原在五、六两乡建立的老社农民，又要求从初级社转高级社。1951年冬天，有些老社农民就有转高级社的要求，那时他们还没有听到“高级社”这个名称，但是听到在苏联还有一种更好的生产合作组织叫：“集体农庄。”他们感激党解放了他们，分给了他们土地，又领导他们组织起来互助合作，1954年建社后都增了产，社员也都增加了收入。但是他们通过实际生产，总感到还有一些问题阻碍着大家高度发挥自己的劳动潜力。在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通过干部的宣传介绍，他们更确切地知道了还有一种比初级社更为完善的高级社，主要生产资料归全社所有，统一经营，于是大家就更倾向早日踏进这个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门。

五、六两乡农民在工作干部的帮助下算了算细账，算出初级社有八大矛盾：1. 土地私有和组织劳动力的矛盾；2. 小块土地和利用土地、节省劳动力的矛盾；3. 小块土地对改进农业技术和进行农业基本建设的矛盾；4. 耕畜私有和使用耕畜的矛盾；5. 耕畜私有和喂养耕畜的矛盾；6. 大副业私有和实行多种经营的矛盾；7. 土地私有和国家计划的矛盾；8. 低级社与社员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矛盾。其中一般农民感觉最深切的就是土地私有和组织劳动力的矛盾。我在色满区所接触过的农民，谈到为什么要转为高级社的问题时，大家首先提到的就是土地报酬问题。在色满区，初级社的土地报酬定为40%。有些土地较多的农民，名义上虽然加入了合作社，但是因为依靠土地报酬生活的思想，不愿好好劳动。另一方面，那些土地较少，劳动积极的



农民，看到自己劳动出来的果实，有一部分被土地较多的农民分去，心中不平，因而使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以五乡的新路社来说，全社有男女劳动力216个，在1955年就有40个劳动力不经常参加劳动。同时，假如按每一个劳动力每年平均做90个劳动日计算，全社一年应做19440个劳动日，而实际上，1955年全社才做9000个劳动日，这说明有一半以上的劳动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有些土地较多的农民，即使社主任亲自去催促他，他也不好下地劳动。例如五乡有一个老中农叫乌斯满吾不拉阿吉，全家六口，有男劳动力一，女劳动力二，一家三个劳动力全年才做了67个劳动日。原来他家有土地24亩，每亩可得土地报酬130斤，24亩共可得3120斤。乡长去劝他好好劳动，他公开对乡长说，他的土地收入已够全家一年吃的了，再加上少许劳动日，也就够全家一年用的了。另外有一个叫买提明沙吾提的，有两条耕牛，一年可得2000斤的耕畜报酬，还有18亩地，一年可得土地报酬1200斤，共合3200斤，成为全家生活的主要依靠，所以全家虽然有两个男劳动力、三个女劳动力，可是大家劳动都不积极。对于这样一些不合理现象，农民意见很多。我在五星社七队访问一个叫司马义买木提的农民时，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买木提正在旁边。土改时，穆罕默德买木提在喀什卖烤肉，所以没有分到土地。司马义买木提分到了四亩半地。后来他们兄弟两人加入了合作社。可是穆罕默德买木提看到他们兄弟二人才四亩半地，别家地多得多到三十多亩，自己一年辛辛苦苦的劳动，很大一部分都被别人拿去了，他就不愿再生产下去，后来退了社到伊犁当伙夫去了。这次乡里成立了高级社，他才回来，仍然加入了高级社。

在五、六两乡老社社员的积极要求下，领导上决定在1956年1月帮助这两个乡转高级社。办高级社的首要条件是要把主要生产资料归全社集体所有。在酝酿转高级社时，两个乡的农民对于这点不仅没有意见，而且极力拥护。他们说：多劳多得，劳动才光荣，不要再依靠土地。关于耕畜问题，农民说：耕畜入社还折价，更是公平合理，也没有问题。五乡在转高级社时，甚至对与耕畜如何折价的具体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有些社员就把自己的耕畜牵到了社里来了，逼得干部赶快进城去打听各项耕畜的市价，以便照价折算。在讨论一个乡究竟



是建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高级社时，大家都赞成干脆合并建一个，因为假如分建两个，土地的连片和渠道的整齐，仍旧不能彻底。一些社员早已看到土埂多、水渠多、土地浪费大的现象，认为要是把田块合并、渠道合并，就能扩大耕地，将来还可以进行机耕。

那时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弥漫全国，再加上五、六两乡转了高级社，色满区其他几个乡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说：五、六两乡已经进入了高级社，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进入高级社？当时有五个乡的乡支书都写信给区上要求也跟着转高级社。十一乡五村八十多户也联合要求转高级社，这十一乡在1952年土改时曾上书毛主席致敬，并曾接到毛主席的复信，所以他们不甘心落在后面，也要跟上去。

那时整个色满区真是一天一个情况，到处弥漫着社会主义热情。就在1956年1月下旬，色满区12个乡全面展开了转高级社的工作。在半个多月内，全区107个初级社合并建成了33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到全区总农户的95%。

五

全区全面地建成了高级社之后，农民的劳动热情格外高涨。我问五乡五星社的主任阿不都卡迪尔司马义说：“你乡成立了高级社以后，有什么新气象？”他说：“作为一个社主任来说，我第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每个社员都能自发地积极地劳动起来了。在初级社时，我们当干部的最头痛的，就是对于一小部分社员领导不起来。

“他们依靠着土地和耕畜，不好好劳动。你去督促他，他爱理不理，或者阳奉阴违。水管会的布置有时也贯彻不彻底，下面爱做就做，不爱做就不做。成立了高级社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大家的劲头大，劳动率高，水管会的布置能够贯彻到底。过去妇女向来不下地劳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成立了初级社以后，一部分妇女也参加了劳动，而现在，有劳动力的妇女差不多都参加了生产劳动了。现在我们不仅要提高耕作技术，增加单位产量，而且还要扩大耕地面积。全社有1070个劳动力，地才4500多亩，由于人人劳动，劳动力反有剩余。所以社里决定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到七十里以外的地方去开



荒。派了29个人去，本来计划开200亩，他们却一口气开了600亩。本来规定半个月一轮的，可是去了的人都不愿回来，说要把地种上后才回来。这样的现象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

我在三乡访问时，他们那儿转高级社以后，在耕作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改进。在积肥方面，1954年冬天三乡从城里运来的肥料1.5万多口袋，但1955年冬天运了4.2万多口袋。这个乡过去从来没有买过油渣，一则不习惯用；二则农民穷，买不起；但今年为了肥水稻田，买了3.1万多斤油渣。今年各项耕作时间都比往年提前一些：过去开犁最高的是3月初，而且也只有地富人家犁多畜多，才能开犁得这样早，一般农民要到3月下旬才开犁，但是今年3月初，全乡就普遍开犁了。往年到4月初才种胡麻，由于下种较晚。常常不易熟透，坏得多，影响产量，可是今年3月21日就开始种了。过去棉花要到4月底才种，今年4月7日就开始种了。过去这一带不很重视植棉，植棉的人家也只是把下地种棉花，或者在地头边上种些，有的甚至还和高粱混在一起种。种的都是土棉，棉株只有一市尺光景高，一株只结三个四个桃，一亩一般只能收上二三十斤，丰产的也只收上五六十斤，农民已是欢天喜地的了。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植棉技术和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53年改用了苏联棉种，今年又都按技术要求，实行了条播和密植。往年要到桑子成熟时才种高粱，今年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下种。往年要挨到3月中旬才往地里拖沙，今年2月15日就开始拖沙。再如耙地，过去三乡从来不耙地，今年全乡1432亩冬麦地全都春耙了一遍。过去，要是两家合着一条田埂，谁家在田埂自己的一边多产生了一些泥，对方就会大闹大吵不同意，可是今年，自从转高级社以后，全乡已经废除了212条田埂，填平了110条渠道，估计增加了50亩耕地……这一切的改进，都只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要努力完成增产的计划，为高级社成立后的第一年创造出社会主义的辉煌成绩。

色满区酝酿及建立高级社时，正是冬天。按照往年的习惯，这一带的农民一到冬天，就爱留在村子里打打“举尔提”（纸牌）、晒晒太阳。要是下了一点小雪，大家就更不愿出来劳动了。可是去年冬天完全两样。从色满区到喀什城里一共有三条路，条条路上整日整夜地毛

驴往返不停，给高级社驮肥料。1956年1~2两月全区的积肥量要比1955年同期的积肥量多出三分之二，出勤率增加60%。使用新式农具的比例也骤然上升。去年还有不少农民使用土犁，从今年起，土犁完全绝迹，甚至五寸步犁农民也不爱用了，大家都喜欢用23号单体犁和双轮单铧犁了。过去农民强调水稻田不能用步犁，只能用土犁，但今年也都改用了七寸步犁和23号犁。

色满全区建立了高级社以后，领导上为了示范试验，打算先帮助五、六两乡作出一个从1956年到1962年的七年规划。领导上动员社员酝酿这个七年规划时，先把中央颁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发给大家学习。领导上也先拟了一个两乡七年规划的底稿，但没有先在群众面前展开来。两乡社员在学习那四十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极自然地结合到他们自己乡的具体情况讨论了起来。出乎许多干部意外的是：在讨论酝酿中，凡是领导上想到了的，农民也都想到了，有些个别地方领导上没有想到的，农民也都想到了，有些地方，领导上认为已经够放手了，但是农民提出来的意见更放手。例如生产指标中的玉米一项，玉米虽是高产作物，但是这



农机站的拖拉机手在检修机件





维吾尔族女孩子在学校学习

一带过去玉米的产量不怎么高，所以领导上提出的指标到1962年是每亩800斤，但是农民提出的却是1200斤。农民提的数字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中曾有人去北疆玛纳斯河垦区参观过。他们说：“我们这儿的水比玛纳斯河垦区多，地也比那儿好。我们过去产量低，主要是因为玉米的品种不好，技术落后。假如改换了良种，再提高技术，一定可以增产。”（后来订为1000斤）讨论到其他一些作物指标时，农民都是700斤、800斤、900斤，1000斤那样提。有些干部说：“你们过去的产量这样低，将来怎能提得那样高？”农民说：“再不要拿过去做底子了，大家的眼睛应该朝前面看。”领导上虽然拟了一个产量指标，但如何达到增产的方法还没有提出来，农民却先提出来了，他们认为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有一个劳动定额，他们提出的定额是男女平均每人每年作二百个劳动日，比《四十条》里提出的指标还高。谈到全乡的规划时，哪儿是耕作区、哪儿是住宅区、哪儿是拖拉机道、渠道、林带、排水沟，他们都谈得头头是道。关于扩大耕地，例如五乡，领导上的底稿是扩大500亩，但五乡农民认为可以扩大2000亩，而且他们说的很具体，哪儿有多少荒地，平埂填渠后又可增加多少，能够开出一笔账来。至于文教福利方面，农民也无不一一想得周全。仍以五乡

为例，后来拟定在七年以内，要使12岁至18岁的学龄儿童有90%都能上学，小学毕业生中的30%能够读完初中。要培养出一个农业专家、15个农做技术员、15个机械师、5个拖拉机手、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一个调剂员、一个兽医。要有一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俱乐部，要有社办公所、图书馆、托儿所、医务处、体育场，此外还要有澡堂、缝纫部、分销处、轧花厂、石炭窑、砖瓦窑和可以容纳150头乳牛的乳牛场。领导上的底稿中没有提到买卡车，农民建议要买一辆卡车。他们说：“为什么其他地方都想到机械化，送肥料就不想到机械化呢？”他们还要装电话、电灯和广播器，他们说：“将来可以用广播来调度田间的劳动。”他们并且规定在1957年内扫除文盲，至于社干部，则争取在一年以内完全扫盲。

在讨论中，有的农民要求政府赶快把拖拉机开进来。干部就说：“拖拉机开来容易，你们谁能开？”有一个党员阿不都克日木沙吾提说：“只要拖拉机一来，我们在一两个月就能学会驾驶。我们乡支部向你们提出保证。”在我去色满区的前几天，两部崭新的、刚从苏联进口的拖拉机真的开到了色满。由于拖拉机站还没有建成，两部新拖拉机暂时停在一个桃花盛开着的园子里。这震动了很多农民前去参观。区上也立刻从各乡抽调了22名青年农民到区上来学习如何掌握拖拉机后面的农具。有一次，我和那其中的21位在那花园里座谈了一个下午，他们不仅学习了技术，而且在思想上受到了相应的启发。这些青年农民都能对我说出一篇细账，例如拖拉机和人工的生产效率的比较以及两者成本的比较，使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和重要。他们说，经过这次学习，更想到要好好学习文化，提高技术，这样才能大力发展生产。我在这农村里访问，无论到哪儿，都看到农民群众的情绪完全放开，集中努力生产和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4月，喀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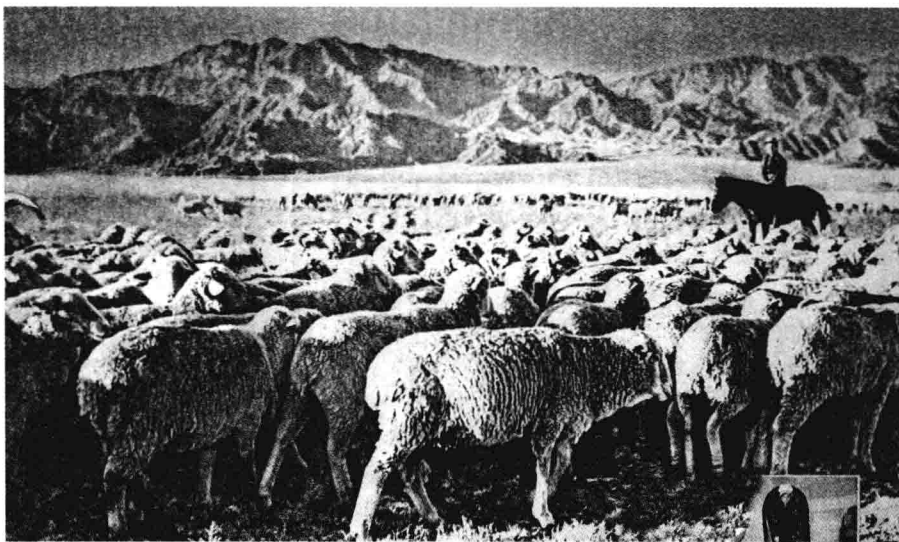




帕米尔高原上的牧业社

我在祖国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上旅行了几天。那宽阔深远的河谷，那磅礴矗立的岩崖，那层层不绝直入云霄的高山，以及从山巅到山根的不化的积雪，都给人们一种高原旷迈的感觉。勤劳淳朴的柯尔克孜民族就在这一带世代相传地牧放着他们的马匹、羊群和高原特有的牦牛。

我所旅行的一带正在国境边缘上；我两次投宿的地方都离中苏边境不到1公里。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在那一带驻扎了一个边卡大队，这也就给当地牧民带来了不绝的灾难。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上了脚镣关了两年，新中国成立后才被释出狱、并且担任了那个乡的乡长的吐尔达列说：“我们这个乡本来有200多户。自从盛世才叛变、国民党来了以后，人民不堪压迫，逐年逃亡外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只剩下83户了。国民党军队要我们乡每月供应30只羊，每户每月供应1500~3000斤柴，每户每天供应两缸子牛奶。好一些草场的草，三分之二都要供应国民党军队，我们



新疆巩乃斯种羊场培育的“新疆细毛羊”

自己只能用三分之一。就是那剩下的83户中，有70多人都被强迫担任了国民党的边卡情报员，探听苏联的军情，并且在本民族中互相监视。那时候大家生活困难，没有粮吃。一只上好绵羊只能换到60斤小麦，而且还只有向国民党军队才能换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在共产党的温暖的安抚下，才陆续回乡。现在我们乡已经有177户。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83户共有2807头大小牲畜，到1955年底，已经发展到8647头，比1949年增长了两倍多。”

这个乡在1955年2月建立了一个红光牧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新疆全区第一批试办的三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我访问这个社的时候，有些社员坦白地说，他们最初入社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那时候大家主要的顾虑是怕入了社以后，牲畜归公，不能自由处理，不能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例如怕过库尔班节的时候不能宰羊过节了，有远客来也不能宰羊款客了。有些坏分子造谣说：“合作社要用80米布做的大被子集体睡觉，要用40个耳朵的大锅（当地最大的锅有4只耳朵）集体吃饭。”可是一年来事实打消





了大家的顾虑，击破了坏分子的造谣。过节要宰羊的仍旧可以宰羊，去年过库尔班节，社里就有七八户宰了羊。社员艾衣库鲁有一个亲戚从苏联来探望他，他仍和没有入社以前一样地宰了一只羊款待他的远来的亲戚。另外一个社员戈德瓦衣的父亲死后，他家仍旧按照民族风俗宰了一匹马请四邻吃饭，此外社里还给他贷了50元救急，供销合作社又给他贷了给死者缠身的白布。还有些牧民到附近的农村里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农村里的合作社并没有大家住一个大被子里睡觉，也没有集体吃大锅饭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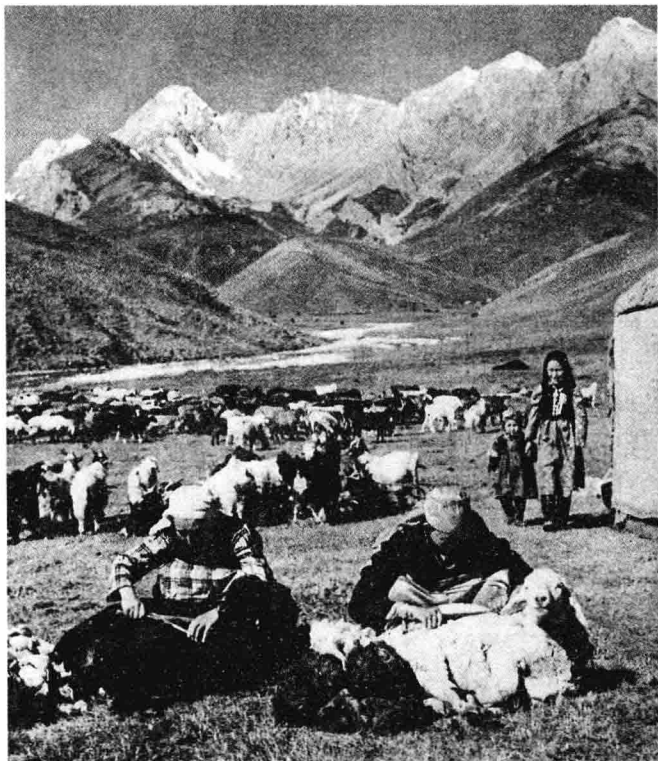
这一个新疆地区第一期试办的红光牧业生产合作社在第一年生产中的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合作化道路是正确的，合作社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的。社员阿力格许说，他体会到的合作社的好处很多。他自己有牛有马又有羊，牛马羊吃的草不一样，习惯上不能把它们合群放牧，因此他过去总是顾了这顾不了那，使牲口放不好。在春天接羔的时候，一个人也忙不过来。由于劳动力不够，过冬以前也不能充分割储冬草。可是这些问题在参加合作社以后大都解决了。他现在的分工是放山羊，他说他现在不仅不比入社以前忙，反而感到轻松得多，可以集中精神放好山羊。由于大家分工、各有专责，去年接羔的情况也很好，羊羔的成活率在95%以上（同年单干户的成活率最高的是85%，互助组的成活率是92%）。过去入冬以前无力多储冬草的，入社以后，就有能力多储冬草。这一年来大家的牲口都有发展。阿力格许入社时只有3头牛5匹马20只羊，现在他有了4头牛9匹马和45只羊。他说过去单干的时候，除了依靠自己牲畜繁殖以外，再不能增加自己的牲畜；可是去年他在社里，因为劳动好，又学了兽医，替社里治好了250头病畜，单单在劳动分红方面就分到了12只半羊羔。他说：“一年来的事实使我充分认识，社就是我的家。离开了社，再没有富裕的道路。”

社主任阿比沙里和其他社员告诉我，去年一年合作社除了放自己的牲畜以外，还代外地的农民放了200只羊，代国营牧场放了300只羊。去年入冬以前全社一共打了21万多斤草，平均为每只羊储冬草120斤。接羔时期是牧民一年中最紧张的季节。建社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挖土窖育羔的老习惯，改用草帘搭成的小棚圈育羔。白天实行

跟群接羔，夜间轮班起来三次接羔。为了照顾小羔的发育，一般都对母畜推迟挤奶15天（这是指挤给人吃的奶），或者原来一天挤两次的，改为一天只挤一次。此外还进行了改良草地、栽种苜蓿、栽种青稞、打柴打猎、组织妇女抓山羊绒、组织骆驼队给供销社运输货物等，以增加社员收入。

去年红光社年终分配的时候，社外一些互助组和单干户亲眼看到户户社员的收入都有了增加。二乡常年互助组组长库鲁说：“你们办了一年社，指出了牧业生产合作社是我们牧民过幸福生活的道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明年也要转社。”

在我访问的那一部分高原上，除了去年建立的红光社以外，今年又建立了一个红旗社。当我们翻山到达另外一个草场访问红旗社的时



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族牧民在剪羊毛





专家在指导新疆细毛羊的鉴定工作

候，红旗社的主任提勒克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新社在接羔工作上有些什么样的新进步。他说他们在接羔以前先作出了接羔计划。他们专门搭了一个蒙古包安放羊羔，使人畜分居，使羊羔能自由活动。白天把蒙古包的顶毡掀开，使羊羔得到更多的阳光。把10天以上的羊羔和不满10天的羊羔隔为两群，以免大的把小的踏伤。除了白天跟群接羔外，夜晚轮班守夜，随生随接，以免小羔冻死踏死，剪脐带的时候，也实行了先把脐带系紧然后再剪的科学方法，以免病菌传入羊羔肚里。

提勒克是一个年纪很轻的贫牧。他一直笑眯眯地接待着我们。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又很文静。我问他：“大家选你当社主任，你愿意不愿意？”他说：“我过去一直不懂得人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现在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大家要我多为大家服务，我



是很愿意的。”我说：“办一个社，当一个社主任，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怕不怕困难？”“困难是有的，但是我不怕困难。在劳动上，我自己可以苦干带头，来推动大家。只是我没有文化，在组织劳动力和制订生产计划上，我便感到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一面请求党的帮助，一面经常和群众商量，我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时我们同行的同志问他阿图什县今年新建的将尼奴尔牧业生产合作社向新疆各牧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提出增产挑战，“你们应不应战？”提勒克迅速而肯定地说：“应战。”这一个初看起来仿佛很柔弱的、然而意志却很坚定的小伙子，他的谈话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

在红旗社里，我们会见了新社员朱凯。朱凯去年曾经和红光社社员沙仁挑过战。沙仁告诉我说：“去年朱凯劝我不要入社？说入社以后牲畜就要充公了。我因为相信共产党，仍旧决心入社。朱凯就说：你入我不入，各走各的，看谁的牲畜发展得快。”那时他和沙仁各有3头牛、10只羊。沙仁入社以后，生活上的困难都有社照顾，一年的结果，牲畜发展到5头牛、2匹马、20只羊。但是朱凯因为刁羊摔伤了腿，休养了三个月。他的10只羊只生了5只羔。为了解决一年的吃用问题，他宰了5只羊又卖了5只羊，到去年年底就只剩了3头牛、5只羊了。朱凯说：“我认输了，我现在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了。合作社确实好，所以我今年也决心加入了社。”

我在访问红光、红旗两个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都看到了他们那辛勤的生动的育羔劳动。每天清晨和傍晚，牧民们都亲热地抱着自己所接的小羔送到母羊身边吃奶。柯尔克孜牧民有着异常敏锐的记忆力，尽管他们每户都接了几十只小羔，但是他们都能够一一记清楚哪只小羔是哪只母羊生的，毫不弄错。他们吹着轻盈的口哨，呼唤着一只一只母羊前来喂奶。那些小羊羔，一忽儿一啻一啻地吮吮着他们的母亲的乳汁，一忽儿又在草场上乱蹦乱跳，活泼鲜健。生双羔的母羊很多。牧民们顾虑生双羔的母羊乳汁不够，就用牛角做成“奶瓶”，用人工给那些双生羔喂奶。有一个妇女生产组组长阿衣夏，她去年接了26只羊，其中有8只生了双羔，一共生了34只羔，全部成活。今年她接了70只羊，成绩也很好。牧民们都知道，牧业生产发展主要是通过牲畜繁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每年一季的接羔育羔



工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和它所取得的初步成就，给牧民指出了一条幸福的道路。今年那一带有许多牧业互助组都要求转社，很多单干牧民也要求入社。在我离开那儿的那一天早晨，一乡的常年互助组组长托吾提买合木提还特地请我代他向县领导机关反映，要求早日批准他们转社。虽然是在祖国极西的边陲，虽然是在雪峰连绵的高原，但是党和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化道路，也同样像一盏明灯照耀着祖国边陲高原上的牧民。

1956年4月，喀什。

和田的缫丝女工

和田的蚕丝生产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那儿也是新疆蚕丝生产最集中的地方。1941年是新疆历史上蚕丝生产最盛的一年；那年全省发蚕种10万盒（25厘米装），和田一地即发7.5万盒，生产生丝300多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田的蚕丝生产逐年下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年产生丝已不足5吨了。

新中国成立后，南疆人民一再要求党和政府帮助他们发展蚕丝生产，并希望修建现代化的缫丝工厂。1953年，政府在和田兴建和田缫丝厂，这个厂已在1954年的国庆节投入生产。当旅客到达和田近郊10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那占地200亩、建筑着一幢幢新式厂房和办公楼、耸立着很高的烟囱和水塔的和田缫丝厂了。

政府一面施工建厂，一面选派了70多名少数民族女工到苏州去学习缫丝技术。当我在和田缫丝厂问那些去过苏州的维吾尔族女工的时候，她们一提起在苏州学习的那一段情况，都引起一种无比温暖的和幸福的回忆。在苏州学习期间的学习模范白西汉说：“我很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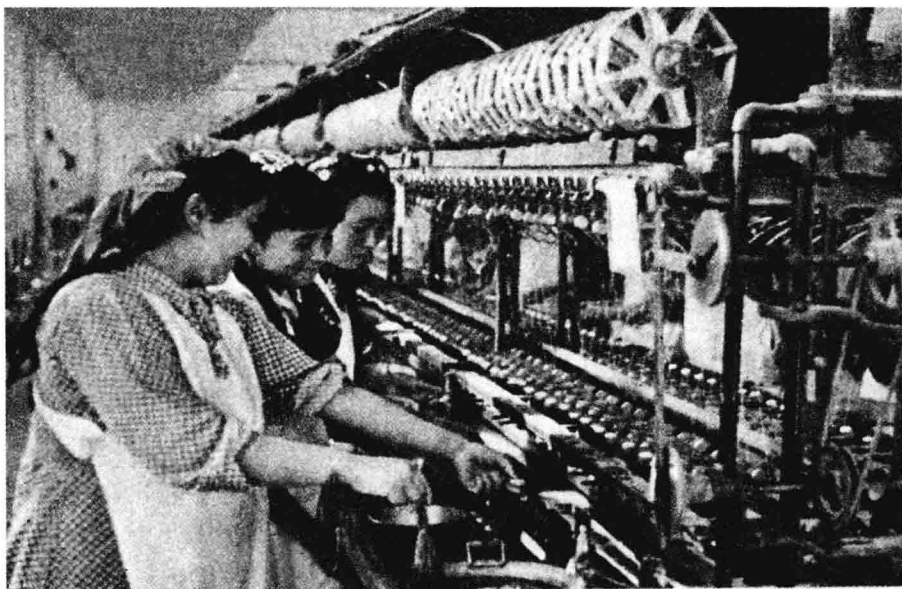
时候，就看到家里用一个小木车缫丝，要好几天才缫出一斤丝。后来听说沿海有很大的缫丝厂，我就想，要是和田也能有这样一个厂，多好啊！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决定在和田建筑缫丝厂，还要送我们到苏州去学习技术，我听到了就高兴得不得了。到了苏州，我们刚在苏州第一丝厂门口下车，便被许多汉族大姐抬了起来。虽然言语不通，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犹如亲生姊妹好久没见似的那种强烈的火热的感情。我们参观车间的时候，只见机器转动很快，汉族大姊动作敏捷，简直使人瞧不见丝在什么地方，那时我们心中又有很多顾虑，怕自己学不好。但是汉族大姐一直耐心地帮助我们。她们先教我们如何打结、穿磁眼、做鞘、捻添等等基本动作，技术员又给我们上理论课，接着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分配到车间实习。言语不通用手比，实在说不明白的事情，便用实物来说明。下了班在路上也是边走边解说，新疆本来没有工业，现在汉族老大哥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建立工业，汉族大姐又这样热心教我们，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一致保证要把技术学好。”这批民族女工在学习上是认真的，尤其那年冬天学习了总路线以后，思想提高一步，学习进步更快，她们最初是两个人管一台车，后来逐渐可以一人管一台车了。她们最初缫出来的丝都是一些次品，后来她们的成品也达到了双A级的标准，同汉族女工的成品一样了。

和田缫丝厂的工会副主席买合木提，1953年曾经陪同那批女工一起去苏州。他说：沿海汉族老大哥对从和田去的女工关切照料，无微不至。和田女工到达苏州不久，就入夏季。她们不习惯江南暑天的炎热，领导上便特别让她们在中午休息一段时间；江南雨多，地气较湿，有些女工开始脚肿，领导上便立刻派医生给她们治疗。维吾尔族习惯吃馕，但是苏州没有馕，想自己做，又没有馕坑，也没有人会砌馕坑。后来领导上多方设法，终于找到了一个回族同胞，专门砌了馕坑，做馕给她们吃。维吾尔族喜欢吃抓饭，苏州不容易买到做抓饭用的黄萝卜和羊肉，领导上就专门派人到上海去买。过肉孜节和库尔班节的时候，领导上给维吾尔族女工放假三天，同时动员汉族女工代替她们生产，以免影响整个厂的生产计划。过节的时候，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给她们宰了羊，又请她们看电影。平时一到星期日，很多工厂、学校、机关争着和她们联欢，带她们上家里或风景区玩。有一个

女工叫奴尔尼莎，怀孕七个月小产了，领导上特地把这个不足月的孩子送到医院里去用特备的氧气箱保育。那个医院里虽然有四只氧气箱，但都有小孩占用着。为了特别爱护兄弟民族，医院就把其中一个快要好的小孩提前抱出，把那只氧气箱腾出来让奴尔尼莎的孩子睡。医院还专门派了一个护士看护这个孩子，用牛奶喂他，这样在医院里保育了五个多月，一直保育到这批女工学习完毕，才把孩子交给奴尔尼莎带回新疆。在学习上，厂方不仅派最优秀的汉族女工耐心教她们，还经常派人来了解她们的学习情况，征求她们的意见。买合木提说：“这些事实使大家深切地体会到，这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

这批少数民族女工在苏州学习了一年，1954年春天回到和田。以后厂里陆续招收了好几批少数民族女工，就由这些从苏州学习回来的女工和部分汉族女技术员教她们。白西汉说：“我一面教那些新招的女工学技术，一面就给她们讲苏州汉族同胞是怎样热情地帮助我们，

和田缫丝厂各族工人到苏州学习缫丝技术





这样大大鼓舞了她们的学习情绪。”我看到全厂450名生产工人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女工。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在汉族女工的帮助下，她们已经基本上能够独立掌握缫丝作业中的主要操作了。

在和田女工从苏州回新疆的时候，有80名江南女孩子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陪同这批维吾尔族女工到和田来支援兄弟民族的缫丝生产。她们有些是杭州纺织工业学校和苏州浒墅关蚕桑学校的毕业生，有些是无锡一些丝厂的熟练女工，有些是新招的并在无锡受过短期训练的青年女工。她们大都只有十八九岁。她们初到和田，正如和田女工初到苏州一样，在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女孩子从小都是吃大米长大的，一下子吃蒸馍和面条，吃不惯，羊肉也吃不来。当时厂房还没完工，宿舍还没造好，饭厅还没修建，大家只好在露天里吃饭，一阵风把沙子也刮进了菜碗饭碗。后来工厂投入生产了，但她们看到茧子小、茧层薄，丝时常断，水又浑浊，影响丝色，这一切都使她们感到工作不好做，对前途发展缺乏信心。再加言语不通，人生地疏，所以有些人思想波动，不能安心生产。我会晤了厂里两个先进女工过风英和朱玉兰。过风英说：“我过去一直有不正确的想法，认为这里发展慢，要进入社会主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心里老想在这儿做上三年，帮助厂里培养出一批新的民族女工以后，就回无锡。我又怕越是工作做得好，将来越难脱身，所以初来时工作总不够积极。自从1955年2月厂里开始整党学习以后，我的思想斗争很剧烈。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认清：我既是一个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安心在这儿工作，并且要带头搞好生产。尤其现在在全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高潮发展得这样快，我们工人更应该加紧努力，现在我们厂里就要实行双班制，还要扩建，增加车台，听到这些消息大家都很兴奋，感到边疆的发展也很快。”朱玉兰说：“北京青年志愿去黑龙江垦荒的新闻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比我们更艰苦。我最初以为我们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在生产上很难帮助维吾尔族姊妹。后来领导同志说，只要我们汉族女工生产得好，也就可以激发维吾尔族姊妹向我们看齐。领导同志的话说得一点不错。维吾尔族姊妹总是那样虚心地向我们问这问那，她们那种虚心的学习态度鼓舞并教育了我们汉族女工，使我们格外要把生产搞好。”

从江南来和田的一些汉族姑娘中，像张顺和、马丽娟，许品梅、姚冰澄等都已经能够直接用维吾尔语言指导维吾尔族女工操作了。张顺和是技术员，我问她是怎样学习维吾尔语的？她说：“我在苏州的时候，上级就分配我帮助维吾尔族姊妹学技术。后来和她们一起来新疆，在路上我就一点一点学习她们的说话，并学着吃羊肉。到了和田，厂里招收了一批新工人，也派我担任教员，那时领导同志鼓励我们学维吾尔文，我就决心把维吾尔文学好。我和翻译阿乐布江同志合作，上课以前我先把讲课的内容告诉他，我把一些有关的维吾尔文名字先在簿子上记下来，这样我便跟他一起去上课。由他讲，我旁听。听不懂的地方我就记下来，下了课再问他。后来教操作，我就先学这样一些话：身体应该立直些、眼睛应该看哪儿、手应该放开些、手应该放拢些……先从和工作有关的话学起，说的次数多了，也就容易记住了。那些姊妹们看到我能说几句维吾尔语，都特别高兴，我们之间就格外容易接近。她们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总是主动地来找我问我，每天下班后，也总有许多少数民族姊妹们跑到我房间里来，亲昵地和我谈笑。”

在党不断的教育和关切下，这批从江南来的女孩子，现在都已安心在和田工作了；其中有些已经在和田结了婚。青年生产组长韦玉林说：“我们起先对新疆的建设不够关心，可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新疆的建设，看到祖国边疆的各项建设也发展得这样快，都很兴奋。现在我们在这儿都做长期打算了。说个笑话吧：从前我们买暖壶，都只买竹壳子的，现在，买起暖壶来，就都要买铁皮壳子的了。”

1958年3月，喀什。





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

——新疆学院访问记

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访问了新疆学院：这是新疆的最高学府。从1958年起，这个学院将扩大成为新疆大学。

由于新疆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原因、现在的客观条件以及民族地区的各种特点，在新疆发展高等教育，具有许多为内地所没有的困难。成立一个学校的最主要的条件是学生和教师，而这两者在新疆学院都成为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以外，新疆全省只有六所维吾尔族中学。盛世才时代曾经在迪化办了一所蒙哈中学，可是到国民党时代，这所蒙哈中学也停办了；此外，除了三区，新疆全省没有一所哈萨克中学。那时新疆的一些中学，大都是初级中学，高中很少。这也就格外影响到学院学生的来源。1945年，新疆学院曾经因为没有学生而一度停办。后来从内地调了



一批汉族学生到新疆学院来。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新疆学院一共有学生379人，但其中民族学生只占到38%。女生数目也很少；在民族学生中，没有一个民族女生。

由于过去高中很少，既影响了学院学生来源的数量，又影响了学生来源的质量，因而不能不降低标准，招收一部分初中毕业的学生。1951年伊犁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相等于高中）的学生182人转入了新疆学院，这是新疆学院吸收的学生在质量上比较好的一批。由于新疆情况的特殊，对于民族干部的需要极其迫切，新疆学院在1952年时规定两年毕业，到1953年才改为三年毕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将改为四年毕业。由于学生程度不齐，第一年常常主要是给学生补习若干基本课程，余下只有两年，再加上翻译困难，学生实际学习到的东西有限，这样就必然影响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到1956年暑假，新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设的高级中学开始有学生毕业，以后新疆学院将能够保持它吸收学生应该保持的标准。

学生在质量上虽然受到一些限制，但这几年，新疆学院的学生在数量上一般是发展的。到1955~1956这一个学年，新疆学院的学生已经从1949年的379人增加到1247人，其中有女生239人。1247名学生中，民族学生占到96%；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锡伯、塔塔尔、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民族都有。民族学生占到绝大的比重，这是完全符合在民族地区设立民族学校培养民族学生这一正确的目的的。

学生的来源固然有困难，而师资问题更其严重。在1950~1951这一学年中，全院有学生336人，而教员却只有13人。其后内地支援新疆，陆续来了一些汉族教师。可是新的汉族教师的支援并不能真正解决学院在教学上所存在的困难，因为新来的汉族教师由于语言的隔阂，不能直接给学生上课。每个人都需要配备翻译，而又没有那么多翻译可以调配；况且一般性质的翻译和教学上的翻译有很大的区别。当时也曾经从校外调进一些翻译，可是由于他们缺乏专业知识，例如化学、物理、数学这些课程，便很难翻译。那时学院里因为民族师资太少，翻译力量也不足，因而在课程比重上，曾经出现过政治课和语文课开的较多，专业课开的较少的现象。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将影



各族专家
在研究“木卡姆”的搜集与
整理工作

响新疆学院的正常发展，因此民族师资问题成为了新疆学院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2年春天，学校开始采用培养“实习助教”的办法来逐步解决培养民族师资的问题：这是新疆学院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从毕业班中挑选了40多名优秀的学生，分到各系或各教研组去，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养。主要是适当地减少他们一些一般性的课程，而对他们加强专业学习的指导。培养的方式主要采取由教师给他们上课的方式。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育学、教育史、普通心理学、遗传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农业经济、达尔文主义、解剖学、棉花学、农机学、中国史、世界进化史、苏联文学、地质学、水利学、素描学、民族舞等课程，都由有关教师编好讲义分别给本专业的实习助教上课。给实习助教讲课的教师中也有少数苏联教师和民族教师，但主要是汉族教师；他们平均每周要给实习助教上14小时的课，有时还要专为某一个实习助教补开某一项为他没有学过的专业课程。在教师



这样的培养下，成绩好的实习助教，能够独立掌握某一门课程的，即由这个实习助教直接去给学生上课。假如还不能独立上课的，则由教师陪着他去上课，仍由实习助教讲，教师坐在旁边听，必要时给他一些指导和帮助。假如这样还不行，则教师和实习助教共同备课，由教师主讲，实习助教翻译，使实习助教通过备课和翻译的工作，能逐步培养到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给学生讲课的程度。因此，在新疆学院，教师都有双重的任务，既教学生，又教实习助教。通过这几年来实际工作，大家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能永远由汉族教师来负担，要大批培养民族学生，首先要大批培养民族师资，因此对于汉族教师来说，培养民族师资是他们更主要的责任。从长远来看，假如他们能教好一个实习助教。就等于解决了一门功课，教好两个实习助教，就等于解决了两门功课，教好实习助教比之教一般学生，效果更为实际深远。

目前民族地区民族学校的教学工作除了由民族教师、包括民族助



中共中央
新疆分局在新疆
设立地方干部
训练班



教、直接授课以外，还有一部分课程需要由汉族教师或苏联教师通过翻译的方式进行教学，而这种教学翻译，要比寻常一般性的翻译困难，既要具备一定水平的语文程度，还要具备适当的专业知识。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急切需要更多的教学翻译，另一方面是很不容易找到适当的教学翻译；反过来说，教学翻译具备有关的专业科学知识，可是某一个人真的通达了某一门的专业科学知识，他就不会再当教学翻译。教学翻译也是民族学校教学中的一个困难，而要解决这个困难，没有别的道路，也只有自己培养。

在培养教学翻译方面，新疆学院过去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过去新疆学院曾经在语文系增设过一个以汉族学生为主的维吾尔文班和一个以民族学生为主的汉文班，规定三年毕业，经过三年的语文学习以后，再留校分到各系去进行专业培养，担任专业翻译。但是这个办法费时多而效果坏。因为那些语文班学生，经过了三年的语文训练，毕业后还要从头学习专业知识，在情绪上都不安定。因之现在新的办法，基本上和培养实习助教相似，从各专业班中挑出一些专业基础和汉文基础较好的学生，减少他其他若干课程，让他着重学习汉文，使他在语文和专业两者相并发展，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就可顶用。同时，这种对教学翻译的培养也可以和对实习助教的培养结合起来，通过教学翻译的训练，最后使那个翻译也能成为可以直接授课的实习助教。

这种培养民族师资的方针，现在在新疆学院已经取得了肯定的成就。在1952~1953年度挑出的40多名实习助教中，目前已经有三名。像我后面要介绍的哈密提那样，能够独立开大学专科一、二年级的一门至两门课程了。在过去三年中，新疆学院先后培养了113名实习助教，这113名实习助教已经成为了目前新疆学院教学工作的一支主力和骨干。现在全校每周授课1107学时，其中由实习助教开课的有654学时，占到60%左右。1955~1956年度全院所开270门课程中，有174门由实习助教在教师的辅导下直接讲课。现在全院37个班中，其中35个班的班主任都是由实习助教担任的。这一支新的民族师资力量成长，为新疆学院以及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少数民族学生在做化学实验



二

我在新疆学院访问时，花了好几天时间访问了一些担任培养民族实习助教或教学翻译的汉族教师和被培养的实习助教和教学翻译。

有一天我访问了数理系的物理教研室主任王怀德和他所培养的实习助教哈密提。哈密提是伊犁人，原在伊犁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读法律。1951年2月，那时他还是八年级（即高中一年级），即从阿合买提江学校调到新疆学院学习，改读数理。学了一年半，到1952年10月，学校里便把他抽出来教书，1952年下半年，他教的是初中物理。1953年上半年改教高中物理，学校里并派汉族教师王怀德培养他。

哈密提说：“1953年上半年我教高中物理时，我自己也才等于高中二年级的程度，心中很害怕。学校里虽然派王怀德同志帮助我，但我那时的汉文，连日常生活里的一些话还不十分会说，更不要说课程上的问题了。我那时想，学校派汉族教师帮助我，也不一定有什么结果，还不如我自己直接从俄文课本上自修来得有效。我讲课时，王怀德同志就去听课，对我经常提出意见：哪些地方不系统，哪些地方不深刻，甚至哪些地方讲错了。那时我们彼此语言不通，有时用手势来表示，有时在黑板上用画图来表示。要是我讲错了，经他改正后，我就在下次上课时更正，但是我觉得老是这样更正也不是办法，后来我便和王怀德同志一起备课，以便先弄正确了，再去上课。

“那时我教的高中物理学，王怀德同志有汉文本，我有俄文本（实际上是乌兹别克文），我们就一句一句互相讨论。王给我的帮助很大，有些地方，我本来以为已经懂了，经王一说，才知道我并没有真懂。这样，就使我逐渐感到兴趣，觉得汉族教师的确对我们有帮助。以后我们天天晚上都在一起进行备课。在王怀德同志的帮助下，我讲课的质量大大提高，学生大都表示满意，我的汉文程度，这时也有进步，很多汉文的物理学上的名词我也知道了。

“后来，王怀德同志更进一步让我看他的汉文讲义；不懂的地方，他给我解释。在他这样热心的帮助下，我后来竟然能够把他的汉文讲义译成维吾尔文。这时，王怀德同志不再跟我天天去听课，只是



隔一两个星期偶尔去听一次。当他觉得我对于课程本身问题较少的时候，他便转而在教育法上多帮助我，如指导我讲课应有系统，应该分出一般和重点，以及如何使理论联系实际等等。

“我现在已经可以教大学专科二年级程度的物理，并且可以领导做二十几种不同的实验了。”

哈密提谈完后，我便请王怀德同志谈谈他的体会。他说：“1953年学院领导上要我们担负起培养民族师资的任务，我们也觉得，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老是汉族教师讲，翻译翻，不是办法，应该从根本上把民族师资培养成长起来，他们才是将来民族地区民族教育事业的真正骨干。至于哈密提同志，那时他自己才只高中二年级程度，已经要担负教高中物理学的责任，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好好地帮助他，那时学院培养民族师资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系里决定重点培养哈密提，并把他交给了我，我开初感到很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那时哈密提虽然认得几百个汉字，可是并不真正了解那些字的意义。他只能听懂很少几句话。我们在一起备课时，常常要借用手势来表达彼此的意思。有时，遇上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好几个汉族教师同时用了各种方法，用尽力量，还是没有办法使哈密提听懂。后来我知道他有一本乌兹别克文的物理课本，而我又有了汉文物理课本，两个本子的内容相同，这样，就由我一句一句读，他一句一句听。但是乌兹别克文的文法和汉文的文法不同。我读的，他在他的本子里有时找到了，有时找不到；我们先把找到的肯定下来。我重复再读时，他也就渐渐把最初没有找到的找到了。最初每句我都要读上五六遍他才懂，后来进步到读一两遍他就懂了。我们每天至少要在一起读2个小时，有时甚至要读到五六个小时。这样读，读了半年。那时他一面直接向学生讲物理，一面又当了我给实习助教上课的翻译。口音腔调，各人不同，他最初只能听懂我一个人的话，又经过了半年多，他慢慢地也能够听懂别的汉族教师的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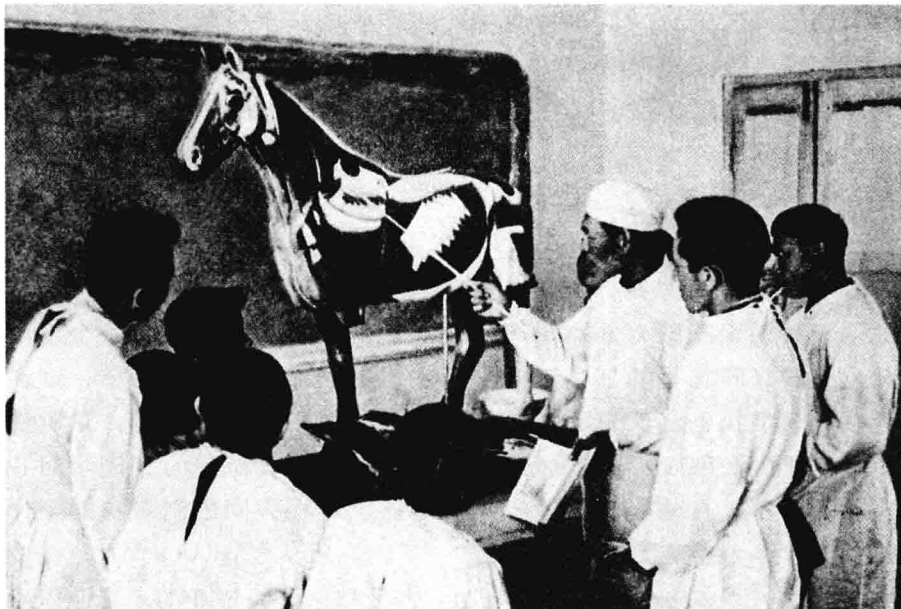
“哈密提虽然能听汉话，但还不能读汉文。1954年，学院要他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学。由于没有俄文课本，必须自编讲义。最初由我编，读给他听。他一面听，一面记下来；根据记下来的备课去讲课。后来哈密提说这样不好，既费时间，对于他的提高也没有帮助。



他建议由他直接阅读我编的讲义。我同意了他的建议。由于我们多年相处，我知道他哪些汉文较熟，哪些汉文较生，所以尽量挑他熟悉的字写，尽量写得通俗易懂。我并且努力按照维吾尔文的文法写成句子，尽一切可能使他容易看懂。这样试了一两个月，以后便在讲义中逐渐加上一些较新的字和较深的句子，并且把新字先注出来，教他先学一下。这样，生字逐渐加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就能够看懂我编写的一般讲义了。

“到1955年初，不再由我编写讲稿。我只在事先和他研究这一堂课的目的，应该分几个过程来讲，举哪些例子，画些什么图等，讲稿主要由他自己编写。而到1955年初夏，一般的意见我也不再提了。哈米提同志经过逐年的锻炼和提高，他已经能够独立担任这门功课了。”

新疆学院畜牧系学生正在上课



三

我接着又访问了畜牧兽医系的助教王殿兴和他培养的教学翻译乌布里·哈斯木。哈斯木是1955年8月新疆学院语文系汉文班毕业的学生。由于学校决定哈斯木毕业以后把他分配到畜牧兽医系当教学翻译，所以在1954年11月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畜牧兽医系就叫助教王殿兴培养他，先教他《农畜繁育学》一门功课。教了三个月以后，哈斯木就担任了王殿兴的教学翻译。哈斯木担任翻译工作时，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因为他过去在语文系学汉文，对于畜牧的功课完全不接触；不仅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一点都没有，甚至很多名字和术语也都不懂。那时班上有些同学是刚从兰州的民族学院调来的，他们的汉文基础比哈斯木还好，哈斯木心中格外害怕，本来会说的，可是一上课堂，心里一阵慌张，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因此同学对他有很多意见。他那时感情上很苦闷，不愿再搞这个翻译工作。可是王殿兴同志总是安慰他，告诉他什么工作最初都会遇到困难的。王殿兴对他说：“我们汉族教师到新疆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你们培养兄弟民族的高级师资，而翻译是培养工作中的一个桥梁，你做这工作对于本民族是一种贡献。”就在王殿兴同志这样既热情又耐心的帮助下，哈斯木的汉文程度和专业知识都逐步提高。哈斯木说：“我初学汉文的时候，许多字不识，后来识了，又不会写。很多汉字，外形差不多，例如‘困’‘团’‘因’，不容易区别他们的意义。有些名词，在不同的地方，意义完全不同，例如‘组织’，说‘组织起来’是一个意义，说‘身体上的组织’又是一个意义，最初很难掌握。1954年我初跟王殿兴同志学习时，认识的汉文很少，草字一个也不识。王殿兴同志写的都是正楷，后来也逐渐加上两三个草字，现在他写的草字我也全认识了。1954年我听王殿兴同志说话时，只听懂40%，现在，可以听懂80%到90%了。我初担任翻译时，同学对我的意见很多，有些人甚至说我条件不够，现在，同学们对我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



王殿兴是1954年夏天在兰州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



组织上分配他到新疆学院工作。他最初以为要他上课，学校里一定会给他一个翻译的，没有想到翻译要他自己来培养。最初他培养哈斯木时，感到很大困难，主要是因为哈斯木没有专业基础。在备课的时候，一个很寻常的名字或者一句很寻常的话，王殿兴也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哈斯木了解，王殿兴那时想，这样培养，不知要培养到什么时候。后来学院领导上一再纠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说关于民族师资和教学翻译的人才，上级不可能派给我们，校外也不可能派给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想法从下面挑对象，进行培养。

“我们培养的翻译，一般说来，大都汉文差，专业基础差，而又年轻急躁。”王殿兴先总结他的一部分经验说：“在培养他们时，有些具体的东西，他们容易了解，有些抽象的名词或理论，就很难解说清楚，例如生物有机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质变与量变问题、泌乳量和含脂率的换算问题、家禽在产蛋时色素如何消退问题，甚至一些名字如什么叫‘遗传性’，什么叫‘变异性’等，很不容易解说清楚。有时，有些字眼对于说明某一个意义，出入很大，不能随便改变，例如‘渗入’不应说成‘进入’、‘细嫩的’不应说成‘细小的’、‘促进它发育’不应说成‘使得它发育’、‘尽可能’不应说成‘一定’、‘避免’不应说成‘不能’、‘抱孵性’不能说成‘抱小鸡的性情’等；用字改变了，意义就不同了。但是翻译同志因为不容易了解，有时就希望把难译的地方删掉。每当我写完一段讲稿以后，常常要查很多次字典，我指导他们哪些名字查一般字典，那些名字查专业字典；先查《汉俄字典》，再查《俄维字典》。有时他查来查去，没有查到。为了省事，他们常会随便译上一个不恰当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极大的耐心，既要不厌其烦的反复解释，又要鼓舞他们的情绪。他们查字典查不到，我就帮他们查。

“此外，我们还要照顾到翻译同志在学生中的威信。例如哈斯木，最初学生对他意见很多，要求调换。有时学生当场指出他的错误，使他下不了台。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把哈斯木翻译的责任，由我自己担当下来，说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并且告诉学生，哈斯木确实已有很大的进步，将来可以有更大的成绩。下课以后，我另外约哈斯木个别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当他知道我在学生面前如何照顾他的时



候，就会使他更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业，增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团结。”

关于具体的培养过程，王殿兴说：他最初先给哈斯木解释了一些一般常用的畜牧名词，如“营养”“饲料”“乳腺”“乳静脉”“分娩”“妊娠”“性成熟”“发情”“品种”“调教”“卵细胞”“胚胎”“鉴别”“系数”“指数”等，哈斯木懂得了这些名词以后，他就容易了解这门课程大概包括哪些内容，然后再把与《农畜繁育学》有关的名词如，“有机体”“遗传性”“变异性”“获得性”“繁殖”“培育”“育种”“杂交”“有性杂交”“无性杂交”“同化作用”“异化作用”“新陈代谢”等解释给哈斯木听。但当时的困难是，即使哈斯木懂得了这些名词的意思，也不一定能找到适当的维吾尔文名词，因此必须再查字典，或者去问其他经验较多的民族翻译。为了使哈斯木容易记忆，王殿兴就帮他写了一个“名词记忆本”。王殿兴用汉文正楷写，哈斯木把它们一一译成维吾尔文。王殿兴写的时候，尽可能写得系统化，把同一类的名词写在一起，例如“羊毛的构造”“毛囊”“脂肪腺”“毛乳头”“粗毛”“细毛”“落毛”“两型毛”等，都属于羊毛一类，就写在一起，以便哈斯木容易调查。王殿兴写讲稿时，也全部用正楷，少用长句深句。多用短句浅句。王殿兴说：“我们平时写行草惯了，一旦要写正楷，又慢又吃力。但用正楷写，哈斯木容易认识，并且容易据此翻查《华俄字典》。但假如我永远只写正楷，他就永远只认识正楷，所以，隔了一个时期，我在讲稿上慢慢写上几个草字或简笔字。一年以后，我写的草字他已认识了80%，到现在，我写草字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了。”

在每次讲课以前，王殿兴都和哈斯木在一起备课，先由哈斯木把一些新的名词查出来，记在他的“名词记忆本”里面，然后再看讲稿，把不了解的地方提出来，由王殿兴解释。解释工作有时进行得很复杂细致，王殿兴举了一个例子说：“由于哈斯木同志最初不懂百分比如何计算，因而不不懂如何计算‘含脂率’，我便先使他懂百分比如何计算。我先举例子问他：现在有一百个学生，内中维吾尔族50名，回族50名，我问他维吾尔、回族学生各占学生总额百分之几？这他很容易回答：维吾尔族学生占50%，回族学生占50%。但是我又问他，



现在有7个学生，其中维吾尔族4人，回族3人，各占百分之几？他就说不出来了。这样，我就告诉他如何算法：一个是 $\frac{4}{7} \times 100$ ，一个是 $\frac{3}{7} \times 100$ 。当他懂得如何计算百分率以后，然后再引导他计算含脂率。”

在备课时，常常有些问题王殿兴讲了好几遍，哈斯木实际上并没有懂，可是觉得不好意思，只好说懂了。王殿兴为了试验他到底懂没有，就提些问题反问他。哈斯木说，懂是懂了，只是还不能用汉语表达出来。最初王殿兴信以为真，可是后来发现学生问哈斯木时，哈斯木答不出来，王殿兴才知道哈斯木并没有真懂。王殿兴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恳切地劝导他在每次备课后，用汉语说一遍给我听一下。他最初说的时候，也确实困难，例如把‘吃饭’说成‘饿了’，有时文法说错了，有时发音发错了。发音发错了，我就用国音字母给他拼，文法错了，就帮他更正。困难虽多，但我总是一直帮助他到他真的懂了时为止。”

1956年3月，喀什。

教学结合生产

——八一农学院访问记

我访问了新疆学院以后又访问了八一农学院。这一个农学院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的。它一方面成为了新疆生产部队和新疆各族农民的技术顾问，另一方面又是大批培植新疆农业生产技术骨干的专业学校。它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从部队抽调出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参军的青年，当我在新疆很多地方的部队农场访问时，经常遇到这个农学院的教师带领着学生在那儿进行生产实习。这个农学院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这一教育方针的推行和前文叙述的新疆学院对于民族师资的培养，是新疆高等教育中两个比较突出的教学特点，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绩。

我在八一农学院访问时，主要是要了解他们“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这一个教育方针的实施情况。八一农学院现分农学、林学、水利、土壤改良、畜牧兽医、农业经济五系和一个农业机械班。我先后访问了在该校担任昆虫、园艺、棉花、牧草、水利等课程的





教师。农学系的教师朱懋顺自从1952年八一农学院成立以后，几乎历年都带领着学生到部队农场进行生产实习。他们一年之中有半年在农场里；一般是3月底或4月初下去，一直到秋收以后才回学校。朱懋顺同志说：“生产实习对教师、学生和生产部队，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当教师的，通过这种生产实习，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来充实我们的教材，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对于学生来说，生产实习不仅可以使他们在课堂里、书本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生产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而且通过一次生产实习，可以使每一个学生对农业生产上从播种到收割的生产程序，能够完整地加以掌握。对于我们去实习的部队农场，他们不仅不感到是一种负担，正相反，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习。他们感到我们去实习对于他们也有很多帮助。学生每次到部队里去，总会带一些新的知识去，从而提



植物专家在田野调查植物分布

高部队的生产技术。很多战士都得到学生的帮助和指导，所以在部队里，战士都叫学生为‘老师’。生产部队和八一农学院成为血肉相关的两兄弟。农学院利用部队农场的各项条件来训练他们的学生，搜集实际的资料以丰富教师的教材，同时农学院的整个教育工作又都是为新疆的生产部队，更广泛地说，是为新疆的农业生产而服务的：帮助部队农场解决他们生产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为生产部队培植大批的技术骨干力量，研究新疆农业生产上的重要问题，并根据研究的结果更进一步地改进新疆的农业生产。”

下去实习时，教师先把学生带到师、团，先由师、团首长介绍一般情况，然后再把学生分配到连。那时地上还没有化雪，学生分配到连以后，就立刻参加部队即将举行的对于备耕的检查工作。这种检查工作对学生有很实际的教育意义：使学生看到哪些处理是合理的，哪些处理是不合理的。例如有些单位把播种机不加遮盖就放在露天里，这样对农具保管就是不好的。有些单位把种子堆在阴湿的地方，也是不好的。检查种子的发芽率时，先用一个碗，盛着沙，放着水，把种子放在沙里，然后把那些碗放在火旁边（按照技术要求，气温应在摄氏20度左右，火旁边一般有15~16度），一般三四天就开始发芽。10天之内检查发芽率的高低，一般都在80%以上，但也有只达到20%或30%左右，这就因为种子收时较湿，后来没有晒过的缘故。遇着这样的情况，就必须换种。在检查各项农具的准备工作时，检查在两个桶的旁边是不是已准备着一根扁担？之字耙的螺丝是不是松了？耙齿的方向是否一致？播种机有没有安装好？锄和锨够不够锋利？朱懋顺同志说：“这些小问题，我们过去本来也不大注意，后来看到苏联专家提托夫检查工作时，非常细致，连这些小地方也都一一检查，我们后来也就学习他的先进方法，小地方也不放过。”

1954年起，八一农学院农学系的棉花和粮食两个专科规定每一个参加生产实习的学生都要负责两百亩丰产作物的技术工作，地上化雪以后，学生就纷纷下地，先划定自己的丰产田的面积，了解田地的种植历史，然后就把这一块地的土壤做许多剖面测定，分析这块土壤的质地和结构，过去的耕作情况、肥料翻埋情况和墒度情况等，以便掌握今年耕作措施的参考，并据此在一个星期内拟定出自





教师指导人民解放军生产部队在田间喷洒杀虫药

己的生产实习计划，实习学生不能离开部队单独去搞一套，因而他们的实习计划必须在连的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制订出来。学生的计划须先送给连看，并由带领实习的教师批准。一切技术措施由学生提出，但仍由连领导。

计划批准后，就立刻开始工作。这时正是进行春耙的时候，学生要首先检查耙地的质量。按照要求，要对角线耙地，耙到4~5厘米深。假如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学生就得要求连里再耙。但是春耙是一项突击的和十分细致的工作：地还湿，不能耙，因为一耙反而耙成沟痕；地干了，又失去了耙地的意义。对丰产会有影响。最好是在地面上稍稍有一些干的时候耙。所以在春耙的时候，必须随时侦察，随干随耙。在耙地的时候，学生进行着科学的测定工作。例如用温度表来测量已耙地和未耙地之间的不同的影响：耙了的地，土松了，容易吸收日光，因而地温较高；没有耙过的地，地温较低，一般要相差一度



到两度。科学的测定工作，可以使学生在书本上获得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完全得到了证实。

接着就是春播，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对于这一年的整个生产来说，这一场战斗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我们现在以种棉花为例：春播前第一步工作是棉籽处理，如晒种，药剂拌种，都由学生指导处理并亲自操作。因为要提高产量，促使棉花提早成熟。部分棉籽用春化处理。在最初一个时候，部队还不会处理种子的春化工作，所以由教师作总的指导，学生做具体工作，部队则跟着学生学习春化的技术。种子春化时，一面加温，一面喷水。学生通过实际的操作，获得很多实际的经验。例如喷雾器必须事先检查，否则如临时发生障碍，不能给种子喷水，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水的供应也要注意，在大规模的春化情况下，水的需要量是相当大的，种子在春化的过程中不能临时缺水。朱懋顺同志举了一个实例说：“1954年我们在乌拉乌苏农场做春化工作时，把两口井的水都用完了，早春渠水因山雪未融，水源枯竭，意外地发生了水荒。部队紧急动员全团的战士用脸盆和木桶从一两里路以外供应水源，才算安全渡过困难。那次虽然没有造成事故，但已经搞得非常紧张，这都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事先估计不够充分的缘故。像这样的经验教训，在教室里是讲不出的，而且也是意想不到的。经过这样一次实际的经验，将来再拿到教室里去说，就更生动具体，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了。”

在播种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播种的质量。学生不是仅仅在田里看一下就算，还要跟着播种机走；这时有些值班的同学满身扎了50~60厘米长的芦苇短杆，假如播种机有漏播的地方，就随时在漏播处插上一根苇子，以便补播。另外一些学生还要检查种子的深度和密度。一般要求1米地播70粒种子，假如距离这个标准太多或太少，就要停机检查。还有些学生在棉田地上进行种子拌沙的工作，使种子能够均匀地播下来。再有一些学生则参加农机的技术测定，实习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在紧张地工作着。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每经过一个段落，就要做一次总结。春耙以后要做一个春耙总结，春播以后又要做一个春播总结等。累积各阶段总结后，最后还要做一次生产实习总结，全面地运用实习中所搜集的



材料加以分析。这种总结，对学生学业的提高，帮助很大，因为他们亲自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理论联系了实际，对于许多问题更容易获得深刻的体会。

春播完毕以后，就进入田间管理的阶段。当棉苗稍稍显行的时候，就要中耕，以便提高地温。接着进行查苗补苗。棉株已生长一两个真叶时，就要间苗定苗。部队每年都有新来的战士，学生就做了几十根尺子带领这些新来的战士做这些工作，教他们怎样的苗算好苗，怎样的苗算坏苗，以及怎样留苗。一般的中耕、追肥、整枝、灌溉等实际操作，都由部队担任，学生的任务主要是掌握技术，例如中耕的深度、追肥的时间、整枝的时间、田间的墒度、要不要灌溉等等，都由学生掌握，并和连长商量执行。学生对于作物的生育情况也须及时记载，以供连、团的参考。但在这一个阶段里，学生和部队之间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经常会有些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程序是，学生把提出的意见先交小组长，再由小组长报告教师和连长。连长对学生提的意见，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连长不接受时，小组长便再向教师反映，假如教师同意学生的意见，就向团提出，团调查后，再做出决定。但是这样的程序，有时会引起连的意见和误会。因此教师和学生深切地感到：要使连信任学生，首先要自己做出成绩来，有了成绩，部队对自己自然信任。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当棉苗生长后，蚜虫也出现了，接着就要展开防虫的工作。杀虫药水按规定是用烟草0.5斤、熟石灰0.5斤、水60斤的比例配制的。但是1954年农学院的学生在玛纳斯河流域某一个部队出场实习时，发现如法配制的药水，效果只有10%。学生很着急。后来经过反复检查，才知道烟草还是1952年的，因而性能不足，学生建议改变配制的比例，改为烟草1斤，熟石灰0.75斤，水30斤，以加强药水的效力。但是连因为这个比例是上级规定的，不同意改变。学生就反映给教师，教师和团都同意改变配制的比例。后来按照学生所提的办法重配以后，杀虫药水的效力提高到82%，那一个农场的蚜虫因此得以基本消灭。同年还有一个例子：那年玛纳斯河流域垦区在苏联专家提托夫的指导下，要求把灌溉的方式从沟灌再提高为细流灌溉。在苏联，细流灌溉是用橡皮管子灌溉的，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农学院二年级学生刘世伦，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块



小木板，把木板插在每一条沟口，在木板上开一个小孔，水由小孔里慢慢流进来。最初战士们对这个办法都认为没有什么意思，不好。但是刘世伦整天地在田里试验的结果：

普通沟灌 一人一天可放水 11.2 亩地

用有孔木板细流灌溉 一人一天可放水 14.4 亩地

用刘世伦的设计进行细流灌溉，比普通沟灌的效率提高 27%。刘世伦并因此得到师、团的物质和名誉奖励。1955 年，农学院的学生朱光熹、汤剑夷、杨宝丰三人认为原来的单管喷雾器所花费的劳动力太大，建议连里修改，并由他们三个人合力设计，在教师张学祖、张新寰的指导下，把八个喷雾器放在一起，用马拉，在轮子上做杠杆，利用轮子走动，杠杆一上一下，进行喷雾，工作效率提高五倍。这些事实都说明，学生用实际的成绩来赢得部队的信任，从而更进一步帮助部队，提高他们的生产。

7 月麦收以前，各个农场都要做一次冬麦鉴定的工作。这种鉴定工作比较复杂，一般战士还不能担任，所以通常都由实习的学生来做。学生做这种鉴定工作时，还要连带做很多科学的分析工作。例如有些麦田每亩产量 450 斤，有些只产 250 斤，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这里面就要进行一系列的分析研究。例如用牲畜耕的和拖拉机耕的有什么不同？春耙过的和没有春耙过的有什么不同？幼苗时曾经倒伏过的和没有倒伏过的有什么不同？缺水的和不缺水的有什么不同？施过磷肥的和没有施过磷肥的有什么不同？在不同时期收割的有什么不同？这样细致的分析研究，就会使学生发现很多问题，搜集很多材料。例如经过这种分析，他们知道春耙过的土地的产量比没有春耙过的高 6.2%，这样就使学生对春耙的重要性更增加了认识，并使他们以后指导他人春耙时，可以用这种具体的事例来说服他人的反对。

科学的分析研究工作贯彻在整个的生产实习里，而教师则负更大的责任。1955 年春天，某些农场的冬麦死亡率很高，部队就问教师：要不要翻种？当然，究竟翻种不翻种，这个问题应该由部队自己决定，但是带领着学生到部队农场实习的农学院教师，他们同时担任着师或团的农业生产委员，对于部队提出来的疑难问题，应该负责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教师的意见会很大程度影响部队的决定，因而教



在生产一线进行土壤分析

师们在回答这种问题时，感到所负的责任很重。但是这种问题既不能完全依靠理论和书本，也不能完全依靠过去的经验，主要要调查现场的情况，根据实际的情况再作决定。教师根据所得到的材料，认为那年有些冬麦的死亡，主要是由于耕作技术不当所致，因而加重了冬麦受雪腐病的危害。教师一面分析研究，一面把怎样测定分蘖数和分蘖节入土深度的方法以及如何检查雪腐病的方法告诉学生，叫学生也到现场进行调查。学生通过实际的工作学会了怎样测定的方法，同时他们测定以后也可以提出他们的意见。学生测定的结果和教师测定的结果一致，这就更加强了材料的可靠性。教师根据调查的材料，认为有些分蘖还可发芽，只要加强田间管理，可以毋须翻种。他们提出加强田间管理措施后，结果每亩获得了200斤的产量。在新疆，不仅1955年发生冬麦死亡的现象，过去也经常发生冬麦死亡的现象，所以教师不仅具体地帮助部队解决了那次要不要翻种的问题，而且通过实际的调查，搜集了很多资料，以便回学校以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八一农



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根据教师们的实习报告，就把这个冬麦死亡问题列为1956年的研究题目之一。这种研究工作既可提高教学的质量，又可为新疆农业生产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八一农学院师生在部队农场进行生产实习，对部队生产和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很多贡献。1955年春天，教师关晋桀和学生郭宽子经过多次的挖掘，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在秋耕秋灌地的田埂的南坡三厘米至五厘米的地方，藏有棉铃虫的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过去一直找不到棉铃虫的蛹究竟潜藏在什么地方。一个蛹一般可产800个卵，假如能及早消灭一个蛹，就等于消灭了800个棉铃虫。后来部队即照这个经验在全师展开了挖掘棉铃虫蛹的工作。另外昆虫学的教师张学祖在荒地调查时，发现在一种紫草科植物上有棉铃虫的寄生。根据这个发现，再检查棉田中的紫草科植物上也同样有棉铃虫的存在。过去以为棉铃虫都在天仙子植物上，这时才知道紫草科植物上的棉铃虫比天仙子上的棉铃虫还多，因而建议部队农场消灭棉田中的一切紫草科植物。

八一农学院教师通过指导实习，对提高苜蓿产量和利用芦苇做青储饲料，也是有贡献的。在北疆一带，通常苜蓿只能年收两次。但根据八一农学院的试验，认为可以年收三次。在苜蓿每次开花时收割，不仅可收三次，增加产量，而且质量也好，因为开花时收割，质地较嫩。1955年在玛纳斯河垦区中推广后，原来每亩年产800斤的，可以提高到年产1000斤以上。有的甚至可以年收四次。关于利用芦苇做青储饲料，1954年夏天也试验成功，在部队推广时受到广泛的欢迎。当芦苇长到七个叶子或八个叶时，割下侧成约2~3厘米长。入窖密封，使之自然发酵，产生乳酸，牲畜吃了很容易消化。新疆各地的芦苇很多，用芦苇做青储饲料，既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又可减低牲畜饲料的成本。假如用玉米秆做青储，每100斤的成本约为一元，但用芦苇，每100斤的成本只有三角。1954年把芦苇青储喂养乳牛的结果，提高了乳牛产乳量的26%，现在南疆有些地方也在推广这个经验。

我在八一农学院访问时，访问了教师以后，又访问了农学、林学两系的好几位同学。他们过去大都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进了八一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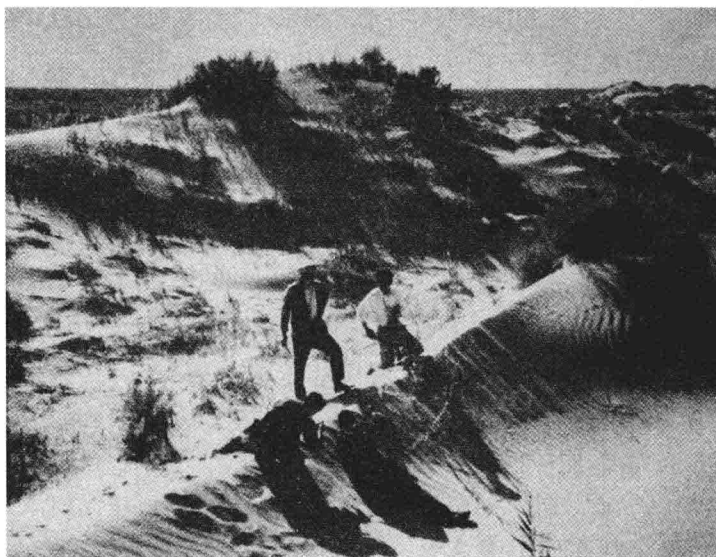


学院以后，最初虽然从书本上获得了一些理论知识，可是初下去实习时，还是经常闹笑话，许多具体问题一下子摸不到头绪。后来经过亲自操作，才一步一步把实际和理论联系起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增加了很多实际的经验。他们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说明八一农学院的“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对于他们有很大的益处。农学院四年级的方孝庭同学说：“有很多问题，虽然书本上也说到了，教师在课堂上也讲了，但不经过实际操作？还是搞不清楚。书本上说的只是一般的原理，具体做时，还要灵活处理。”例如喷药，书上只说用药水喷杀蚜虫，但怎样喷法？什么时候喷效果最好？这些问题书上都没有说明。他们经过实际的摸索，知道早上喷要比中午喷效果好些，因为早上气温低，大气下降，喷的药水容易下沉。到了中午，地上晒热了，空气上升，药水就不容易下沉。要是经常在棉田中杀虫，就会摸索出害虫究竟在棉花的上部、中部或下部，例如盲椿象一般都在棉花嫩的地方，而红蜘蛛开始在棉花的下部，后来则慢慢爬到了棉花的上面。喷药时，假如只是一面走，一面喷，这样还是打不死蚜虫，要来回往返地喷，“生长点”上还要特别多喷些。方孝庭同学还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喷药时，正巧前一天田里刚刚灌过水，地没有干，按照他们原来的规定，一亩地是喷三斤六六六，但那次他们一亩地喷到五斤上下，这就因为地湿不好走：走得慢，药也就费得多。这种经验只有从实际操作中才能体会到。

又如绿肥的问题，书上只说绿肥可以肥土，以补畜肥的不足。但绿肥的肥力如何计算？书上没有谈到。后来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实际学习了如何测定绿肥肥力的方法。他们计算出每一平方米内茎叶和根的重量，然后得出每亩的重量，也就是测出每亩可产多少肥力。绿肥开花的时候，肥力最大，所以通常都应该在绿肥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翻入土中，因而测定绿肥的肥力，也应在它开花的时候测定，而不是等它结了荚再测定，这些他们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实际的经验。

书本上说：小麦如灌水过多，茎秆因之发软，麦秆容易倒下。假如小麦在灌浆时期（乳熟时期）倒下，对于产量就将有较大的损失，因为麦秆倒下以后，养分就不容易充分输送到麦穗中去。有一次方孝庭他们看到一块地里的冬麦都倒了下来，他们就问战士：这块地上的

八一农
学院师生深入
沙漠研究沙丘
运动规律



冬麦是不是在同一个时候倒下来的？战士说，有一部分地方的冬麦是在拔节时（即开始长茎时）倒下的，有一部分是在乳熟时期才倒下的。在那次收割的时候，他们就把在拔节时候倒下的、在乳熟时期倒下的以及没有倒下的冬麦，每种取一平方米若干点，做了一次比较研究。结果是：假如没有倒下的代表正常，作为100，在拔节时候倒下的，仅损失5%，而乳熟时期倒下的，损失达到58%。方孝庭同学说：“书上说到小麦如倒伏，产量有损失，也曾说过，某种情况的倒伏，损失小，某种情况的倒伏，损失大，但是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大到什么程度？书上没有说明。我们经过这次分析实验，就得到一个概念，同时也就知道，在小麦灌浆时候，对于小麦的灌溉以及田间管理，都应更加注意。”

农学系的学生都学过农机（包括拖拉机动力和农具部分）和植物栽培这两种课程，而进行中耕时候，就要把这两门课程密切地联系起来。关于中耕器入土的角度，书本上只说：入土的角度愈大，翻土愈深，但在调剂中耕器的深度时，究以何种深度为切当，书上就没有说明了。理想的中耕是：前面中耕器走过，开成一沟，后面覆土器走





过，就把两旁的土覆盖，正好把地盖平，而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地，就只有通过实际操作，逐步摸索。又如中耕时，要经常注意马的休息，不使过分疲劳，而这种地方，书本上是根本没有提到过的。

方孝庭同学叙述了很多的事例以后，总结他和他们一班同学的学习时说：“我们经过四年来在八一农学院所受的训练，现在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并且把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服务。我们初进八一农学院时，对于农业生产什么都不懂，这几年来在党的培植下，我们成长起来了，我们就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全力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我们现在都在准备我们的毕业论文，而我们在选择我们毕业论文的题目时，首先考虑的一点，就是在部队农场中是不是存在着我们打算研究的那个问题？我们最主要的是想把我们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一些具体问题上去。例如我们有一位同学搜集了车排子、炮台、乌鲁木齐一带的气象材料，他搜集这些材料的目的，乃是使他自己可以独立思考来研究一个问题，而他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北疆的棉花播种期究以怎样一个时候为最适当。我们现在要使自己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独立思考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我们这一班在1956年都要毕业，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在技术上、工作上、思想上全面地准备自己，希望毕业以后走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去，为发展具有无限前途的新疆农业生产而努力。”^①

^① 本篇报道，原书未注明写作时间与地点。

新疆远景

新疆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但在过去的岁月中，它一直沉沦在冷落的被人漠视的命运里。它的土地辽阔，但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不多；它的景色壮丽，但称道并欣赏它的景色的人很少；它的物藏富庶，但认识它开发它的人更少。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大片土地逐渐活跃起来，它逐渐受到人们的注意，为很多爱国青年所向往，并被一致地认为它有着极大的开发前途。它的突出之点，不仅是由于它的土地广大，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具有多方面的开发价值。

新疆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地区。在将来，新疆也永远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农业基地。谈新疆的农业，得先谈新疆的水利。自古论新疆的人都有这样一句话：有水斯有土。在农业生产上，灌溉地区是最可珍贵的农业地区，因为水受人力的控制，不致遭受天然灾害；而新疆的农作区几乎都是灌溉地区。新疆每年究竟有多少水量？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文资料很少。这几年来，陆续在各大河流设立了60多个水文站，今年计





划再增设 100 个水文站，到今年冬天，大体上可以估算出一笔水利账来。按照目前的估计，新疆全年地面上的水量约为 600 多亿立方米。除了地表水以外，新疆还有着巨量的地下水，将来也需加以利用。但新疆的地下水究竟有多少，必须先做好水文地质调查工作，而且要把新疆的地下水源全部搞清楚，才能算出这笔账来，目前还不容易估计出一个近似的数字。

这些水能够灌溉多少土地，首先决定于一亩田要消费多少水。这就牵涉到土地的灌溉和水的管理是否科学合理的问题。目前新疆水的浪费是很大的。一方面是灌溉浪费，一方面是损漏很多。苏联水利专家沃洛宁 1954 年在新疆玛纳斯河流域视察时报告，包括渗漏和蒸发等损失在内，每亩地消费的水量约为 750 立方米。但是这每亩消耗 750 立方米水的计算，按照近几年来观察，其中只有十分之三上下真正灌溉了土地，其余十分之七上下都是走漏损失掉了。我在 1955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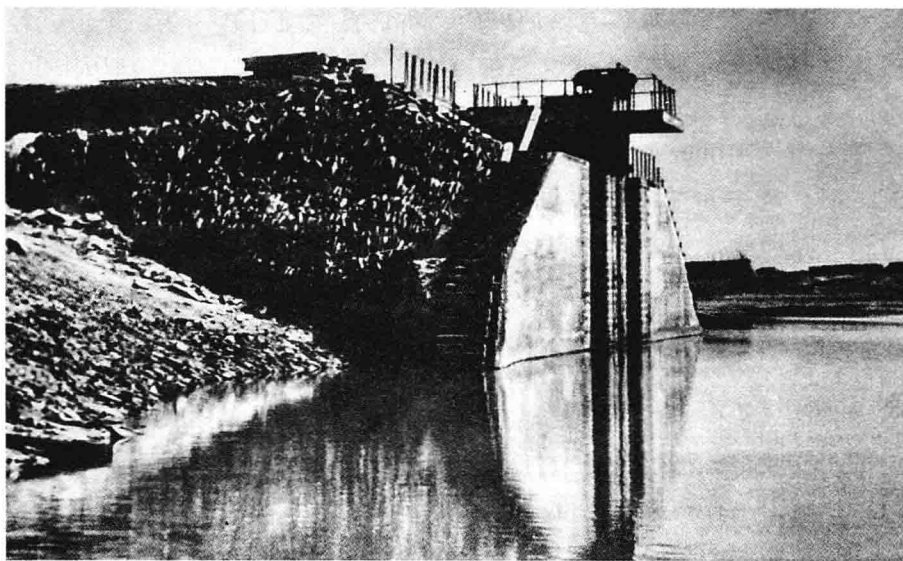
新疆天池风光





27日的《新疆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玛纳斯河和奎屯河的水约80%都是流失了的。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管理的日益加强和农业技术的日益提高，国家对水的管理必将逐步提高，灌溉日益合理，每亩的平均用水量可望逐步降低，同样数量的水将来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土地。例如乌鲁木齐河的水量，在新中国成立前灌溉6万亩土地还嫌不足，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上游兴建了水库，又用石块补砌渠道，减少了渗漏，现在已经可以灌溉23万亩土地。新疆的全部面积为17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25亿亩，其中可耕地，过去一般的估计是1.1~1.2亿亩、近来估计约为2亿亩。假如一方面增开水源，加强水的管理，一方面合理灌溉，减少水的浪费，新疆的水和新疆的可耕地，大体上也还是可以求得平衡的。

到1955年底，新疆全区的耕地面积是2552万亩，播种面积是2238万亩，预计在12年内要开荒6000多万亩，到1967年，新疆的耕地面积将广大到8600万亩，播种面积扩大到7500万亩。但要扩大耕地，须先兴修水利。为了要把不用的水蓄起来，以使用之于需用之时，就要建筑很多水库；为了要把水从它所在的地方引送到需要它的地方，便要建筑一系列的渠道；为了要进一步利用地下水源，将来还要更多地运用坎儿井、自喷井和深井抽水等等方式。现在新疆正在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全自治区的河流普查工作。编制流域规划，新建和改建各项水利工程，以创造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现在我在这儿谈一些简单的轮廓，先说天山北麓。天山北麓的主要农业地区之一是玛纳斯河流域垦区。这个流域东起玛纳斯县的塔西河，西至乌苏以西的四棵树河，可耕地约为500万亩。在这一流域里，将修建一系列的水库。目前已修好及正在修的，从东往西，有大泉沟水库（蓄水4000万立方米）、车排子水库（蓄水2000万立方米）和柳沟水库（蓄水7000万立方米）。计划要修的有夹河子水库（蓄水1.2万立方米）、蘑菇湖水库（蓄水2万立方米）、安集海水库（蓄水5000万立方米）、奎屯河水库（蓄水4000万立方米）和钟家庄水库（蓄水2000万立方米）等。这些水库，预定在1960年前都要修完。天山北麓的另一个农业区是乌鲁木齐河流域。这一流域东起奇台，西至玛纳斯县，可耕地约为400~800万亩。在这一地区，已修了红雁池水库（蓄水5000万立方



新疆红雁池蓄水库的低水位放水闸

米)、猛进水库（蓄水 6500 万立方米）和八一水库（蓄水 3000 万立方米）。还要修头屯河水库、三屯河水库以及乌拉泊水库。另外可能再在达坂城修一水库，但那是打算给吐鲁番地区送水的。在天山南麓，计划中的大工程之一是开都河的改道。目前开都河的水流入与焉耆东面的博斯腾湖，再由博斯腾湖经哈满沟流入铁门关以南的孔雀河。博斯腾湖沿湖一周约为 300 公里，开都河的水在这个湖里绕一个圈子，要半年以后才能流入孔雀河。博斯腾湖的湖面很广，水的蒸发量很大，从开都河流入湖水的水，三分之二以上都被蒸发掉了。同时，湖的水位高，开都河下游和沿湖地带的地下水位也即随之提高，从而增加了土地碱化的程度。目前计划在焉耆西面的阿拉毛墩地方开一条新河，把开都河水直接引入孔雀河。这样，一可以避免河水因盘旋于博斯腾湖而被大量蒸发，二可以降低博斯腾湖的水面，使滨湖地区增加 100 万亩左右耕地，三可以降低开都河下游的地下水位，减轻那一带土地盐碱化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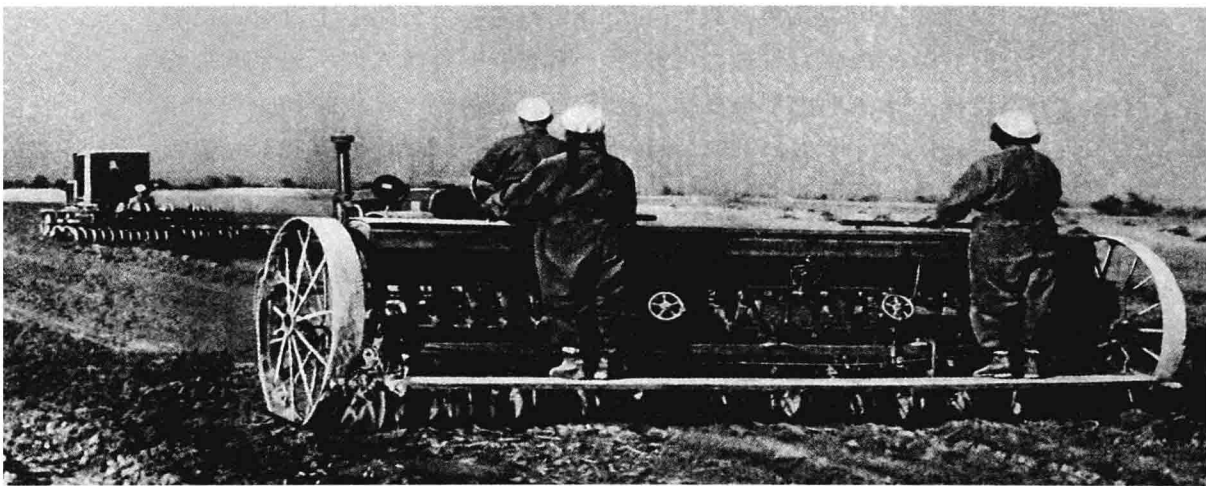
开都河水直接流入孔雀河以后，将从孔雀河再开一条新渠道，经过尉犁县的东面流到从尉犁到若羌之间的铁干里克一带。在历史上，那一带曾经有一个时期，也是一个水足草秀，农牧并茂的地方，后来由于塔里木河的改道，水走了，土地遂被遗弃荒芜。计划中的新渠道开辟后，那一带的土地将重新苏复过来，估计将可开垦300万到400万亩。这条新渠道将长达200公里以上，河面宽，流量大，将来并且可以通航。

在开都河的上游，将建筑一个大水库，称为裕勒都斯水库。水库的库址已经找到。目前全国水库的库容以官厅水库为最大，计21亿立方米，造价也以官厅水库最低。计划中的这个裕勒都斯水库，库容和官厅水库相似，但造价比官厅水库还要低些。此外，当把开都河水通过铁门关引入孔雀河时，也将利用地形发电。

天山南麓的另一个大计划是要使阿克苏河流域和渭干河流域连接起来。阿克苏河的水量较大，它的年净流量有60多亿立方米。目前生

横跨开都河的九十余孔的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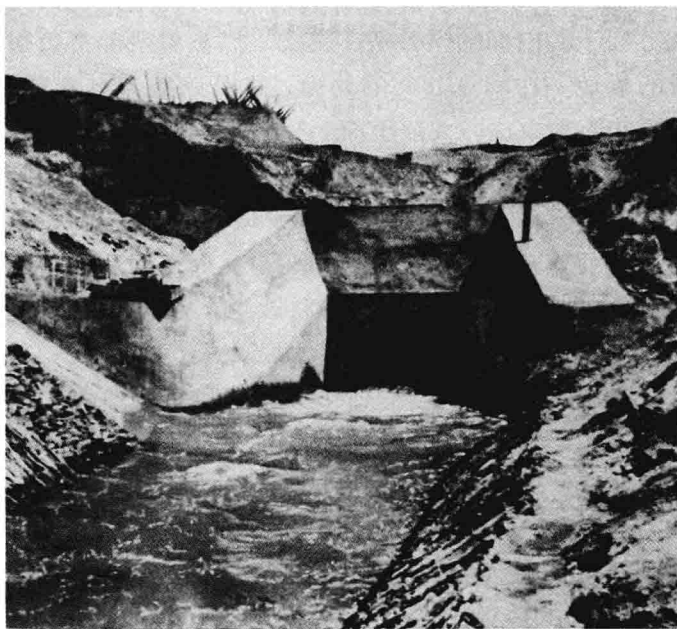
人民解放军用拖拉机开垦荒漠使原野变成了良田

产部队在阿克苏河的西面开了一条长达一百多公里的胜利渠，把阿克苏河水引到沙井子和哈拉库勒一带，开了三个胜利农场。还打算把胜利渠的水引到阿克苏河下游南面的乌鲁桥一带去。胜利渠全部将负担灌溉大约100万亩的耕地。在阿克苏河的北面，即从阿克苏、温宿、拜城，一直通到沙雅和新和，这一大片土地上有1000万亩以上的荒地可以开发。计划中要从阿克苏开一条长达300公里以上的渠道通到库车。这条新渠道规模很大，它的流量将达到100~150秒立方米，将来也可在渠道中通航。目前库车到阿克苏的公路，是从库车西北翻山经过拜城县到达阿克苏的。这条公路线不久即将改道。新路线将向南移，离库车后即向西南方面通到阿克苏。改线的目的是为了更便利这一大片处女地的大规模的开发。同时，将来在库车还要修筑水库，并把新的渠道继续东开，一直延伸到尉犁。

以上就是在可以望见的短短几年以内将要实现的天山南北改变自然面貌的巨大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个伟大的改造自然的计划，在天山的北麓，从奇台到精河这长达600多公里的一长片原野上，将有自有历史以来荒芜至今的一千几百万亩土地，被开垦变为良田。仅仅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几年，我们在天山北麓这一条公路上走过时，已看到公路两旁的面貌有着很大的改变。那一带不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荒漠连片，很多地方都已变成了肥沃的棉田和粮田，作物和防护林给人们带来了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翠绿的颜色。很多地方出现了一幢幢新式的建筑，夜晚走过还看到闪闪耀目的电灯。要是再过五年十年，这一带必将出现更多的规模巨大的国营农场和新的农庄，水库和渠道将接连成为一个有机的灌溉网。公路和电线四通八达，将成为这一片土地上无数活血的脉络。不仅农牧产品有巨量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

在天山以南，自然面貌的改变将比天山以北更要显著突出。在阿克苏河、渭干河和塔里木河这一块三角地带，一向是一片苇湖、草滩和丛林的处女地，现在将被英雄时代的英雄人们英勇地开垦出来。另外，从尉犁到铁干里克那些素来被人遗弃的地方，由于新的渠道的修建和巨量土地的开发，不久将会出现新的城市。两地的垦荒工作，都



水利工程放水涵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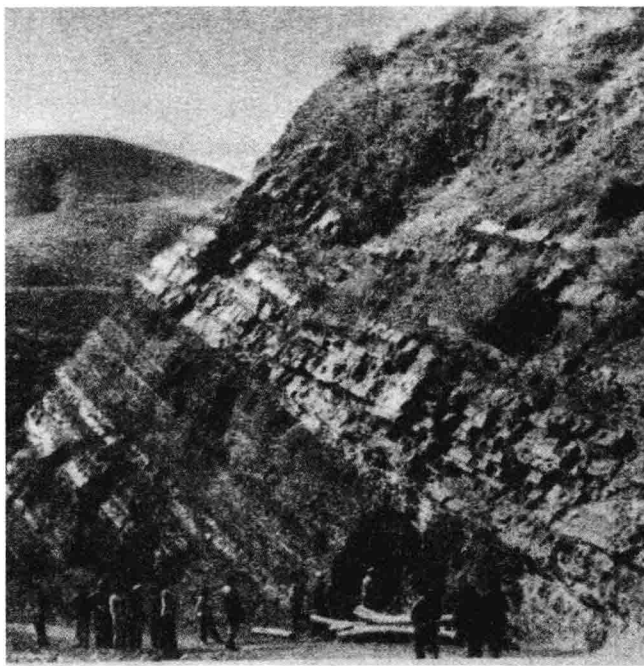




将在规模巨大的、完全正规化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的情况下进行。而且由于那些地带过去荒无人烟，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将不会发生任何土地纠纷问题。开都河的改造工程1956年即已着手进行，从阿克苏开一条新渠到库车的计划，1957年就要进行。这些计划实现以后，那两个原来是荒芜冷落的地方，将变为富庶热闹的地方。这确实是巨大的可以自豪的历史改变。将来还有可能从阿克苏河流域通过新建渠道，一直通航到开都河流域，这也是前人做梦也不会想象到的事情。至于那条历史上久享盛名的塔里木河，在这伟大的改造自然的计划下，也将改变它的命运和地位。这一条河将来虽然仍将存在，但是不再成为南疆的一条主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也将负担起新的历史任务：它主要将成为那一带巨大的农业区的一条总排水道，并容纳来自天山的特大洪水。

根据上面所谈的轮廓，可以预见到新疆农业生产上的广阔前景。到1967年止，新疆年产各种粮食共达205亿斤。7500万亩的播种面积中，棉田面积将为1500万亩，1967年棉花的总产量约为16亿斤皮棉。在作物的品种上，除了小麦、棉花、水稻、玉米、高粱以外，还要扩大大豆、油菜、芝麻、薯类、甜菜、烟叶、麻类等作物的种植。棉花生产中，长绒棉将占到10%左右。新疆的瓜果也是有名的，要大大发展葡萄、哈密瓜、苹果、香梨、桃、杏等的园艺生产。瓜果的种植面积要从1955年的65万亩扩大到1967年的550万亩。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使新疆有能力解决将来自治区内数倍于今日的人口的粮食、瓜果和蔬菜的供应和将近6000万头牲畜饲料的供应，并有条件供应一部分轻工业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原料，为新疆大规模发展工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新疆地域太大，国家的地质勘测力量有限，对于新疆的地质调查工作还是一个开端；要把新疆地下资源估算出一笔初步的账来，也还要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对于新疆工业建设的远景，现在只能谈一个轮廓。先说石油。新疆的独山子油矿已有20多年历史，人们很早就知道新疆出产石油。最近在准噶尔盆地的西部、独山子北面约160公里的克拉玛依地方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油田，引起了全国极大的注意。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简单，油层浅，油出得快。关于这一个油区的开发



新疆的煤炭资源

前景，我已在前面“访前景壮阔的克拉玛依油区”一文中叙述过了，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加速开发这个油区。公路正在积极修筑，房子正在大量修建，巨量的器材和人力正像潮水一样从各地输送进去。不要很久，在那荒芜的原野上就将出现新兴的石油工业城市。但在新疆，石油资源并不仅限于天山北麓，从乌拉斯台经独山子到安集海以至更东这一条山前洼地线和从克拉玛依到乌尔禾这一个地台区。在南疆，在库车、拜城一带和喀什、莎车、巴楚这一个三角地带，地下都有石油。吐鲁番盆地也有石油。新疆的石油资源是丰富的，有着很大的开发远景的。

煤也是工业的主要动力原料之一。新疆煤的资源也很丰富。在天山北麓，东起奇台，西迄乌苏、精河一带，这一条煤线长达五六百公里，煤的厚度厚到100米以上，含煤系数达到18%。现在乌鲁木齐市的地下，就是一个大煤田。乌鲁木齐市过去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河





的东面，由于地形的限制，不易发展。现在再加上市区地下是一个有待开采的大煤田，这个城市将有计划地向西北移动发展。哈密地区也有煤，目前柴达木盆地用的一部分煤就是由哈密供应的。伊犁也有煤，可供将来当地发展工业的燃料之用，在天山南麓，从库车到阿克苏和从莎车到和田这两条煤线，都长达300公里以上，煤的储藏量很大。阿尔泰山一带的煤田较少，目前仅知额尔齐斯河南面的和布克赛尔山中有煤，其他散在天山南北各地的零星煤矿也还很多。将来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的一部分用煤也将要由新疆供应。

新疆铁的储量也是丰富的。伊犁地区尼勒克的赤铁矿是有名的，成分也好。在富蕴和和静也有巨大的铁矿。鄯善的硫铁质量也很好。吉木萨尔和乌鲁木齐则都有菱铁矿。到1967年，尼勒克将成为祖国最西部的一个综合性的钢铁工业基地。

除了石油、煤、铁以外，新疆还有很多矿产，如铜、铝、铅、锌、钨、锰、重晶石、盐、石膏、硫黄等等。南疆的库车、拜城、乌恰、蒲犁一带都有铜矿。尼勒克也产铜。铅锌矿的分布很广，主要在乌恰到莎车一带。焉耆一带也有锌矿。过去钻井泥浆所用的重晶石都

考察队进行田野调查





工人师傅在学习发电的程序和机器的构造

是从苏联运来的，最近在伊宁发现了重晶石矿，并已生产。至于新疆的盐，几乎到处皆是。在阿尔泰山地区，还出产稀有金属。

在轻工业方面，新疆将成为祖国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前面说到，到1967年，新疆将年产皮棉16亿斤，大约可供500多万纱锭之用，按照新疆的具体条件，不可能设置500多万纱锭。在12年内可能设置大约二百几十万个纱锭，可以消费本地所产棉花的半数，其余半数供应内地。按照现在国家的要求，一个纺织厂最适宜是设置九万个纱锭，每六个纺织厂为一组，再加上一个印染厂、一个热电厂、一个化工厂，构成一个联合企业。到1967年，新疆将建成四个组，其中一个组设在石河子，两个组设在库尔勒，一个组设在阿克苏。石河子的纺织厂1958年就要兴工。库尔勒的在1960年兴工。

除了上述四大工业以外，新疆当然还将有很多其他较大的工业。农业生产既然在一个巨大的规模上发展，必然随之要建立一些农业机械厂和拖拉机修配厂。在伊犁，将建立玻璃制造厂。在乌鲁木齐，除了现有的水泥厂以外，将再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水泥厂。为了配合南疆的发展，南疆也将建立水泥厂。在和田、莎车、阿克苏，将分别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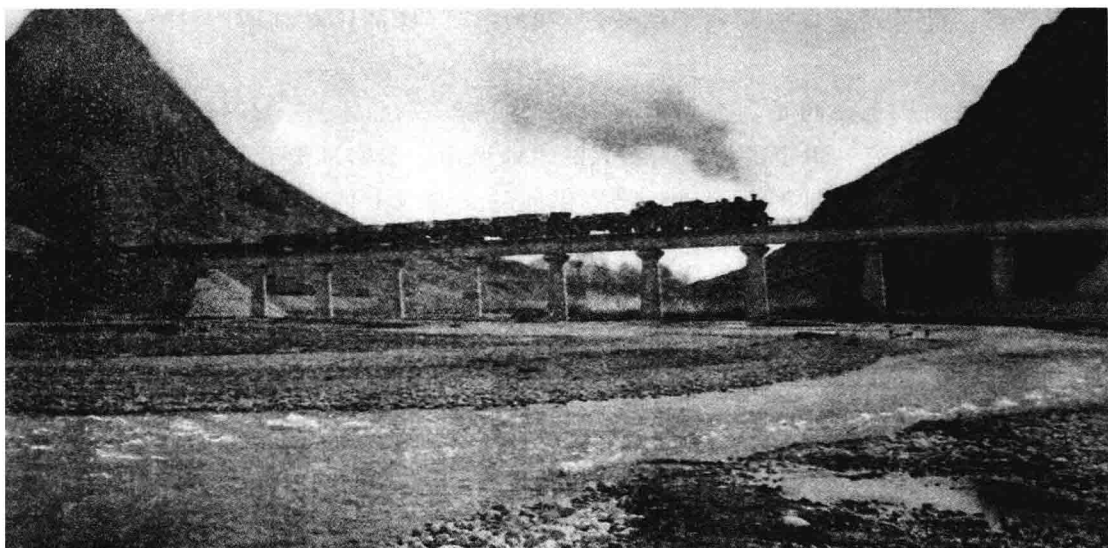


建缫丝厂。此外新疆还要修建毛纺织厂、麻袋厂、榨油厂和制糖厂等等。

将来我们从东往西看，在新疆的中路，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乌苏、尼勒克、伊宁都将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哈密地势开阔，位居新疆东口，在内地对新疆进行物资供应的交通线上估有有利条件，将来这儿会出现若干大的工厂。石河子将成为北疆的一个以纺织工业为重点的新的轻工业城市。除了纺织工业以外，由于它有着整个玛纳斯河流域垦区作为它的原料基地，因之它还可能有利制糖工业、榨油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独山子、克拉玛依和乌苏可以联成一个单位，这一带将成为石油工业及其附属工业的一个工业地带。在新疆的南路，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田将成为一条未来的工业城市线。库尔勒也是以纺织工业为中心，铁门关的水力发电对于那儿的工业建设是一个有利条件。将来莎车的发展前途也很大，因为它的燃料和水力的条件都比喀什好。在新疆的北部，富蕴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城市。

配合这样规模的工业建设，就应该有相应的电力工业。伊犁河、开都河、玛纳斯河、阿克苏河、渭干河等河，都可以水力发电。再加上火力发电，新疆将来的电力是十分充足的。

新疆地方辽阔，交通问题是自有历史以来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不要说从前骑马或步行的时代，就是有了汽车以后，在新疆旅行，也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坐运输公司的汽车，从乌鲁木齐到伊宁要走四天，从乌鲁木齐到喀什要走七天。过去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要走十二三天。可是这个历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交通问题，在12年以内大都可以得到解决。目前兰新铁路日益西进，预计1958年可以铺到乌鲁木齐，1959年可以和苏联通车。这一条铁路基本上解决了从内地到新疆的交通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将从吐鲁番延伸一条铁路，经库尔勒、库车、阿克苏而达喀什。这条铁路预期于1967年以前通达喀什。这条铁路通车以后，加上早已通车了的兰新铁路，基本上解决了新疆自治区内部的主要交通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内，还要从喀什向东修一条铁路，经过莎车、和田、且末、若羌通到新疆和青海交界的金鸿山口。由此再分两路，一路东向经茫崖和柴达木盆地的



兰新铁路永登以西的庄浪河二号桥

铁路衔接，另一路向东北经敦煌和甘肃安西衔接。另外，再从库尔勒修一条铁路经铁干里克到达若羌，这样，南疆的交通问题就全部解决，而且环成一圈，声气呵通。至于北疆，将从乌苏修一条铁路翻过天山通达伊宁。另外要修一条铁路到阿勒泰。由于最近克拉玛依油区的发现，通达阿勒泰的一线将由独山子附近延伸出去，通过克拉玛依油区而达阿勒泰。这条路线并将提前修筑。这样，北疆的交通问题大体上也算得到了解决。

目前新疆的航空交通已经相当普遍。从乌鲁木齐到兰州每星期有五次飞机；通过兰州可以和国内其他大城市通航。在自治区内部，乌鲁木齐到伊宁、到库车、阿克苏和喀什，每星期都有两次飞机。最近南疆的航线又扩展到了和田，使从和田到乌鲁木齐公路长达2400多公里的路程，乘飞机一天即可到达。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的航线最近也已开航，这样，新疆各主要城市就都能在一天以内到达乌鲁木齐。

在旧时代，由于政治腐朽、生产停滞、文化闭塞、交通阻隔，新





疆和内地在经济、文化和行旅的交往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内地来说，大多数人对于新疆的情况不了解，对于新疆真正巨大的价值不认识，并由此在感情上对新疆不关切，不向往。旧时代偶尔从新疆回返内地的人们，常常片面地夸大新疆落后的一面，以致长时期来，人们受着那些片面的不真实的传说的影响，一提到新疆，便以为那儿除了寒冷、荒凉、贫穷、落后以外，一无可取。其实，在新疆，在冬天，天山以北虽然较冷，天山以南却很暖和。像喀什、和田一带，过冬可以不穿皮衣，不穿棉鞋，比北京的冬天还暖和。就新疆的面积来说，北疆只占三分之一，南疆占到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新疆的冬天，冷的地方少，暖和的地方多，可是从来只听到人说新疆冷，很少听到人说新疆暖；即此一端，可见过去对新疆的谈论，偏而不全。又如很多人以为新疆有大戈壁、大沙漠，既然戈壁沙漠都是不毛之地，便以为那儿出产很少，地方很穷，生活很苦。实际上，新疆地利之肥，矿产之富，土地之广，前途之大有可为，都是极其吸引人心的。虽然改造沙漠戈壁要花很大的力量，但目前新疆除了真正的沙漠戈壁地带以外，等待着人们去开发的处女地还很多，除了2亿亩可供农业耕种之外，还有4亿亩可供发展牧业之用。新疆的工业资源，不仅储量大，而且品种多。这些都说明新疆有着巨大的综合开发价值。兰新铁路通车以后，全国对新疆的人力、物力、技术的支援就可以在较大的规模下源源西移。这几年来党在新疆的努力，等于为开发新疆写下了一页序言。一个巨大的、崭新的、划时代的建设局面接着就要广泛展开。在新疆，要走几十、几百里才能遇到一个村子的那种荒凉的景象将逐步成为过去，而物质和文化繁荣富庶的程度则将与日俱增。各兄弟民族在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下，将更大地发挥他们在建设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力量，用自己光荣的劳动来创造富裕幸福的生活。而数以千万计的毛泽东时代的优秀的爱国男女，在党的爱国主义号召下和民族政策教育下，也都庆幸自己能够获得光荣的机会在那广阔无边的大地上纵横驰骋，为祖国的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才能智慧。这个各民族结成的铁的巨人正在豪迈地奔向一个一个的新的胜利！

1956年7月，北京。

天山上的红领巾

当我访问石河子新城的时候，我抽出一天去游了天山。先在紫泥泉子和石场两地参观了生产部队的种羊场和休养所以后，便一弯接着一弯地徐徐上盘，要翻过达子庙高峰。当车子越上越高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境界也就越开阔浩壮。纵目北望，看到那铺展在我们脚下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创造成为祖国的一个杰出的大棉区的玛纳斯河流域大平原，这时已是莽莽苍苍，成为一片烟雾了。我们祖国的大地是无极无终，我们祖国的富藏是无竭无穷。然而那样美好可爱的土地，过去竟然荒芜连年。现在历史改变了，在这片广阔肥沃的大平原上，拖拉机在安静的旷野上开始发着粗犷的声响，泥土在河水的滋润下不断吐出芬芳的气息。粮田和棉田的面积，一年比一年扩大。不要很久的时间，铁路就要在这大地上通过。铁路将像一支输血的针管，当它一扎进了这枯竭多年的土地，就将使这片大地更加跃动起来。

当我们终于到达达子庙高峰峰顶的时候，另一幅震





人心弦的巨大的图景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啊，这就是天山！当我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我就听到“天山”；中国有多少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中国有一个天山啊！而现在，我终于第一次站在它的面前。虽然从达子庙峰顶到对面的山岭，中间依然隔着好几公里的浅谷浅坡，然而那开阔的浅谷不仅没有冲淡对面山岭矗立的深度，而且仿佛格外衬托出它的豪迈浑厚。山上长着满山的云杉，姿色挺秀，色调森严，而在那长满着云杉的山岭后面，是层层雪峰，上接云天。浅谷中随处扎着一些蒙古包，使这深邃幽致的山林里更增加了边疆的民族情操。在这旷荡的山坳里，一个蒙古包远看起来只剩下白白的一点，而这白白的一点又反过来衬托出山林的深大旷静。

我们越过峰顶，不久就到了林场。天山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地带，最上一部分称为雪线，中间一部分称为林带。从奇台西迤伊犁，绵延千里，都长着这种绰约多姿、既高又直的云杉。天山的树木，只长山阴，不长山阳；不长山顶，不长山麓，只长山腰。这一带的林木，最

天山中部常年覆盖冰雪的群峰





维吾尔族少年看画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像



高的达到40米以上，一般也都在30米上下。直径最粗的有70~80厘米，平均直径约在20厘米左右。林区最稠密的地方，一平方公里中有1600多株。这绵延千里的丰富的木材，成为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巨大的富源。

正当我和林场的工作同志谈话时，蓦地听到背后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伯伯您好！”

这一句问候使我在刹那间完全忘了我是在石河子、在天山，我以为我是在北京的街道上遇见了什么亲眷。然而当我接着听到那像倾盆大雨跌落而来的你一句“伯伯您好”、他一句“伯伯您路上辛苦了”的时候，我的神志立刻回复过来，原来我被几十个少先队员包围了起来。他们的骤然的“袭击”竟然解除了我的思想准备，使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他们每个人都争着和我握手，前面的孩子不肯让，后面的孩子又争着挤过来。



各族少女走在林荫大道上



我那时完全沉浸在热情的海洋里。孩子们是那样天真热情地欢迎着一个生客，因为这个生客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来的，是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来的。

他们集中了所有热情问候毛主席。他们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是那样自发地而又一致地问候毛主席好。实际上，他们不仅关怀毛主席的健康，他们还关怀着毛主席的一切，他们是多么想更多地知道毛主席一点事情。你听他们问：“毛主席每天吃些什么？”“毛主席睡不睡午觉？”“毛主席看不看电影？”他们是多么天真，又多么真挚，当我告诉他们毛主席的个儿比我还高还魁梧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兴奋地鼓着他们的小手掌，嘻嘻哈哈直乐！他们是太清楚他们自己和毛主席的关系了。他们今天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幸福，都是同毛主席的名字分不开的！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在他们的一生里，他们将永远地跟着这个伟大的领袖走，遵循着伟大领袖所指示的道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的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孩子们蹦蹦跳跳，要我讲北京的故事。可是北京的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幸而一个女孩子给我解了围，她要我讲讲北海。于是大家就安静地在山坡上坐下来，我给他们讲北海：讲琼岛白塔、讲九龙壁、讲五龙亭，说五龙亭后面有一个“少年之家”，说北京的少先队队员经常在星期日去北海过队日，有的还划着小船和海军联欢。我又说北海的南面有个中南海，中南海里长着密密的树林。在夜晚，你从那用汉白玉砌成的、有着五个桥洞的、像一条玉带似的横跨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蝾桥经过，看到南面那远远的倒映在海里的堤岸灯影，美得真像一个神话似的境界一样。我们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那儿辛勤地劳动着。毛主席从来就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嘱咐你们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他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将来争取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模范旗手！我问：“你们的身体好不好？”“好！”“学习好不好？”“好！”“生活过得好不好？”“好！”“谁给你们带来了幸福？”“共产党、毛主席！”“你们大了能不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一定能！”

我们这样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说说笑笑，就像一盆水在地面上



泼开了似的，孩子们都乐开了。

这些孩子就是我前一天在石河子新城参观的第一子弟小学的学生。他们是由几个老师率领，自己带了米、菜、衣、被，翻山越岭，到这林场来度夏令营生活的。这地方一面是葱郁的森林，一面是绿油油的草坡，孩子们在这儿爬爬山、讲讲故事，生活得多么轻松愉快！孩子们上天山过夏令营！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这就是新中国的生活，这就是新中国的气派！当我要回石河子的时候，孩子们又涌了上来。车轮在人海中一寸一寸地移动，每个人都在扬着手，扬着手帕，扬着红领巾，每个人都热情地、一再叮咛地托我回北京时问候毛主席好。

我们循着原路下山，出山口的时候已快8时。那时候，西方虽然还泛着鲜红的晚霞，而薄薄的暮色却已掩近大地。远边的原野就像一个蓝色的海洋，那无边的海洋和无数的红领巾，将永远是我们国家的不朽的财富。

1955年1月，乌鲁木齐。

从内地到新疆来的年轻人

这一年多我在新疆旅行，无论在矿山、工厂、部队、农村或者城市机关，都接触到很多来自祖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在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下，他们都具有不辞艰苦的勇敢精神。虽然各人的工作不同、所在的地区不同、担负的责任不同，但他们都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兄弟民族，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地献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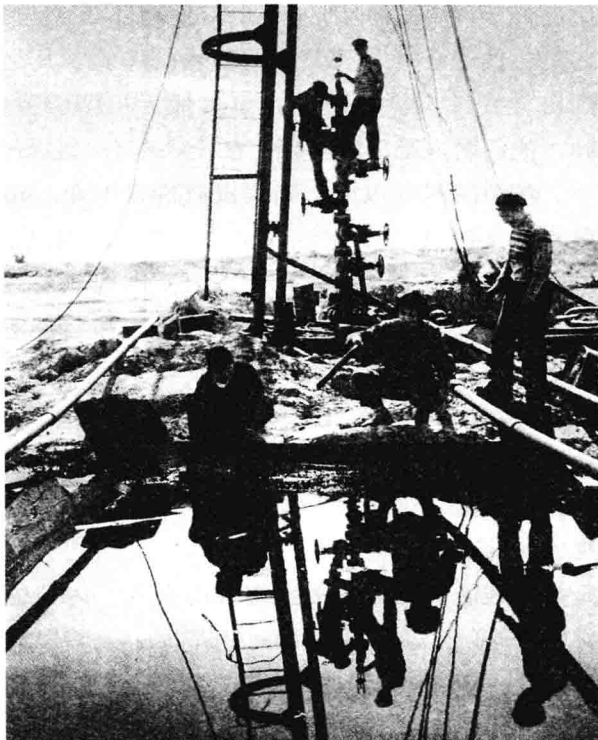
我在独山子油矿会见了在苏联专家培养下第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我在下面一篇文章里还要专门介绍他，现在先简单地谈一谈）。1951年王炳诚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独山子工作；和他一起到独山子的还有其他一些大学毕业生。他们到独山子后，苏联专家一开头就要求他们从工人做起。这对于当时怀有许多不同想法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王炳诚遵循了苏联专家的指示，每天在井架上扫地板、搬东西、擦机器、洗泥浆槽子、给机器上油。有时还要到井架下面去洗井口，或者爬到那四十多





米高的井架上去清洗冰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做着这样简单的体力劳动，没有接触到技术。王炳诚说：“苏联专家指示的道路是对的，党要求我坚持下去是正确的。”由于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这就使王炳诚在实际的工作中熟悉了钻井技术每一个大小粗细的操作过程。王炳诚也搭过井架，安装过机器。他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学，使他后来在升任为钻井技师、去年又升任为独山子油矿的代理总工程师、担任了钻井工程的领导工作以后，体会到许多深刻的益处和意义。不仅在技术上，王炳诚因此掌握了钻井工程的全部环节，而且，由于他和工人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生活，穿一样的衣服，讲一样的语言，怀着同样的感情，因而缩小了他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工人把他看成了自己的一个伙伴。王炳诚这种从根本做起的踏实作风，推动了矿上其他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使大家后来也都走了同样

油田修井操作





的道路；在王炳诚以后，又有更多的中国青年钻井技师在苏联专家的培养下成长了起来。

在新疆金属公司的富蕴矿、阿勒泰矿和康苏矿上，我都遇见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学生。在富蕴矿时，我遇见了清华和北大毕业的张稼栋和刘履中。他们都是学电机的，最初都被分配在水电站工作。富蕴冬季比较冷，从10月开始，水上就有浮冰。为了不让滤水纱被冻住，要经常用棍子扒冰、打冰。张稼栋说，那时他们人少，每人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也就是要打12小时的冰。打冰时，水沾在衣裤上，衣裤就结成冰；水沾在铁棍上，手也会冻在铁棍上。有时涡轮叶被冻住了，还要进入水深及膝的安装水轮机的坑里去工作。张稼栋经常要带头下水，推动大家。刘履中刚到富蕴时，做的也大都是一些体力劳动。他第一次拉大锯时，不是拉不动，就是锯歪了，搞得满身大汗。为了不使新铺的洋灰地面冻裂，发动大家抬木屑去保护地面，他抬不多久，就腰酸气喘。可是尽管筋疲力尽，他还得咬紧牙关干下去；即使已经下了班，但别人不走，他也不好意思走开。这些都是他俩在1951、1952年年初到富蕴时所受的考验。凡是劳动好的人，他总会得到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多地为祖国服务的。当我访问富蕴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已经担任了矿上一部分的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没有现代工业。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年，乌鲁木齐陆续建立了钢铁、电力、纺织、农具制造、汽车修配以及面粉、水泥等工业。很多青年工人从内地前来支援新疆的工业建设。像我访问过的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和乌鲁木齐农业机械厂，大部分的工人都是从内地来的。八一钢铁厂建立以后，它基本上供应了这几年新疆在基本建设、水利工程、农具制造以及民用方面的钢铁需要。乌鲁木齐农业机械厂从1952年到1955年一共制造了大小农具14万件，对于这几年新疆农业的增产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而那14万件农具70%的原料，也就是八一钢铁厂供给的。七一纺织厂建立以后，使兄弟民族能够买到更多更便宜的布匹。内地工人到新疆来不仅支援了兄弟民族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帮助了兄弟民族学会生产技术。在许多工厂里，很多兄弟民族工人在汉族工人的帮助下成长了起来。民族工人大都来自农村，过去没有见过机器，没有在工厂里生活过，没有集



北京初中毕业生出发到祖国西北参加建设工作

体劳动的习惯。他们初到工厂时，不仅在技术上，就是在生活上，也需要汉族工人随时随地关照他们，我在七一纺织厂访问时，一个织布车间的维吾尔族女工库里娜说，她的老师赵富华（汉族女工）不仅在车间教她，下工后还到宿舍里去教她，有时教到很晚很晚。库里娜学了三个月就能独立工作，她现在已经能管24台织布机，库里娜当学时，津贴较少，有一次她把钱花光了，没有饭票，只好不去吃饭。赵富华知道了，就去买了几块钱饭票送给库里娜，叫她去吃饭。另一个精纺车间的维吾尔族女工布沙衣说，她的老师姜保兰耐心地教她各种操作方法，教她怎样才能少出废花，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姜保兰不仅教她技术，还在政治上帮助她，鼓励她立功，鼓励她入团。现在布沙衣可以一个人管600个纱锭。她参加了工会，参加过乌鲁木齐的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且加入了青年团。另外一个汉族女工王淑英，她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人带了五个徒弟，其中三个是民族女工。有一个叫艾孜追的维吾尔族女工，恳切地要求拜王淑英做老师。后来艾孜追每次领了工资，都交给王淑英，由王淑英帮助她先买足了饭票，再买手巾、肥皂、牙膏这些日常用品，有余钱，再帮她买鞋子、做衣



知识青年在吐鲁番县和农民一起剪枝



服。艾孜追对人说：“我的老师比我妈待我还好。”王淑英最初怕影响自己的产量质量，教了一个不想再教第二个，教了第二个不想再教第三个。但是党对她说：“为了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的需要，我们厂里就要增加机器。假如我们不能耐心培养更多的民族女工，我们就不能给全疆人民供应足够的布匹。”在党的教导下，王淑英不仅一连带了五个徒弟，而且由于她和她所教的民族女工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她说：“我现在愿意再多带几个民族姊妹。”

在新疆军区农业生产部队里，也有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参加着各项生产建设。当我在玛纳斯河流域大泉沟水库工地参观的时候，会见了好几个在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到新疆来工作的山东姑娘。她们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机器，可是现在她们都成了很好的拖拉机手。有一个叫周长兰的，她在学习驾驶拖拉机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什么前轮叫“引导轮”、后轮叫“主动轮”，又是什么“前后横轴”、“中横轴”，单单这些名字就把她搞得头昏脑涨。但是困难虽多，她终于还是学成功了。另外一个女拖拉机组组长李庆云，不仅学会了驾驶拖拉机，还学过驾驶挖土机。她所领导的一个组在当时的大泉沟水库工地上是有名的：团结好，分工好，工作质量好，机器保养好，而且事故少。李庆云说：“回想我在山东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妇女。到了新疆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我也能够驾驶着现代化的农业机器来参加国家的建设了。这将永远使我感到安慰和自豪！”在生产部队农场里，经常有八一农学院的学生在那儿实习。这种生产实习，既可以使这些学生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同时对于部队农场来说，也是一种技术上的帮助。这些八一农学院的学生将是新疆发展农业生产中未来的技术骨干力量之一，而这些学生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各地参军后而破分配到新疆来的一些青年。

在阿勒泰、塔城、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以及南疆各地，都有从内地来的青年农技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当地农民改进各项农业技术。仅在南疆的喀什、叶城、和田三个地方，我就见过浙江农学院、华中农学院、西南农学院和西北农学院四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吐鲁番葡萄沟，我曾经遇到一个园艺干部，他一个人负责整个葡萄沟的技术指导，不懂话，要学话；还得自己做饭吃。在阿勒泰，我看到两个农



新建的新疆医学院

技干部，屋子里没有一张桌子、椅子，他们要绘图或写材料，就伏在地上做。他们的艰苦的劳动，对于这几年来新疆农业生产的提高是有贡献的。在和田地区，还有一批从江南来的蚕桑干部，其中一部分是苏州浒墅关蚕桑学校毕业的。她们有的在和田缫丝厂工作，有的在和田蚕桑试验站工作，有的就直接深入乡间帮助农民育蚕。1955年和田县一般农民平均每盒蚕种（18厘米装）产茧31市斤，但是有蚕桑干部指导的重点社，平均每盒产茧50市斤，其中最高的达到75市斤。这说明她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上海的女孩子，特别在最近一两年来新疆的很多，她们有一部分分配在医药卫生工作岗位上。我曾在乌鲁木齐的军区医院住过一个时候，那儿的护士绝大部分都是从上海来的。上海女孩子更大部分是在财经贸易系统工作。在新疆，无论到什么地方，在贸易公司、百货公司这些单位里，你都会遇见这些活泼美丽的上海姑娘。她们的长处是





机灵细心，很适合于做售货以及会计、统计等工作。这一批十七八岁的江南姑娘成了目前新疆商业系统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此外，这些女孩子还活跃了当地的一部分社会生活。举行舞会要是有了这一批“生力军”参加，会场就更显得欢腾活跃。

当然，还有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在新疆担任了机关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许多区委书记同志。新疆地方辽阔，常常一个县比内地的一个专区还大，一个区比内地的一个县还大。从一个区的这头到那头，常常要骑马走上两三天。就在这样一大片地面上，所有关于党的政策方针的宣传、传达，以及上级规定的任务的布置、推动和检查，都要通过并依靠这一个区委书记。区的编制中没有翻译，区委书记不懂维吾尔文也得硬逼着学，否则就无法工作。区委书记不是在农村，就是在牧区，生活作风更得民族化。这些区委书记，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为边疆建设服务，为兄弟民族服务，数年如一日。知道他们的人不多，但他们做的工作却不少。

这些从祖国各地到新疆来建设边疆的青年男女，大都赞美、满意新疆的风光、生活。他们都安心在新疆长期工作下去。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育下，他们都能够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和兄弟民族团结得很好。靠了他们和全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几年新疆在各方面的建设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整个新疆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同时，这些勇敢有为的爱国青年，他们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也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1956年5月，乌鲁木齐。

从工人做起

——记独山子油矿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的成长

我到独山子的第二天，就在130号井上会见了独山子油矿在苏联专家培养下成长的第一个中国钻井技师王炳诚。

我是在夜晚到达独山子的。1954年11月4日下午4点，我从石河子新城出发，过安集海大桥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不久就看到远处摇曳着一丛灯火。驾驶员指着那灯火处说：“那就是独山子。别看前面就是灯火，走走还得一小时哩。”我们真的又在公路上疾驰了一小时，才离开乌伊公路向南折入去独山子矿区的支路。

进矿区时，哨兵向我们盘问了一下，并给我们指点去矿务局办公大楼的方向。我们看到很多一排排或一幢幢新盖的漂亮的宿舍和办公大楼。明亮的灯光透过各种花色的窗布投射到马路上，给我们外来的旅客挑引起不少美丽的感情。虽然是夜晚，但是载重汽车和拖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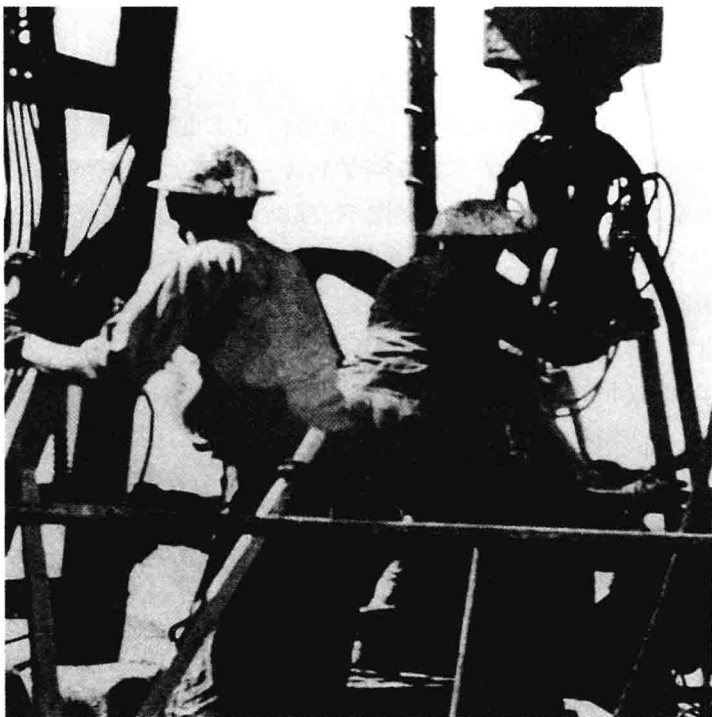




机，仍在马路上来来往往，紧张地输送着各处井上所需要的器材。广播器柔和地播送着音乐。这一切使我的思想都集中在这样一个感觉上：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城市！

第二天上午，我们便到矿山上去周游各井。矿山在矿区的南部。从宿舍区或行政区向南看去，就像一条山冈一样。但当我们奔上这条山冈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片开阔平坦的场地。从东向西，疏疏密密，到处是高耸的井架。井架构成了矿区的主要景色。

当我们的车子经过井段段长的办公室时，引导我参观的那位同志招呼驾驶员把车子停了下来。“王炳诚的马在这里，我下去看看他在不在。”没隔上几分钟后，他真的带着一个人出来了。是一个小个儿，脚上套着一双长筒胶靴，穿着一身泥渍的青色棉制服。那位引导同志开了车门，说：“这就是王炳诚。”



油区建设初期的石油工人



我们在老远就能判别哪一口井是130号井。因为在所有的井架上，只有130号井架顶上飘着一面红旗。我们很快就到了130号井。在井架北头四五十米地方，有着一间小木屋。这是王炳诚的工作室。他请我到那间小房子里先坐一下。

那时，井段段长苏联专家库拉科夫同志也来了，他是来收井架上的工作自动记录表的。他每天上午都要亲自到一个一个井上去收集这种自动记录表，通过这种自动记录，了解各井每天的工作进度以及在工作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库拉科夫同志中等身材，瘦瘦的，但是脸色红润，显得和蔼诚恳。在谈话中他特别向我介绍了王炳诚。当他提到王炳诚和沙布林诺夫挑战的一段，他得意地说：“沙布林诺夫是王炳诚的老师，可是王炳诚却向他挑战。结果王炳诚打破了沙布林诺夫所保持的一昼夜（24小时）钻204米的全国最高纪录，创造了一昼夜钻231米的全国新纪录！”

二

七年以前，王炳诚中学毕业。他是天津人，他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的采矿系采煤组。1949年全国解放。党看到石油工业干部的缺乏，在1950年，北洋大学的党就号召一部分同学转学石油系。要王炳诚从采矿系转入石油系，他在感情上是有些摆不开的，因为他在采矿系已读了三年，多少学到了一些底子，现在转学石油系，等于要从头学起。但当时王炳诚的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党员。他终于响应党的号召，带动了其他几个同学一起转入了石油系。

1951年王炳诚在北洋大学毕业，组织上分配他到独山子油矿工作。那次，北京、天津被分配去新疆工作的学生有好几十个。到了西安，又会合了从中南和西南来的一批。他们虽然都被分配到新疆去工作，然而各人脑子里却有着各种不同的想法。

那时的独山子相当荒凉，一共才有10座砖盖的宿舍，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窝子里面。他们第二天到井上去参观，走了半天才看到一口井，又走了很久才看到第二口井。事实上，那时独山子油矿也就只有两口井。



就在同一天，公司领导上约他们谈了一次话。那一次的谈话对于那一次到达独山子矿区工作的那批青年学生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上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王炳诚。首先是中苏石油公司苏籍总经理德·聂列金讲话。聂列金一开头就宣布了一个明确的思想：这次中方来的同志都应该被培养成为将来的中方的专家。帮助中国培养技术干部是苏联的党和政府给来中国的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之一。聂列金询问这些青年学生已经学了些什么，他们把他们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告诉了他。聂列金说：“你们学的东西太多了。”有些学生听到聂列金这样说，很高兴。但在王炳诚看来，聂列金显然是说他们学得不专门。聂列金又征求他们的意见，到独山子以后希望怎样学习？这些青年学生就说，第一希望学什么，第二希望学什么，第三……他们充满着热情，希望一下子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关于学习的方式，他们希望

天寒地冻条件下的钻井工作





苏联专家给他们讲课，这些年轻的刚出学校大门的学生，依然习惯于学校里那种学习的方式——听课的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聂列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忠实的批判，他说每个人应该在一门具体的工作中从头学起。要钻下去，要学得透，将来在工作中要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并使工作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严肃地要求大家采取苏联的学习方法，而不是那些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方法。苏联的学习方法的主要精神就是亲自动手，从头做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不仅仅能嘴里说，指挥人，而且还要能自己动手做，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是在这样一种方法下训练出来的。在这样一种方法下训练出来的人，才能实事求是，结实顶用。

什么叫“从头做起”？“从头做起”就是从普通工人做起。先当普通工人，做一个普通工人所应该做的一切工作。这样的做法对于那些刚从学校里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聂列金讲话以后讲话的是中苏石油公司党委书记钱萍，他号召大家在思想上行动上放下包袱，积极地按照聂列金同志指示的去做，亲自动手，从工人做起，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工人。这个号召引起了一系列的尖锐的思想斗争。有些人对于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做的永远是一些体力劳动工作，感到非常单调。“这些工作又何必要我们来做呢？”这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最典型的想法。有的人认为这样学下去，恐怕要学20年才能成为一个工程师。有的人要求可否改为实习半天，理论半天。对于王炳诚，当他听了聂列金和钱萍的讲话后，他是很激动的。他检查了自己：他发觉他自己过去只是在理论上认识了共产党，而在感情上，还没有能够真正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决心响应党的号召，按照聂列金指示的，钻下去，从工人做起，并带动大家。

钻井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一个井开钻了以后，就需整日整夜钻旋不停。别的工作有星期日、有节日，但钻井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过年也好，过节也好，都须按时上班。在夏天，为沙漠地带所特有的那股蒸人的热劲袭击着他们，使他们多么容易感到疲乏和烦躁。冬天更坏，经常是零下20~30度，有时没日没夜地飞着密密的



雪花，他们没盖没遮地在井上工作，连续8小时不进任何食物，脚上穿着毡袜、毡袜外面再套上毡筒，身上在小皮大衣外再加上一件大皮大衣，戴上皮帽皮手套，整个的人就弄得像一个圆圆的大冬瓜似的。即使这样，还是寒冷彻骨。尤其夜里，要是站久了，鞋子就会在地上冻住，要是坐久了，就会站不起来，胡子眉毛都会变得白白的，就像在黑刷子上粘着一些白糖一样。有时要是身子长久不动，一动时，就会把冻得硬硬的衣服都折裂了。

对于一个没有一定的锻炼的人，一下子把他投入整整8小时的不停止的体力劳动工作，也委实是够乏死人的。王炳诚初上井时，他每天做的工作就是扫扫地板、搬搬东西、洗洗泥浆槽子、擦擦机器、给机器上上油。他每次到下班时，都已累得要命。他一面坚决地遵守领导上的指示，从普通工人做起，然而一面在思想上又有着一些矛盾：为什么一定非做这些不可？一天一天尽是扫地、擦油？

尤其是上井架，那委实是各项考验中的最尖锐的考验。这样一个仰头望去就像触着了云天的40多米高的井架，仅仅是由一些稀疏的钢条架起来的，使人一看就已经有些胆寒了，而还要沿着在这样空疏的钢架外面所附设的单薄的铁梯爬上去，那简直是令人心悸胆裂的事情。当王炳诚第一次往梯子上爬时，他的心不能控制地卜卜地跳动着。他的两条腿自发地软了下来，就像两条泄了气的车胎再没有气力前进一样。他毛孔里冒出了一粒粒的冷汗。他全身紧张，甚至有些发晕。他那时心里尽管明白：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然而却有一种不是用理性可以解释的畏惧的气氛包围着他，仿佛他那时整个的身子凌空地悬挂在生死莫测的深渊里。

有一天夜晚，井里喷出瓦斯，水和泥浆都喷得很高，井架上很多地方都结成了冰块。假如不把那些冰块清除，机器一旦开动，井架上的冰块掉落下来，就容易把人砸伤。钻井技师叫王炳诚上去把井架上那些冰块清除掉。那时正是深夜2~3时，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一级一级的扶梯只装到24米的地方，再上去就不是梯子而只是一格一格钉在井架上的一些扶手了。王炳诚就一格一格地在这些扶手上爬上去。那时有一条冰块，王炳诚看来好像是一个扶手，可是一把抓住时，冰一碎，扑了一个空。幸好他另外一只手还没有放开，他的身



子在空中剧烈地颠荡了一下，总算没有摔下来。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以后连着好几天，连梯子都不敢看一眼。

在冬天时，经常要到井架底层去清洗井口的泥土。井架底四周没有一点遮蔽，又没有太阳，风特别大，特别寒冷。但当领班通知大家下去洗井口时，别的工人说下就下，王炳诚总不免迟疑了一阵。有一次，他刚穿上一件公司才发的新的工作服，就要下井洗泥，他觉得穿着这样新的衣服去洗泥，委实有些可惜。晚上他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时，他就感到：“啊，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我和真正的工人之间还有多大一段距离啊！”

王炳诚决心要按照党和苏联专家指示的道路，从普通工人做起，然而他有时又感到一些空虚软弱。天天是扫地板、擦机器、洗泥槽，而且言语不通。学到的东西多么少啊！工作忙的时候还好，一下班，就困在黑夜和风的世界里，又是多么寂寞啊！……然而每当王炳诚感到烦恼、彷徨的时候，党总是安慰他、鼓励他、坚强他的信心。党说：“当前的环境对于你来说，确是一个陌生的、困难的环境：工作是生疏的，地方是生疏的，天气确实冷……然而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党的任务是要改变自然的面貌，改变历史，把地下的财富搬到地面上来，把荒凉的地方变成繁荣的地方。党的政策，党的理想，就要通过每个党员来实现。特别是在独山子矿区，从部队转业来的战士比较多，从学校里来的学生比较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你，就更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起带头作用。我们必须扭转过去知识分子习惯于坐在屋子里做一些上层工作的那一套旧的做法。那套旧的做法已经和旧的时代一样，永远是过去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出来，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牵涉到很多知识分子的问题。在独山子，你如坚持下去，坚决地走工人的路，别的女知识分子就会跟着你走，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变为真正的工人。”党要求他更坚强地坚持下去，把自己的工作和去朝鲜的战士的艰苦战斗联系起来：那儿流的是血，这儿流的是汗！

党的指示是简单的，然而是有力的。每次王炳诚听了党的谈话回来，在内心里都生长起一种巨大的力量，感到有一股热劲像电流似的



通过全身。“为什么我和工人之间总有着一些什么不同？我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苏联专家就和工人一样在水里泥里干活？”王炳诚这样质问着自己，又这样提醒着自己：“我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一个人变得坚强起来的时候，本来感到的一些困难都会悄悄地溜走，正如太阳上升了，黑夜就自然地消失了一样。有一次，王炳诚去接班，还没有走近井架，就看到井上又发生了事故，所有在井上工作的人都被喷得一身是泥。苏联专家也是一样，在那儿紧张地忙碌地工作着。王炳诚那天正巧刚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脚上穿的又是一双新棉鞋，然而当他一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就立刻走上井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整个的身心都投进那水和泥的世界里去了。

在党的教育下，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王炳诚勇敢地面对着摆在他面前的严峻的考验一步一步走过去。那时王炳诚做的始终只是一些体力工作，他还没有接触到技术性工作，然而，在那冰天雪地之中，他终于能和其他工人一样做了一些事情、在那巨大的工程中，也有着他微小的一份，他对此开始感到一种愉快。他觉得他和工人之间的距离一点一点缩小了起来。当他和工人在一起做着一些普通工作的时候，他不再感到委屈、感到没有意思，而且，他开始感到这是一种光荣。这完全是一种新的感情，这是他过去没有体会过的感情！当他满意于自己的工作，当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一种愉快的时候。他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单调和疲乏了，甚至忘掉了疲乏。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在来以前无法预料、来了以后又无法控制的变化。就说泥浆吧，王炳诚初上井时，看到在自己的工作中既离不开黑黝黝的机油，又离不开黄糙糙的泥浆。“为什么非有泥浆不可？”有一天他对自己简直问起这样可笑的话来。泥浆确实讨厌，搞得一年到头井架上都是水、都是泥。然而现在，泥浆已经成为王炳诚生活里的一部分，而且将和他的生命同时活动下去。当他用手撩着在泥浆槽里流着的泥浆时，就像缝衣工人扬着布料，印刷工人掀着纸张、油漆工人搅着油漆一样的自然，不再有什么生硬的感觉。他并且可以从井口里出来的泥浆的颜色和质量，判断井里的现象是不是正常。当井里的现象是正常的，他便会说：“你瞧，那泥浆多漂亮，亮光光的。”但是



井里要出了些毛病，泥浆里掺进了一些油或瓦斯时，王炳诚便会说，“像坏了的豆腐一样，多难看！”

由于从头做起，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就使王炳诚在实际的锻炼中熟悉了钻井工程里每一个大小粗细的操作过程。他自己搭过井架，安装过机器，甚至还搭过那种小木房子。他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学，使他后来在升任为钻井技师、担任了钻井工程的领导工作以后，体会到很多想象不到的益处。

王炳诚不仅在技术上能掌握了钻井工程里每一个具体工作，更重要的是，工人都把他看成为自己的伙伴。王炳诚和工人们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生活，穿一样的衣服，讲一样的语言，怀着同样的感情，向着同样的目标努力：王炳诚秘密地发现，每一个工人在业务上几乎都有各人独特的一套。于是他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窍门。他既认识到他们的能力，又认识到他们的品质。工人们都知道王炳诚是一个大学生，然而他们并不以一个大学生看待他，他们不再把他看成是一个外人。“感谢党，”王炳诚说：“我在工人之间不再是孤零零的了！”事实上，他自己已经是工人之间的一个了。

三

王炳诚的学习是艰苦的。在王炳诚的艰苦的学习过程里，人们可以看出，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帮助是何等的真实和诚恳。

王炳诚初上井时，首先碰到的困难是语言。那时，整个的钻井处一共只有8个人能说汉语，至于王炳诚所编入的一个班，不是苏联专家，就是兄弟民族，而他们两者的语言王炳诚都一句不懂。王炳诚初上井时，受苏籍钻井员衣格利的指挥。苏联同志是最讲究工作效率的，假如衣格利单纯地为了工作效率，那么有些事情最好由他自己来做，或者叫其他一些懂俄文的兄弟民族来做，而不必一定叫王炳诚做。正因为要培养王炳诚，所以衣格利总是热情地教王炳诚做这做那。常常是这样：衣格利要他拿锤子。而他却去拿了绳子，弄得两个人非常尴尬，旁边的人都捧腹大笑。由于言语不通，有时衣格利就硬



油区的艰苦创业

是拉了王炳诚的手，放在什么操作把手上，扶着他的手教他，像老师扶着小学生的手握着毛笔练习写字一样，一面说一面教。就是这样，教了还是不懂。后来，王炳诚就把衣格利说的俄文，用中文注音记下来，或者叫衣格利教几个工具的俄文名字，记下来，在走路的时候，在下班的时候。总是像念着符咒似的，嘴唇嚅嚅微动，默念着这些生字。从一些简单的俄文名字记起，一直到慢慢地懂得苏联同志说话，并且自己也能勉勉强强用不连贯的俄文答话，这样地学习下去。

第一个教王炳诚钻井的实际操作的是苏联钻井技师莫可尔前。莫可尔前不仅要教会王炳诚关于钻井的整套操作技术，而且还要训练王炳诚成为一个独立的钻井技师。因之在培养的过程中，莫可尔前就用各种在技术管理上允许的假动作来锻炼王炳诚。有时，他有意把什么东西弄坏了，要王炳诚修；有时，正在王炳诚冷不防时，他在王炳诚



身旁弄出了一个巨大的震人的声音，来观测王炳诚是否能够镇静地照样工作下去；有时，他使钻井工作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迫使王炳诚运用智慧来解决这种虚构的问题。莫可尔前要训练王炳诚的是：不仅能操作，而且还要能安全操作，还要能独立解决问题。凡是在生产上一切可能发生的故事，他都告诉了王炳诚。当他最初让王炳诚独立操作时，他不下班，不回去休息，他经常逗留在王炳诚的身边，观察王炳诚操作，不断地提出意见，答复疑难的问题，以提高王炳诚的技术水平。他保卫了同时又鼓励了王炳诚，使王炳诚在初次独立操作的过程中，变得勇敢、沉着，而在勇敢的学习中终于一步一步地能够自己独立站起来。

另一个苏联钻井技师沙布林诺夫也用着同样的风格来训练着王炳诚。那时王炳诚已经升为副钻井技师，他担任了沙布林诺夫的副手。沙布林诺夫在交代工作时，先把一切说清楚，要王炳诚去独立执行，然后他来检查。有时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沙布林诺夫胸有成竹，然而总要叫王炳诚先提出处理的意见。在王炳诚初次尝试独立操作时，在工作中一定是会有一些漏洞的，而沙布林诺夫就来指出这些漏洞，这样，使王炳诚获得了充分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苏联专家在工作中所表现的高度的忘我劳动和勇敢负责的精神，使王炳诚受到深刻的教育。王炳诚在过去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人可以连续工作24小时、48小时、72小时，甚至96小时，然而他终于在独山子矿区亲眼看到了这种伟大的崇高的品质。在钻井工程中，每钻到某种深度时，就要下一次套管，以防井壁的塌倒。每次下的套管，都有几百米长，一个接一个地从地面上送到地层里面去，所以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王炳诚亲眼看到一些苏联钻井技师，因为下套管或其他意外事故，常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一直留在井上，一直等到工作完成或者问题解决后才离开井回到自己的寓所去。他看到苏联钻井技师库拉克也夫和莫里阔夫等，他们都已五六十岁了，然而竟然能在井上连续工作到三天三夜，甚至四天四夜。有一次，当莫里阔夫做完了他的工作时，他已疲乏得连话都没有力气说了，然而当别人劝他先回家休息一下时，他坚决拒绝，一直要等工作搞好后，才肯休息。



每逢有些井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故时，苏联专家总是奋不顾身地参加抢救工作。有一次，68号井的水泥还没有钻完，钻杆还没有提出，就发生了喷井事故，原油从井底喷出，无法制止，形势非常严重。钻井处的总机械师瓦亭临时亲自画了图样，并亲自到修理厂去做好了个铁套子，想把套子套到套管上去，以便制止原油上喷。但是铁器碰上铁器，容易冒出火花；这样，要是遇到瓦斯，就要引起爆炸，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套套子的工作不能随便交别人做，仍由瓦亭自来盖。瓦亭在抢救的工作中，不仅从头到脚溅了一身油，而且两只眼睛被油和瓦斯熏得赤红，无法张开。但是他跑到旁边的救护车那里用药水洗了洗眼睛以后，又继续到井口去安装套子。一直搞到夜晚才把喷井制住。又有一次，80号井瓦斯上喷，那时因为井上正在进行修理，所以上面挂了一盏机灯。上升的瓦斯把那盏机灯冲得东西摆动，最后把机灯的玻璃荡碎，以致引起冒火。那时井架高头还系了打泥浆用的橡皮管子，这东西是最容易引起燃烧的。井段段长米哈依洛夫和钻井技师康姆卡特依，就爬上井架去把橡皮管子拆下来。当时的形势是危险的，因为下面已经烧了起来，假如火再大一些，他们上了井架以后，就可能下不来了。然而他们两人是那样勇敢，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公家的财物。这些事情，有的是王炳诚亲眼看到的，有的是听到很多同志都这样说的。苏联专家不仅在先进的科学技术上教导着王炳诚，并且也在思想品质上滋养着、熏陶着王炳诚。

四

1953年9月，矿务局领导上批准升任王炳诚当钻井技师。这是独山子油矿在苏联专家培养下成长的第一个中国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开始独立担任钻井的领导工作了。

王炳诚开始独立担任领导工作时，心中多少有些忐忑的、不踏实的感觉。他第一个领导钻的井是第25号井。他当时领导的那个队的政治情况并不怎么好，只有一两个积极分子、而且其中有些人，王炳诚当普通工人时还向他们学习过。队员对于王炳诚也没有什么信心，有的人抱着观望态度：要是王炳诚领导得好，他们就做下去；要是不



行，他们就想转到由苏联专家领导的队里去。

王炳城接受了钻25号井的任务的第一个思想是必须首先和全队团结好。党多年来这样教导着他：和群众团结好，依靠他们，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但是当你想去依靠群众时，群众并不是一下子就给你依靠的。群众根据他们自身多年的经验，常常先要试试你，然后才能和你有交情。当王炳诚最初订出计划、说明理由、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大家并不表示意见，只是说，“技师”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好了。然而当群众了解了你，肯定了你的态度是真诚的时候，情况就会改变过来。王炳诚在团结全队的工作中，首先是团结好队里的几个钻井员。他们是实际掌握钻井操作的人，什么事都先和他们在一起共同研究商量，并通过他们更好地团结并推动全队，使大家的责任感逐步提高。

在钻25号井时，开始还比较顺利，但是后来，机器常常出毛病，发生卡钻的现象，使得王炳诚很苦恼。他的经验限制着他，看看不困难，做做真困难。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那时他还没有结婚，除了下山吃饭以外，其余的时间整天都守在井上。有时连脸也没有心思洗，只是呆呆地徘徊在井架上，苦苦地思索着怎样解决井上所发生的那些问题。他想：假如不是由他而是由别的人来领导，这个井就不会发生这些毛病，也就不会使国家财产蒙受损失。他又想到：他是独山子油矿的第一个中国钻井技师，然而连这样一个浅井所发生的困难都解决不了，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苏联专家一定会笑我们！有一夜，他苦恼得竟然哭了起来。责任心、能力不够、惭愧、焦急……这一切都集中地向他攻击着，他一直哭到夜晚4时，整个的脑袋好像要爆炸开来似的。他打电话给党，说明他的能力不够，要求党另外派人来领导这个井。当党在听筒中听到他在哭泣时，就安慰他，告诉他一个人在开始工作时总会碰到很多困难的；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不是在一天一夜间生长起来的，必然要在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中逐渐磨炼出来。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遇见困难时，正确的道路是努力去克服那些困难，而不是设法逃避那些困难。关于苏联专家会讥笑我们的问题，党严肃地给他指出，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党说：假如由于我们经验不够，工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因而想到苏联专家会讥笑我们，那是把苏联党



和中国党、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了。苏联专家是在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之下帮助我们的，他们把我们看成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党要他冷静一点，要他再好好地想一想。

党对他的指示既温暖又冷静，既简单又明确，他放下了电话。他的脑袋本来像一个鼓鼓的皮球似的，这时却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好像一个小孩大吵大闹后，被母亲的软软的手一抚，唱了一段歌，就一下子变得平静舒服起来一样。“该死！”他突然想到，“我怎么这样幼稚，这样冲动！这是夜晚4时，硬生生地把负责同志吵醒！正如党说的，假如天下的事情都那么顺利，那为什么还要有共产党员？”他又想到苏联专家会笑他的问题，这显然还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想法！他回想起，当组织上决定叫他独立工作时，苏联专家是多么热烈地庆贺着他，同时又关心着他啊！他们常常跑到他井上来看看，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而他呢，却想到人家会不会讥笑他！他想到自己是多么狭隘啊！“党是正确的，党是正确的……”当他这样反复体会着时，他终于在长期的紧张和疲倦之后睡着了。

经过党的指示后，他变得勇敢和坚定起来。他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解决了他井上的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不久也就很顺利地完成了25号井的钻探任务。当他回想他最初这一段经历时说：“当你下了决心的时候，好像钢铁也会对你让步似的。”

他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钻84号井。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1942年，在离这84号井20米的地方，曾经进行钻探，发生过喷井事故。当时瓦斯已经从井内出现，井口的防喷器虽然总算被关住了，但是由于这一地带地下的瓦斯压力太大，瓦斯竟然穿过地层，在山腰里穿了一个大洞仍然喷了出来，后来用了很多水泥才把喷出的瓦斯堵住。这是10多年以前的事情。这个84号井不仅离地下的瓦斯很近，而且还有泥浆漏失现象，同时可能还会发生井塌现象。这样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井，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钻井技师，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王炳诚来说，可以说是一次考验。王炳诚这样想：“领导上要我领导钻84号井，是不是在考验我？”钻井处处长依凡金米达维基说过：假如这个并能钻好，其他的井就都能钻了。

在技术上，钻84号井困难的关键在泥浆的比重问题上。泥浆是由



油区生产一线

水、泥、小苏打、煤、烧碱和重晶石这些成分构成的，在一般情形下，泥浆和水的比重是1.8:1。但是王炳诚为了预防井内瓦斯的上喷，必须考虑用一种比重很大的泥浆，以便这种泥浆注入井内后，能够封住井壁，从而防止可能从井壁冲出的瓦斯。王炳诚考虑要用2:3比重的泥浆，而这样比重的泥浆在独山子矿区还从来没有用过。但问题是：假如泥浆的比重不够，正如上面所说的，恐怕不容易防止瓦斯；但是泥浆里的重晶石成分要是太浓，则泥浆就容易沉淀，一沉淀，钻杆就可能拉不出，同时，泥浆太浓了，又要影响泥浆的正常循环。王炳诚整日整夜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后来，在他苦苦的钻研下，并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他总算避免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安全地完成了84号井的钻探任务。当84号井终于出了油时，大家都祝贺王炳诚，说他“大考及格”了。

王炳诚钻完了84号井后，又钻完了一个52号井，又开始钻89号井，这时王炳诚所领导的钻井队，政治质量已经提高，他自己和全队





同志在技术经验上也都比从前丰富成熟一些，全队的团结也比过去更坚强了。这些使他有可能响应领导上的号召，要求大家展开社会主义的爱国运动竞赛，班与班挑战，个人与个人挑战。而作为整个一个队来说，他和他从前的老师沙布林诺夫所领导的一个队挑战，他要超过他们的成绩，并为全国创造钻井进度的新纪录。

那时沙布林诺夫领导的一个钻井队，由于采用了苏联的先进的快速钻井和用三个吊卡接单杆的方法，创造了一昼夜进钻204米的全中国高纪录。这个方法王炳诚在书本上曾经看到过，但不会运用，所以就向沙布林诺夫讨教，沙布林诺夫丝毫没有因为王炳诚是在和他挑战，因而不愿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教给王炳诚。正相反，沙布林诺夫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王炳诚，并且对他说：“你要超过我的纪录，也非采用这个先进的方法不可。”

王炳诚向沙布林诺夫学习以后，就回去把自己的钻井队组织起来一起学习。他知道，任何一个成功的工作不能单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他要把大家的力量有组织地都发挥出来。他整天整夜在井上领导着全队学习、研究。他在沙布林诺夫所传授给他的方法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高一步，使每次接杆的时间由15分钟缩短为7.5分钟。这7.5分钟时间的节省，有着巨大的效果。所谓接杆，就是钻井的钻杆每次从地面上钻下去，快完的时候，就要接上新的钻杆，这样一根一根地接着，一直钻到地层一千几百或二千几百米。假如一昼夜要钻200多米的深度的话。则大体上要接20次左右的钻杆，假如每接一次要15分钟的话，就要用到5小时，也就是说，一昼夜24小时中要停止工作5小时，这个百分比是很高的，假如把接杆时间从15分钟缩减为7.5分钟，一昼夜接杆的时间就可以从5小时减为2.5小时，而这节省出来的2.5小时，就可用在钻探工作上，借以增加钻探的进度。

此外，王炳诚又把井架上两部柴油机的运用组织得更为合理。在过去，每当因为接杆停止钻旋的时候，两部柴油机也同时停下来，以便加油加水。现在王炳诚设法不让两部柴油机同时停下，而是这一部停下来加油加水时，另一部仍在发动着；把这一部油水加足而发动了以后，再把另一部停下来。这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不使井架上的动力停止。这样，当钻杆一旦接好时，就可立刻开动钻旋，不受动力停



止的影响，并因动力经常在开动着，所以在动力的速度上也经常保持着充分的速度。这些，都帮助增加钻旋的进度。

除了上述两点外，当我在单独访问沙布林诺夫时，他还给我补充分析了一个原因。他说，王炳诚在钻89号井时，根据“地质技术施工单”的规定，钻到某个深度时，是应该在泥浆中掺用重晶石的；但是由于王炳诚研究了具体的地质情况和地层厚度，他当时没有用重晶石，用的仍是轻泥浆，这样，一面减轻了井架设备的负担，一面也可以加速钻井的进度。沙布林诺夫说，这样大胆的试验，是王炳诚的勇敢地创造的结果。

王炳诚就是这样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他所领导的钻井队全体的团结努力下，在他自己的刻苦细心的钻研下，终于创造了一昼夜钻进231米的全国新纪录。

所有的苏联专家知道了王炳诚这个新纪录后，都非常高兴，他们热烈地祝贺着王炳诚，他们说，这是王炳诚的光荣，是中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光荣，也是他们苏联专家共同分享的光荣。

五

王炳诚认识到，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培养的钻井技师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几百个、几千个。特别在新疆民族地区，更需大力培养兄弟民族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作为一个钻井技师，又是一个共产党员，王炳诚不仅在技术上业务上领导着全队，而且还须在政治上思想上领导着全队。每当他接受一个新井任务时，他着先要把全部计划向全队报告一下，使大家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有一个全局概念。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这个计划如何完成，如何钻法，泥浆的比重应该如何，钻到什么地方可能遇见什么情况，到什么时候大概要下什么套管等等。他经常在井上和大家一起开会，研究业务上的问题，启发大家热烈讨论，提出意见，使大家在思想上对于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并且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克服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提高大家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创造性，使钻井任务完成得更好更快。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并团结兄弟民族，除了俄文，他



新井出油



又学习了维吾尔文，以减少语言上的困难，增加他和民族同志之间的团结和了解。在他现在所领导的“青年钻井队”里，他已经培养了四个副钻井技师，其中一个维吾尔族，一个是哈萨克族。另外又培养了一个哈萨克族钻井员、一个维吾尔族副钻井员、两个维吾尔族架工、一个维吾尔族女柴油机技工。他除了对大家进行业务教育外，又经常进行政治教育，讲民族政策、阶级教育、党的历史等，由于他自己也成了工人，大伙是不再把他当做外人看待，因此就大大便利了他在工人间的活动，使他能够更好地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政治任务。现在他的队里已经有了三个党员和好几个团员、全队的战斗性非常坚强，这个“青年钻井队”已经成为独山子矿区的一面旗帜。

我会见过王炳诚领导的钻井队里一个维吾尔族副钻井技师阿尤甫。他是1939年到达独山子矿区的，那时他还只有12岁。当时盛世才在招募工人时，欺骗工人，说学三年就可以做工程师，而事实上，他在独山子矿区一共干了五年，什么都没有学会。他说他在那五年中只学会了三样东西，就是喝酒、赌钱、打架。他说他们维吾尔族本来不会打麻将，然而他在那几年中，连麻将牌都学会了。旧社会不培养工人，而是毁灭工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1951年6月第二次到独山子来工作，在最近这三年中，他从普通工人、副钻井员、钻井员，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副钻井技师。他说过去民族不平等，他们少数民族根本没有被培养的机会。就是稍微学到了一些，也什么事都轮不到他们。自从共产党来后，民族平等了，他们不会，汉族同志就帮助他们。过去他不会写俄文，也不会说汉话。自从他在王炳诚领导下工作后，因为一天到晚和王炳诚在一起，慢慢地连汉话也学会了。他现在的汉话大体上还说得不错，我和他谈话时，就是直接谈的，没有用翻译。他过去不会写俄文，现在也勉强能写了。他现在就用俄文把井上每天的工作记下来，王炳诚帮助他修改，过去他不会填自动工作记录表，王炳诚教他如何填。过去井架上的工作向例是由钻井技师支配的，但是在王炳诚的领导下，总是先问副钻井技师和钻井员的意见，要他们先动脑筋，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阿尤甫说，王炳诚经常和他谈党的历史、党的政策，有空时谈，下班在路上一起走的时候谈，有时上他家里去谈，使他的政治认识逐渐提高，并在1954年6月介绍他入了党。



王炳诚不仅关心着他自己的井，而且也关心着别人的井。他不仅帮助自己一队的同志，并且还帮助别的井上的同志。当他向沙布林诺夫同志挑战时，沙布林诺夫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快速钻井法传授给他。这种伟大的无私的友谊是多么感动着王炳诚，并使王炳诚受着多么深刻的教育啊！所以，凡是王炳诚自己学到的什么东西，他也是毫不吝啬地愿意告诉别人的。当别的井上一些年轻的中国同志来找他去看看什么时，他总是很热情地去看看他自己能不能帮助他们一些什么。

王炳诚每天从井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告诉他爱人的是这一天又钻了多少米。后来，当他每天从井上回家时，他爱人便先问他这一天钻井的进度。他的爱人钟珊告诉我：“他是那么的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即使回到家里，他脑子里想着的还是他的工作。作为他的爱人，我首先关心他的应当是他的工作，假如他一回来，我首先问他的工作，他就显得兴致勃勃，要是我忘了问他，他便显得不那么得劲似的。”

是的，对于王炳诚来说，工作是他的第一生命。除了他平常的工作时间外，不论是在深夜，不论是在刮着多大的风、下着多大的雨或雪，只要井上需要他，他总立刻就到井上去。除了在节日或一些特殊场合外，他总是终日穿着在井上工作时穿的工作服。他说，换来换去多么费时间！有时难得要去看一场电影，也要估计估计井上会不会有什么情况。有一次，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正和他爱人要上什么地方去，突然接到井上的通知，他连衣服也不换，拔脚就向井上奔。这情况就像波列伏依在《露中》叙述的热涅奇卡的丈夫的故事一样。

王炳诚是在1954年2月和他的爱人钟珊结婚的。结婚只有4天，他爱人便因为工作而从独山子调到乌鲁木齐去了。1954年4月30日，王炳诚领导钻的第52号井正巧钻完，领导上为了照顾他，劝他到乌鲁木齐去休息几天，看看他的爱人。他说：“没有时间啦？”井段段长库拉科夫说：“我给你7天假期。”而且，库拉科夫就用自己的吉普车把王炳诚送到了乌鲁木齐；那是5月2日的事。就在那天晚上，他和他爱人一起去看电影，那天演的电影正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他看到石油管理局局长巴特曼诺夫、总工程师别里捷、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以及一些积极分子如丹妮亚、罗戈夫在那样艰巨的环境里英勇地斗争着：在大风雪中输送油管、架设电话、开凿海峡……他是多么受到

感动和鼓舞啊！然而只看到一半，王炳诚忽而显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突然想到，他所领导钻的52号井，虽已钻完，但是还没有正式交给油田处。对于一个钻井技师来说，一个井从开始钻的时候起，一直到正式交给油田处止，他始终是应该负责的。而现在，井是钻成了，但还没有交给油田处，而自己却跑到了乌鲁木齐来！万一井上出了什么意外，谁在那儿负责？这样想时，他简直连电影都看不下去了，“到乌鲁木齐来玩玩！看着爱人！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以上！我是多么的糊涂啊！”他这样无情地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他决心第二天就赶回独山子去，他要对井负责。对公司负责，对国家负责。我问钟珊：“他第二天走成了没有？”钟珊说：“他决心要赶回去。第二天就带着他的手提包到石油公司运输站的门口去等车，终于在第三天的早上，他搭到便车回到独山子去了。”

1955年1月，乌鲁木齐。





张新泰 总主编
杨 镰 主 编

*Series of Western Regions'
Exploration*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新疆纪行

◎蒲熙修/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迪化印象	225
南山之游	231
焉耆的新气象	236
铁门关	242
库尔勒、轮台、库车所见	246
从喀什看南疆	252
和田的新生	259
莎车、阿克苏、拜城杂记	269
著名的吐鲁番盆地	276
编辑说明	283



迪化印象

1951年7月16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一部分同志，从兰州飞往迪化^①进行传达工作。四个月来的经历仿佛云海般汹涌在我的心头。从斗争最激烈的朝鲜前线，我懂得了为什么要打击敌人，应该怎么样打击敌人。从北京开始，经过天津、西安、兰州等地作了无数次的传达报告后，我一次比一次加深了在朝鲜的感受——爱与恨的界限。当你沉静在群众欢呼的海洋中，控诉着敌人的暴行，赞扬着我军的英勇时，那眼泪与欢乐凝结在一起的激情场面，谁能不为之深深地感动？我们谁也不再是孤独的人，谁也不能不放下沉重的包袱和人们一齐愤怒地高呼，一齐欢乐地歌颂！飞机飞了6小时，经过积雪万年的祁连山畔又飞到了耀目欲眩的天山顶上，越过了瑶池，前面便是目的地了。我们心中说不出的高兴，今天要和生活在遥远的边疆上的兄弟民族一齐欢呼，一齐歌唱了。

^① 迪化，即乌鲁木齐。

王震司令员、包尔汉主席、苏联总领事地米扬诺夫，以及新疆各族各界的代表们在飞机场已经等候好几个小时了。那大戈壁滩上的天然飞机场仿佛已被鲜花覆盖起来，各兄弟民族以他们最出色的民族歌舞来欢迎我们。我爱听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用不纯熟的汉语唱着的《东方红》，我更爱看那乌孜别克族跳的劳动生产舞。右边又传来了悠扬的声调：“过去是冰雪掩盖的沙漠，今日变成了美丽的花园。”左边一面舞着一面接着唱道：“劳动生产才能开鲜花，你要过好日子，就要劳动来发家。”美丽的新疆的面貌就这样呈现在我的面前了。

我们的汽车直驶省府第一招待所，那是过去新疆的外交特派员公署。我在新疆所见的一些官府建筑物都相当富丽堂皇，这不仅在迪化如此，就是在南疆各偏僻县份的专员公署或县政府也是如此。各地并都有容纳两三千人的大礼堂或俱乐部。这在内地各省份尤其是少见。这些建筑物都是盛世才“进步时期”在苏联帮助之下建筑起来的。这

伊宁市中苏友好协会新疆分会俱乐部





农垦战士

魔王一时的手法会给渴望光明的人以许多幻想，但他亦因而毁灭了更多的人，优秀的共产党员毛泽民同志、陈潭秋同志等以及许多的民主人士都死在他的魔掌之下。

盛世才把新疆变成了各民族人民的牢狱。我在迪化所遇到的人——自包尔汉主席至工作同志——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坐过他的牢狱。迪化大半个城，只要是大一点的房屋，无论学校、教会，或民房几乎都做过牢狱。在那苦难的年头，夜幕一下，人们只要听见汽车的声音，便是性命交关了。盛世才的爪牙到处在抓人，他们用一顶黑布大帽子在被抓者的头上一罩便把人带走了。人们告诉我说：“在牢中最能知道外面的政治气候。那时正当苏德战争的时候，如果莫斯科吃紧，那么在牢中的‘共产党嫌疑犯’便要受种种虐待，上电刑、灌辣椒水，饮食也减半。但我们忽然又会被罩上一顶黑帽子被带出去就医，这就是苏军打了胜仗了。”魔王的心情是这样地可鄙而可恨。

我们会见了王震司令员。这位为着人民革命事业曾受伤七处的猛将，正坐在这座大厦的办公室里为新疆各族人民筹划着幸福的生活。



他在新疆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像作战一般的用红绿线画出精密的水道，指挥军民生产工作。人们熟知他当年在南泥湾领导军队开荒的故事，人们信赖着他，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会把戈壁变为绿洲。办公室面对着白雪皑皑的天山。他望着窗外的雪山悠然神往地对我们说：“新疆很少雨水，有的地方终年不下雨。耕地面积全靠水利灌溉，这雪山上的雪水够3000万人口之用呢！”他又细算着这笔账：

“新疆13个民族现在只有530万人口。已开垦的土地军民一起共为1500万亩到2000万亩。全军指战员1950年原定开荒60万亩，但结果超额完成96.2万余亩，收获量为6500余万斤。今年不扩大耕种面积，抽调一部分人兴修水利灌溉工程但注意单位面积的收获量。今年全年共耕种98万亩，预计收获量为1.08亿万斤，据苏联土壤专家的估计，新疆可增加垦地至1亿亩；平均每人以3亩计，可供3000万人口之用。”

他回忆着过去南泥湾开垦的情况说：“这要比南泥湾的开荒困难得多，但其发展的前途是不可计量的。”

我们在他的地图上看见了一个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五年计划。这计划从1950年到1954年共修水利灌溉工程500万亩。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全军指战员将从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修建五条大渠——和平渠、南大渠、北大渠、胜利渠、红星渠，五大渠的主要干渠全长共为380.5公里加上支渠将为800公里。这些渠道完成后，新疆即将经营大规模的机械化集体农场。

我们从他的谈话中又看见了新疆工业化的远景。

“北疆将建立工业区。迪化附近正在修建的有苏联专家设计的一个全国最大的汽车机械修理装配厂，有自上海迁来的纺纱厂与炼钢厂。另外水泥厂、发电厂、制糖厂等也都已勘定地址即将动工了”。

“中苏合办的乌苏油矿及有色金属矿也都已开工了。明年乌苏油矿即将大量出油，乌苏的油质比甘肃玉门油矿的好得多。新疆的交通、工业、农业将赖以大大地发展。”

我这时仿佛觉得有几千辆拖拉机正在广漠的原野上驰骋，美丽的天山正照耀着林立的烟囱，新疆各族人民正在集体农场上、或正在各种工厂里愉快而幸福地工作着。这伟大的景象来到新疆并不太遥远了。



新疆各族人民正以加速的步伐迈向这伟大的前途。在迪化街头，我看见人们指着那与“督办公署”遥遥相对的天山大厦骄傲地说：“国民党时代造了几年没有完成的建筑，我们今年几个月便修起了。”天山大厦是省人民政府的办公厅，里面有大会堂与大礼堂，省府的各厅处都集中在此办公。我们曾和各族人民的领导人在里面举行过多次晚会并听过戏。那和睦的气氛与辉煌的景色，和当年督办公署那种望而生畏的建筑迥然不同了。可骄傲的事情多着呢！我们曾去迪化郊外30里的大戈壁滩上，参观红雁池蓄水库的修建工程。这也是国民党时代就计划修建的，但从来没有放过水。去年在人民解放军与民工们的忘我劳动下，那险峻的山坡上便出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今年5月初在这高大的建筑物的涵洞中流出来了一股激流。蓄水库的低放水闸近代化的工程宣告完成。这使3.6万亩地得到了水利的灌溉。预计今冬可完成高放水闸工程，灌溉的农田可增为6万亩。这不仅值得骄傲而



迪化市七区
六街的维吾尔族
群众从报上看到
美国侵略军进行
细菌战时，表示
无限的激愤



且是奇迹了。

抗美援朝运动更加快了新疆各族人民迈进的步伐。举例来说，我们到时，迪化市正在修建柏油马路。在我们做了传达报告后，迪化市各族各界人民展开了献工献款运动，来加速修好马路作为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工作。迪化原来是满目风沙的市区，但两个月后当我从南疆回来，它的面貌完全改观了。路面是那樣的洁净平坦，马路两旁的臭水沟也都疏浚一新，沟两旁砌了石板，沟底灌上水泥凝结的细沙浆，上面盖上新木板。清澈的流水从南梁一直流到北门外。这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人们这样做呢？志愿军的英勇行为给了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在生产部队中还有着这样一句口号：“我们要把新疆建设得像个美丽的大花园似的，来欢迎我们的彭老总回国，欢迎把红旗插遍大西北的彭老总到新疆来看一看。”

最动人的一件事是住在迪化七区五街的一位102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吾湖尼沙汗也订立了爱国计划，她要每月纺线增产180元新币买飞机大炮。（新币每元折合人民币350元。新疆于1951年10月1日改用人民币。我们到时尚未改，故此处仍以新币计算。）迪化的各族各界都订了具体而切实的爱国公约。我们走进办公室，或者每个家庭，常会发现墙头贴着各自的爱国公约。这是各族人民走向光明建设大道的里程表啊！

我从南疆回来正赶上迪化国庆日的大游行。12万人的都市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队伍。在那灯火辉煌之夜，各族人民以无限的欢腾检阅着自己的队伍，他们用智慧创造着自己的理想，首先是一列用彩灯扎成的“迪兰号”火车开驶过来了。人们用震天般的欢呼声迎接了这5年或者10年后的事实。接着飞机、坦克、汽车、轮船等各式各样的彩灯依次前进。秧歌队与民族歌舞队掺杂其间。“民族大团结”的歌声响彻云霄。我呼吸在这欢乐的空气中，我想到了北京的国庆之夜，我想念着毛主席。我心不能安，我走出了城郊。乌鲁木齐河正沿着迪化城西缓缓地流着，河那边成千只的羊群已经随着牧羊人晚归了。一队清澈的驼铃声仿佛正为这欢腾的都市奏着优美的节拍。北京啊，迪化啊！祖国的每一块大地啊！因为有了你——毛主席——才显得这般庄严与瑰丽。



南山之游

在迪化传达报告完毕后，包尔汉主席约我们到南山一游。

南山是哈萨克族的牧区，距迪化74公里。我真描写不出那是怎样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汽车走了两小时，便进入山区了。崎岖的山路，使得汽车时时抛锚，我们索性下车步行。满山的云杉挺立秀拔。它不是北京公园内的苍松，也不是朝鲜山头清秀的小松，它像一座座宝塔似的直耸云际。山脚边开遍了各色野花草。还是7月中旬的气候，我穿着毛线衣已感觉寒冷了。走过曲曲折折的山路，前面豁然开朗，那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原仿佛天然铺设的绿绒地毯一般。马、牛、羊群逍遥自在地在上面散步。这像神仙世界般的仙境却会被魔鬼盘踞着。远的不要说了，就是在去年此时，乌斯满的股匪还不时出没其间，去年匪帮们还拉去了120个牧民，320顶帐篷，以及无数的马匹。人民解放军前来肃清了股匪，哈萨克族牧民才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我们的来临，使得牧民们忙碌起来了。他们有的赶



着马驹子从下面山沟里担来了一桶桶的清水，有的骑在马上背来了一顶顶大帐篷。妇女儿童们一齐动手就在这绿绒般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这是一种游牧包，也叫着蒙古包，他们又在树根前搭起了炉灶，并且从羊群中挑选了两只肥大的羊来宰杀。空气是那么清新，景色是那么美丽，我们每个人禁不住挑选了马匹试马于天山脚下。他们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们那不熟练的姿势，他们时时赶着前来扶一把，教我们怎样骑得更好些。啊！我真陶醉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了。

试马归来，我们就在如茵的绿草地上和他们举行了座谈会。通过翻译，我们仅仅了解到：这里是南山最大的一个乡，共有300户人家。其中50户是牧主，但仅10户有牧场。最大的牧主有100匹马，50头牛，300只羊。中等人家有10匹马、10头牛、50只羊的（按：此地所谓的“牧主”恐怕也包括富牧中牧了。），其余250户都是贫苦牧民。有的一家七八口人，只有一两匹马，七八只羊，也有的什么都没有的。贫苦牧民终年为牧主劳动，但还养活不了全家。他们有的便只有靠伐木为生。

“政府目前应该帮助你们解决些什么问题呢？”我们问他们。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自古以来牧场便是有钱人的。”他们述说着他们的哀怨。“我们放20匹马、20头牛吃4个月的草，便要给牧场主3岁的牛5头。有时牧场主要钱不要牛，而我们的牛一时又卖不出去，那就不能不把牛贱价折钱，吃亏的当然是贫苦的牧民。因此我们希望政府的减租反霸政策要在各民族间无区别地执行。牧区也须要减租反霸，最贫苦的牧民应该无须乎再付租金了。”（按：新疆农业地区今年已普遍试行减租反霸，唯牧区尚未实行。）

“其次，”他们接着说下去，“贫苦的牧民一般是靠伐木为生。但自政府禁止砍伐树木以来，我们断绝了生活的来源。我们不知道树林中倒下去的废料是否还准我们砍伐？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更有另外救济的办法。”

和我们同来的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张邦英同志记下了他们的要求。他答应回去仔细研究后予以答复。

他们对于今日人民政府能够深入了解他们的痛苦并予以解决，感到莫大的欣慰。他们说：“过去官家人来总是住在大巴依家里（新疆



各族人民称老财为大巴依)，哪有我们穷人说话的余地？现在不同了，你们专来照顾我们穷人。这是毛主席的大恩典啊！”他们商议了一下，共同献出九只羊给我们。我们说：“毛主席关心你们，会知道你们的痛苦的。这些羊还应该留下来为你们自己用。”

人民政府给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他们最感激的是今年春天牲畜的口蹄疫传染病的防治。他们说：“过去牲畜患口蹄疫传染病而死的死亡率最高曾达90%。经过人民政府兽医专家深入的治疗，这种死亡率已经大大减少，今年只有10%，目前可以说已经停止了。”

牧民们长久以来所受的深重苦难不是一下可以解除的。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分局与新疆省人民政府曾派遣了工作组深入各民族地区调查。他们在牧区中调查到：牧民所受牧主与喇嘛在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的剥削，其程度之深已到了不能生活的地步。牧区蒙古、哈萨克两族的人口因此逐年在减少。这在新疆分局陆续编印的《新疆社会调查》中，都有详细的纪录，我不在这里多说了。我深信人民政府是能挽救这种危险的，我深信人民政府是能为各族人民谋求幸福的，我深信5年10年后再来到此地的时候，哈萨克族牧民们已经过着像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中所描写的库班哈萨克族一样美丽而幸福的生活了。

草地上的游牧包已经搭好了。包尔汉主席邀请我们进去聚餐。那是一个多么别致的餐会！地下铺着和田地毯，上面再敷上一层白色的餐布。我们在游牧包内坐成了一个大圆圈。各种果品，各色菜蔬杂陈着，其中最珍贵的当然是羊肉了。我们先吃用铁钎子穿起的一串串烤羊肉，再吃煮羊肉，再吃羊肉抓饭。哈萨克族人把最宝贵的马奶子端来了一大脸盆要我们当酒喝。这是发了酵的新鲜马奶。他们把马奶挤下后，便存储在大缸中。这需要随时用棍子在缸内搅拌，等过了两三天或一个星期马奶便发酵变成酒了。包主席殷勤地欢饮。他说，马奶最滋养人，他过去因坐牢而得的肺病全靠马奶吃好了。我们喝着真像酒一般鲜美，但喝不了很多。包主席却一天能喝上几大脸盆。在这种场面上哈萨克、维吾尔等族人民总是高歌曼舞以欢乐，而我们汉族人未免相形见绌了。



饭后，我们又参观了包主席的别墅，那是在山沟小溪旁用四个游牧包搭起来的，他的老母妻子儿媳及孙儿女辈祖孙四代都在此过夏，包主席每星期来此休假一日。他说：“母亲过惯了山中的生活，每年必携儿孙辈来此度夏，一尝游牧的生活。这真是恢复健康的好地方。”他们的游牧包中都有一个储存马奶的大缸。这在他们已为日常的饮料了。包中已生了火炉，四壁挂着鲜艳的和田毯，一切日常用品俱全。整日在青山绿水间，牧羊驰马于草原上，这是多么美满的生活！新疆各族人民健壮的体格、歌舞的传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今天人民掌握了这美丽的自然环境，这美妙的民族风光与优良的民族传统，更将无限量地发扬光大了。

夜幕降临了，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预备的两个大游牧包里已经铺上了厚厚的毡毯，包外燃起了熊熊的柴堆，我们便凭藉着这火光在原野上睡了一个舒适温暖的觉。清晨起来只见万道红霞，昨日的阴霾已经一扫而空，雪山显得愈加美丽，草原显得愈加青翠。黑白黄棕相间的牛羊马群早在我们面前散步了，我这时再不感觉寒冷。我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精神焕发，我今天要和哈萨克族的牧民们一齐歌唱了！附近的男女牧民们聚集了千人以上，他们是特地前来听关于朝鲜前线的传达报告的。抗美援朝的热潮早已流入了这草原地带，牧民们曾经提出实报牧税，就是抗美援朝的爱国工作。他们在有一次群众会上就曾检举过企图分散牲畜逃避税收的牧主马的牙，一位叫做哈季的贫牧虽然自己只有4只羊，不够起征点，但他也非要缴税不可。他说：“打倒美帝国主义人人有责！”

他们听了我们的报告后，又进一步了解了实际的情况，那一种忽而愤怒忽而狂欢的感情，深深地感动着我。哈萨克族真是一个最诚实朴素的民族，他们参加新疆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干部，被誉为最能脚踏实地工作的好干部。他们过去曾经深受乌斯满、司的克等匪徒的迫害，今日联系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暴行，每一个人不禁都举起手来高声喊出：“我们要坚决保卫我们的祖国！”一位牧民在听完报告后兴奋地流着眼泪，他牵了1匹马13只羊前来捐献。我一看，他就是昨天那位和大家商量要送9只羊的人，我们这时再不能拒绝他了。这是他对于祖国的献礼，对于祖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献礼！



猎人与鹰

哈萨克族牧民又以他们的民族歌舞及赛马、摔跤、刁羊等特技回答了我们的报告。那万马奔腾在草原上的雄姿，永远回绕在我的脑际。那彼此骑着马飞奔抢夺而争取一只已宰的羊，这种刁羊之戏是显得那般强健矫捷。最后他们又表演了哈萨克族男女追逐恋爱的古风俗。男女双方骑马追逐，男先追女；将及，女则拐鞭欲击，男又纵马急驰女则在后追赶。女终赶上以鞭击男，男女追恋游戏宣告完成。这仿佛是一首健康而美丽的古诗，这古诗真令人心向往。这别有洞天的南山蕴藏着哈萨克族牧民们的喜怒哀乐，我相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消灭他们的哀怨，发扬他们的喜乐。苏联库班哈萨克族的“幸福的生活”不久将要成为他们的美景。

焉耆的新气象

一、横越天山到焉耆

在迪化工作完毕后，我们分为四组到全疆各县进行传达报告，我参加第二组到南疆去。

从迪化到南疆越过白雪皑皑的天山，这是一段艰苦而有趣的行程。

7月28日上午10时从迪化出发，我们面对着耀目欲眩的天山南行，30里便入山区了。由葱岭到哈密，天山的重峦叠嶂，相错而不相接，像覆瓦般地横及在新疆中部。我们虽然进了山区，但天山仿佛仍是可望而不可即。再前行经过芨芨槽、柴窝堡便到了南北疆分界线的达坂城。达坂城海拔1100米。这时向东看见了有名的博格达山峰，前后左右也都是绵延的山势。我们一直仿佛行于平滩戈壁中真不知道是怎样上来的。前面的白杨河便是通南疆的大道了。这里有两条路：一到吐鲁番，一到托克逊。我们循后者而行。托克逊与吐鲁番都低于





海平面，为世界有名的洼地。夏天最热的时候室外温度常达华氏120度。我们傍晚到达托克逊，真是汗如雨下，坐卧不安。我们吃过晚饭在露天睡了半夜，于清晨2时便又起程前进了。黑暗中走过了渺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干沟，东方发白的时候我们已经爬上了海拔1680米的俄霍布拉山口。这时大家睁开了蒙眬睡眼，看着高耸的山势和嶙峋的怪石，不觉精神为之一爽。托克逊的热劲早被抛之九霄云外了。大家都已穿上了厚厚的绒衣，有的甚至披上了皮大衣。从此下坡西南行，天山便在我们的北面了。我们赶到库米什早餐，和硕午餐，于傍晚7时抵焉耆。

二、新的焉耆

焉耆为南北疆之咽喉，自古以来为战乱征伐之地，今日解放了，自有一番令人兴奋的新面貌。

焉耆城不大，只有两条比较热闹的道路，它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新气象的，但你接触到那里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你自会觉得这边疆上古老的城市正在急剧地变动着。我们所住的专员公署，是所有南疆各地公署县府中最古老的，因为房屋不够分配，所以办公室都挤在一处。今年夏天专署全体工作人员动员参加半日劳动，他们在后面广场上不到三个月便修建了十余间屋子。我们初到时还和他们挤着住，但等我们自和田归来，他们不仅把办公室布置得井井有条并且宿舍也有了。

这里的各族人民听报告是那样地动情而热心，2.9万人口中维吾尔族占70%。我第一次用翻译向维吾尔族千余干部作报告，我以为通过翻译的报告其效果是不会怎样好。但那天我从清晨7时报告到12时半，每一个人都在细心地记笔记，没有一个人显出半点疲倦之色，这当然要感激专署的好翻译热依曼同志。

他们希望有一架“焉耆号”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各阶层的人民都在节衣缩食地捐献。这使我在报告中不得不强调增产捐献，并且说明，政府绝不要人民因捐献而减低已经不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回答却干脆：“今天我们的生活问题总算解决了，为着抗美援朝，我们一



定要捐。”有个回族妇女听完报告后匆匆跑回去，把存了不知多少年的一段绸子送了来捐献。我深深地被各族人民的热情感动着。

在焉耆令我不能忘怀的是三个维吾尔族的巴郎子。维吾尔语男孩称巴郎子。他们三个，一个叫依敏（9岁）；一个叫乌沙尔（10岁）；一个叫墨罕默德（12岁）。我在第一天的欢迎晚会上便认识他们了，乌沙尔最淘气，他会用纸片撕成整齐的五角星，贴在自己的脑门或贴到别人的小帽上，他一次次地撕不完贴不完，这便引起我的注意了。这三个巴郎子每会必到，到必挤在最前列，于是我们熟识了。墨罕默德会说几句汉话，他便充当了翻译。我真怀念那小依敏。那天欢送大会上他赤着脚大胆爬上了主席台。他一一和我们握手为别，乌沙尔和墨罕默德也跟着上来了。第二天我们真要离开焉耆了，想不到依敏和墨罕默德清晨6时便等在专署门口来送行。他们说我们是两兄弟，乌沙尔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没去通知他。我们的汽车已经走得很远了，《牙夏颂，毛主席》的声音还是久久飘荡在我的耳际。（“牙夏颂”，维吾尔语为万岁之意。）

这种天真而诚朴的感情说明什么呢？中华各民族是个大家庭，在这里真正体现了。千余年来民族间人为的大仇杀，现在已经宣告永远结束了。在这新生的一代中正滋长着多么美好的民族友爱和睦的花苗呀！

我们只要再进一步看，就会看见这古焉耆的面貌是和全国各地一样，正以惊天动地的力量在改变着。

新疆所缺少的是水，但焉耆西门外的开都河却是一片汪洋，河床宽达300米以上。这焉耆的大富源过去不但没有被利用来大量灌溉可耕地，并且当春水泛滥的时候，还阻碍着西行的交通。1940年黄汲清先生到南疆作地质考察时，在他所著《天山之麓》中便载着：“曾被大雨阻于开都河畔。”如今这里已是长桥玉立，再无行路之苦了。驻此的人民解放军更利用了这宽阔的河水，正在开建焉耆南北两大渠，预计可灌溉耕地200万亩。开都河的上游为小裕勒都斯河，大裕勒都斯河及屯博克达岭水，三水合流至焉耆城西5里为开都河，东流入博斯腾淖尔（淖尔，维吾尔语为湖）后自淖尔溢出，西流至库尔勒为孔雀河。因此，这伟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完工后，将和开都河的上游与西



南的孔雀河等相联结，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灌溉系统。

我们曾参加了南大渠的放水典礼。该渠从去年10月便开工了，到现在已完成了一部分干渠，全长为80公里（支渠不在内）。当一湾清澈的流水自开都河南岸引入新的水泥砌碎石的渠道时，附近的农民欢声雷动。新渠道的水马上由支渠灌溉了附近一大片农田和没有开垦过的碱地。我们离开焉耆到库尔勒时，沿公路的两旁还都是荒荒的碱地，但等我们从和田回来时，两旁的碱地都已被一望无际的流水深深地浸湿泡过一冬，把碱泡了起来，明年便可以春耕播种了。北大渠今年7月才动工，全长105公里，预计三年完成。我真想象不出三年后自焉耆以北到和硕，和自焉耆以南到尉犁以西，这广大的荒原上将出现多少个机械化的集体农场！

我曾几次出焉耆西门，徘徊在那风光旖旎的开都河畔。美丽的雪山常隐约于变幻云层间。两岸垂柳如荫，三五红衣小儿女嬉戏于河畔。河里的鱼，有的比人还长。河滩低处，维吾尔族的渔夫们正在撒网捕鱼。向着雄伟的开都河大桥，焉耆名马正自远方驰来。（焉耆马与伊犁马皆驰名于世，焉耆马身材适中，善行走，伊犁马高大难驯。）这般美丽的景色，已经令人依恋不舍。将来周围的沙漠变成了绿洲，我真不知道又将是怎样的丰富的内容了。

三、“明屋”吊古

我们在参观南大渠放水典礼的清晨，由当地老百姓引导到焉耆四十里城的“明屋”吊古。（明屋，维吾尔语为一千间房之意。）我们完全行走于渺无人烟的沙漠中。到了目的地后，也不过仅是几个土堆而已，但还看得出来古时庙宇的残迹。这里的宝贝早让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盗窃一空了。我们此来考古，毋宁说是吊古。同行的向达教授曾在山前山后，每一处土墙中、每一个石窟中仔细觅见和考察。他终于找到了一两个残存的半截泥塑头像，那姿态之美完全和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记》中印的图片一般。那是印度极西北边流行的希腊式佛教美术的作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曾翻译为中文，中华书局出版。）我们正在痛惜新疆的古物被盗窃殆尽的时候，有人忽然在



一个石洞里喊着：“我发现了窃盗的证据。”原来在那壁画全剥落的石壁上有一行“湘阴蒋资生在此勘古”的题字。蒋资生便是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一再提到的他那中国好助手蒋师爷。向达教授首先用木炭在那题字旁面写着“一九五一年八月二日向达到此吊古”，我们大家依次题名于上。斯坦因前后四次来到新疆考古，他主要的任务是来测量新疆地形，绘制新疆最精密的地图的，他在新疆各地满载而归的几百箱古物不过是他附带的收获。

我们此行虽然没有有什么有关考古的收获，我们也更深一层地体验到人民解放军的可爱。他们在新疆的大进军中，在艰苦地开荒中，常常发掘了汉唐时代的古钱、古刀剑等而珍惜地交给政府保存。唯有人民的军队才能保卫人民的文化遗产。有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帝国主义也再不敢来侵略我们的边境了。

四、维吾尔族的“俚郎”

维吾尔族是一个善歌舞的民族，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以“俚郎”来表达他们的情感（维吾尔语“俚郎”即歌舞之意）。今天的“俚郎”也随着解放而有了新内容。焉耆的盛大晚会曾予我以深刻的印象。那天会上共有21场俚郎节目，并且有相当大规模的乐队伴奏。男女演员的民族服装都艳丽极了。男的穿着裕祥，是一种大衣式的。女的穿着轻盈的舞衣，长袖圆裙，和西欧的服装相似。21场节目大致可分为四类来说。

第一类是歌颂领袖的，如祝领袖健康，向伟大的领袖致敬等。大都是四五对男女边唱边舞，无数次地用手齐指着毛主席的像，告诉人们，是他给他们带来了光明与欢乐。

第二类是描述要求学习文化与参加劳动的热情的。如学习、学习、再学习，把戈壁变为绿洲等。这也都是男女合舞，在舞姿与歌声中表达了这种情感。

第三类是表现他们在学习与劳动过程中怎样克服困难的。这一类，大半由男女两人装扮成夫妇出场。或是男的不肯参加学习，而女的加以规劝。或是女的不肯劳动，而男的予以说服。我记得有一首歌



维吾尔族学员表演的新疆民间舞，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经常被约在各种晚会上演出

中女的唱道：“我要穿上海绸缎，我要吃抓饭，（抓饭为维吾尔族人最讲究之饭食。用羊肉加作料和米焖熟，以手抓吃。）我不愿意劳动。”而男的唱道：“不劳动便不得吃。”他们经过斗争后，女的终于觉悟和男的一起参加劳动了。

第四类是情歌。这是由康巴尔罕的学生娜汉演出的。康巴尔罕现去西安担任民族学院舞蹈系的主任。她的学生却能传其衣钵。娜汉共表演了三场，两场是独唱，一场是单人舞，都博得了最多的掌声。

这四类节目大致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今日的思想与生活的情况。

古焉耆的面貌在转变中，各方面表现了无限的新兴气象。等到将来焉耆完成了一切新建设后，我真想象不出这些欢乐的人们将怎样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他们将会舞得更欢，唱得更乐，创造出人间最美妙的景象。

铁门关

从焉耆到库尔勒的公路上有一个地方叫铁门关，我来南疆曾两过此地。我一次比一次地留恋着它。至今想起来，我还觉得悠然神往！

美丽的孔雀河从博斯腾湖溢出后，便顺着焉耆西南流到了库尔勒。在广漠无边的新疆旅行，看见有水处便已觉得欣喜若狂了，何况我们现在一直傍着这条河岸而行呢！两岸的山势有时高耸入云，有时又盘旋曲折。河身亦因山势而变化无穷，有时仿佛深渊莫测，有时又缓流见底，水草滋生。在这样渺无人烟的仙境中走了两个小时后，忽然前面有一片稻田在望，并有农舍三五散居着，这便是铁门关了。

汽车进了铁门关，需要办理登记检查等手续，我们便趁此游览胜地。那依山傍水的雄伟气势不用去说了。我最爱的是：那孔雀河流至此，因山势的关系，发出了奔腾万钧之力，而两岸则垂柳深沉，有的低拂水面，显着另是一番幽邃的境界。我们跑下河岸，坐在深入水中的柳树根上，有时俯身弄水，真觉得心旷神怡。对岸的





风景是更加引动人了。从隔岸望过去，树木深处仿佛有一栋别墅似的房子，房后有一大片果园，高高的山岭在后面紧抱着。我们找到了一条可通行的木桥走了过去。原来那别墅只残留着一个门面，里面残破不堪，主人早已不在了。这大概与民国当匪帮的驻军有关。那铁门关三字还是郑逆文义的题字呢！人民解放军来此后还无暇做清洗和修理的工作，他们最初仅在果园后面开了十几亩荒地，一面防守着关卡。现在又从事一个伟大的工程，这我将在后面再提到。果园中有着桃、梨、葡萄等各种果树。我初来时它们还刚刚结果，等我从和田归来，它们都已经熟透了。那有名的库尔勒香梨真是清甜可口，（铁门关距库尔勒仅20余公里，隶属库尔勒县。）那桃子个儿虽小，却比关内的水蜜桃还好吃。这些财产现暂归当地的驻军管理。

出了果园，便看见蜿蜒的山势了。随行的一位维吾尔族翻译指着那高岭的一个坟墓说：“这是塔依尔和柔和娜的麻扎。”麻扎是维吾尔语，即坟墓。这里传颂着维吾尔族人民的一段恋爱故事。当时我们的翻译没有把这段故事说清楚。后来我在库车、喀什、叶城等地曾连续地看了苏联影片《铁门》三次，据说这片子是完全根据这传说编摄而成的。这真是一段美丽的故事呢。

这故事是非常曲折复杂的，我这里只能说个大概，这是古焉耆王国的一位公主叫柔和娜和丞相之子叫塔伊尔的恋爱故事。他俩从小便在宫中一起长大并受着国王宠爱。后来那位丞相因为请求国王释放一位被关在死牢中的革命分子，又屡次向国王直谏，便失宠于国王，最后终于被国王暗杀了。这便注定了塔伊尔和柔和娜的悲剧的命运。塔伊尔的父亲死后，焉耆国王便干涉着柔和娜的婚事，不许她和塔伊尔再恋爱，要把她嫁给一个奸臣之子，绰号叫“黑英雄”的。塔伊尔被关在一个箱子里，顺着孔雀河水被放逐出境。他流出了国境后忽然被正在游船上的另一国的公主救起，那一国的老态龙钟的国王看见塔伊尔英俊有为，便想招他为驸马，并请他继承王位。塔伊尔却回答说：“你的财富和王位，加上你的公主比不上我的柔和娜的一个小手指头。”他顺着山路偷偷地跑回了自己的国家。

柔和娜自从塔伊尔被逐后，因为和父王争抗无效，便病倒宫中。国王为着使她恢复健康，假造了塔伊尔的信来安慰她。等她的健康逐



渐恢复了，国王又强迫她嫁给“黑英雄”。正当宫中悬灯结彩宣布公主婚礼的那一天，想不到这对情人又会面了。原来塔伊尔被边境上的老百姓装在箱子里当做“嫁妆”送到了宫中。被迫穿上嫁衣的公主正含着眼泪打开这箱子时，可爱的塔伊尔站立起来了。于是“黑英雄”进来和塔伊尔比剑，被塔伊尔击毙于剑下。这悲剧的结局是塔伊尔被处绞刑，公主到父王面前苦苦求情，也被愤怒的父王扼死在地下。当边境上的人民队伍赶来救援时，这对纯真的相恋者已经死去，人们沉痛地抬着并列的一对恋人的尸身，悲愤的唱起挽歌，以沉重的步伐缓缓地走向高山举行葬礼。我们所看到的那高岭上的坟墓正是当时人留下的纪念碑。这对纯真的相恋者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压力下虽然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但当时他们那种斗争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感谢苏联朋友对于我们兄弟民族的这种文化上的帮助。这部片子几年来在新疆300万维吾尔族人民面前放映过千百次而依然被他们爱好着——那真是百看不厌。这主要是因为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自己的美丽故事，维吾尔族人民自己的斗争生活。其次这部片子是译成了维吾尔语才运来的。这使他们人人看得懂，因此更加喜爱。我们关内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电影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那真是太少了。即使有一些影片运到新疆，因为没有翻译，使他们看着也茫然莫解，我想到新疆人民那种渴望了解祖国的热情，那种渴望获得文化的要求，我不能不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电影工作者呼唤：请多注意些边疆人民的工作，这是联系关内外人民最好的办法啊！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驻疆的人民解放军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新疆创造着奇迹。我在迪化时，曾听见王震将军说：“我们要在铁门关利用孔雀河水修筑一个水力发电厂。”我初过铁门关时，这事仿佛还没有影迹，但等我从和田回来，却已经开始动工了。他们正计划着把铁门关东面的一座山炸开，使绕山而流的孔雀河水能够直泻而下，以增加水力。这工程将于1952年完成，预计可发电2万千瓦，可供焉耆到库尔勒的全部电力。一车车的钢条、水泥、火药等正自迪化运来，一座座的帐篷已经在铁门关外。美丽的孔雀河水仿佛更加有力地为此



伟大的工程伴随着胜利进行曲。

这真是一个令人怀恋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那幽邃的景色，那美丽的传说和那正在进行的伟大工程。我不能想象当那神秘而幽美的仙境，一旦灯火通明，机声轧轧，将变成怎样壮丽而辉煌的人间乐园！

铁门关啊！我怀念着你，我更祝福你。



库尔勒、轮台、库车所见

新疆在地形上，从迪化越过天山便是南疆。但在行政的划分上，过了铁门关，才算真正到达了南疆。

广阔无垠的南疆的每一个县都是沙漠中的绿洲，我们常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奔驰几百里才到达一个县。县与县的距离，有时比内地省与省之间还大。现在的每一个县便是古时的一个国。古西域三十六国都在南疆的范围以内。

我在库尔勒初次领略了南疆的风光，它远离着南疆的公路干线。过了铁门关，在大戈壁上，远远地望见那隐约在地平线南端的一块长形绿洲，那便是库尔勒了。汽车折向南行，绿洲的面貌便逐渐呈现在面前了。我们到达绿洲后，曾横越小桥流水，傍着沿河的三五人家而行，又穿过杨树参天、柳荫遮地的整齐街道。一望无际的肥美的农田向你展露笑靥，丰盛的果园从矮墙上向你探首弄姿。这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境界啊！

南疆维吾尔族妇女的热情，我在这里深深地感受到了。我曾在果园中单独为维吾尔族妇女作了一次报告。



除了住在城乡的妇女外，还有远自二三十里外抱着瓜，排着队，举着旗子前来听报告的。那蒙面的盖头已经揭开了，那红艳艳的服装把绿油油的果园装点成锦绣一片。已经是8月初旬的天气了，这里的炎热依然未消。从树隙间射进来的阳光在她们因跋涉而疲劳的面庞上，又激发出粒粒汗珠。但她们是那样静悄无声地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坐下专心地听着报告。有时孩子烦躁得不安了，母亲赶快把带来的瓜给孩子吃以免搅扰会场。

我曾绕遍半个绿洲到离库尔勒50公里的苞头湖——部队的生产地——去做报告。那将近6000亩的荒碱地如今已是铺满了一片金黄色的麦浪，饱满的麦穗仿佛低垂着头在含羞地欢迎远客。我最爱的是那站在麦田里的雄赳赳的战士们。看，他们把枪支和坎土曼（在新疆，坎土曼是一种农业生产工具。）东一堆、西一堆地并列着。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闹钟。这已是集体化农场的雏形了。他们正在试用苏联的马拉收割机进行秋收。这种收割机每架每天可收割百亩上下，可抵50个人的劳动力。战士们还不怎么熟练地拉着马拉收割机赶入麦田中。马在前面奔驰，收割机便在后面把一片片的麦秆割断了。一队队的战士们随在后面把麦秆一捆捆地扎起来。附近的维吾尔族老百姓们都喜欢来看这种新式收割。他们常常带着自己种的瓜送给辛勤的战士们，战士们也就用自己劳动的果实来回敬。军民融洽得像一家人。新疆的农业集体化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新疆的生产部队中有着不少从湖南新招来的女战士。她们大多只有十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20岁。有的初中毕业，有的高小程度。这里的十几位编成了一个学习班，她们日出夜入地从事于修整棉田工作。一位身体胖胖，面庞红红的小女兵跑过来向我说：“你看我们是多么健壮，多么愉快啊！”我详细问了她们来到新疆的经过。她说：“不瞒你说，我们初来时还哭过鼻子呢！但现在已经过惯了部队的生活，我们喜欢向老战士们学习，我们可以锻炼得更好些。”其中有一位，上级要把她调做政权工作，她多日来都在闹情绪，她不舍得交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符号。我深深地向这些死心塌地在边疆为少数民族服务的他们和她们致敬！他们和她们都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共产主义的光荣！

报告完毕，我又参观了库尔勒的十八团大渠。这是引用孔雀河水

将来与焉耆南大渠相联结的一条42公里长的渠道，可灌地20万亩。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它是修得那么好，几个闸门都用石头水泥木板砌住。清流的流水已经放入，但可以随时开关。修渠中有一位女英雄叫吴梅苏的，原是关内的大学生。她来此后每天和战士们一同到五六里外的山上背石头。她曾创造了每天背17趟，每趟背80斤的最高纪录。新中国的好儿女无论在朝鲜前线或后方生产战线上都同样地以忘我的劳动精神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我们伟大的祖国怎会不强大起

中央访问团在新疆和阗举办的图片展览会上，70岁的维吾尔族老工人看到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照片，发出了由衷的微笑





来呢!

我们临别库尔勒的那天，在来道别的群众中我又再一次地看见了维吾尔族妇女们热情的脸庞。她们那明亮的眼睛仿佛照耀着这美丽的沙漠中的绿洲的前程。

轮台维吾尔族老乡们交纳公粮的工作曾予我以深刻的印象。这真像做喜事一般呢!男人们穿着新袷袂，女人们戴着满头的鲜花，他们打着红旗，敲着鼓把一队队驮着粮食的骡马或粮车赶向县政府，县政府后面的大粮库早就打开了。收粮的工作同志天蒙蒙亮便在那里等候着，老乡们笑嘻嘻地卸下粮袋来比较着谁的粮食好，女人们便在粮库前面的广场上佯郎欢唱。粒粒金黄的稻谷过秤后被倒进了大粮库里，人们看着自己辛勤所得的一部分果实贡献给了政府是感着多么轻松愉快!这是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啊!县长冉广田同志前来向老乡们问好，并表扬他们这种遵守政府法令、如期交纳公粮的工作，是抗美援朝的具体表现，是光荣的行为。老乡们兴奋地说我们以后一定要提早交纳公粮。这里洋溢着维吾尔族同胞们无限的爱国热情与朴实的作风。

“我觉得在边疆工作，”冉县长转向我说，“除了言语不通的麻烦外，其他方面比内地还容易呢!只要政府说是光荣的事，老乡们没有不踊跃以赴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把民族问题搞得乌烟瘴气。因此，我们去年的征粮工作还有些困难。今年不同了，人民政府一年多来建立了威信，今年又经过宣传动员后，你看他们是多么热烈地来交纳公粮啊!妇女在这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们督促丈夫儿子要把好粮食交给政府，她们生怕在大伙面前失了面子。”

那天从清晨到傍晚，一个乡的公粮共有10余万斤，它们全部被装进了一个大仓库。县府后面的空场上共有五六间大仓库，有的已经装满，有的还空着。他们的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了两三天，计划一个星期便可全部完成。我9月下旬从和田归来正碰见了这件盛事，我久久站在粮仓前面看他们那完粮的盛况不忍离去。过去听过我报告的维吾尔族妇女们认出了我时，她们纷纷把插在头上的鲜花拔下来送给我。我捧着一大堆鲜花真不知说什么好，那又感激又兴奋的心情简直使我说不出话来!

我们来到南疆有名的大城市库车县了，这里有回汉两城，县政府



在汉城，它的规模几乎与迪化的“督办公署”相埒，当然在建筑方面是远不及的。前面有着一排整齐而堂皇的两层办公大楼，后面有一个大厅作为礼堂，并且还带着一个花木丛生，屋宇豁朗的后花园。最令人瞩目的是那办公大楼前面的空地上放着两块未经雕琢的有石墩般大的碧绿色的和田玉了。我当时想，如果这两块大玉石搬到北京中山公园，那将受着多么大的欢迎啊！

据说这县政府是盛世才伪装进步时代，由当时的一位县长共产党员林基路起建的。林故县长的政绩，如城外的水利工程等，至今还被人们称道着。他在此地不到一年便被盛匪调回迪化，后来便遭毒手。

我爱现在的维吾尔族县长吾买尔同志。他日夜不息地为我们主持报告会。有一天忽然没有见他的面，原来他到距库车40里地的渭干河的水闸上为库车、新和、沙雅三县分配水力去了。过去三县人民为着争取渭干河的水力常闹出人命案子，如今每届春秋两季，三县的县长必亲到那里为三县人民公平分配用水量。

县政府里是热闹得很呢！各地调训的减租训练班及教员训练班的维吾尔族男女学员都住在里面。每当我从办公楼走向后花园去时，不论在前面空场上，或者后院的树阴下，以及花园的小亭子里，总看见他们一组一组地热烈而认真地在讨论。我们的抗美援朝的报告也是他们讨论的主题。有一天，我遇见他们在大月亮下还在讨论。我看见了一个仿佛熟识的人影——是那一位在我报告了6小时后还递上条子来说“这样的报告就听三天三夜也不厌”的女学员。我把翻译请来问她在讨论什么？她说：“抗美援朝的报告使我增加了阶级觉悟，我知道怎样做减租反霸工作了。”新疆的减租反霸工作正在各地热烈地展开。我在和田时，曾参观了重点试办的区域。我从和田回来，在这曾经熟识的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前面的空场上又遇到了这些曾经熟识的人们，他们是342人的一支大军，现正准备出发，到乡间去进行减租反霸。我怀着无限的兴奋向他们预祝这场战斗的胜利！那两块和田玉也仿佛在一旁默默地对他们闪烁着光芒！

库车的回城具有浓厚的本地风光，我们到的那天，正赶上了这里的“巴扎”（维吾尔语“巴扎”为集市之意）。回城原是个商业区，巴扎的日子，远近各乡村的男男女女都来到了。他们带着各自的货物前



来交易，他们欢腾得仿佛过节日一般。顺着大礼拜寺走过去沿街摆满了地摊：有菜市、肉摊、也有卖旧衣物和新皮靴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南疆特具风格的鲜丽的各色小帽了，这种小帽单独摆在一条街上，称为帽子“巴扎”。维吾尔族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春夏秋冬都戴着这种小帽。女帽用各色丝绒做成，上面绣着彩花，有加用金银线或珠子的。男帽比较朴素，有在黑绒上绣着白花的，亦有用红绿丝绒做成的。这都是些最精致的手工业品。最珍贵的要卖十五六个“天罡”一顶呢！（我们到时，南疆还盛行以银元计价，维吾尔语“天罡”即银元，现已渐形禁止。每顶最高价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上，也有两三万元一顶的。）库车的黑子羔皮是全国闻名的。我们走过了拥挤的人群，又回到了大街上看见了两旁挨门比户的皮货店。那黑色的小卷毛皮筒显得油亮亮的可爱，有的已经制成了冬天戴的苏联式的皮帽。这种子羔皮筒在当地只有人民币三四十万元一件，但运到关内，因为交通阻塞，价高两三倍以上了。

我们曾走向库车河的大桥上，这桥梁上的匾额，一面题着“龟兹古渡”一面题着“团结新桥”，库车是古时的龟兹国啊！现在的“佤郎”中亦还保存着库车舞，可见古来此地的歌舞是有名的。现在这里有些什么改变呢？驻此的人民解放军曾将库车山地中的石油标本给我们看，油质的纯洁比乌苏的还好，可惜产量不丰。另有煤、铁、铜、石膏、岩盐、硫黄、明矾等标本。这些矿产在山地中都是俯拾即是，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大量开发。

我徘徊在这古渡边也是新桥上，想念着它过去的光辉，瞻望着它将来的远景，我仿佛看见那支浩浩荡荡的减租反霸大军正开过那人群拥挤的“巴扎”为新的库车铺平道路。

从喀什看南疆

喀什是新疆古城之一，向有“小北京”之称。8月16日在库车工作完毕后，我们应王震将军之邀先去瞻仰古城。

一、回城巡礼

喀什那规模宏大的建筑，那浓厚的宗教气氛，以及那奇异的服装等都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它分回汉两城，彼此相隔9公里。回城在疏附县，为维吾尔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汉城在疏勒县，为喀什军区总部所在地。我们先巡礼回城。

城中心广场的艾提尕尔大礼拜寺是多么的庄严肃穆！这使人不能不首先研究南疆的宗教情况。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南疆14个民族310万人中（焉耆除外），有309万人信伊斯兰教。在喀什共有大小礼拜寺126所，每村有一个。据统计全疆共有礼拜寺在1万所以上。喀什并有经文大学一所，各地都送学生前来留学。宗教的





风俗习惯贯穿在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中。他们每天要做五次“乃麻子”（维吾尔语“乃麻子”为做礼拜），每星期五到礼拜寺去做，平时在野外在家里都可以做，只要向西天礼拜便了。在各地的报告会上，我们常看见那些虔诚者到了做“乃麻子”时便坐立不安。他们必须找个僻静的地方跪拜一番，再归座听讲。每当天未明或傍晚时，我们常看见阿訇的司号员站在屋顶上用两手捧着嘴巴大声吼叫，告诉人们做“乃麻子”的时候到了。在艾提尕尔大礼拜寺里更是盛况可观，那可容3000人的大教堂几乎跪满了人。

阿訇分五等，其中以有“毛”的最有权（维吾尔语“毛”为印）。维吾尔族人民无论婚丧喜庆，买卖房屋，以及诉讼等都要出钱请阿訇盖“毛”。大礼拜寺的地产收入亦归阿訇所有。如今政教分治，取消了阿訇的一半剥削。但人民并不反对阿訇——除非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或恶霸地主，他们需要阿訇带领做礼拜。人民政府也照样地尊重阿訇。各地的县人民代表会议中都有开明的阿訇被推选为代表。

经文学校里的文化干部，有些是不识字，所以学生等于瞎子念经，但他们有着宗教上的地位，因此依然受着人民的尊重。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化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宗教文化。政府没有明令取消经文学校，但上学的人毕竟没有过去踊跃了。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艾提尕尔大礼拜寺里的盛况，也有了很大的变更。9月12日我们从和田回来时，正赶上维吾尔族人民过库尔班节（回历新年）。他们认为在这一年一度的欢乐节日里到礼拜寺做“乃麻子”是头等大事。据说往年在那可容3000人的教堂里跪不下，台阶上、庭院中都跪满了人，估计有万人上下。

维吾尔族妇女是被封建宗教压迫最深重的，在喀什表现得尤为奇特。《可兰经》上载明一夫可娶四妻，因此维吾尔族的上层分子多妻是很普遍的现象。有些地主恶霸竟娶上二三十个妻子，有的甚至会达拥有300个妻子的最高纪录。她们一般在十一二岁便到达了结婚的年龄。今年5月喀什街头曾斗争了一个娶了8岁小姑娘的70岁老汉。喀什妇联主任赛立满同志说：“当那老汉抱起他那像孙女般的妻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的时候，那小姑娘嘴上还吃着梨，什么事也不懂呢！”我曾仔细观察喀什已婚妇女的装束。她们不仅在面部挂着一个



在喀什市国营百货公司选购商品

黑纱小门帘并且在头部还披着一件白布或白绸的外衣以便把长发辫全部遮起来。这种外衣叫着“阿克渤日旗”，袖子在背后，衣摆上叠起三道花边作为装饰，长久以来，她们的痛苦就这样被掩藏在这严封密遮的装束下。新中国成立后，她们热烈地要求参加劳动生产，她们在生产劳动时便再不蒙面了。她们只要能够经济独立，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也便可迎刃而解了。

喀什回城的市容，真不愧为“小北京”之称。城中心的广场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在库尔班节，那大礼拜寺的巍峨的门楼上坐着几个吹





打乐器的人，他们把节日的欢乐吹向广场，吹遍全城。人们穿着新衣来到广场，孩子们围着一个特设的大转盘轮流地坐上去旋转。大人们看着各种杂耍，或者三五成群地开谈着。最有趣的还是那些蒙面的妇女了，她们也夹杂在人群中游荡。

从广场伸展出去有六条大街。“巴扎”的日子，人群仿佛在沸腾。街面上分门别类地开设着绸布店、小帽店、蚕丝业、做银饰的、卖铜器的和打“匹甲克”的等店铺。（维吾尔语“匹甲克”为小刀。）刀长五六寸或七八寸，刀柄镶嵌精致的维吾尔族花纹。维吾尔族人民皆喜佩置于腰间。人行道上摆满了各式的地摊，新旧杂陈，五光十色。这南疆的市容毕竟不同凡响呢！

广场南面的新盟俱乐部是南疆最大的一个戏院，里面有3000座位并有转台电灯等设备。据说这是盛世才在伪装进步时代修建的。但建筑尚未完工，他已暴露出狰狞的面目。因此，原向苏联订购的转台机便没有运来，现在的转台是用人力推动的。维吾尔族人民经常在这里演剧或看电影，但男女是分座的。另有苏侨俱乐部亦经常为维吾尔族人民放映着苏联影片。这里还有《天南日报》社，每日出四开维文版一张。维吾尔族人民的娱乐似乎并不缺乏，但他们所渴望祖国的消息——无论电影、书报等方面——都太少了。

我曾几次地徘徊在这回城的街头。我在那汹涌的人群中感觉到了他们那从重雾中透露出来的欢乐曙光。

二、边防军

我们来到了喀什的汉城。它的外表虽没有回城热闹，但令人感觉着一种庄严的气氛。王震将军正在这里主持喀什军区党代表会议，南疆的各路英雄齐集于此。这里是建设南疆的原动力。

我们会到了温文儒雅的喀什军区政委王恩茂将军和领导生产的吴志杰师长，及守卫边境的陈占北连长等。王政委是王震将军的最好的助手，他和王震将军的一切辉煌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我们曾经从他的口里听见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南疆的伟大史诗，保卫及建设南疆的光辉景象。我们更从英雄们口里听见了许多具体的实例。我们这时才恍然



大悟，为什么王震将军要我们先来喀什了。

那千军万马进军南疆的史诗，我这里只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表明。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为着解放新疆的各族人民，在酒泉只停留了半个月后便继续前进了。据说，当年左宗棠为着进军新疆，曾经在酒泉准备了一年。我们的解放军从酒泉出发时只有400辆汽车，因此到了哈密、焉耆后，便全部步行了。某步兵团从阿克苏到和田曾于15天内横贯1560华里的大戈壁滩。这是一条从未开辟的路，比绕喀什大道要节省1000余华里。到1950年4月，共费半年的时间他们便已进驻南疆各主要地区同时他们又抽出一部分部队横越昆仑又进军西藏阿里区。

这几句话里包括着人民解放军的千辛万苦，也包括着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的无限喜悦！

人民解放军到达南疆后，主要的任务是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他们兴奋地审视了南疆的地形，原来它是这样地有利于建设，成为祖国大后方的工业基地。它的西北边境和苏联毗连，这里虽然隔着大山但仍有两条公路可通。这两条公路曾在盛匪世才反动时代被破坏了，他们首先便进行修复工作以便得到苏联的援助。它的西南边境和阿富汗、印度相邻。

我不想多说他们怎样修复公路的工作了，但那大雪山中守卫者的英姿是必须一提的，以便了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祖国边境还有些什么阴谋。南疆西南的蒲犁县^①是边境上的重镇，它比山西省还大，人口却只有10 000左右，大半为塔吉克与柯尔克孜两族。

这里四面都是大山，有云便下雪，6月雪是常事情。每日午后起大风，风大到使人睁不开眼睛。人民解放军来边境后先修建营房，并打茅草、拾马粪，以烧热炕。他们又开荒种青稞及蔬菜。青稞的收获很好，蔬菜的成绩不佳，因此一般食物还是要从喀什运去。从蒲犁到喀什没有公路只好用牲口运输。有时接济不上常常就没有菜吃。尽管在这样不毛之地，战士们精神依然旺盛，在蒲犁边境上有六个关

^① 蒲犁县，即今塔什库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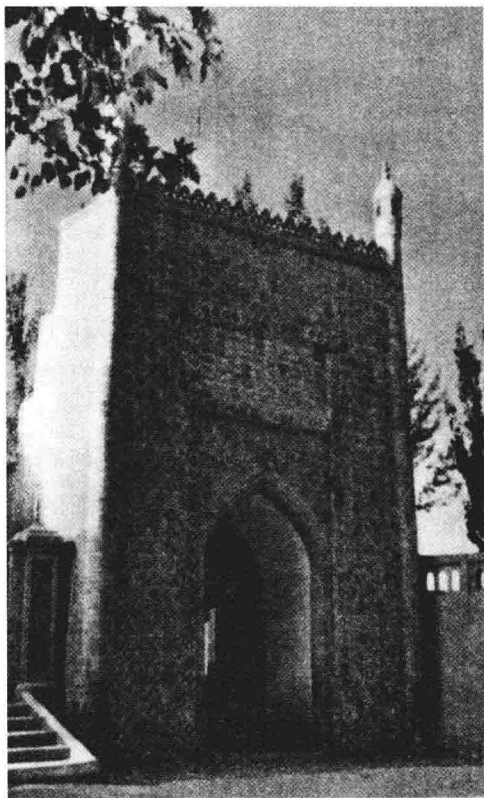
卡，原定每两个月换班一次，但他们常自动地请求不换。

边界上现在除了从麦加朝圣回来的人外，很少过往旅客。一年多来曾经发生过这样两件事，一是逮捕到一个从明铁盖跑到坎巨堤去的国民党匪帮的特务，一是逮捕了两个形迹可疑的巴基斯坦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前者是塔吉克族人，已由蒲犁公安局审问明白，后者已押解到喀什。

驻疆的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战士们在集体劳动中发挥了无限的智慧，他们自己设计就地取材修起了一座177间的大营房，外表是那样美观，里面又是窗明几净。45岁的老战士朱春林曾在天津、东北等地当过13年窑工，由他负责设计了三个大砖窑，为这座营房烧了全部的砖瓦。门窗与铁合叶，都是由他们自己的铁木工厂制造的。附近山中有一种泥土刷在墙上，便是美丽的天蓝色，除了玻璃外一切都是自制的。参加劳动的500战士就要从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搬进去，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了。吴师长把营长叫来说：“你当初不是说什么也不懂，怕不能完成任务吗？现在又怎样搞的呢？”营长回答说：“人民解放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战士们个个是专家！”

三、喀什名胜

香妃墓的外景和艾提尕尔大礼拜寺相仿，但壮丽则过之。那高大的门楼和四角的圆柱全用蓝白相间的琉璃砖砌起，光辉夺目。墓门经常锁起，管墓的大阿訇前来为我们开了门，上面的大圆顶已于三年前倒塌了，下面的墓地上整齐地排列着大小68座坟墓。那些坟墓原来都用玻璃花砖砌起的，但当大圆顶塌下时压坏了很多。后来修过的，只是敷着土坯，便没有那美丽的外形了。前面第一排校小的两座，是香妃和她的母亲的坟墓，墓前竖着一块回文石碑，以为标识。其余66座，据说都是香妃的祖先们。从墓地的四角落里都有台阶可登临屋顶上的小阁，墓外有建筑精致的大小礼拜寺两座，并有景物幽美的水池、柳荫和果园等名人胜地，令人流连不忍离去。维吾尔族人民景仰香妃的心情至今未衰，他们正集资准备重建那倒塌的大圆顶，他们每



新疆喀什的名胜——香妃墓



届库尔班节总是成群结队地前来墓地膜拜。我深深地体验着他们这种深厚的民族情感。在今日民族平等的新时代，这种民族感情是被尊重的民族间的友爱和睦不正像亲兄弟一般吗？

此外喀什的古迹还有回城东南角上的耿恭台和小阿图什的千佛洞。前者为全城最高处，登临其上可俯瞰全景。耿恭为后汉时的“名将”，后者在高山悬崖上共有三个石洞，原是古代文明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最好的宝藏。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中国也已掌握在强大的人民手里，我们再不怕什么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了。

喀什今天在人民解放军领导之下，各族人民将踏上光明的建设大道。它是西北国防的重镇、它是后方工业建设的基地。从喀什瞻望南疆以至全中国，我真感觉无限的喜悦。



和田的新生

从喀什南行，经过莎车后，我们度过了南疆的第一大桥——叶尔羌河大桥。那桥的南端耸立着两块高大的匾额，上面写着“南出昆仑”“北入瀚海”。这又是一个新境界了。广漠无垠的戈壁滩显得愈加辽阔，远远地被旋风卷起来的沙柱子像一座座山头似的高耸入云。我们已到达了南疆的南端塔里木大沙漠的南缘。从此沿着昆仑山北麓东南行，便进入和田区。和田区包括皮山、墨玉、和田、洛浦、策勒、于田、民丰七县。和田专署设在和田县。我们一部分同志留在专署所在地工作，另一部分同志又远去策勒、于田等地。

一、和田的手工业

古老的和田仿佛边疆的一颗明珠，它的辉煌的手工业品长久以来便被人们称道着。著名的和田玉、和田毯、和田绸等的发展历史说明着和田社会的变动。和田原是产玉的名乡。



从昆仑山上流下来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流过和田、墨玉两县，为和田人民带来了美丽的玉石。前者亦名白玉河，以产白玉著名；后者又叫墨玉河，以产墨玉著名。据说另外还有一条绿玉河，但现在已不知河身所在了。人们守候在河畔就会发现从昆仑山上冲下来的晶莹的玉石。玉工菊曼说：“寻找玉石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我们常等十天半个月没有拾到一块。有时在月夜下，玉石忽然来到了，那就必须连夜寻找，否则第二天又不见了。”晶莹的玉石，大如石墩，小如鹅卵。在库车所见的两块千斤以上的大玉，在和田反而少见。

和田东街上的一条著名的玉石“巴扎”显得冷落了。过去有七八十家玉工，现在只剩了四五家。他们费尽心血雕琢出来的玉杯、玉镯、玉戒指以及文房四宝等，不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现在只剩了图章和烟嘴等还有些销路。真正以玉石雕刻出来的东西不多，一般都以“卡瓦石”来代替。“卡瓦石”是凿自洛浦东山上的玉石，它亦分黑、白、绿三种，但不如真玉的质坚而色润。一个玉工用“卡瓦石”雕刻一套酒杯（10只）需要7天，价值约在3.5万元到7万元之间。图章或烟嘴的每个售价为3500元，一人一天可做10个。玉工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现在只有转业一途了。玉石业的好转只有等待将来人民生活提高之后。因此，玉石“巴扎”的暂时没落却象征着和田的新生。

鲜艳美丽的和田毯曾经是遐迩闻名。和田毯过去虽和和田玉一样是为地主、贵族阶级服务的，但它却有着发展的前途。过去维吾尔族地主阶级是用它来挂在墙上，垫在床上，铺在地下的，而现在已经把它发展为正规的地毯业了。羊毛与棉线都是本地的出产，所以成本不高。当我们走进专署接办的地毯工厂时，那已织成和未织完的各式美丽地毯真令人爱不忍释。维吾尔族人民喜欢强烈的色泽，如大红、大绿、正紫、深蓝、金黄等色，但他们却把它们配合得那样谐和而别具风格。毯子的花样有维吾尔族图案、苏联洋花和中国古花三大类，以第一类最受欢迎。全厂共有织工400余名，每月可出丈六、丈二、八五、四六等大小尺寸不同的毯子六七十条。以四六毯为例（四尺宽、六尺长），两人12天可以织成一条，价格为35万元。工会主席关逊尼



丰收时刻

牙孜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这里工作，等于无偿劳动。我们辛辛苦苦织就的毯子，都让官僚、军阀拿去了。我们工人简直吃不上一顿饱饭，不要说领工资了。”现在工人的生活虽然还没有很大改善，但已有了保障，所有的成品都由省贸易公司负责收购，运到迪化销售。他们欢迎各地前来定货，任何花纹、任何尺码，都可以定织。北京苏联大使馆大客厅里的一条维吾尔族图案花纹的大地毯，便是和田厂的出品。

和田的地毯业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织毯工人仅和田县即有1500余人，据说洛浦县还要多。现在除了在工厂工作的以外，其余都是家庭手工业者。由于本地没有销路，加上交通不便，地毯业的发展还暂时有困难。这般美丽鲜艳的和田毯能够远销到关内就好了。现在天兰路已经完成铺轨工作，兰迪铁路的修建也不是太远的事实了，到了那时和田地毯业将有着飞跃的发展。

蚕丝业在汉唐时便传入和田了。和田蚕丝业的兴衰充分说明了和



田政治上的征候。

最可惜的是40年前被斯坦因在和田古都城附近丹丹乌里克沙漠中盗窃去的有关蚕丝业起源的一幅版画。那幅版画上画着一位头戴高冕的中国公主，旁边放着一篮蚕茧和一辆纺丝车，另外有一个侍女跪着以手指冕。^①据说这位公主就是把蚕丝业传入和田的第一人。当时由于禁止蚕种出口，她把蚕种暗藏于帽内携出。和田为着感谢她的可敬计谋，奉她为神明，并在古城附近建筑了庙宇来纪念她。这虽然属于古文物的事情，但与蚕丝业有关。和田蚕丝业是有着多么美丽的一个起源啊！

和田蚕丝业据说在唐朝时已经盛行，后来又传入了印度种；但此后，因为养育不善，故产量不高，丝织品极为落后。远的不去说了，现在具有史籍可考的1935年说起。

在盛世才前期，和田蚕丝业得到苏联的帮助曾经有过一个极盛时期。1936~1941年期内苏联曾大量输入蚕种，免费发给农民饲养。最初每年为一两盒，最高曾达10万盒。1941年南疆（包括和田区6县及莎车、叶城共8县）生丝产量曾达51万斤。1942年生丝出口达25万斤。

盛世才后期反动劣迹暴露，苏联蚕种即未再输入。但在这时期曾由内地聘来专家。技术人员30余人。他们曾在和田设立了蚕丝试验场，并曾到各地指导农民养蚕制种工作，大量推广了中国种。同时在各重点地区设立了织绸厂。因此，那时的产量虽不高，但对缫丝及织绸的技术有所改进。

1946年冬，聘来的技术人员纷纷返回口内。国民党反动统治变本加厉，贪污横行。蚕种场发出的蚕种，不经检查，不论有病无病，一概用强迫手段发给农民饲养。农民把它叫做“哄人种”。从此和田的蚕丝业便一落千丈了。1950年据和田区的统计，仅产生丝8000余斤。

我们参观了和田郊外新疆省立的和田蚕丝试验场。这是接收过来的一个场子。接收时该场只剩了蚕种3000余张，现在又已培养到3万

^① 此画见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插图第31幅。



张。该场的工作人员正在仔细地用显微镜检查蚕种，好的储存起来，坏的全部烧掉。该场负责人说：“新疆如果再不解放，此地的蚕种就要灭绝了。”

该场的蚕种现有苏联种及中国的中农29与华字7、8、9、10等种中国种。中国种较苏联种抽丝多，并且丝质洁白，但其缺点是抵抗力弱，不如苏联种之耐寒热，容易饲养。因此，维吾尔族人民都愿意饲养苏联种。现在该场正在试验中苏交配种，交配到第三代后，可以吸取两种之长处改良蚕种。

农民饲养一盒或一张蚕种的收益，可以等于四五亩地的收入。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把桑叶打下来喂了羊，桑皮剥下来买给造纸的人。但今年不同了，今年他们又信心百倍地爱护着桑树，争取着养蚕。农民派司买哈艾提说：“今年养了一盒蚕种，结果使我买了一头牛。我来年打算养10盒，一个月不睡觉呢！”

和田织绸业还显得落后，有待于内地的技术人员前去协助。现在织出的有白绸、手绢、百合绸及夹线绸等。后一种特具民族风格，那红绿蓝相间的宽条花纹是显得多么艳丽谐和！此绸质地厚实，维吾尔族男子都用以制作外面穿的袷袂。维吾尔族女子都喜欢外来的轻盈的印花绸。

此外，和田的手工业还有棉纺、制革、造纸、制帽、采金、冶铸及织羊毛等等。其中以棉纺业最有发展前途，因为和田气候温和，适于种棉，并且这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驻此的人民解放军又大量收购羊毛，运输出口，并设立了洗毛场。这对于维吾尔族人民的经济收入，也有很大的帮助。洗毛厂的女工一边在水池里脚踏手洗着羊毛，一边歌唱道：“人民解放军来了我们能够劳动生产，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

二、和田的减租反霸运动

去年9月初旬到达和田的时候，这里正在重点试办减租反霸工作。和田虽是边疆上的一颗明珠，但这颗明珠还深藏在千年的古墓中。古老的和田的翻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一个时期还是封建前期农奴制社会的活标本。直等到经过这次减租反霸运动，它才扳倒了千年的大石，苏醒过来。这里好多农民都说：“新疆新中国成立一年多了，我们依然不懂得什么叫新中国成立。这次减租反霸运动，才把我们真正新中国成立了。”

和田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有农奴制、租佃制以及高利贷三种。后者除了剥削程度比关内更为严重外——一般地租在70%以上——其方式是和关内相同的。但第一种是和田农村特有的现象。这里的大地主都有几千亩土地，甚至有达万亩以上的。他们经营这些土地不是靠租佃关系，而是靠比租佃关系更为残酷的农奴制来剥削农民。地主将占有的大量土地，分出一小部分给农民耕种。种了这一点地的农民就必须无偿地给地主耕种绝大部分的土地。同时他们的身体也失掉了自由，不能随便脱离关系，并且可以被地主任意买卖。这是封建前期的农奴制社会的现象。这在关内已经是千年以上的陈迹，就是在南疆其他各地也都少见。我现在引用墨玉县扎瓦区第一乡的情况来具体说明这个问题。

扎瓦区一乡是封建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这里的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上的权力都被掌握在几家“霍加”的手里，其中尤以买买提力汗“霍加”、艾合买提汗“霍加”为代表人物。^①

该乡原是一个荒凉的戈壁滩。后来因为有了水，劳动人民才逐渐地把它开辟了出来。买买提力汗霍加的曾祖父本为传教师毛那阿訇的随员。毛那阿訇自麦加前来传道，在这里建立了教经堂，于是被人尊为“圣人”。劳动人民从此要将耕种所得的一半交给教经堂。毛那阿訇死后，买买提力汗的曾祖父便承继这笔财产，传到买买提力汗手里，已有9000亩地、60家农奴。艾合买提汗霍加原是个贼娃子。他依靠马虎山的一个副官——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伪法院长的势力，把朝圣未回的阿里木汗的2000亩地和70多户农奴霸占了过来，于是成为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霍加”们自称为圣人的后代，他们要当地的老百姓每日前来请安，他们荒谬地说什么：霍加用过的东西谁都不许用，谁用了手就会

^① 维吾尔语“霍加”为地主乡绅的尊称。



烂；霍加说过的话，谁都不许说，谁说了嘴就会长疮；霍加走过的路，谁也不许走，谁走了脚就会跛；霍加坐过的地方，谁也不许坐，谁坐了屁股就会肿；霍加看过的东西，谁也不许看，谁看了眼睛就会瞎。

农民无偿地给霍加种地、分全劳动与半劳动两种。全劳动的需要整年累月地给地主劳动而没有一点自由；半劳动的在10天中，5天给地主劳动，5天给自己劳动。全劳动的可分到12亩到15亩地，半劳动的可分到1亩到12亩地，但地权仍属于霍加。农民给地主种地除了种子由地主供给外，其余农具肥料及口粮等皆由农民自出，而全部收成都属于地主。他们白天给霍加劳动，自己的地只好在晚上偷偷地耕种，有时被霍加知道了还要毒打一顿。农民分来的荒地刚刚种熟就要

维吾尔族人民学习汉族的秧歌舞





被霍加收回去，高价转租给中农，再分得还是荒地。有时正是农忙的时候，霍加要造房子，农民只有抛下了自己的庄稼老远地去背石头，搬木料。有时农民还需出石灰，全劳动20秤、半劳动10秤，没有的，就以包谷折合。这样农民们便永远还不清地主的债，几十年，几辈子都得给地主当农奴。120岁的肉孜阿洪在控诉时说：“我家就这样给霍加当了四辈子奴隶，我至今没有吃的只好吃桑子。”巴吾提是全劳动，分到了17亩地，一家7口都得给地主劳动。因此，自己的地就无法照顾，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总是没有吃的，要向霍加借。这样年年借，年年还不清。他已当了农奴17年了，霍加的庄园里色色俱全。几十家农奴分门别类给他种地、榨油、做靴子、烧饭、喂羊、喂马、放骆驼，甚而捶背捶腿也有专业的。另外养着一些狗腿子专门给他做生意，管钱财，鞭打农奴。霍加们吃饭、穿衣、走路、大小便都要农奴服侍。农民们控诉说：“霍加除了里面的裤子自己穿外，其他一切不动。挽扶的时候嫌我们手粗，要垫上棉花。有时棉花没垫好，就是一顿打骂。”庄园里私设着各种刑具！大梁上挂着铁滑轮，地下摆着格杀勿论棍、大头棒及各种大小的皮鞭等。被买买提力汗打死的农奴，有姓名可查的，有11人，被艾合买提汗杀死的有7人。

农民们的控诉大会就在这个庄园里举行的，那惊天动地的哭诉把千年的阶级仇恨像怒潮般地掀动了起来。八九十岁的老头子指着铁滑轮控诉着当时被吊打的惨痛情景，年轻的农民们怀着深仇宿怨，倾倒着苦水。维吾尔族妇女们所受的罪孽更是深重了。吐尔逊尼牙孜说：“我7岁上，因为父亲欠了霍加的钱，被卖到这里。当时小恶霸（地主的儿子）把我当驴骑，把我拴在驴棚里，和驴一块儿睡，让我吃驴粪。11岁上，霍加叫了个依麻木给我念了经，要我和他睡，第二天霍加给了我六档子花洋布，但被他老婆知道了。她恶狠狠地把布抢过去，把我吊起来了毒打，打得我死去又活来。有一次要我洗血裤子，洗过后又要我喝那脏血水。我至今恶心得常要吐。”……又据那个念过经的依麻木供认说：经他手给买买提力汗念过经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就有三个，其他的人给念的还不知有多少。

从霍加庄园里清查出来的几箱卖身契约，更充分说明了封建前期农奴制社会的残迹。这些契约大半都是由于农民还不起地主的债，而



自愿将亲生儿女卖给地主时立的字据。这些字据上都特别注明：“我儿如在工作期内死亡，买主不负责任，但如有逃亡等情，由我负责。”有的是永远卖绝的，有的是卖二三十年的——到1960年或更远的年代才满期。另外有一张是地主立的字据，上面写着：“农奴乌沙尔等3人原是我父留给我的动产，我现在把他们释放，从我的动产中除去。”但这3个农民都已是70以上的年纪了。

农民们控诉后，一个个地睁大眼睛望着毛主席的像。他们好像愣住了似的想着他们的心事，那衷心感激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他们说着无穷无尽的感激话：“我们天天祈祷救星来，现在果然来了。这救星就是毛主席！”“我们过去像戈壁滩上的一条虫，吃没、没喝快要死去了，感谢毛主席把我们救活了。”“今天我们减了租反了霸好像快枯死的草得到了甘露，从此可以长得茂盛了。”

我们后来又在和田三乡、五乡参观了减租反霸运动，其情形大致相似。那愤怒的火焰，那欢乐的新生，使他们的泪水掩盖了笑容，笑声里又带着呜咽。他们所受的痛苦之深，在关内参加过土改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他们那种获得新生的感觉真像是从古墓中又回生的人！

三、和田的新生

新生的和田农村很快地呈露了一片新气象。那封建前期农奴制社会的活标本就要送到历史博物馆去了。我们同行的向达教授曾建议：北京历史博物馆正要举办封建前期农奴制社会陈列室而没有实物标本，那些霍加的家谱、刑具、卖身契约等都是最能代表那个时期的实物标本，希望即能运京。农民们解脱了千年的镣铐后，立即像生龙活虎般地干起活来。在农民们的坎土曼飞舞下，玉龙喀什河畔的大荒滩立时变成了可耕的土地和新田园。几百间房子修盖起来了，几万棵果树、桑树、杨树种植起来了。过去没地和少地的农民从这片新田园上得到了自己的土地。这还是仅仅减租反霸后的新气象。

另外，如上所述的，和田的辉煌的手工业已从为地主贵族阶级服务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它的发展前途虽然还有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但毕竟走上了坦途。我们实在觉得无限的欢喜。

和田所以长久以来停滞在封建前期的农奴制社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新疆南路湮没，以至它与世隔绝。现在新藏公路修通，而它由皮山又可直达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又为国际通路的要道。同时它的经济基础良好：一方面是气候温和，适宜于农耕，又不缺水；一方面是有着深厚的手工业基础。新生的和田有着无限灿烂的前途。这颗古老的边疆上的明珠从此将发出崭新的光芒。





莎车、阿克苏、拜城杂记

我们在和田工作完毕后，便循原路往回走了。回程中的所见所闻和过去所未谈到的几个地方，至今回旋在我们的脑际。这虽是些零星的回忆，但却是几件非常新鲜的事呢！

一、维吾尔族的话剧

善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民也是话剧演出的能手。在莎车及拜城黑孜尔镇上的两次演出都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南疆正在进行减租反霸运动，因此，这两剧的内容都是有关减租反霸的。维吾尔族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搬上舞台，那份生动的感染力是非常魅人的。我从他们的话剧中更熟悉了他们的生活。

在莎车演出的是苏联维吾尔族作家编写的《富农与雇工》。苏联各族人民在革命前所遭受的压迫，大致与新疆各族人民不久之前的情况相仿佛。因此，这个剧本在此时此地演出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教育意义。它受到当



地人民极大的欢迎。

莎车本是南疆四名城之一。莎车回城的人民公园为南疆第一大公园，我们那天在这名园里作了抗美援朝的传达报告后，晚上便来到隔壁的新盟俱乐部的露天剧场里看戏。阵阵的荷叶清香与玫瑰花香不断袭来。舞台上临时安上了电灯，灯光布景俱全。新盟文工团演来细腻极了。

这是一个五幕剧，第一幕描写大巴依家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舞台上除了满是精美的和田毯铺设的房间外，另一角上还布置了一个葡萄园。大巴依有了三妻四妾侍候外，又在向雇工的一个美丽的妻子调戏。第二幕描写巴依他们围坐着共谋迫害雇工。第三幕是雇工被诬赖偷了巴依的东西，他被吊打得死去活来，被乡长关在黑牢中。第四幕，雇工的妻子披上锦缎上场了，她被巴依霸占后苦念着雇工。巴依的三妻四妾想尽方法在陷害她，把她新生的婴儿泡在滚水中烫死。巴依回来大怒，想把她置之死地。第五幕中，这可怜的人儿毕竟跳井死了。这时雇工忽然越狱前来相会，但太晚了。雇工怀着深仇宿怨离去。他那愤怒的目光，坚强的决心，留给观众无限的战斗的精神。

我们虽然言语不通，但都能了解其中的大意。我望望四周的观众，大半都是白天听报告的人。他们像白天一样地有时流着眼泪，有时又燃烧着复仇的眼光。

在拜城黑孜镇上的演出有着另一番情景。那也是一个晚上，在那荒僻的小镇的广场中心的一个土台子上，由该地减租反霸训练班的学员们临时装置了一个舞台。四盏豆油灯高挂在四角的柱子上，周围挂起幕布分成了前后台。演员就是当地的积极分子和减租反霸训练班的学员们。远近的乡民们听说有戏看都扶老携幼地前来了。我真想不到，在这样简陋的地方有着那样精彩的演出。

这也是一个减租反霸的戏，共两幕。第一幕将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强烈地对照着描写出来；第二幕又把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主的恐慌与新中国成立时农民们的欢乐对照着描写出来。这本来是非常一般化的事情，但由于这是真实的生活，他们演来竟那样的深刻动人。终场时台上台下舞成一片的景象，更显示了今日维吾尔族人民的欢乐生活。

善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民有着非凡丰富的艺术才能。他们将随着



生活的改善与建设的进展而创造出更美妙的艺术来！

二、农民的发明与战士的创造

我们曾参观了莎车郊外的农村。这里传说着一些农民们的新发明：骆驼刺上长西瓜，苜蓿草上长麦子，桑树上结棉花。

骆驼刺是沙漠中生长的一种植物；苜蓿草在荒瘠的土地上便可种植；桑树在莎车郊外很多，因为这里也是养蚕区。我们沿着白杨环绕的村庄与流水潺潺的农田走了很久，想亲眼看看这奇迹和发明这奇迹的人。最后毕竟找到了一位叫着阿不都拉阿洪的农民兴奋地指着门前一片麦子间杂着苜蓿草的庄稼说：“我的新试验就在这里面啊！”的确其中有十几棵麦子长得特别好。他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新发明。

“我是专门管接树的。过去曾经给地主把桃树接在柳树上，秋桃接在夏桃上，或者把不结桑子的桑树接在结子的桑树上，只要活了，都能改良品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12个人一小组，种着一片土地。有一天我试着将削尖了的麦秆插在苜蓿秆上，外面用桑皮包上，几天后果然活了，长得又快又肥。我后来又把麦粒放在苜蓿的根中，试验了10棵，也都活了。这十几棵麦子便是我接种试验的结果。它们比普通麦子抵抗力强，能够抗旱、抗风、抗虫，用不着浇多少水就可以活了。过去我们连包谷都吃不上，现在已能吃上白面，我就有闲空来搞新玩意了。”

我真想不到在这边疆的沙漠田中发现了“米邱林”，这虽然有待于科学的论证才能普遍推广，但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们的无穷智慧得以发扬，这是多么可贵的事啊！

关于骆驼刺上边长西瓜，据驻此的人民解放军谈：他们确曾从骆驼刺上摘下西瓜来。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西瓜在沙地里才能长得好，它的性质是和骆驼刺有些相近的。至于桑树上结棉花，我想只是传说而已。桑树是木本，棉花是草本，怎么能够接种呢？但据阿不都拉阿洪说：“桑树上是可以接棉花的。”也许他正在想着试验或者已经试验，但我们究竟没有看见实物，同时其他的人也说不出所以



解放军种植的新疆特产“哈密瓜”也获得了丰收

然，所以至今还是一个谜。

在阿克苏西门外有一个180亩地的大园子。过去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一个军官买下来想作为私人的花园的。但树木还未栽上，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已作为人民解放军某师师部的耕作地。某师的师长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什么花园，要的是劳动生产。”里面种着稻、麦、棉花以及各种菜蔬等。农忙时，师长带头，师部的所有干部都前来参加劳动。平时只要四个人管理就够了。一年所得已可供师部的食用而有余。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我爱的是那肥硕丰盛的果实。他们因为精耕细作，管理得法，所以各种收获都要比别人高。我们前来参观时，正是向日葵的收获季节。向日葵子堆成了高山，每个结籽的花托，都有几个人头大。师部的战士们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常常和附近的维吾尔族农民们联欢，彼此交流着生产的经验，把多余的生产产品送给农民。





阿克苏是有名的塞外江南，它以生产大米著名，大米的颗粒比一般都大。在这富饶的土地，在这柳暗花明的美景中，由于某师的积极建设现在街头已经有了电灯。这是在南疆的街头唯一有着电灯的地方。

如果说到战士们的创造，那真是太多了。他们在戈壁滩上挖着几百公里的大渠，他们要化戈壁为绿洲。他们建筑着大工厂、大农场，他们要把新疆推向工业化的前途。人们只要记着一条规律：“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那么就会理解到战士们的创造是多么的丰富。我现在要说的是在拜城的一件小事。拜城近郊的山中矿产丰富有煤、铁、铜、锡等，维吾尔语“拜城”原是丰富之意。驻此的人民解放军某团的战士们在山中挖出了铁砂，当地的老百姓都是用土法治炼，他们想要用新法来改进，但掌握科学技术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农民出身的战士。有一天，该团的政委从《科学技术通讯》上看见了用通天炉炼铁的简易方法，便告诉了战士们。战士们在想：怎样搞个通天炉来才好。但一时无从取得，他们便想仿照杂志上的图样来自造，但通天炉需要用耐火砖，耐火砖又哪里去搞来呢？正好有一个从迪化来的人告诉了他们耐火砖的制造方法。他们居然把耐火砖制造出来了，于是通天炉也按着图样试造成功了。但困难的是铁砂放在炉里熔化后铁流总不能从炉门口流出来，他们一次次地试验一次次地记录下铁砂的数量，火力的大小，时间的长短，但都失败了。他们曾把五次试验的详细记录寄给《科学技术通讯》，但至今没有回音。在第六次上，有一个战士用铁棍从上面捅进去，终于缓缓地流出了一点铁流。他们恍然大悟，这是空气压力不够的缘故。当然这试验还是没有成功，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试验着。

我所以提这件事的原因，第一，人们可以知道边疆战士是如何盼望关内的技术人员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该团的政委曾说：“我们只要分配到一个学技术的大学生就满足了。”第二，《科学技术通讯》的负责同志如果想到边疆战士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迫切地盼望着一封回信来解决问题，也不至于弃而不顾了吧（那封信后来也许回了）。第三，边疆战士伟大而坚毅的创造精神表现在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上，都值得我们歌颂哩。



三、克孜尔的千佛洞

我以前曾经提到：南疆沙漠中丰富的古文物宝藏几乎全部被英、日、德、俄等“考古家”一网打尽了，其中尤以斯坦因盗窃最多。但我们这次在距拜城克孜尔镇30里外的千佛洞中，竟看见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洞。令人惊喜交集。

这里的千佛洞是与库车的千佛洞一脉相连的，前者在渭干河上游，后者在渭干河下游。这里住着5家老乡，27口人，他们几乎很少与外界来往，自己种着田地，养着鸡犬。新中国成立前湖南韩乐然君曾在此工作过。他摹临了不少壁画，并且收集了不少材料，但从迪化回关内途中，因为飞机失事，他本人和他辛勤工作的成果全部都同归于尽了。老乡们带我们攀登高山，遍历各洞。在第一山洞中有韩乐然先生的石刻题词，记述他在此工作的梗概。其题词如下：

“余读德勒库克等《新疆文化——宝库》及英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知新疆蕴藏古代艺术品甚富，遂有入新之念。于1946年只身来此。观其壁画琳琅满目，均有重要艺术价值，为我国各地庙洞所不及。可惜大部墙壁被外国考古队剥去，实为文化上一大损失。余在此试临油画数幅，留居15天，即回关内做充实准备。翌年4月19日携赵宝棋、陈天、樊国强、孙必东二次来此。首先编号，计正附号洞75座。而后分别临摹、研究、记录、摄影、挖掘，于6月19日暂告段落。为使古代文化发扬光大，敬希参观诸君特别爱护保管。最后于12号洞下挖出一完整洞，计6天，60工。壁画新奇，编为特一号。”

那所谓的75座洞已不是什么完整的洞了。不过比我们在其他各地所见的遗迹要稍微多些。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六朝藻井的遗迹，几个完整的塑像，和残留的不同的壁画。那个完整的洞深埋在山脚下，韩君曾在洞门口做了一道木门。老乡们刨去了门前的流沙，我俩才能进去。里面的光线非常黯淡，靠着几支手电棒的光才把它照亮。那顶上的全部佛传故事绘画得精致极了，从释迦牟尼的降生到死都有着极复杂的过程。色泽依然鲜丽，保持着当年的原状。据向达教授鉴定，这是唐以前的作风，两壁的菩萨像与供养人像却因泥土风化的关系已经



有些损坏。这里的老乡们十分懂得爱护古物。我们看完后，他们又把门关上，用流沙覆盖起来。

富饶的南疆，和南疆热情的维吾尔人民，还有那无坚不克的战士们，永远令人怀念着，以上所述的虽是几件小事情，但也是那般动人，令人留恋不置。南疆正在前进中，它将是屹立在祖国边境上的最美丽的大花园。



著名的吐鲁番盆地

已经9月下旬了，吐鲁番盆地里仿佛还在过着盛夏。这是世界最著名的洼地。它的最低处低于海平面283米。它的三大中心——托克逊、吐鲁番、鄯善三县，除后者地势较高外，也都低于海平面。托克逊为-45米，吐鲁番为-15米。这里不仅物产丰富并且还充满了汉唐以来的古迹。坎儿井和葡萄沟尤为遐迩闻名。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踏上了这向往已久的吐鲁番盆地。

一、和坎儿井工人谈话

到达吐鲁番的当天，我们曾和此地的坎儿井工人进行谈话。我这里必须首先说明：什么叫做坎儿井？

这是一种地面直井与地下暗渠相结合的水利灌溉工程。吐鲁番盆地的水源大部依靠于博格达山峰上的积雪。但盆地是那样地酷热：当雪水从山间流到中央平原地带时，几乎全部消耗于蒸发或者渗透到地层下面去



了。怎样利用这些水源呢？当地的各族人民发明了坎儿井水利工程。

这是一种艰巨而伟大的工程。它的开掘方法与采矿工程中开平巷的方法相仿佛。在离田园20公里的中央平原或山脚砾石地带先选一地面坡度最大的线，在这线下挖一暗沟：一端露出地面；一端深入地下，直达水源处。暗沟的坡度必须小于地面，这样才能使水源缓缓地流出地面。每挖暗沟三四丈，或五六丈，必须在地面凿一直井以作输出泥沙和通风之用。暗沟有长八里、十里、或二三十里的，因此每一暗沟在地面出现的直井口便从十数个到十个不等，最多的有达一二百个的。暗沟越挖越远，直井也就越开越深最深的有达30余丈的，当然也有没挖到水源而半途而废的。这种直井口在平时是被用沙砾堆成馒头似的小山丘封闭起来的，每届春季清除暗沟中的淤泥时才开启。它的口宽不及二尺，长可四尺许，可容一人上下。下面的横渠则可容两人通行。我们在吐鲁番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所看见的一串串连接成直线的小山丘，那便是伟大的坎儿井工程的标志。

维吾尔族工人塔依尔今年45岁了，他一家子祖祖辈辈都从事于挖掘坎儿井的工作。据他记忆已经有170余年的历史了。过去有些书上记载着，坎儿井是清末林则徐谪降新疆时倡导的，这种说法可以不攻自破了。坎儿井为吐鲁番盆地各族人民的命脉，我相信它被发明的年代很早。有说从希腊传过来的，也有说从陕西关中传过去的，这样的说法或有几分根据，因为这里原为古西域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但我更相信这是此地各族人民，主要是维吾尔族人民，创造与劳动的成果。

“过去所有的坎儿井都是属于地主的。”塔依尔带着无限愤懑的眼光说：“地主垄断水利剥削农民的情况，比起地租来还要凶得多。农民托乎提租了地主乌斯满能浇4亩瓜地的坎儿井水，每亩水租就是9斗麦子，占瓜地总产量的45%。有时水租和地租合起来就要超过总产量75%以上。我们工人同样遭受着地主残酷的剥削。我们每年冒着生命的危险替地主修井——有时上面的绳子不牢固，就有摔死的危险；有时里面岩层塌下来，就有被压死的危险。但所有得到的是什么呢？讲定的工资是一石五斗包谷，地主却从来不肯付现。经过我们三番五次地要求，地主总说包谷没下来不肯给。最可恨的是：地主藉口我们



要工资就向农民拼命勒索租子。农民交不上租子，地主就不给水用。我们拿不到工资就只有用重利向地主借来吃，我们的工资就在重利剥削下变得无影无踪。这样闹得工人与农民两不满，而地主却成了老财。”塔依尔那因挖井而受伤的身体上还残留着深刻的伤痕。

地主剥削的年代就要过去了。比塔依尔小20岁的他的弟弟阿不都尔就深深地体验着今日生活在毛主席时代的幸福。这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无限兴奋地接着哥哥的话说：“共产党来了就好了。今年县人民银行贷给了款子，我们把10余年未出水的董家井给修复了。工人们真是高兴得什么似的，他们白天90个工，夜晚70个工，日夜赶修，仅仅四天半，这废弃已久的老井就出水了。劳动了几辈子，从来没有权使用一滴水，而今天我们工人有了自己的井。”在他那明亮的眼光中，手舞足蹈的神情中，不知蕴藏着多少欢乐！

吐鲁番县人民政府曾号召修复废弃的旧井。凡参加修复旧井的工人都有权管理这井，他们供给农民用水的价格是每浇地一亩，一次收费1.5万元。农民们都愿使用工人的井。他们曾经自动集资请工人们修复了另外一口旧井。据说全县待修复的旧井还有13口，今年可全部予以修复了。

吐鲁番减租反霸办法上的规定：水租不得超过所灌溉土地常年总产量的30%，但这在农民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他们热切地盼望和工人合作来修复旧井，并且盼望1953年的土地改革来解除他们的束缚。

吐鲁番的坎儿井有320口，修井的工人约有千人上下。我从他们那欢乐的面庞上，和那劳动的热情上看出他们将使这作为吐鲁番各族人民生命线的坎儿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阿不都尔曾说：“我们能够有今天，完全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怎么可以不加倍努力工作呢！”

二、葡萄沟

距吐鲁番城东15公里的葡萄沟是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在傍山依水的一条十余里的山沟中铺满了葡萄田。两岸白杨参天，柳树覆



荫，绿阴深处点缀着无数维吾尔族人家的小土屋，门前的溪水潺潺地流着，孩子们三五成群地玩耍着。我们经过一段酷热的沙漠来到此地，顿觉暑气全消了。

9月，正是葡萄的收获季节。我们看见了各式各样的葡萄。产量最多而最有名的叫着“吐尔甫”的水晶葡萄。它无籽、色白、味极甜，专为晒葡萄之用，因为它晒干后可以保持原状，经久不坏。其次为“马奶子”，长圆、色青绿，与关内所见者相同。另外还有红葡萄、圆葡萄、白葡萄、黑葡萄、“贝加克”，和“红加”等六种。其中又以红葡萄最为名贵，红葡萄亦名“红马奶子”，因产量不多，且不易保存，一般仅作为款待宾客之用。“红加”是作药用的，也有用于“抓饭”内。其他各种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了。

新疆盛产葡萄，特别是吐鲁番城北的葡萄沟所产的葡萄品质最好





这里种植葡萄的方法亦和关内不同，我们称它为“葡萄田”是名副其实的。一亩地中大致可以种植十二三棵葡萄。每棵葡萄都高不及二尺用短木桩支撑着，其枝叶向四周蔓延，累累的果实俯拾即是。春天人们把葡萄树从土里挖出后，就予以剪枝并上肥料。这样可以使得葡萄在6月开花后长得肥硕壮大，同时在低处结果，也可以避免鸟类的伤害。在地主庄园里也有搭得很精美的葡萄架，那是为乘凉用的。我们看见了一间精细的葡萄绿屋。架子完全搭成了屋子的形式，门窗俱全，坐在里面真是阴凉无比。但在目前，这还与劳动人民无关。他们种植葡萄完全是为着收获。

葡萄沟里的农民们的生活正在渐渐改善。62岁的阿不都尼牙子乡长说：“反动统治时代，公差过多，我们的牲口常常被拉走。现在人民政府实行着合理负担，有意见就可以提。过去100斤葡萄干只换3斗麦子，今年8月王震司令员亲自来到这里，把葡萄价格提为每百斤换5斗麦子。我们的生活好过了。过去我们要把葡萄干驮到吐鲁番，再转迪化销售，现在可以不出门，由贸易公司前来收购了。”他是一位中农。一家13口人种着八亩八分地，每年可收葡萄干1500斤。

最令人感觉兴趣的是晒葡萄干的方法了。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附近的山岭上，他们用土砖建筑了一座座仿佛碉堡似的房子，有的是两层楼似的。这种房子四壁是镂空的，里面用树枝搭成架子，顶上亦用树枝纵横地覆盖起来。树架上挂满了成串的葡萄后，便把门用泥土封上。经过40天，屋里的葡萄便成为晶莹甜美的葡萄干了。这种晒葡萄的房子由于在高空，气候干燥，空气流通，从来没有苍蝇蚊子的打扰，是非常合乎科学原理的。那刚晒干的美丽的葡萄干真是又干净又芬芳。在当地的零售价格，每斤为人民币3500元。它比过去美国在中国推销的“美女”牌葡萄干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了。

这般精美的葡萄干为什么没有大量推销到关内来呢？主要是交通问题。毛主席在庆贺天兰路通车的题词中有“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号召。这伟大的号召对于新疆各族人民将是多么大的鼓舞。葡萄干大量销行全国的时候，葡萄沟人们的生活也将大大地提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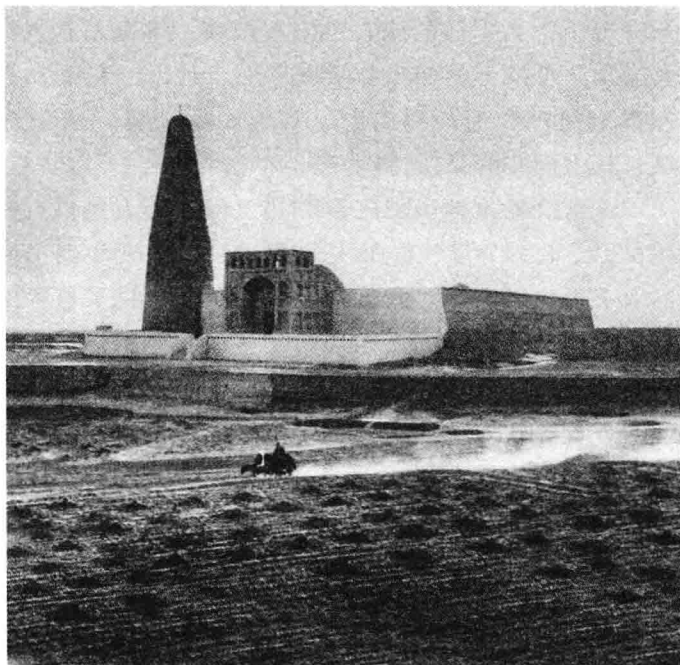


三、从古到今

吐鲁番盆地在汉唐时代曾为古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这里充满了辉煌的古迹。吐鲁番县城亦分为回汉两城。回城为商业中心，汉城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两城相距2公里，在回城中有关帝庙，在去汉城的路上有文昌宫。这是汉族文化在此地所留下的影响。

我们曾经走出吐鲁番城外，沿着火山东行32公里到达胜金口。那远远地呈现在面前的一脉红色山岭，令人想起了《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在胜金口有一块唐僧的拴马台，还有无数的古庙。在残破的遗迹中，依稀可辨古代的大土砖。此外还有四个千佛洞残留着一些斑驳的壁画。胜金口是吐鲁番通往哈密的隘口，只有几户人家，但来往的车辆很多。我们又从胜金口沿着蜿蜒的火山南行到达土峪沟，这已是鄯善县境了。吐峪沟的风景仿佛葡萄沟，但前者比后者还要深邃幽静。

吐鲁番城郊的清真寺





当地的维吾尔族“巴郎子”听见远客来临，争先恐后地前来带路。我们顺着一条铺满了葡萄田的山沟走上去，只见两岸的崇山峻岭中布满了数不清的千佛洞。但除了少数洞中的壁画和塑像还比较完整外，大部分都已剥蚀殆尽。我们在高山岭上还挖掘出一些片纸只字的古经，有印度文的，有汉文的。这可以想见当年此地古文化的盛况。胜金口与吐峪沟都充满着古迹，但和南疆其他各地一样，早被40余年前斯坦因和勒库克诸人掠夺而去了。

从吐峪沟出来原想再往西南到高昌古城，因为那是隋唐时高昌国的故址。但汽车陷于沙窝中，无法前进了，我们只好从原路折返吐鲁番。在暮色苍茫中，那骑着马或牵着骆驼的维吾尔族晚归人，在沙漠中面向西天跪下、虔诚地做着晚祷的图画，给我们的访古之行添上了无限的诗意。

吐鲁番盆地的居民仍以维吾尔族为主，回族次之，汉族又次之。他们今天在民族真正平等的政策下，各自尊重着彼此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和睦地相处着。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吐鲁番的回城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彼此贸易的盛况。很多回族人开着饭馆，为来往的旅客供应着饭菜；维吾尔族人在沿街出售着各种农产物。瓜摊上的西瓜与哈密瓜堆成了山，有重70斤以上的大瓜。吐鲁番不仅盛产葡萄和瓜果，其他如豆、麦、稻和芝麻等都是一年两熟，其中棉花的品质特别好。

这富饶的盆地虽然气候酷热，但各族人民自有避暑的办法。他们在6、7、8三个月气候最炎热的时候，白天便到了地下室，等到太阳下山了再出来活动。我们在县政府里便看见了这样的地下室。屋顶是凸出在地上的，地面上也还留了一尺光景的空隙装置着窗子以便透光与通空气在深深的地下室中，人们照样可以工作和活动。

听着各族人民在过去被压迫时代，在勉强维持生存的条件下，曾经有那样多的创造：从千佛洞中辉煌古壁画到伟大的坎儿井工程；从科学的晒葡萄干方法到阴凉的地下室等……今天，压在他们头上的大石头被扳倒了，他们将发挥更大的智慧来创造新生活。著名的吐鲁番是世界上最低的洼地，它也将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编辑说明

编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的《新疆新观察》一书，收入了储安平《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与蒲熙修《新疆纪行》两部书。

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依据的是作家出版社1957年1月初版本。因为储安平对新疆的采访报道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新观察》等报刊，报道的精选集名为《新疆新面貌》，副标题则是《新疆旅行通讯集》。

蒲熙修的《新疆纪行》，依据的是平明出版社1953年4月初版本。

《新疆新面貌》与《新疆纪行》这两部书的写作时间大致相同，反映了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新疆，特将其一并奉献给读者，可以为新疆的新起点——1949年和平解放，留下深刻记忆。

这两部书的作者，当时都是以记者身份面对的新新疆，《新疆新面貌》与《新疆纪行》原本都有数量比较多的插图，但原书插图清晰度达不到今天的标准。我们从50年代初期有关新疆的图片（主要依据《人民画报》）之中，另选取了同一时期、同一主题的图片做了替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新疆新观察

页数=284

SS号=13482029